



少年中国评论文萃

第一期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Review.youngchina.org

二零一一年六月

少年中国评论文萃

第一期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REVIEW.YOUNGCHINA.ORG

二零一一年六月

走入广阔天地，在大风大浪里成长

◎特约评论员 邵钟萍

历史发展总是向每个时代里的最优秀的分子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适应了时代挑战，才能不断壮大、发展。修正主义头子整天絮絮叨叨挂在嘴边的“与时俱进”，正反映了他们本能地感到时间主动权并不在他们手中。脑满肠肥的首长们，步履蹒跚地盘踞在历史的窄道上，试图让无产阶级新生势力无路可走。但是，和一切反动势力的设想相反，最敏锐的一批先进分子已经重新开始了在低谷里的逆风长征，将庸人啼啼哭哭的忏悔声和七嘴八舌的奚落声远远甩在了身后。

要想实现社会的变革，必须有实行变革的主体。要有一个有力量、有目标的集体执行历史的判决，通过漫长的斗争，次第夺取社会和国家机器的领导权。这样一个集体必须是最得到人民信任的，也是最了解人民的。而这样的集体，要求有大量的先进分子作为其中的构成材料，他们来源于社会大众，在实际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中锤炼为合格的政治知识分子。

这样的先进分子，必须具有独立进行科学地思考政策和策略的能力。任何运动的开创、发展和最终胜利，都不能须臾离开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政策的依据只能是对当前世界和中国根本性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策略的依据只能是对一定时期国内外各阶级力量对比和斗争局势的观察。要想准确判断局势，就不能不懂得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真相。我们不但要知道社会上各种势力斗争的动态，还要熟悉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行情，甚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吵。正如列宁所说，我们需要能够了解整个官方世界秘密的各方面人才。

然而，重中之重是要熟悉当代工人、农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工业化的新兴大国，有着最广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有着光荣的革命造反传统和深刻的红色政权记忆，有无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学习。调查研究是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绝不能将眼界限制于狭小的书斋。

马列主义者的调查研究，并不同于学院社会学家的数据堆砌。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要想担负低潮期的革命责任，就必须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全方位改造自我，在感情上也真正站到人民大众一边。在调查研究中，逐步培养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适应不同职业群体和地域文化的能力、计划和领导实际工作的能力。当调查研究逐步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风气时，我们将从庸碌政客和大言书生的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基层动员能力也将大大地发展。

做实际的调查研究，特别需要有卓越的理论思维，随时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辨别事物的真伪粗精。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来是如影随形的。以“接触实际”为名，拒斥理论，只会导致在纷繁芜杂的现象面前无所适从。不能懂得规律，形势判断的预见性和准确性也就无从谈起，最终必然错失历史的良机，甚至滑向机会主义。

调查研究是为了科学判断形势，而不仅仅是为了鼓动宣传，所以必须有实事求是之意，来不得半点哗众取宠之心。靠浮夸的描述，甚至虚假的谣言来煽动群众，也许会取一时之宠，但不可能赢得群众长期的信任和衷心的拥护。如果我们和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一样，沉迷在自我制造的荒诞想象里不能自拔，导致政策和策略的错乱，那将是对历史的犯罪。

通过调查研究的基础工作，让新生力量走入广阔的天地，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通过大风大浪的检验，亲身体验过失败和成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将全方位锻炼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使每一个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都可以将学者的缜密和工程师的精细结合起来。当然，只有不畏艰险与劳苦、勇于直面各种诱惑的人，才能面对汹涌的自发势力牢牢掌握住真理的航船。

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一次对人压迫人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虽然由于产业的区划、民族的隔阂等原因，斗争实践常常被分割为不同的战场。但如果想取得符合被压迫者根本利益的成就，必须始终铭记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的革命左翼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难免时而和民族主义者，时而和自由主义者形成事实上的不稳定的联盟。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本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并不会改变。左翼中某些人对他们的口号毫无批判，甚至将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纲领直接说成是当前斗争内容的全部，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种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投降的行径，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警觉。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在对这些叛卖行径进行辩论、批判的过程中，将深化我们对当前政策和策略的认识，擦亮革命者的眼睛。在路线斗争的风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才会具有争取主导权的能力，非但不会破坏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联盟，反而会增强未来将会形成的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狂飙马上会袭来，雄鹰知道，任何怯懦和犹豫都无济于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调查研究

工人调查表	. 马克思	2
调查提纲（1894—1895 年）	. 列宁	8
理县记行	. 带 Q 过人	12
给我给我力量啊	. 王小晦	18
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思考——零年夏成都调查报告	. 沉浮	20
校清洁工生活工作实态调查报告	. 李捷	31
凄风苦雨中的毛泽东展览馆	. 中华布尔什维克	35
重庆万盛失地农民考察报告	. 思余	37

中流击水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 CCTV 狗血连续剧	. 马前卒	48
关于“玩革命”与革命理想	. 马前卒	67
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一些问题	. 阿土	70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 黑夜里的牛	74
张宏良的左转理论及其对中国左翼运动的变革	. 实存之城	79
以无产者的名义	. 高流	90
关于学生中的成功学	. 月满青山	94
资本主义时代为何如此漫长——一点个人看法	. DesertHX	96

理论视野

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	. 王虹	100
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些必要的分析	. 黑夜里的牛	10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 柳知秋	113
YCA 学习活动讨论总结	. 黄铭	123
国际共运遭遇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	. 左派星火	127
纯经济学还是现代社会的巫术？	. 萨米尔·阿明	136

文艺评论

电影《托洛茨基》观后感	. 黑暗骑士	142
《集草为巢》影评：印度农民工的苦难	. 路易的学生	143
为了劳动者的理想	. 黑夜里的牛	146
再读马雅可夫斯基	. 季娜伊达	148

革命时期的爱情

.路德维希 150

译文选编

利比亚局势评论两则	.泥石流等 154
与埃及社会主义者的谈话	.赵丁琪 157
生活水平对比：苏联 1980 与美国 2008	KGB1986 161
苏联生活水平统计	.KGB1986 171
在黑格尔之前的列宁	.带 Q 过人 179
如何从头开始	.带 Q 过人等 187

马克思主义研习推荐书目	. 194
少年中国荐书榜	. 198

后记	. 204
----	-------

调查研究

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卡尔·马克思

在调查研究时，要深入到基层中去，在切实掌握丰富的具体材料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成功和失败的真正原因。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莫过于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

——弗拉基米尔·列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毛泽东

工人调查表

作者: 马克思

编辑说明:

《工人调查表》是马克思应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主编贝•马隆的要求，于1880年4月上半月编写的，4月20日在该杂志上发表。这份调查表还印成25000份传单在全法国散发。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运动大大衰落，70年代又慢慢得以恢复。当时的法国7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工厂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的普遍使用却越来越恶化。90年代前，没有社会立法，没有疾病和养老保险，工会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工人每天工作10-12小时，而所得的工资甚至不够维持温饱。1879年到1880年初，巴黎、里尔、兰斯等城市都曾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为发表《调查表》写了下述前言。

“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都还不敢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认真的调查。可是，关于农业危机、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商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调查却有多少啊！”

英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行径的揭露，以及由这些揭露引起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如法律许可的工作日限制为10小时，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更加害怕由于进行公正和系统的调查而带来的危险。

我们希望也许我们能促使法国共和政府仿效英国君主政府的榜样，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所作所为及其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因此我们利用自己的一点有限的款项，试图为这件事作出一个开端。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得到所有城乡工人的支持。他们懂得：只有他们才能非常熟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苦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难。我们也期望得到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既然他们想进行社会改革，那就应该愿意准确而清楚地了解工人阶级这个未来正是属于它的阶级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条件。

这种收集劳工资料的工作是社会民主派为了准备社会革新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下面列举的一百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回答问题时必须写明所答问题的顺序号码。不一定要回答全部问题，但我们建议尽可能回答得具体和详细些。回答问题的男女工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许可将不予公布，但是名字和地址仍须写明，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联系。

请将答复寄交巴黎近郊圣克鲁，罗伊亚尔街28号《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负责人累克吕兹先生。

收回的答复将进行分类整理，以便为专题著作提供材料。这些专题著作将由《社会主义评论》发表，以后还将汇集成册出版。”

马克思早在1866年为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就提出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工人阶级状况统计调查大纲。大纲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此后，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强调了进行这种统计调查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实行起来十分困难。

《工人调查表》实际上是把统计调查大纲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扩充。《调查表》的手稿

是用英文写成的，共开列了 99 个问题，分成四组，每组问题分别单独编号。《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法文译文则不分组，总计 101 个问题统一编号，其中第 88 个问题“请说明劳资调解委员会是怎样工作的”和第 101 个问题“总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里是没有的。此外，在个别问题的内容后面，法文译文作了一些补充。

马克思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进行这样的调查，能够确切地了解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种种形势和方法，从而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十分确切的事实材料来开展和领导工人运动。

—

- (1) 你在哪一个工业部门工作？
- (2) 你所在的企业是私人资本家经营的，还是股份公司经营的？私人雇主或公司经理的名字叫什么？
- (3) 请说明雇用的人数。
- (4) 请说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 (5) 招收童工（男童和女童）最低年龄是几岁？
- (6) 请说明监工和不是一般工资劳动者的其他雇员有多少。
- (7) 有没有学徒？有多少？
- (8) 除了经常的和固定的工人以外，是不是在一定季节还从外面招收另外的工人？
- (9) 你的老板的企业是全部或主要为当地主顾生产的呢，还是为整个国内市场或为了向外国出口而生产的？
- (10) 你的工作场所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1]
- (11) 如果你是在乡村工作，那么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务农为主做工为辅或两者相结合？
- (12) 干活是完全或主要用手工，还是用机器？
- (13) 请说明你所在企业的分工情况。
- (14) 用不用蒸汽作动力？
- (15) 请说明工厂各个部门占用工作间的数目。谈谈你所从事的那段工序，不仅从技术方面，而且还谈谈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
- (16) 请谈谈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每个工人的活动空间），通风，温度，粉刷，厕所，一般的洁净程度，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等。
- (17) 政府或市政机构对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有没有某种监督？
- (18) 你所在的企业里有没有引起工人患特殊疾病的特殊的有害的因素？
- (19) 工作场所是不是摆满了机器？
- (20) 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来防止工人的肉体受到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械的伤害？

- (21) 请根据你亲身的经历谈谈发生过哪些造成工人残废或死亡的重大事故。
- (22) 如果你在矿上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为保证通风、防止爆炸和其他危险事故，采取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 (23) 如果你在冶金或化学生产部门，在铁路或其他特别危险的生产部门工作，请说明你的雇主是否采取了防护措施？
- (24) 你的工作场所用什么照明？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设备？
- (25) 一旦失火，在工作场所内外有没有足够的脱险设施？

- (26) 根据法律，一旦发生事故，雇主是否必须对事故的受害者或他的家属给予补偿？
- (27) 如果不是，那么雇主是否用某种方式给那些为他发财致富而在工作时受伤害的人以赔偿？
- (28) 在你的工作场所有没有某种医疗服务？
- (29) 如果你在家工作，请谈谈你工作间的状况；你用的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的机器？你是否利用你妻子和孩子们以及其他帮手（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一个“企业主”干活？你同企业主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经过中间人？

二

- (1) 请说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 (2) 请说明一年有几个假日。
- (3) 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间断时间？
- (4) 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或吃饭是不定时的？[2]
- (5) 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
- (6) 如果使用蒸汽动力，请说明实际的开关时间。
- (7) 开不开夜工？
- (8) 请说明童工和 16 岁以下的少年工人工作时间。
- (9) 在一个工作日内，童工和少年工人是不是换班？
- (10) 现有的经立法机构制定的关于童工劳动的法律，政府是否付诸实施？雇主是否严格执行？
- (11) 有没有为你所在工业部门里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的学校？如果有，孩子们一天里什么时间在校学习？他们学些什么？3[3]
- (12) 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换班——班工人接替另一班工人一是怎样安排的？
- (13) 在生产繁忙时期，工作时间比平常延长多少？
- (14) 机器是别外专门雇一些工人来擦拭的，还是由操作机器的工人在正常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 (15) 采用哪些规则和处罚办法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饭后准时上工？
- (16) 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从工作地点回家要花去多少时间？

三

- (1) 你同老板订的是哪一种合同？是按日、按周、按月或其他？
- (2) 解雇或辞职，按规定要在多长时间以前通知对方？
- (3) 老板如果违反合同，要受什么样的处罚？
- (4) 工人如果违反合同，要受什么样的处罚？
- (5) 如果雇有学徒，请说明他们合同中的条件。
- (6) 你的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 (7) 你所在的工业部门是基本上在一定的季节进行生产，还是通常比较均衡地全年进行生产？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那么在其他时间你靠什么收入生活？
- (8) 你的工资计时还是计件？
- (9) 如果是计时，是按钟点还是按整个工作日？

- (10) 加班是不是另给工资？给多少？
- (11) 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请说明计算方法。如果在你工作的工业部门里完成的工作是用长度或重量计算的（例如煤矿），那么，你的老板或他的手下人是否用欺诈手段骗去你的部分工资？
- (12) 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产品质量是否被用作欺诈的借口，来克扣工资？
- (13) 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你过多长时间领工资？换句话说，在你领到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工资以前，你必须让老板对你欠多长时间的帐？工资是过一个星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发给？
- (14) 你是否感到，这样拖延发工资，就迫使你经常跑当铺，给当铺付高利，失去你需要使用的器物，或者迫使你向小铺老板赊欠，变成他们的债户，从而成为他们的宰割对象？[4]
- (15) 工资是由“老板”直接发给，还是经过中间人或“包工头”等等？
- (16) 如果工资是经过“包工头”或其他中间人付给的，请列举你的合同条件。
- (17) 请说明你一天或一周工资有多少钱。
- (18) 请说明和你在同一车间一起干活的女工和童工在同样时间内所挣的工资。
- (19) 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日工资。
- (20) 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计件工资。
- (21) 请说明在上述时间内你实际挣到多少钱；如果你有家，也请说明你妻子和孩子挣到多少钱。
- (22) 工资是付给现金，还是一部分付给别的东西？
- (23) 如果你的住房是向你的雇主租赁的，请说明租赁条件。雇主是不是从你的工资中扣除房租？
- (24) 请说明你的各种生活必需项目的价格，例如：[5]
- (a) 房租和租赁期限；有几个房间；多少人住；房屋修缮和保险；家具购置和修理；床铺；取暖、照明和用水等等；
- (b) 食品：面包、肉类、蔬菜（马铃薯等）；乳制品、鸡蛋、鱼；黄油、食油、脂肪；糖、盐、调味香料；咖啡、茶叶、菊苣；啤酒、苹果酒、葡萄酒等；烟草；
- (c) 衣服（父母和孩子的）；洗衣；卫生用品，洗澡，肥皂等等；
- (d) 其他开支，如：邮资，还债和付给当铺的保管费；孩子上学的各种开支，学习技艺的费用，买报，买书等等。交给互助会、罢工基金会、各种联合会、工会[6]等等的会费；
- (e) 和你从事的职业有关的开支（如有这种开支）；
- (f) 捐税。
- (25) 试将你一周的、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有家，再加上你的家庭收入）和一周的、一年的支出以预算的形式开列出来。
- (26) 根据你的亲身体验，你是否觉得，生活必需项目的价格（如房租、食品价格等等）的上涨大于工资的增长？
- (27) 请说明你所记得的历次工资变动情况。
- (28) 请说明在萧条或危机时期工资降低的情况。
- (29) 请提供在所谓繁荣时期工资增长的情况。
- (30) 请谈谈由于时尚的改变和局部或普遍的危机而造成停产的情况。[7]
- (31) 你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或你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如果改变，你的工资是同时改变还是不变，请以对照形式说明。
- (32) 在你的工作经历中，是否有过由于采用机器或其他改进而解雇工人的情况？

- (33) 由于机器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 (34) 你是否知道，什么时候有过由于生产改进而提高工资的情况？
- (35) 你是否知道，有哪个普通工人在年满 50 岁时可以退休而靠他做雇佣工人时挣的钱过活？
- (36) 在你所在的工业部门里一个中等健康水平的工人可以工作多少年？

四

- (1) 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工会[8]？他们是怎样管理的？[9]
- (2) 根据你的亲身经历，你们行业发生过多少次罢工？
- (3) 历次罢工的时间有多长？
- (4) 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
- (5) 罢工是为了要求提高工资，还是为了反对降低工资？是因为工作日的长短，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
- (6) 罢工的结果怎样？
- (7) 你们行业的工人是否支持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
- (8) 请谈谈你的老板为了管理他的雇佣工人而规定的规章以及违反规章的处罚办法。[10]

- (9) 老板之间有没有联合成组织，以便迫使工人接受对工资的降低、对工作日的延长、对罢工的干涉，总之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
- (10) 根据你的亲身经历，有没有政府方面滥用武装力量来帮助老板反对工人的情况？

- (11) 根据你的亲身经历，这个政府是不是曾经帮助过工人反对老板们的侵犯和非法联合？

- (12) 这个政府是否对老板贯彻执行工厂法（如果有这样的工厂法）？政府的工厂视察员（如果有这样的视察员）是否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 (13) 你所在的工厂或行业中有没有应付不幸事故、疾病、死亡、短期丧失劳动力、年老等情况而组织的互助团体？
- (14) 加入这些团体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些团体的基金是否完全由工人掌握？
- (15) 如果交纳会费是强迫的而且会费是由老板掌管的，那么老板是否从工资中扣除这些会费？他是否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辞职或被解雇的工人，能不能收回自己每次所交的钱？
[11]
- (16) 你所在的工业部门有没有工人合作企业？它们是怎样管理的？它们是否也像资本家那样从外面招雇挣工资的工人？[12]
- (17) 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这样做的工厂：付给工人的报酬中一部分用工资的名义，另一部分则用所谓分红的名义？请把这些工人的全部收入和没有所谓分红的工人的全部收入作一比较。请说明这种制度下的工人要受到哪些约束。是否容许他们参加罢工等活动，还是只许他们做老板的“顺民”？
- (18) 在你的行业中，男女工人的一般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状况怎样？

卡尔·马克思写于 1880 年 4 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

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

[1]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请写明何地”。——编者注

[2]沙龙格在调查表的手稿上对这一页作了如下补充：“吃饭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编者注

[3]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什么人来指导他们？”——编者注

[4]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据你所知，是否有过因老板的生意破产倒闭而工人拿不到工资的情况？”——编者注

[5]本题从(a)至(f)各页在手稿上是用法文写的。——编者注

[6]手稿上用的是 tradesunions(工会)，《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用的是 societiesderesistance(抵抗会)。——编者注

[7]《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谈谈你自己非自愿停止工作的情况。”——编者注

[8]手稿上用的是 tradesunions(工会)，《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用的是 societiesderesistance(抵抗会)。——编者注

[9]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请附上它们的章程和条例。”——编者注

[10]手稿上删去了如下字句：“自然，在他的工厂里，他把最高的立法权、审判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编者注

[11]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据你所知，有没有工人领取由老板掌管但却是从工人工资中提留的所谓退休金的情况？”——编者注

[12]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请附上它们的章程和条例。”——编者注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33>

调查提纲（1894—1895年）

作者：列宁

少年中国按：

中文版《列宁全集》第2版付印后，又陆续发现了一批未发表过的列宁文献，后收入《列宁全集补遗》，其中包括本文。这份关于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的调查提纲，于1894—1895年冬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和其他小组的鼓动员中间传看。

这份调查提纲是从沙俄警务厅有关1895年12月与列宁同时被捕的以及此后大逮捕时被捕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的案卷中发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心小组成员米·亚·西尔文在其题为《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的回忆录中谈到：“研究各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早就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来了。这是他编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现在要是能在旧宪兵档案里找到它才有意思呢。这种四开纸的调查提纲有4页多，写满了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这种调查提纲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我们还把它复制出来发给其他小组的宣传员。我们非常热心于收集情况，有一个时期，连宣传工作也放弃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收集情况也十分热心。我们工人中不知是哪一个（是舍尔古诺夫，也可能是美尔库洛夫）到他家里去看他时，常常被他盘问得汗如雨下。”（《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卷56页）。列宁本人也在他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提到，他曾围绕与这里发表的《调查提纲》内容相近的一些问题同工人谈过话。

本文是一份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仅展示了革命导师思考和研究工人问题的过程，而且用详尽的提纲教导了积极分子进行工人调查的实用方法，即使今天看来仍然不失鲜活。

一、工厂和工厂主管

1. 厂名
2. 厂址
3. 建厂时间
4. 工厂的管理、生产和劳动规章制度有无变化。主管人、厂长、工长等的变动对工人（其在工厂中的处境及工资等）有无影响。列举最典型的例子。
5. 厂主及主管人的姓名。
分厂或分支部门（车间等）的数目。
6. 逐一列出。

二、工厂工人

7. 男女工人的数目，男女成年人（大致年龄）、少年和儿童的数目。
8. 工人的民族（每个民族各有多少人）。各族工人之间关系如何。对俄罗斯工长等人的态度如何。不同民族之间有无相互敌视的情况出现。原因何在。举例。其他民族工人的开化程度如何。
9. 工人的出身——农民还是本地居民。前者因何种原因被迫入城，是否已经很久。农民出身的工人与城里工人有无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城里的工人对农民出身的工人态度如何；城里的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工人之间有无隔阂和纠纷；两者之间有无交往；农民出身的工人起初和后来的举止如何。
10. 工人是否长期在该厂工作，如有变动，原因何在。
11. 不同工种工人的年龄最高限制。有时是否需要休息。夏季是否去乡下疗养，农民出身的工人是否回乡干农活。是否连续多年在该厂工作。工厂录用条件。体格检查。是否常有这样的情况；经诊断大多数人后来在劳动过程中染上了原来没有的疾病。

三、劳动条件

12. 列举全部工种（机车司机、纺纱工、钳工、车工和粗工等）。各工种工人的数目，注意其性别、年龄。
13. 工作情况。各工种的劳动内容，更多需要的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劳动中不能活动、单调乏味和令人生厌的程度。
14. 厂舍。厂舍的面积、温度和清洁度；指出最差的部门（粉尘、高温、穿堂风和寒冷等）。厂舍的卫生条件。
15. 有哪种机器，机器是否运转的很快（近来速度是否提高），有无危险性（齿轮，传动装置未加遮盖的危险部件），有无防护罩，事故是否经常发生，以哪些事故最为常见，因何引起（通道狭窄、疲劳过度、不停机进行保洁工作）。工人对此持何态度——举出事实。
16. 对致残者有无补偿费，是否经常诉诸法律，哪一方胜诉；举例说明厂方对待致残者偿付的数额以及未作任何偿付的次数；大多数致残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去向如何。

四、工资

（领取条件、提高和降低的原因，付酬期限）

17. 按工种、年龄和性别……发放的工资
18. 与过去的工资水平做比较；如有降低，说明自何时起；如有增加，说明原因；举例。
19. 计件（包件）工资。有无定额（计件活的定量）；如有计件工资，自何时起实行，是否比日工资收入多，有无因工人之间的竞争而提高定额的意向。
20. 某些部门实行日工资或周工资等；工人是否了解日工资或周工资的好处；他们对两者的态度如何——举例说明。
21. 是否有车间之分和车间工资；有无工人所得低于车间工资（“漏底工资”）的情况，厂管理部门对此负多大责任；车间工资较其他付酬方式高多少，工人对车间工资持何态度。——举例说明。
22. 付酬期限，最近有无缩短或延长的情况，工人对不同的付酬期限持何态度。
23. 有无承包人：（1）承包人（领工），只承揽工厂的活，由工厂付酬。（2）承包人（发包件活的人），将自己从工厂承揽的活分包给他人，由他们本人（而不是由工厂办事处）付酬；谁是这种发包件活的人：是工长还是工人；他们是否从工人身上赚很多钱（指剥削和获取利润）；他们是否压低劳动报酬；工人对此尤其是对第二类承包人态度如何；曾否要求取缔这些发包件活的人。

24. 劳动的连续性（不间断性）；工人的劳动何时（哪一季度）最紧张；停工时工人是否领取工资还是最后清帐，是否强迫他们在未最后清帐的情况下等待开工。
25. 该厂有无“失业大军”，该厂有无常年替补人员（他们每天到厂准备顶替腾出的工位）；能否说明失业者产生的原因（受机器排挤，因生产率提高或因该厂的订货中断等）。失业工人对在岗工人的压力是否明显，如工资降低、主管人任意解雇工人的情况增多，恣意妄为变本加厉。
- 26.（手稿缺第26条）
27. 厂方与工人签订的合同和条件书。详细介绍录用条件。如不录用，说明原因——举出事实；每天前来受雇的人数。各季度雇用工人数的增减情况。
28. 关于工人工资的清付。过去和现在有无厂主在付酬时耍花招欺骗工人的情况——详细列举事实。

五、工作日

29. 平时和星期六的工作日长度。按工种、性别、年龄、车间和部门区分；司炉和必须提前上班（为蒸汽锅炉和机器投入运行做准备等）的工人的工作日长度。
30. 倒班；有无倒班，详细说明各班的起讫时间和间歇时间；不同性别、年龄和工种……的工人的夜班情况；工人对该厂的倒班和夜班持何态度。
31. 如对童工的工作日有限制，该限制是否根据工厂检查机构的法规严格执行，此事有谁决定；使用童工是否会导致工人编制缩减和成年工人被解雇。举例说明。
32. 既定工作日与加班有无区别，有无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的情况；如早开机、晚关机、侵占早餐午餐时间等。
33. 有无加班。加班是否经常，是否时间很长，节假日是否强迫工人上班；不同季节的报酬如何。举例说明一周、一个月……加班多少次；哪个季度加班最多；加班使工资降低的情况是否明显，如明显，举例说明。
34. 节假日。节假日天数，过不过星期日，过不过皇家节日和东正教十二大节，节假日是否上班，如何付酬。

六、工人的顶头上司、录用条件、盗窃和罚款

35. 工长、副工长和副工长助手（监工和小包工头等）；工人对他们的态度；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他们对工人的态度（有无辱骂、殴打）；工人是否表示抗议，抗议的结果如何——列举两方面的事实；工长及其他主管人对妇女和儿童的态度如何。
36. 材料质检。如并非操作有误，而系材料不合格（如织工所用纱线有霉烂等），是否罚款。举例详述。
37. 有无工长和工人盗窃材料的情况。是否搜身，详述对妇女搜身的情况（是否脱光衣服，进行人身侮辱）；如有盗窃行为，工人会因此受到何种处理（罚款、解雇、送交法庭处理。）为何盗窃，是否因工资较低。
38. 罚款。列举罚款种类（因迟到罚款，迟到多久罚款，例如迟到15分钟、半天，因缺勤、旷工和不听话等）；罚款数额，多举例子说明，厂主一周、一月内对工人罚款的数额。罚款的用途（资本家获利或是依照法规作为用于工人的基金）。这个法规是否规定要通过注入罚款的办法来发奖金（罚工人的款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说以后再发奖金）。
39. 对丧失劳动能力（因伤残或年老体衰）者如何处置。是解雇或是提供生活保障。是否安排住厂办医院；受害者的医疗费用谁支付——举出事实。

七、机器的保洁、学校、医疗

40. 机器和机床的保洁工作是否单给时间，是开机还是停机时进行。保洁时是否经常发生事

故，工人曾否表示抗议。保洁是否另有报酬。

41. 有无学校。学生人数，是工人子女还是工长子女，有无工人上学的情况，是否从工资中扣款作学校经费。厂主和工人对此持何态度，评价如何。

42. 识字者是否很多，是否读书看报，常读何种书报，工人中有无知书达理者，其他工人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工长对能读书看报的工人有无敌意。

43. 厂主对能读书看报的工人、对他们上周日学校持何态度，是否有敌意。

44. 有无医院，设施如何；是否从工人工资中扣款用作医院经费，医生对工人及工人对医生的态度如何。

八、工厂视察机关、申诉、住房、伙食

45. 工厂视察机关是否经常下厂，对工厂的缺点是否关心，是否认真负责。如何对待工人申诉。分别举例说明。视察员的姓名及住址。

46. 对厂主、警察机关或视察机关的申诉。工人是否认为申诉有用，工人提出申诉后是否收到工厂辞退、逮捕和罚款——举例说明。

47. 厂内和由厂方提供的工人住房。厂区宿舍，租住人数、面积、清洁程度、陈设，厂主是否从中渔利，房租价格。对住宿舍的工人是否严密监视，有无限制性的规约和其他警方措施，单身工人和成家的工人情况如何——需详细介绍。有无浴室，工人对厂区宿舍持何态度，是否满意，有无不满——举例说明。

48. 工人自由租住的房舍，调查内容同厂区宿舍。成家的工人和单身工人居住情况如何，是否一间房住许多人；拥挤程度，房租价格，与工厂之间的距离，步行上班所需时间。

49. 工人的伙食，是否经常吃肉。有无厂办食堂，厂主是否从中渔利；食堂是否备有公共读物，系何种读物；饭菜价格，工人对食堂持何态度；举例说明。

50. 厂主是否用商品付酬，用何种商品付酬；是否较贵，这种付酬办法对工人来说是否合算——举例说明。

51. 有无厂办小商店；是否必须去小商店购买，价格上的差别如何，举例详细说明；商品质量，工人对这种小商店持何态度，有无不满，厂主和小店老板有无协议；其结果怎样；举例说明。

52. 有无消费合作社或储蓄所。是否因此硬性扣除工人的工资。有无工人的监督；有无舞弊行为；工人对此持何态度。工人有无独立创办提供失业救济的储金会的意向。

53. 有无捐款活动（是否对工人施加压力——要求为祈祷活动、修圣像等捐款）。不捐款者是否因此导致上司的歧视。工人对此持何态度。举例说明。

54. 向小店老板赊账。是否有许多人赊账购物；赊购商品在价格上的差别；工人是否知道赊购吃亏；赊购的不利之处。有无改变的想法。举例说明。

九、黑名单与罢工

55. 黑名单。厂主有无记录工人的黑名单。对待卷入政治者态度如何。是否在身份证件上做标记。厂主与警察局和工厂视察机关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举例说明。

56. 抗议和罢工。详细列举每起事件和事件爆发的缘由、经过、后果及结果。工人过去和现在有无结社的意向，希望结成何种社团。多举例子说明。

57. 工人对这种捍卫自己利益的手段持何种态度。

载于 1985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40 卷

2001 年《列宁全集补遗》中文版第 1 卷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23>

理县记行

作者：带Q过人



遭遇理县，完全是一次意外。在成都时偶然听柳老师说起的一个贫穷的藏族村寨，让我们同这个静静地躲在川西群山中的不起眼的地名，第一次发生了联系。

理县，这个位于汶川西侧，同属阿坝州的山区小县，显然并没有像汶川一样一震成名。虽然距离成都只有 160 公里，但即使是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雪山，高原，地震，泥石流，喇嘛手里的转经筒，篝火旁的牦牛肉，素未谋面的理县，在我们的脑海中就是被这样一个个略带神秘色彩的词语模糊地建构着。而山区、地震、民族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更是激发了我们一探究竟的兴趣。虽然时间仓促，但简单的准备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此次理县之行。

一、进山之路

交通不便，成了我们此行的第一个印象。由于几乎找错了车站，我们直到上午九点半才得以出发，而这已经是当天的最后一班进山汽车了。而且据说是由于修路，进山的车都是隔天才有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对于进山的道路不禁又多了一层担忧。

但是前三个小时的路程几乎很快打消了我们的担忧。当林立的高楼渐渐疏远，层叠的山峦开始遮住我们的视线，道路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变得崎岖。新修成的高速公路跟平原地区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不断长高的山脊和汹涌盘转的浊江，提醒着我们已经进入了邛崃山区。

因此，即使是铺满了山体和江滩的乱石，也没能让我意识到，这就是两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地震的遗迹了。

直到映秀镇。若不是立在岷江边上废弃公路中央的那块著名的巨石，恐怕没有人能够认出，眼前就是震中映秀镇了。这个在震后救援部队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得以进入的地方，如今只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没有了照片上那些震后的断墙残垣，取而代之的是路边清一色的三层小楼，崭新的外墙上漆着统一的羌族图饰。偶尔还能见到塌了半边的简陋老房，它们同断桥、残路和乱石一起，作为地震博物馆保留了下来，供中外的游客参观。

的确，从映秀至汶川，我们都成了真正的游客。坐在平稳舒适的大巴车里，地震只不过是博物馆里安静的陈列品，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不可触摸。人们欣赏，感叹，然后离开。当人们注视着地震，身边是却是现代化的公路和新县城，于是免不了再加几句歌功颂德。像极了一座动物园，你看到的是动物，快乐却来自对人类自身的欣赏。

成都到汶川，三个小时的路程，比起生活来可算平稳得多了。然而生活一旦继续，平稳也就到此为止了。刚过汶川县城，路况马上变得糟糕起来。公路变成了两车道的，而且由于修路的缘故，许多地方仅容一辆车通过。一路上尘土飞扬，飞石和滑坡的警示牌也开始屡见不鲜，而剧烈的颠簸让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拍照的打算。车速开始慢了下来，剩下的这段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又走了另外的三个小时。

同样是震区，但是比起震中汶川来，理县的确又是另一番光景了。不仅高速公路到此为止，前面整齐地排在路边的新房也不再常见了。没有了“××羌寨”的醒目标志，只是在远地山腰上隐隐可见一片片灰色的传统村落。鲜明的反差之下，究竟哪一个才是震区的真正面貌？

二、空荡荡的县城

到达理县车站，是下午三点半。此时应该是这里全天最热的时间了。高海拔和干净的空气让阳光显得更加强烈，晒在皮肤上微微有灼烧的感觉。然而温度并不高，虽是盛夏，也不过二十几度的样子。相比起湿热的成都，我们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仅是气候，这个群山深处的县城在各个方面都显示着它与外界的不同。

车站很小，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理县不过是个只有四万人的小县，而县城人口更是只有两万。于是，在只有两排座椅的狭小的候车厅里，我们很容易地找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吴老师。

吴老师大概六十岁左右年纪，被阳光晒成暗红色的脸膛体现着一个山里人的健康，也向我们暗示着他的藏族身份。而除此之外，他那一身简朴的穿着，尤其是头上戴着五角星的旧军帽，同毛时代的普通农民再无区别。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吴老师所在的科多寨，距县城还有八里山路。

上山的路要穿过县城。县城被一条大江分成两半，车站所在的是震后重建的新城，隔江相望则是被地震摧毁的老城。新城与汶川相比要稍差一些，但也算得是高标准了。宽阔的街道，成片的住宅区，新修的理县中学更是够得上沿海地区的标准，江边甚至还有景色优美的公园，一个城市应有的一切，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唯一缺少的，却是人。空荡荡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行人，只有沿街的店铺中，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偶尔同吴老师打着招呼。这是一个小到可以让所有人互相认识的地方。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七万人的死亡，对于这里意味着什么。

过了江，便是老城了。这里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一座城。凹凸不平的土路，布满裂痕的两层小楼，只有一条被称为老街的路上，新铺的水泥还没有晒干。老街旁又见到了一路上常见的那种新式房屋，只不过这里的工人还在紧张施工。据吴老师说，这些房子都来自政府的拨款。

上山之路却并不艰难，一路上都是新修的水泥路。这或许是得益于山中丰富的资源吧。

山路是沿河而建的，这是山区常见的方法。由山泉汇集而成的河流顺谷流下，冲击形成的宝贵平滩便成了人们定居的地方。而河流给人们带来的还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我们身边的这条河如今的水量并不算大，据说这就是由于上游建了水电站的缘故。

水电站，算得上是这样的山区小县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了。这条河上的水电站，发电量可达6000千瓦，算下来一年便是800万的收入。这似乎确然是称得上是“发展”了。

然而，当地居民却对这种发展显得不以为然。像这样的水电站，并非由当地人所有，而是被外来的老板占据，甚至连工人往往都要从外地招来。而这些老板占有资源的代价，不过是每年给村里的3万元钱。但就是这三万元也只是村里的干部私下收取的，村民们谁也没有见到过。就这样，自己家门口的资源，却成了别人的摇钱树。

如果说资源被掠夺还只是经济上的损失，那么环境的破坏则带给了村民们更大的灾难。在上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一座弃置的铅铁矿场，黑色的矿石没有进行任何处理，被直接堆在山坡上。更大的污染来自山上的金矿。这个被德阳地质队发现，随后私自卖给个体老板的金矿，如今同样只是每年付给地方干部几万元。然而分文未得的村民，却因为金矿带来的化学污染，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河水。面对这样的情况，村民代表去县里抗议，却被派出所抓走。于是，没有任何抗争经验的山里人，只好选择了忍气吞声。

这里不缺少财富，但这里的人们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与空荡的城市相比，空心的经济或许才是真正的问题。

三、重建之殇

而彻底把这里的村民掏空的，恐怕还是两年前的这场地震。

有人说，地震对死者是一场灾难，却让幸存者过上了好日子。对于山下的一些人来说，或许确实如此。然而在山里，我们见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

山里也有一部分人因震得福。比如这个村子的上一任书记，震后的救灾款刚刚拨下来，便举家搬去了成都。而留下来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上山的路上，我们在一户农民家里歇脚。户主邓文知已经接近七十岁了，和弟弟合住。他们原来的房子在地震中被完全毁坏，我们看到的是震后重建的新房。修这座房子总共需要十几万元，而国家给的第一批补助却只有两万，第二批的两万元至今还没有拿到手。为了盖房，家里不仅花光了八万元的积蓄，还不得不贷款四万元。兄弟两人都是五保户，但每个月只能拿到五十元左右的补助，生活艰难。震后政府曾发动民兵参加清理工作，但兄弟两人为此每人只得到500元。清理工作政府拨款十多万，但按照20个民兵每人500元计算，实际发下来的只有一万。

我们随后又遇到一位正在路边采花椒的老人徐光才。虽然地震没有彻底毁坏他的房子，但从前的房基地却被政府要求复耕。而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补偿，仅仅是原来房子的维修费5000元。老人说，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大多数农民无法完全按以前的标准重建，倒是一些干部家庭，即使房子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要择地再修一套新房。

地震让这里的村民失去了亲人，而如今的重建又掏空了他们的财产。打工，成了很多农民被迫的选择。

我们一路上随处可见正在修路的工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湖南的援建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便是当地的农民。农民在工地上打工，每天可以挣六十元左右。我们与正在休息的农民聊天，得知这条路的重建国家拨款百万，其中工钱按人数算下来只占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原料和运输的费用。但事实上，由于石料更多的是就地取材，材料费算下来也不过几万元而已，剩余的大部分资金便不知去向了。

这些都是我们在沿路上看到的情况，而到了山上的寨子中，情况又是远远不如了。

水泥的道路在距离科多寨还有一里的地方断了，通往山上的只有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只能步行通过。有几段道路更是被土石埋住，更加难以通行。其实在地震之前，这里还有一条石子路，是从前村民集体修筑的。现在还可以看到被埋在土中的碎石子，那些都是村民自己开采的石料。而地震将路毁掉之后，这里的交通再也无人过问。

我们直到七点半才到达科多寨，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村民小王的家中，摆了两桌的丰盛饭菜让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从房子的情况来看，这里的条件显然比山下更差一些。房子是石头砌成的，虽然宽敞，但是整个客厅里除了一台电视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小王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邻近县过来的上门女婿。为了盖房，被认为是“很能干”的小王花光了几年来打工所得的积蓄，然而不幸的是，房子刚刚盖起来不久，他的妻子却离家而去，仅有的一个孩子更是十个月大时便死于地震。家破人亡的打击下，如今的小王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不幸的人在这里还有很多。第二天我们在村里又见到了一位羌族青年王海清。在地震中房子倒塌，他为了保护四岁大的孩子，腰椎被石头砸断。如今他的双腿都没有了知觉，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看到这种情况，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留下他孤苦一人面对漫长的生活。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只能靠父母和两个姐妹的接济为生，日常的起居也要姐姐在身边照顾。残疾之后，王海清也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助，只是每月领取六十元的低保。房子在地震中毁掉，村里非但没有帮助重建，反而阻挠他在山下寻找宅基。如今他住的简陋的土房，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建起来的。更让他心寒的是，在绵阳住院期间，有个自称张霞的女孩曾经找到他，说自己是大学生，可以以他的名义去寻求捐款。然而筹到三千元钱后，他却再也联系不到这个女孩。今后的生活还长，他只能希望多学些文化知识，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他的心底，依然埋藏着重新站起来的梦想。

四、他们的时代

或许，吴老师是值得我们专门花些时间来介绍的。生于1948年的吴老师，是同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17岁开始，吴老师担任过村里的多种职务，参加过民兵，文革时期也成为了红卫兵中的一员。这是同时代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然而，在普通经历背后，特殊的身世却赋予了他不普通的意义。

吴老师的岳父曾经是当地的土匪头子，与当时控制整个阿坝地区的大土匪苏永和过从甚密，说起来也算得上是一个颇为了得的人物了。那个时代，整个藏区都处在土司和土匪的控制之下，势力最大的土匪甚至可以同成都的胡宗南分庭抗礼。在国民党退避台湾后，也曾试图把这些土司和土匪的武装变成其在大陆的代理人。

当时的藏区普遍实行奴隶制度，与这些贵族的庞大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沦为奴隶的广大人民的艰难生活。在当时的制度下，奴隶吃的是残羹剩饭，待遇同牲畜没有什么不同。所有奴隶共同住在一个地窖中，黑暗寒冷，时常有人死亡，而死去奴隶的尸体便堆在其间无人处理。奴隶没有任何做人的权利，不准在主人面前吃饭，不准同上层人通婚，他们的子女也将继续成为奴隶。这些奴隶甚至连姓氏都没有，只有一个作为代号的名字。因此，这里的藏民如今用的都是解放后才取的汉族姓名。

吴老师说，红军长征时，四方面军就曾经过我们上山的这条道路前往米亚罗。在红军经过时，由于土司把共产党说成是吃小孩的魔鬼，所有的居民都躲到了其他地方。红军在此停留了一个月，打败了土司，把土地和牛羊分给从前的奴隶，并在当地建立了苏维埃组织，看到了翻身希望的奴隶开始渐渐拥护红军。然而好景不长，后来红军转移，从前的贵族又打了回来，重新掌握了权利。据说，当时带领红军后勤部队的张国焘儿子走在最后，在土匪的反攻中被打死。为此，张国焘曾报复性地在此杀了很多无辜藏民。

正是由于奴隶主黑暗的统治和共产党深入民心的政策，这里早在1946年就已经和平解放。奴隶出身的藏民纷纷加入解放军，其中一人后来还当上了成都军区的政委，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从前的土司和土匪，有些被判刑，有些则逃去了台湾。作为土匪的亲戚，吴老师的生活也受了一些影响。吴老师说，为了避免出身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他后来放弃了去城里当干部的机会。但除此之外，他的家庭并没有遭到更多不公平的待遇。夫妻两人过着和其它农民同样的生活，到今天为止他们显然都是受人欢迎的。

外界的人更加关心的，也许是宗教问题。共产党是否侵犯了当地人的宗教自由？当我们向吴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笑着走到家里的神龛前面。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神龛，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香火不断。让我们意外的是，吴老师把手伸到牌位的后面，居然取出了一张毛主席的半身像。“实际上，我每天拜的都是毛主席啊！”

吴老师说，如今的藏民虽然还保留着很多宗教习惯，但都是相信科学的。如轮回之类的宗教观念，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相信。人们自觉地接受了科学，因为宗教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处，毛主席带来的科学却实实在在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变或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前的赤脚医生制度。到了山上我们中有人开始拉肚子，吴老师马上从家中找出一种中药来给他服下。这种药，就是几十年前赤脚医生传下来的方子。在这个从前往往依靠巫术治病的地方，赤脚医生带来的可谓是一次极大的进步。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这里的医疗条件仍然并不发达，在县城里很多常见的药都买不到，

山里的人至今还在受惠于毛主席的制度。当地人对毛主席的崇拜，也正反映了当前时代的某种缺失。

正是出于这种对毛主席的感激和信任，藏民们很多时候甚至站在了宗教的反面。解放初期，达赖叛乱，当地人组建了藏民团帮助解放军，连当地的活佛也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达赖。破四旧时，红卫兵中也多是藏族青年。

五、今日的生活

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在村民中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情感。这种怀念，不是来源于信仰，更没有人对他们宣传，而是他们真正切身的体会。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毛主席把他们从奴隶制下解救出来，才是一切提高的基础。村民们说，在改革之初的几年中，大家还都是向往常一样的拥护党的政策，相信改革能够继续改善他们的生活。然而如今，趋于停滞的经济却让多数人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贫穷，几乎成了中国绝大多数山区无法摆脱的命运，尤其是在这样的西南边陲。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平坦的田地，更多的是散布在山坡上的小块梯田。由于海拔高，这里唯一的农作物就是每年一季的玉米，以及花椒、白菜等少数副产品。尽管广泛使用了化肥，但这里的玉米的亩产只能达到几百斤。山里的花椒品质很好，但种植量并不大，而且由于交通不便，很难卖出好价钱。仅仅依靠农业，每个家庭一年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而这还只是我们在河谷地带得到的数据。

其实，这里并非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贫穷，这要感谢山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此处的深山里出产贝母等多种中草药，更是虫草的重要分布地。大量的村民靠进山采集虫草为生，近年来虫草涨价，村民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六千元。虽然这种方式受益较高，却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只适合年轻人去做。而在地震中，很多人就是因为进山采药而遇难。

同全国大多数的农村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都选择了外出打工。然而不同的是，这里的人去沿海地区的极少，更多的是在县城或附近地方，因此收入相对低得多。老人们说，因为这里的人受教育水平低，在外面很难找到工作，只能在本地干一些力气活。近两年湖南在此处援建，很多人便到援建的工地的打工，收入才略有提高，男人每天100，女人则更少一些。

教育，的确是农民面临的最大困难。在山区，教育资源的缺乏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吴老师家中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孙女读初中，孙子读小学。过去，每个村里都有学校，孩子们可以就近上学。但现在，这些学校都被撤除，所有孩子都要到镇上上学。而这里一个村子走通都要几十公里，上学成了一件极不方便的事情。很多孩子从小就要住在学校，住宿和生活的费用沉了家里沉重的负担。吴老师的孙女如今步行八里山路去县城上学，虽然近年来免除了学费，但每年的杂费也有几百元。而孩子花了钱接受来的教育，在很多家长看来却是不值得的。由于教学水平低，全县往往几年出不了一个大学生，高中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了鸡肋。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进了技校，以求将来在县城从事一些简单的行业。

在下山途中，我们曾遇到一个双目近乎失明的村民。他的儿子是全县成绩最好的学生，刚刚被湖南民族学院录取，现在父子两人在都为了学费而四处打工。虽然脸上充满了自豪和喜悦，但一个大学生的未来却无人能够预料。

六、现代化的困境

同村民短暂的交流之中，“发展”，是我们听到次数最多的一个词。不仅在此，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发展成了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题。在对“发展”津津乐道的人们众，既有意气风发的商业精英，也同样不乏苦苦挣扎的贫苦农民，每一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来路不明的信心。然而，我们的未来真的如想象中那样光明吗？

两天下来，我们不断听到吴老师对未来的规划。发展林业、养殖，改善交通，有钱后甚至可以开发旅游，把这里建成一个避暑胜地。但这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实际行动却困难重重。除了专业知识的缺乏，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规划是很难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而集体，在广大的农村早已不复存在。

从我们刚刚踏入这个山村的那一刻起，这里的人们就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在今日的农村，我们早已习惯了人情的淡漠和道德的缺失，而这里却是不一样的。在路边的人家，我们总是可以得到热情的接待，甚至会被留下来吃饭，这让同样出身于农村的几个同学惊讶不已。这里的风俗习惯同样证明着人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虽然如今的藏民大多接受了汉族的生活方式，从服饰到语言甚至宗教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舞蹈这一传统的仪式却被保留了下来。不仅仅是保留，这里的羌族和后来迁入的汉族村民在这一点上反而被藏族同化，每逢喜庆的日子，村民们不分民族都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即使贫穷的人家场面依然热闹非凡。

这种纯朴的民风固然是由于广泛的亲戚关系，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来源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奴隶制度下，所有人原本就是从事集体劳作，而三十年的公有制更是让人们亲如一家。而如今改革开放正在剧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生活。

分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让小农思想得以滋生，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政治制度的变化则直接冲击着这里的社会关系。在这个闭塞的地方，竞选村官甚至不用花钱拉票，只需一番游说便可以得到一个职位。善良的村民认为职位是无关紧要的，靠传统的家族关系就可以维系正常的秩序。就这样，“思路灵活”的人当上了干部，公共权力进入了个人手中。当我们努力地向现代化的西方靠拢，民主不但没有实现，各种腐败反而随之而来。在震后的重建中，所有的问题都直接指向了腐败。被克扣的补偿，去向不明的建设费用，以及少数人不正当的获利，共同导致了灾民的破产。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在时间中被慢慢腐蚀。

如今，一场地震将基层的腐败彻底暴露出来，很多村民开始意识到，自己今天艰难的生活，正是由掌握了权力的少数人所造成。救灾款被各级政府私吞，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广大的灾民却要承担着命运的不公。每一场灾难之后，人们总是会问，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穷人。而在这里，答案已经很明显，因为穷人没有权力。

如今，吴老师和几个村民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打算竞选下一任的村官，保障村里每个人的应有权益。他们相信，只要人们团结起来，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现实仍然是令人担忧的。在我们同村民的接触中，虽然很多人意识到改变现状的迫切需要，但他们浑浊的眼神中，对团结、民主、监督这样的词语显然不甚理解。或许，政治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现代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谁又能保证人们在金钱面前不被分化？在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里，英雄主义毕竟难以持久。即使放眼世界，这种来自“发达国家”的制度，也从未解决过任何穷人的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将是一种彻底的变革。

我们此次的理县之行只有两天时间，但这两天之中所看到的一切却足以带给我们深刻的震撼。这震撼来自那深深的群山，更来自群山之中的人民深重的苦难。

回成都的路上，再次经过汶川，我们见到了一队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步行在公路旁边。进山的汽车站中，也不乏外国人的身影。这里并不缺少目光，甚至大有成为旅游城市的趋势。有人注意到，在新建的汶川县城中，路标上不但有汉语和藏语，甚至还出现了朝鲜语。

然而我们同样无法忘记的，还有这两天来村民看到我们时表现出的新奇。在山里，有些地方的村民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大山，而外人，或许也从未曾踏入。究竟应该把目光投向何处，或许才是如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特别说明：

上文中提到的那位羌族残疾青年叫王海清。他在地震中为保护自己的孩子，腰部受伤，失去了行走能力，下半生将与轮椅为伴。更可怕的是，他妻子丢下残疾丈夫，带孩子远走高飞了。曾经美好的家庭不复存在。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痛苦，而只是对这样的人生感到无奈。然而这不是港台偶像剧，严酷的生活在催促他寻找独立生活的道路。所以，他屡次提到自己喜欢学习，喜欢读书，不希望坐在轮椅上虚度光阴。颇有自信当上村长的老吴也鼓励他学习知识，争取将来能为村里的发展做些贡献。因此，我们倡议看到这篇同志们，朋友们，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给这位身残志坚的羌族同胞寄去一些养殖、蔬菜种植、三农、历史、政治、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传记类书籍。如果有生活物品想送给这位年轻人，那也非常好，因为他们在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方面都非常地匮乏。

邮件寄送地址：四川省阿坝州理县杂谷脑镇打色尔村三组

邮编：623100
收件人：吴泽刚转王海清收
如有疑问，请联系本站站长。

原文链接：因特殊原因，此文已经从网上撤下来了。

给我给我力量啊

作者：王小晦

昆华说成都的聚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生美好的回忆，我回复说明年就不能更美好吗？是啊是啊成都的回忆是如此美好，我都感觉对不住你们呢，每天吃那么多好吃的，太浪费了…哈，昆华说我们是史上最贪吃的革命队伍。这次压马路的时候又听昆华和然东唱歌了，你们的歌声啊太有力量了，是不是可以肉麻一下呢这样子说，我们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人民，无数的人民呵。

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民工来讲就是苦难嘛，工人林友金你告诉我啊为什么辛劳为什么休息啊…我坐了 20 多个小时的火车和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到七杯茶就迫不及待的问然东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啊？然东，谢谢你两周多的时间吧不厌其烦跟我讲了那么多，我现在呢终于明白一点点了。我们认同的那个自我是什么？自我肯定不是对肉体的认同也就是说自我肯定不仅仅是那个身体感。我们之所以能认为我们和他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追求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一些人把生活寄托在肉欲的享受上，另一些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他们下一代，虽然他们的下一代的基因只有他们一半而且很有可能一点没有，而还有一些人把自己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天国之上。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抛开，我们仅剩还是那一个身体感。你会问这些寄托为什么可以抛开，是他们构成了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所有的那些寄托的一切都是社会也就是那个大他者加给你的。如果抛开一切我们剩下的只是一个对身体的认同，科技再发达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认同虚拟现实中不存在的身体，就像黑客帝国中那样，所以那些小他也可以占有你的身体，他们的占有和你的占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剩下只是一个漫长的黑夜。

进化心理学说我们出生就有从有机物团块那时候开始竞争而产生的一个装满写着各种繁衍程式而且相当精致的大脑。是的，拜地球生物演化这么多年所赐我们有这一优势。我们的很多行为是受基因所控制的，譬如我们怕黑，妈妈会说小孩子像父亲，成年个体总是对幼年个体有莫名其妙的爱，我们觉得狗屎是狗屎的味道而不是香肠的味道，又如我们见到不明生物首先会逃跑…可是纵有如此牛逼的大脑和基因控制，小孩子如果没有人类社会这个大他者，他长大只能是一白痴。进化心理学这帮人没有看到纵然我们的很多行为是受基因控制，可是没有这个符号系统我们都成不了人啊。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已经完全超越基因了，不然你无法解释江姐和小萝卜头的故事。

好吧，既然我们在自我的漫长夜里还继续活着。原因不是基因也不是身体感的话，我们总是要找一点活着的理由。自我只是某些你认为构成你的东西，你认同的那些东西也就构成了你。血缘构成的亲情身体的快感还有那些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欲望，我是永远不会认同。这样子想来我只能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了，可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在这社会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马克思好像说过一切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的前提，所以讲必须要搞共产主义，我们才可以自由嘛。然东说如果你觉得人生很无聊而且你又不去自杀的话，为什么不找点稍

微不无聊的东西呢？是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难道不是人类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运动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加入这个洪流呢？然东说共产主义之后我们可以搞星际航行嘛，你看我们在火星回望地球的时候对那些移民第二代说看那是我的故乡，啊哈，这难道不是幸福吗？

上次在成都喝茶的时候戴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居然把然东的感冒给讲好了，我听得也好感动啊~然东指给我看路过的拾荒者，我眼睛突然湿了，然东笑我居然还指给昆华看，唉唉唉..城市啊城市啊多美好啊，拾荒者一直在流浪，工业时代多伟大啊，雇佣奴隶们一直被折磨着异化着~~~

戴老师描述的毛时代的国企工人生活就是一天堂嘛。戴老师讲他们厂一小孩，因为是农村出来的不适应大工业生产，每次拿到工资就去吃喝玩乐，是好几次挨，组织每次都是召开职工大会然后看他年轻帮助他改正，唉，看有组织的生活就是好嘛。然后还有现在好多人污蔑大锅饭养懒汉，戴老师说大家有什么理由偷懒呢？大家是从小在厂子长大，上学读书生活结婚生子都是在厂里，厂就是家啊，给家里干活有什么理由偷懒呢？周老师讲了国企改制之后一家人的故事，男人女人都下岗了，男人身体不好治病要花很多钱，男人身体不行只能女人去赚钱，女人长的很漂亮，后来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只是每天上夜班拿回家很多钱，男人发现事情不对就某天晚上跟着女人，发现女人到了洗浴中心，男人回家就做了一桌子好饭，那天之后他家人全都死掉了。唉，苦难的工人啊，我们哭不是办法只好接过枪继续战斗了。

那天下午吃完饭喝完酒之后，葛猴子说我们走吧。出了门，我眼泪就出来了，唉，我越不想承认感情它怎麽就越以最有力的方式回击我呢？然东啊，不好意思又让你们失望了，然东临走给我的嘱咐我都没做好，前天，马前卒又用QQ给我留言，生活工作妹子都怎样？唉，我太让你们失望了~~~~

喔，我对爱情还有疑问呢。齐泽克说：“很深的爱情，现在已经很少见。无爱的性，等同于借助对方来自慰。不过即使如此，人类的性爱已经高于动物性行为，因为它需要幻想。真爱如同自尊，不需要放在生活的中心，越集中在上面，越容易受到羞辱。我也许过分浪漫，但真爱应该是形而上的，不需要幻想。是两个人手牵着手，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就像从前列宁有过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样。”你为啥不牵同性个体的手呢？我觉得抛开生理需求，就根本没有爱情，只有同志或者战友。

我家住在小渔村，我太爷爷的时候我家就是渔民了，我爸爸现在是个小鱼贩，我估计要是民工了。我说这个的时候昆华还说诶你这人很有冷幽默嘛..太爷爷...我家没有过工人所以我是落后阶级的。革命啊就是不断摆脱自己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过程，是你们给我了力量，我们一起见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200>

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思考

——一零年夏成都调查报告

作者：沉浮

一

一百多年前，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一百多年后，这个幽灵历经法国巴黎公社，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毛泽东领导中国广大农民、工人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尝试，再到卡斯特罗兄弟在古巴把理想的火种保留到今天，可以说是一路坎坷。社会主义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曾经的燎原之势，最终却是若有若无，寥若晨星。但荒凉的背后其实藏着巨大的能量。只等着恰当的时机，恰当的领导，比任何一场历史运动都要猛烈的运动终将再次爆发。

在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最需要的是团结，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来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毛泽东曾经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谈到：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所谓农村无产阶级其实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农村雇工。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这是毛在八十多年前对中国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几点阐述，时隔这么多年，中国经过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改造和资本主义的强悍上台，发展三十余年终成“正果”。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终于在新一代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面对资产阶级的迅猛上升，无产阶级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无产阶级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艰辛的发展过程，是哪些人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毛时代的国企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改制后却半死不活或者悄然消灭，昔日当家作主的工人却被认为是没有能力而下岗，难道这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多年的“正果”？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就更加让我疑惑了。我们决定走进社会，接触现实，探寻问题的答案。格瓦拉曾说过，“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但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真的面对现实的时候，却是多么措手不及啊！

成都的活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美好的记忆、同志们的感情以及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让我不断想起那几天日子里发生的一切。我决定自己应该写点东西追记这段经历，于是决定写下这篇文章。第一次写东西，最终的作品也许这算不得什么调查报告，权当是我个人记录的心路历程的“流水账”吧！

近三个月来，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也参加并组织了读书会的活动。但总的感觉有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眼光始终停留在理论上，学习、领悟、经验几乎只是从理论中来的。对理论的强烈关注是以社会实践的极度缺乏为代价的。尽管伟大的阿尔都塞先生曾经提出过理论工作也是一种实践的伟大想法，我也从来没去否定理论的重要性。但对于绝大多数在校大学生来说，理论只是思考的出发点，当理论的学习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必然展开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反思。这个时候，如果仍然固守自己对理论的偏爱，继续从理论当中而不是从实践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就难免陷入死胡同，或者背离了理论学习的初衷。

这个时候，稍懂马列主义的同志会发现一个问题。马列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如何看待、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问题对学马列的同志是个很大的考验。我想任何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都会遇到这么一道坎。至于能不能跨过去，就因人而异了。

下面谈一谈我自己对如何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的想法。

归功于大一时的人物传记读了不少，加上自己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东西稍有了解，似乎从中看出一些门道：那就是青年时期实践对一个人的思想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后人生之路的选择，起到了生死攸关的作用。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上学时，就做过社会调查考察，至于后来二七年那个更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实践的典范，可谓毛选里面几篇尤为值得一读的佳作。这在中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893—1949》里更有提及：毛说，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农民、工人明显比我们这种做较高学问的低一等，他们是最脏的。后来，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农民、工人的接触与了解，我发现自己错了，是农民、工人建设了我们的家园、祖国；特别是处于绝大多数社会底层的农民支撑起了我们的民族走到今天，也正是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的压迫，剥削最深，也只有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革命，推翻压在我们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在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把自己深深的投入到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才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把这种普遍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难题，最终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一切正是因为主席发展并贯彻了这样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个现象，不只在毛主席身上体现，其实恩格斯也是这一核心思想的最好体现者。他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产生了从理论上寻找解决的办法的想法。后来，当他在德国会见马克思时谈到了这个想法，结果和马克思不谋而合。

由于种种原因，我感到实践问题越来越紧迫。如果还不进行调查研究的活动，我的思想就是无力的，我的理论就是空洞的，思考也难以深入下去了。

主席《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考切入点：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要做这件事情，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昂首向天。第二是开调查会。

“关键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的材料及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

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联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789—791页。）

主席当年的话似乎就是针对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而谈的。

二 活动前期

从筹划到正式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月的准备。

七月十八号十三点二十分，我、黄波、G、小嗨、乌托邦五人从西安踏上了南下天府之国的列车。车上的旅途无疑是愉快的，和小嗨相处虽不过短短的几天，但也就在这几天，我们也很快熟悉的无话不谈了。但他那“爽”的理论我实在是不敢恭维，连黑牛说了一个晚上都无法说服他，也难怪，当一个人处于一种意识形态当中而丝毫不自觉的时候，要去扭转他实在是太难了。我似乎现在对鲁迅先生当年的难过有一丝理解与复杂了（本人丝毫没有针对小嗨个人的攻击，只是实事求是的谈点想法）。

谈到小嗨，不得不谈一两件有关他来我们学校的事了，事实上，小嗨也可以说算的上参加这类活动的元老之一了。从前年去重庆的调查到去年河南兰考的活动，其中都不乏他的身影，他也可以说是很早就接触昆华、黑牛了。资历似乎比我还老。（去年我因个人问题去了趟深圳而错过了精彩的兰考之行而深有遗憾，固而对这次活动寄予厚望。）

小嗨是个对科技很着迷的人，当我们几个人在迷恋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他也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所以谈话当然有点不太投机。但是，和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爱看书了，开始思考一些本质问题了。这让我和G都很高兴，每次看到G和小嗨一起争吵的时候，我总在旁边沉默不语，因为从他们争吵的话语当中可以感受到理论的魅力，或者可以说此刻我们的理论得到检验了。

后来，黑牛和广凯先去成都了，就只剩我们三个了。就是在学校旁边的小村的一个小房里。我们三人经常是沉默不语，大家都在埋头读书，现在回想起来仍是其乐无穷。记得有一次，G不在，我和小嗨晚上看书，看到兴奋处都情不自禁大声朗诵起来了，以至于我们干脆说：通宵吧，任尔东南西北风，我们照样笑谈风云，哈哈！小嗨，你真可爱，你说，张广天让你找到了归属感，谢谢他。关于小嗨的故事来成都接着讲。

三 成都

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对围剿蒋介石南京武汉两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今天，我们活动远没有当年的雄伟与辽阔。但我一时激动，竟也化用毛爷爷当年远离爱妻杨开慧时的一首诗里的两句：千里挺进贡嘎山，过眼滔滔云共雾，挥手从此去（首句是模仿上句，贡嘎山是蜀山之王，代指成都）。竟也大胆了一回。想象着这是我们思想、实践上的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啊，难道此时此刻，心情不应该很激动的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抵达目的地。打电话，坐车，很快就到了黑牛的住所，见到黑牛的第一眼，我就用他教用我的哈狗帮去镇住小嗨，没想到反而被他震了，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真，证明我是贱人..哈狗帮，流行于零三年，昆华上次对黑牛说，都早过时了，还在唱！呵呵，管它呢，对我们不过时就行，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别人的标准来生活呢，生活从来都在我们自己手中。我有几次对黑牛说他唱的有点类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垮掉的一代的心情，资本主义大环境下那些家境富裕的青年无所事事，整天就三样事，药、性、摇

滚。这种空虚的心态似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兴盛而在中国蔓延开来。黑牛说，这个和那个不同，这个有点商业炒作。是的，现在还有多少原创的东西呢，连这个都可以出来再火一把了，难怪凤姐这样的跳梁小丑都可以红遍大江南北。

还是在火车上的时候，广凯说柳知秋好粗犷啊，我们听完后大笑。回到住处就见到了传说中的人妖。小嗨说柳知秋让我想起了屠夫（大笑），至于后来他和昆华讨论那个著名的“妓女是否创造价值”话题时更是让我们乐的开怀大笑，高流和我只能在旁边看着他们讨论资本论里的社会总价值和总价格是否相等。那时我饮恨自己只读过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当然这是后话了。

晚上是交流会，大家自我介绍，互相认识。印象最深的是GCC谈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之路，他谈了自身的经历，特别说到自己亲眼目睹了工人下岗后凄惨的状况（他父母以前也是国企工人，后来厂子破产了，他父母也下岗了）。后来在马前卒来那天晚上，老马也把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跟我们说了，那时更是全场一片呜咽，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其中提到了一个印象特深的场景：以前在一块工作的工人坐在了一张桌上吃饭，吃完后，一些人叫工人去占领厂子，另外一些人则去叫警察，最后大家火拼。原来其中的一些人依然是工人，而且面临下岗，另外一些人则成了局长之类的官员。所以他们的阶级感情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不是别人讲故事将给他们听的，而是发自骨子里的深深觉悟，一种最彻底最深刻的认知。还有柳知秋也谈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之路，特别是那次在饭桌上他说他最早接触是在读小学的时候翻《辞海》时对这些词有很深的印象，结果就停不下来，不断地深入了下去。后来昆华对他说，你真的是独辟蹊径。估计你是我们这伙人当中最有潜质打败老朱的（大笑）。接着黑牛又把他的成长经历扯了一遍，说怎样从高中开始接触自由主义到大学接触哲学，宗教。后来碰到昆华，碰到了马克思主义这股洪流，他马上就一下子接受了，搞的他后来从不上课了，甚至连考试都不考了。后来他还得意的跟我们说，我都是补考，考试嘛，简单的很。他还说到，他跟昆华见面的前景，他讲了两个小时，昆华讲了二十多个小时。到后来嗓子都哑了。

（很惭愧，我见到他们时，讲了二十分钟，而他们则讲了两个小时。）后来和成都的同志交流的时候，L同志向我和高流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看待特钢事件里面那些有觉悟的工人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而其他人却不一样。这让我想起了黑格尔探索哲学的一个方法，即去寻找问题背后原因的原因。后来我觉得是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一种自我认同。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是很难设身处地的体会他们的情感与思维方式的。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我们学理论时，如果不能用理论来解释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空洞的，或者说我们对理论的理解远没有达到深刻的地步，还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

黑牛说做完调查后，希望大家写点感悟，或多或少。谢谢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让我得到了启悟，他在那本书采用记录加感想的方式来写了那本书。虽然加入了一些想法与思考，但还是比较如实的再现了当时的调查情景。也许我也想采取类似的方式来谈一下这次调查，虽说加入了不少主观的东西，也许这样的方式更是关于调查与自己的想法的一个结合吧。

想起一年以前，那时曹征路的《那儿》开启了我对国企的认识，至今还忘不了小说里的一些场景和话语：“某天，半夜两点多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杜月梅杜师傅顺着工人新村的小马路朝家走，走到公用自来水拐弯的地方，冷不丁窜出一条狗来。杜月梅妈呀的叫了一声，那狗回头看看，也汪汪吠两下。小师傅是那样一种人，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就推着一辆小车，珍珠奶茶、热的！而在夜里，却换了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的去霓虹灯下做哨兵。”这样的开头，让我至今无法忘怀，但小说中的故事却在戴老师和周老师口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小说写的是东北的一些情况，但貌似全国各地也比较普遍，据昆华说，与他所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

“后来我们分析，那小子不是真想死，想死早就跳了，不用等警察。他不过是想讨回三

个月工资，三个月也才七百块、想想也不值。于是我们十分悲愤，感到这年头实在没劲，连跳楼都学会造假了。”

诸如此类的言语数不胜数，把一个国企下岗工人的真实生活形象生动的再现了出来，此次调查就是针对类似的企业的一些情况，小说毕竟是小说。至于后来曹征路的《问苍茫》更是把目光集中在了沿海地带的一些血汗工厂的一些斗争生活情况，这也是我们下次即将关注的一个大的对象，即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

七月十九号，调查的第一天。十几号人洗漱，吃饭，坐车。竟也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见到周老师是在市中心离他们以前的厂很近的一个街道，黑牛说周老师因为参与工人维权而被XX打伤了，我们买点水果聊表心意。我第一次如此强烈的感受到工人的斗争是多么现实与残酷。见面后果然见到老师身上有好几处伤痕，现在还涂着药水。周老师给人的感觉是年轻，朝气，说话很平易近人。不久，戴老师也来了，老师四十多了，但从言谈举止之间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心是彼此连通的。丝毫没有一点架子，很热情的跟我们介绍厂里的情况。

我们就这样边谈便围绕着厂走了一大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荒凉的画面，从前广阔的厂房如今只剩下两根水泥柱子支撑的破门，穿门而入是四处散落的砖瓦，杂草在上面凌乱的生长着，似乎也展现了野草强悍的生命力一面。DZ两位老师一次给我们讲了厂的发展历史，以及这厂是如何的从弱小发展到兴盛以及至今的破产的，我们边听边感叹，如今这块地成了房地产的囊中之物了，正等着地价的飙升。上午就在交谈与感受当中无声无息的溜走了，厂内四车道宽大的马路让我们惊叹不已，可见厂子当时是多么地繁荣呵！

下午去喝茶，这是成都人很消遣的生活习惯，就像重庆人吃夜宵吃火锅一样已经很 custom 了，其实应该说是去听两位老师讲述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他们厂改制前后的一些具体情况的。感慨于自己的疏忽，竟没有记下一些具体的数字与资料，还好有人记录了，可惜我只用耳朵听了大概，这四川话虽说名扬四海，但一旦真的听起来还真有点费力。哎，不好意思。让两位老师失望了，但还是听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大概意思是改制以前，在毛时代，应该说整个中国的主要国企都差不多，那时受毛主席大环境的教育，当时工人工作热情，学习氛围，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谐，信任场面是很普遍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曾有著名的语录：十五年赶超英美。也正是在大跃进的热情下，中国人的潜力被前所未有的力量激发出来了。也正是在那个如火如荼的环境下，我们国家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两弹一星，航天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轨道。那个时代的工人是最自豪的，每个人都把厂当作自己的家。L 老师有一次还讲过一个有关他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在上初中，做物理实验，需要一块晶片。他妈是厂里的主任，刚好厂里有很多废弃的晶片。他求他妈在厂里捡一片给他做实验，结果他妈说，不行，厂里的一针一线不能拿，毛主席教导我们，厂就是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怎能不热爱自己的大家庭呢？

正是这种主人翁的精神把那一代人团结了起来，创造出了一个个令欧美资本主义不敢相信的奇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者。其中农民就牺牲了自己的很多利益，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农民积累了一代人的努力，用来发展工业。加上当时的天灾人祸，固然受了不少苦。但是这种苦是一个欠发达地区国家工业化必须付出代价。按照毛的理解应该是农业先哺育工业，然后工业再反哺农业，进行现代化农业改革，缩小城乡差距，达到真正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认，这种想法固然是非常理想化的，而且也应该值得一试。事实上也证明这种策略是继苏联之后的另一条可行之路。

但历史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其中更有闻名中外的文革。文革的到来，以及文革后邓的上台让中国的公有制走上了一条莫名其妙之路。

出现于文革期间的国企“三结合”模式是个新的尝试，而且效果不错，所谓的三结合小组指的是：小组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组成，着力解决技术问题。依照中国广泛采用的形式，工人是小组中的领导和中坚力量。负责工厂的技术升级，技术更新和技术规范的创新，

以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小组的活动和政治教育以及工程师参加体力劳动，逐步消除了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之间的分裂。同时也消除了技术人员，工程师对工人的统治。

其实这也是继主席在 1960 年 3 月 22 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发表之后的另一次尝试（五要素：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说到文革期间的工业组织与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可以参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夏尔·贝特兰，中国工人网编译）。

谈到这些当然免不了要谈文革。第二天，我们就此拜访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四川主要领导者之一 K 老师。

七月二十号，调查的第二天，经过昨天白天的一天“艰难”跋涉，再加上晚上的畅谈，就显得格外疲劳，睡到八点多。黑牛一醒来就匆匆把大家叫起来，等到我们准备完毕赶到公交车站时，时钟已悄然走到九点半。没办法，只好打车去。先坐到成都理工，然后再等 G 老师和 D 老师。

经过一番艰难的等待与跋涉，终到达所谓的红色资本家 K 老师的处所。哈哈，以前只在杂志上知道什么荣氏家族之类。现实生活中却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也就慢慢习惯了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正常现象。此刻，我们却接触了真正的红色资本家。有一种措手不及以及惊喜的复杂心情。K 老师厂里的领导先把我们接到了他们的会议室，热情的给我们拿水，开空调。顷刻之间，K 老师也亲自到了。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座谈。

K 老师是成都本地人，从小生活在这块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当时正值解放后，各种工厂在成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蔚然生长，如雨后春笋般一展风采），长大后也理所应当的进了国企，后来厂里培养他上大学，后来又回厂当技术人员，像这样的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厂也很类似。能够当上国企工人是当时许多年轻人的梦想。特别是像 K 老师那样被厂里重用，更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如果历史照着这样平静的走下去，那 K 老师也如现今很多人买房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生。但历史就是这样风云难测。文革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了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K 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文革，有专门的同志在整理资料，估计不久即将面向公众，当然目前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只是这一次是我们一些年轻人自己动手参与调查与整理。意义当然非同一般。

再此着重谈一下和 K 老师的谈话，其实主要是 K 老师在陈述他的经历（主要是文革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和感悟）：K 老师在文革期间在政治上是坚决支持毛主席政策的，从一个懵懂的红卫兵到一个坚定的造反派，从写大字报到工人、学生之间的武斗。一直都没有退缩过，包括文革后十八年的牢狱之灾至今。K 老师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参与了文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中，个人价值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为什么 K 老师会是这样觉得的呢？尽管在文革期间，他是四川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周恩来总理接见十二次，也被毛主席接见过几次，但这绝不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人生价值问题，是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的问题。巴黎公社过去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人们来看待这个问题时仍旧激动不已，这个创造性的革命组织不仅是历史性的创新，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尝试，虽然是艰难的一小步。毕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更是精神和理论上的鼓舞。纵然放到文革这一个特殊的活动中来，也许更多的人是受尽了冤屈，成为自己不幸的渊源。但是像 K 老师这样参加造反派斗争的实是一种幸事。正如他讲到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针对“走资派”、“当权派”，即官僚阶层的革命，更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1965 年 1 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

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针对刘少奇的整‘地富反右’）。

更多资料可参考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68093.shtml>）以及：简评何新先生的雄文—《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1911.cn/bbs/thread-63284-1-1.html>）

关于文革，我实在了解不多，没太多资格可谈。不过思来想去，觉得有几点思考的方向：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民主形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制约体制中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而消除社会中统治者（执政党）与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磨擦和矛盾。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制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类问题。由于这种群众运动可能导致政治失控及无政府状态，因此一直受到主流官僚阶层的限制和抵制。毛泽东1967年2月8日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在当时能够发动这样一场运动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精神崇拜之上的，纵然结局是不尽人意，以失败告终。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有待历史去做出公允的评价。正如一位西方的思想家曾说：关于文革，最好再过五百年再去评价。但是对于现今中国目前的形式却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有很多思想的挖掘点。

当各种思潮在中国蔓延开来的时候，回归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从其源头上找到根本点是一条不错的选择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就如拉康一直宣称自己从未脱离弗洛伊德一样，尽管他在不仅在继承弗氏的一些基本点，但在这条路上走了更远，更是颠覆了弗氏关于自我的观点，在理论上重构了精神分析。我们也必须继承马克思的思想，结合中国新的现实，在马克思达到过的地方，往前踏出一步。

毛在《井冈山的斗争》里写到的共产党一样：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他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和阶级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和阶级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挡（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的给养的经济力。（毛选第一卷P57）当自由主义，托派的思潮在泛滥的时候，左派或许可以从以上几方面做出一些思考。当然，形势变了，策略，方针，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会有一些不同。但还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的，正如黑牛曾说：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各个领域的制高点，掌握各个领域的资料、动向、情况。争取在各个领域占据一定话语权。广泛宣传我们的思想，把全国的星星之火连接起来。这次成都的活动，虽说只有二十几人，但却是全国九省市的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块，至少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实践，去了解社会现实。也算是迈出了新的一步。

七月二十一号，我们一行来到成都中医学院。进行我们来川之后的第一次讲座，主要是昆华同志来重点讲讲东南亚各国毛派的情况。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靠一国搞成功。当资本主义蔓延到全球的时候，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好时机。当然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不一样，各国的阶级斗争处于不同的阶段，斗争的形式和策略也不尽相同。当然了解各国的情况是中国左派义不容辞的任务，历经帝国主义绞杀几十年，至今还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毛派’可谓屈指可数。

昆华着重讲了一些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一些国家‘毛派’的斗争情况，比如菲律宾，越南，新加波等等。对于这些地区的活动，总体感觉是越来越趋于熄火状态。或者暂时处于低潮，不过期间历史的斗争却是蜿蜒曲折的，虽然不及秘鲁光辉道路那样蜚声海外，但也别有一番滋味。至于尼泊尔，印度就不用说了。说到尼泊尔，想起以前曾听昆华说他们学校一校友当年乘着国际左翼活动迅猛的大潮就直接奔尼泊尔去打游击了，搞的昆华也有产生去尼泊尔的冲动，幸好没去成。其实更多的时候想起了切格瓦拉，当年切因为在古巴无法施展新政，无法继续自己的理想，毅然出走刚果，到非洲继续战斗。他的出发点自然是好，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也算是善始善终了。他也因此成为一代又一代造反青年的精神图腾，作为现世的耶稣活在人们心间。但是，其勇可嘉，却并不值得去效仿。正如他也收到的很多人的批评一样，放着这么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却仍然继续自己的经验跑到其他国家去打游击，不了解别国情况，而且没有发动群众路线，失败是必然的。这样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如何契合我们的理想和现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抉择之路。不紧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更要结合社会的情况。正如电影《切格瓦拉传》里曾经谈到革命一样：革命并不意味着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做一个后勤医生也是对革命不可或缺的贡献，当年格瓦拉就是战地医生，尽管当后来他面临着是继续背着医药箱还是枪时，他最终选择了枪。为革命做理论宣传也是一种革命，革命无处不在。革命的硝烟已经弥散在当今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合适的位置上清醒的做着有利于革命的事就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负责。面对当今各种激进主义分子的热血冲头，更多的是保持一份理智。认清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与任务远比盲目的冲动更加合理。当然，革命并不是请客吃饭，正如切曾说到他的革命之路：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陪伴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了悲苦。他还说，我仍旧像过去那样喜欢单独行动，我在寻找自己的道路，但我现在有了历史责任感。我现在无家、无妻、无子女、无父母、无兄弟，我的朋友们在想的与我一样，我感到很高兴。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生活。我们还在为了自己那点小农狭隘心理而悲天悯人，谈论着不着边际的无聊话题，真的感觉羞愧难当。那时的我们又是何等的渺小与可怜啊。虽然回归正常生活是大多数人的必然抉择，郑曾说：如果我们连正常的生活都不曾体验过（条件允许下），那么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是不是一句空话。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照样生活，谈恋爱，工作。虽然他的话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即把一个基本的前提给偷换掉了（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生活只是适合少数人，平常的幸福并不属于大多说人，这个阶段内的主要矛盾还没有解决）。但仍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彻底的解决问题，那么现实生活只是一个空谈，这样的生活只能说是混乱，一大堆无意识在作用着。对于马恩列斯毛，还有太多的理论没去研究，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彻底。黑格尔曾说，内容总是新的，即否定之否定的经典总结。回归正常生活是一种回归，但这种回归貌似不仅有形式上的回归，更有内容上的回归。正常的生活让我们有一种正常的思考方式，其实为我们与正常人打交道提供了很好的心理准备。很多时候，革命者免不了用自己的方式与别人打交道，这样不但融入不了普通人群里，更是让普通人有一种抵触的态度。毛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何协调正常与不正常，是一个很急待解决的问题。关键是一颗反省的心。

七月二十二号，大雨。

租车去另一个红色资本家厂，H 老师由于去赞比亚出差了，留下他女儿接待我们。她介绍了一些厂里的情况。像这样的厂如今已不多了，虽说仍是私企，但较之另一些血汗工厂，无疑是天壤之别的。中午又大吃了一顿，享受资本家的好处，让我们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虽然我们似乎都对钱不太感冒，觉得钱多钱少就是那么一回事。可真的让我们享受有钱的好

处时，似乎有一种难以言衷的感受，确实我们还太年轻，对于社会的各种诱惑还太缺乏锻炼。以前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甚至我还专门为此请教过黑牛，他给我的回答是：享受生活跟革命并不冲突，关键是看一个人的主流，即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的一些小的方面。如果他一生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在为之而努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偶尔享受享受也未尝不可。是的，我们为之奋斗的不是幸福的平常吗。下午，去了杜甫草堂。也算是小小放松一下，乘难得的空闲。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杜甫不得不提。作为晚唐的杰出诗人，一生忧国忧民。想起他的两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与李白的清新飘逸形成鲜明对比，是对现实的深重思考。与后来俄国的莱蒙托夫遥相辉映，慰藉了多少文人墨客，又激起了多少爱恨情仇。想起莱蒙托夫的一首对人生的探索的诗，现敲下来：

沉思

我们这一代人实勘悲叹！/前途不是渺茫就是暗淡，/求知与怀疑重负于肩，/一事无成而日渐衰蔫。

自从离开摇篮/心灵便留下父亲的错怪，/还有姗姗迟来的真知灼见；/我们生活如慢慢长旅，/又置身于陌生人的庆宴。

无羞无耻，不知廉恶，/与世无争，退而独守杰玉；/危难关头常畏首畏尾，强权面前却自甘卑贱/

恰如成熟过早的干瘪果实，/既不悦目，也不香甜/挂在繁花间如伶仃异客，/凋零时正值鲜花烂漫。/我们为无用的学识新劳神伤，愿藏起高昂声音和美好愿望；/一切亲朋好友不敢信任，/恐怕遭受无端嘲笑诽谤。

我们嘴唇吻着享乐之杯，却不懂节省青春力量；/虽然欢娱时担心过度，每每饮尽销魂的琼浆。

艺术的匠心，诗歌的幻境，醉心喜悦不能令我们激动；/我们竭力保留残余情感，把一堆无尘之物留在心中。

我们有时亦恨亦爱，为之却什么都不愿牺牲；/当热火激情在血液中燃烧，莫名其妙的寒冷笼罩心灵。

我们厌烦了先人热情洋溢，厌烦他们放浪形骸；/匆匆奔向墓地仍回头讥笑，确实从未体验幸福与光耀。

生活是一种累带不到墓地，这群人无声无息于尘世；/未给后代留一点睿智熟虑，也为留下一页闪光的徽章。

后人将鄙夷的责骂我们的尸骨，像公民和判官一样不讲情面。/如同在遗产上一无所有的儿子，尖刻的嘲讽父亲顷刻荡产。

七月二十三号，去市中心查看另一国企旧址。

同样的，也是遍地砖瓦，还剩几栋五六十年代苏联帮助建的工人住宿房，正摇摇欲坠中，一层还住了几户没搬走的老工人。旁边是电子科大的一个新的校区，另一旁是高耸的洋房，只剩下这块粗糙围起来极不协调的房产基地。像这样的房地产的囤积地在全国各地是‘星星之火’，正等着燎原呢。国企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看上了其所在的位置，基本上大型的国企基本位于市中心或周围，是房地产的香饽饽。不是破产就是搬迁到郊区，要么就转手卖给外资。这样的命运似乎是合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这似乎验证了一句话，资本所到之处，只剩下钢筋水泥。下岗工人何去何从，是我们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D、Z 老师说，基本上分为几类人：一类人下海经商（条件较好或者有关系的，极少数）大多数加入到摆摊

一族；一类加入到农民工一族，但此类人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另一类人成为无业游民，靠领低保，而工人的亲属如妻子，儿子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下岗工人的离婚率据说很高，至少百分之五十，或者没离婚的干脆靠卖妓为生；而工人的子女则没钱继续上学，基本上待业在家，成为坚实的产业后备军，或者外出打工，成为血汗工厂的又一代压迫对象。总的来说，基本上沦为底层最悲惨的一群。就在我们心情沉重的围绕着厂房转的时候，忽然我们看到了难忘的一幕：几个中年妇女带着几个小孩在拾钢筋，这会儿正是雨后初晴，附近的蚊子大概好久没闻到香味了，争先恐后的跟着我们，搞的我们甚为苦恼。而他们则若无其事专心致志的寻找着触手可及的废弃铁丝，那几个小孩则为找到的铁丝而欢呼雀跃。黑牛说，这样小的孩子，是呆在学校认真上课过着无忧的另一种生活的，现在呢，真可怜。回想起似乎我们的童年有太多的欢娱。也许电影《血钻》、《上帝之城》里的小孩比这个更悲惨，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从小就被灌输着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沦为了统治者的杀人机器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类似之处，心理的创伤远大于身体上的伤害。其实，更多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如农民工的孩子受教育的问题等等。只是平时我们都满足于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了，对于某些东西已经慢慢变得麻木了。

七月二十四号，L 老师带我们参观了一个展览馆，放在里面的是国企以前用过的机器，多少年前，某人曾说过，要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博物馆里去。似乎今天就见证了他说的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滚滚洪流已几何级的速度火箭般的飞奔着向前冲去，留下了这一对破铜烂铁孤零零的睡在这儿，似一个老人，叹自己的黄金生活已经一去不复回，只剩哀叹的份了，也许再过几十年。连这破铜烂铁都将被扔进历史的洪流，被遗忘在历史的某个角落。

七月二十五号，参加成都一个小组的活动，纪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围绕着两个问题：此仗该不该打，打的值不值。这也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鉴于平时的疏忽，没有仔细的思考和查找相关的资料。所以略谈一二，T 老师是强烈赞成此战的，不仅此战最终胜利打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把美帝国主义打回了老家，第二次是越战让美国再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果，美国也就败过两次。当然此战中国也是以巨大的损失来换来的（兵员伤亡双方都差不多，但在当时中国如此简陋的装备下打赢了这场貌似不可能赢的战争），从此美帝几十年不敢骚扰中国，一展中国雄威。当时也确实需要一场战争来获得自信，社会主义的火种可谓势单力薄，这一仗把中国人的潜力都打出来了，为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当然讨论归讨论，最后讨论到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改变中国目前的现状，他们是主张改良的，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改良，缓和阶级矛盾，不要造成动荡，而我们是主张革命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来参与。最后也没谈到一个结果。不过也是挺有意义的，从他们身上了解到不少信息。下午，黑牛，昆华，郑，葛，知秋去和一位博士生谈阿尔都塞。对我来说，阿尔都塞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话题，陌生的是没有仔细认真的读过他的著作，熟悉的是经常听到，看到他的名字。二十世纪的法国，诞生了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像福柯，德里达，拉康。难怪人称法国巴黎高师为法国思想界的摇篮。

七月二十六号，马前卒来川，专讲世界形势，据说他可以讲个几天几夜没问题。因为火车遭遇泥石流而被滞留长达二十多个小时，不然他早就到了。更是在火车上睡了这么久，一讲果然更是名不虚传，中午已过，那势头丝毫不减，反而有继续上涨的苗头，不久，大家纷纷趴头而睡。主要讲的是中国的崛起，美中将成为两大巨头，一番滔滔不绝下来，让大家都有种瞠目结舌的感觉。高流说，颠覆了他的世界观。期间还给我们透露了不少高层（他所接触了解的）一些内幕，包括他对中国各阶层的划分图，更是让人为之一震。最后难免少不了他的那个著名的‘革命理论’：即革命是杀头的事，怕死者最好不要来。他是做实事的人，自己也开着设计院，典型的成功男人，一场爱情马拉松跑了十年。他还跟我们分享他的成就感（婚姻的），回到家后，吃完晚饭，还能和老婆聊上半个小时的天。也许这样平常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奢侈。（黑牛说要是他和他老婆如果只能聊上半小时的天，估计早

就完了，也许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其实倒不是他讲了多少，而是我觉得对材料的占有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下午搞了个小型的经验交流会，很多人都很有感触的谈了不少。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对现实的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很多问题的思考。下午去吃冷锅鱼，也算是调查完满结束的一个仪式。

最后要特别提到三个人，Y同学，来自河南师范大学，这次活动里的唯一一个在校女生，跟着我们跑这跑那，丝毫没有怨言，对很多问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当我们都在为去餐馆吃上一顿好的而兴奋不已时，她却说，哎呀，怎么又要去餐馆吃啊。昆华说得好，这样的女孩都要比我们靠谱，呵呵。还有一个人，这次活动里面年龄最大的Z老师，六十多岁的人，从昆明跟着昆华跑过来，跟我们一样吃一样的饭，坐一样的车。当我们都觉得走路走累的时候，Z老师却没发一言。让我们感到由衷的惭愧。Z老师说，跟你们在一起，找到了年轻的感觉。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春天的希望。这样的老人，对我们的活动是如此重视，如此支持。跟诸位老师一样，给了我们莫大的动力。还有北海月同志也抽空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作为成都的异常年轻的“老”同志，不仅在网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现实生活也是充满了热情。在这次活动中更是感受到了她一颗年轻的心。更是验证了她自己曾说的：走一条新的道路必须以忘记自己为前提。真的是见一次，一次比一次年轻，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此次成都之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现实，更感受到了成都同志的热情与鼓励。就像诸老师说的，为了一个同样的目标，我们走到了一块。是的，一个同样的理想让更多的人团结在我们周围。我想，不仅成都，全国各地也有着无数的等待的同志，在他们的周围也一样集结着同样为理想而默默奉献的同志、战友。就像我后来在重庆受到热情的接待一样，他们也在热心的帮助我和高流搞调查。

暑期的调查活动已经远去，一个多星期的时光有时那么短暂，有时又那么漫长，为什么它显得如此短暂，而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漫长。能够参加此次活动不仅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更是对我们自身的一次否定，留下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与准备。至此结束之际，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之初，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诗与所有参与活动的同志和朋友们共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227>

校清洁工生活工作实态调查报告

作者：李捷

5月15日上午，我参与了由马研社所组织的针对我校清洁工工作及生活基本状况的小规模调研活动。一共有六人参与，以老带新的形式分成了三组，分别对主干道和教学楼中的清洁工进行了调研，方式主要为访谈。我与另一位同志负责主干道的清洁工，一共调研了两组共六名清洁工。后又在机电楼对两名清洁工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在调研工作中，我们主要从工人家庭、工作、思想和所在村庄村况这四个方面初步摸清了工人们的情况，也为以后可能的进一步调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工人基本个人及家庭情况

从我们调研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我校清洁工均为妇女，基本年龄应在三、四十岁之间，年纪小的有二十几岁，大的有五十一岁。从受教育状况来看，她们基本未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很多人根本未上过学，其中还有一些工人是不识字的（这一点，我是始料未及的），我们完全可以说她们的文化程度是极低的。

她们都是我校附近村庄的失地农民，从家庭收入来看基本属于无权无势的中下层的农民，生活和工作对她们而言是艰辛而苦涩的。她们许多人都育有两个子女，儿子一般在读完初中后就会因无钱交学费或成绩不合格（“我们又帮不上他们什么”，一名女工如是说。）而不再上学、出外打工，从这一方面来看，现今教育在资源配置上的城乡和贫富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丈夫也基本以打临时工来赚取收入。据女工们所称，在打工的收入方面，在我校是最低的（500多元），校外商店次之，接下去是南昌市里，最好的就是去外地打工，月工资可以有1000多元。由此，从家庭的经济来源来看，她们和她们的家庭已完全脱离了小农经济，而成为服务业和产业工人。

她们的收入是十分低的，因此除了日常基本花销外，基本就没有多少积蓄了（这一点在后面会详述）。有女儿的家庭可以把女儿嫁出去，而由于当地比较高昂的结婚成本，儿子的婚姻问题父母们则是无法考虑的，只能让儿子自己找不是本地的媳妇。生活的困顿反倒让婚恋上的自由权利得到了极佳地落实。而外出打工的儿子们，也极少寄钱回家，按一名女工的说法，“他们还要交朋友”，“不向家里要钱就不错了”。

在居住条件方面，她们基本上是住在十分简陋的平房中。而一些房屋被拆的人只得在自己村中租房度日。

二、工作情况

1、她们是如何成为工人阶级的

这些女工原本都是些地道的农民，靠种地为生，基本上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我校建起后，便将她们村中的田基本全部占去了。对她们来说，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

她们家庭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她们失去了食物来源，不得不转向市场中的二贩子购买粮食和肉菜。这样，她们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就彻底被崩溃了（不仅是她们的，而且还包括村里一切的失地农民）。我校本来是按每亩一万多元的标准付给她们失地补偿的，但是经过村干部之手，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到这些中下层农民手中就所剩无几了。按女工们的说法，只有通过大家去村里“闹”，才能分得一点残羹剩汁。而有的农民的地是被政府征用的，用于电力建设，政府补贴是17万每亩，但经层层克扣，到农民手中就成了1万3千左右每亩，而且要分十年递减付清。

面对这样的局面，这些农民就不得不四处找寻生活的出路。其中一些人就进到学校成为清洁工。据女工们所言，进学校还是得和原来就在学校里的本村人有关系才能进到学校做工，比如，如果和原来就在学校做保洁工作的村里人熟的话，等到清洁队有空缺的时候，她们就会通知你有工作空缺，这样方可进得学校干清洁工。自然，送礼是在所难免的了。

经过这样一番波折，这些人就完成了农民——失地农民——服务业工人的转型。

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破落农民，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工人阶级在经济层面的起源就是始自农民失地的。我校清洁工的沿革便以浓缩的方式给我们呈现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起源史，只不过这次吃人的不是羊，而是学校。

2、工作及收入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清洁工们几次用“苦”这个词来形容她们的工作。她们的上班时间是：上午7:00—11:00，下午13:30—17:00，一天工作七个半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星期日单休。无论何种天气，她们都必须工作，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在一大块地方，负责的清洁工却是很少的，这样每个人的工作量便十分大了。

至于合同问题，这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女工给了我们三种回答：没签过什么东西；签过一些东西，但内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签过一些东西，但其中的内容却从未实现过。对于第三种情况，一名女工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刚进来时校方承诺干到一定年数（似是三年）后，每三个月工资会涨10元，但实际上从未有过。

在工人被组织方面，据我们从工人打卡处得到的情况，校方有关部门将工人分成了几组：

南主干道组、北主干道组、一食堂组、南教学楼组、北教学楼组、机电楼组、行政楼组、以及机械楼组。（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差池的，比如机械楼和机电楼，打卡处显示的是一个组，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组；学生公寓实际上有清洁工的，但打卡处却未显示）。

每组设组长一名，由工人担任（显然不是由工人选出的），组长在工资方面会比普通工人高80元，而且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第一、组长都不会配合我们的调研，或装聋作哑，或佯装不知；第二、普通女工在组长视野范围内是不会讲多少情况的。每组内部每日具体工作范围是由组长分配的，当然组长也要从事劳动的，有的甚至干得更多。学校会不时召集组长开会，会议内容有时候组长是不会讲的，有时候则是抓工作质量等等。组长是由部长领导的。而所谓部长，则是按清洁工的工作场所设置的，比如两个教学楼就有一个负责的部长，学生宿舍也有。部长的身份则是学校后勤部门的行政官僚。

普通工人工资是580元左右/月，按月支付，每月中旬支付，基本会延期发工资。组长的工资是620元左右/月。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在机电楼调查时，发现那里的工人（共两人）工资是700多元/月。当我们问及原因时，女工告诉我们，机电楼原有4名清洁工，建起机械楼后，便将两名工人调到机械楼去了，于是学校便将调走的工人的工资平摊到她们身上。但，我们可以算一下，机电楼原有4人，每月就要支付 $580 \times 4 = 2320$ 元工资，而现在，按750元/月为标尺，则是 $750 \times 2 = 1500$ 元，在工人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未变的情况下，月总工资却出现了 $2320 - 1500 = 820$ 元的差额。果然巧妙的开源节流之法。

对于推垃圾车的女工而言，还可以通过捡垃圾中的牛奶袋、白纸以及硬纸盒来赚取额外的收入。从一名推垃圾的女工口中，我们得知，她们这样如果被学校抓住，是要扣工资的；而另一名捡垃圾的女工则说学校里是不会抓的。综合这两种说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想：作为行政官僚的管理人员，或是由于不愿自找麻烦，或是由于心慈手软，一方面不会那么勤快地抓女工的“灰色收入”，互相都心知肚明；但另一方面，一旦抓住，便严厉处罚，以显示自己的威风。

在加班方面，工人不太加班，变但即使加班后，月工资实际也是不的，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加班工资，加班加了白加。至于保险、奖励以及其他福利就更是没有了。在请假方面，是没有病假的，如果病得实在无法上班的话，就需要在以后补假，并要扣工资。所以如果是一般的小病，工人都会带病上班的。在养老金方面，女工们提供的是这样的情况：第一，年轻的才可以交；第二，要有关系，上面才会叫你去交。每年女工还要交 30 元的体检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清洁工们的工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就从未涨过。她们多次提出涨工资，但校方始终未予回应。而另一方面是，菜价、粮价以及电价却连年上涨。粮价现已是 1.5 元/斤，电价则从原来的 5 角左右/度涨到了 6 角左右/度。而且有些女工家庭还要担负孙辈的教育费用。据另一组同志调查的情况，有一名女工，要负担孙子在幼儿园（包一餐饭）的费用，每个月是 240 元。

而从夫妻共同收入来看，如果夫妻双方都在校内打工的话，则每月加起来共有 1000 元的收入；如果丈夫在外地打工的话，则一共基本可以拿到 1500 元左右的月工资。这样看来，收入就基本仅够维持生活了，虽然肉还是可以经常吃上的，但积蓄却基本没有，她们也就自然经营不起中产阶层人士所热衷的财产性营生了。

在村里，是没有任何福利和补贴的。即使是理论上应该有的，实际上也没有。这样，上面的惠农资金被基层干部做了何种分配，就耐人寻味了。

3、管理及工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管理人员，我们从不同的工人口中得到了不同的回答，推车和扫地的工人觉得上面的管理官僚管得很严，并且也很坏。但捡垃圾的工人却觉得，有好的，管得也不算太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工人干的稍微不好，或者她们刚打扫完学生就随地扔了垃圾，管理官僚发现后，经常就会辱骂她们，但打人是绝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有的工人认为是自己没有干好，表示要“理解别人当官的”，有的则很是有意见。而对于，学生干部的检查，在主干道上作业的工人表示管得并不严；但在机电楼的工人则表示管得很严，老是扣她们的分。可以看出，官僚们是管理得没那么勤快，不过一旦要去管理，就会大耍威风。

工人之间缺乏自组织。但这些清洁工中还是有几个比较活跃大胆的人，基本上是干了 5、6 年的工人。如果出现维权活动，她们或许会成长为工人中挑头的领导者。

清洁工们基本上认为现在的生活没有以前种地时好。一方面是收入低，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的上升。她们最大的愿望是加工资，很怕被解雇，至于退休，恐怕是从未考虑过的概念吧。

三、村庄状况

无论如何，从居住地上来看，她们依然是农民。每天工作结束后，她们就得回到家中。她们是妇女，因此繁重的家务劳动便占据了她们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

在学校建起之前，村民收入基本以农业为主，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在学校建起之后，拆迁、征地补偿以及在此之前的靠关系及权力捞取的一些资本变成了村中干部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上等收入村民的原始资本。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和资源，通过租房、开网吧等面向校内学生的商业活动，不断地赚取收入，而下层失地农民却不得不靠打工度日，大不如前。这样，有学校所带来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官僚特权制度、原始资本相结合，便导致了村民贫富差距加大的惨淡现状。原有的小私有者有的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有的则节节上升。这倒是资本主义进军农村的典型状况。

对于村干部，普通村民是痛恨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贪污腐化，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村民利益的漠不关心。按女工们的说法，村干部基本上都变成了有钱人，他们的家族也成了村中的权贵门族。面对干部们的行为，普通村民一般都会忍让，缺少为普通村民利益出头的人，因此，即使是村民和干部起冲突，也基本不是有组织的，而是短时间自发的。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干部叫警察将闹事者抓走。这样就更没有人敢维护村民利益了。

干部的选举是形式主义的，而妇女们则实际上没有选举权。没有人给她们投票，她们自己也说“选举是男人们的事”。

村里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落后的，有些村甚至没有公共厕所。

在计划生育方面，有钱有关系的是不要紧的，但无权无势者多生了却要被罚款，也出现过扒房的情况。当然，如果是独生子，村里会发钱。

四、思想和文化状况

面对惨淡的现实，这些女工有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最后还是归于无可奈何的情绪。她们觉得自己是斗不过那些“当官的”的，因此维权意识并不强烈，对村干部是完全不抱希望，只对校方抱有渺茫的希望。她们缺乏阶级意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大概和她们是刚脱离土地的第一代工人有关，小私有者的思想仍然统治着她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和她们的文化水平有关系。当然，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们没有人引导和组织，生活也稍微可以过得去，而且官僚体制本身也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未来，她们之中应该会产生自发的经济斗争的意识，甚至会成为自觉的。

她们对学生的看法是，学校里学生大多是好的，毕竟都有知识。她们口中的“好”的标准就是不乱扔垃圾，这也是她们与学生的仅有联系。对于老师，则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看法，这群高级知识分子倒是对身边的普通劳动者视若无睹。

在文化活动方面，无论是学校抑或村子里，都不会组织什么文化活动。闲暇时分，她们有时会看电视，她们喜欢看的是社会新闻以及都市频道，因为她们觉得“里面讲了很多年轻人犯错的事”，会给提醒她们这些为人母者。她们不爱看小市民所热衷的娱乐节目。

对于村中的网吧，她们觉得是祸害人的东西。一方面，让她们的子女不能认真读书；另一方面，打工回来的子女，给他们钱，便全花在网吧里了。她们子女的这样一种状况倒是可以作为青年农民工的典型状况。

女工们几乎不关心时事政治，对各种政策和法规更是毫不知晓。村中有5元/人的算命先生，她们是会光顾的。对于哪里的算命灵，她们也是很感兴趣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女工身上的低文化小农的思想遗迹。她们希望摆脱生活的困顿，却又无法在自己这里发现力量，便只好诉诸彼岸世界的宿命。但起码她们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女工们的最大心愿是加工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们工作状况的恶劣。

五、结语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群体接触，虽然是第一代工人，但她们身上依然透着普通劳动者拥有的坦率、纯朴和善良的品质。对于我们，她们是信任的，希望我们能把她们的情况反映上去，给她们加工资。当然，她们也怕我们是上面派来采访她们思想的人。上面的人就曾经叫她们“嘴巴别那么大”。官僚阶层虽然在日常管理上是官僚化的，但却在剥削方面完全资本主义化了。这些女工们的境况是艰辛的，她们的艰辛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雇佣方的剥削，另一方面是村中干部的剥削。她们代表了一个集体，那就是居住于农村的失地工人。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066>

凄风苦雨中的毛泽东展览馆

作者：中华布尔什维克

他是一位在收藏界默默无闻的老人；
他是一位缺乏照料贫病交加的老人；
他是一位把信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老人；
他，就是四川省毛泽东展览馆馆长，王安廷先生。

今天的大多数人们，很难想象，在成都市的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收藏了大量关于毛泽东主席的文物，而守护这些文物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普通市民，他用几十年的心血收藏了这些文物，但其目的，既不是为了个人鉴赏，也不是为了囤积奇货，而是为了信仰的传承——毛泽东的信仰。

毛泽东，这位享誉海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缔造了人民中国，更是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他让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闻风丧胆，改写了中国人民一度被列强侵略奴役的历史。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的人物，他是人民的领袖，穷人的救星，他的光辉彪炳史册！

从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到2010年，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4年了，在这34年中，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用了种种卑劣的手段，力图促成中国的“西化”和“分化”，他们甚至给刘晓波这样，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得到改变，只不过是披上了文明和人道的外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毛泽东思想，正是我们抵御西方腐朽思想侵袭的最有力防火墙。

王安廷先生，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怀着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为了让年轻人不忘历史，更为了使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精神，能够世世代代传承和发扬下去，穷尽半辈子的心血，收集了有关毛主席的大量书刊、报纸、像章、照片、雕塑等，可谓用心良苦。

在缺乏官方和民间资助的情况下，收入微薄的王安廷硬是凭着超人的意志力办起了自己的展览馆。对此，他的亲朋好友，甚至包括子女很不理解，因为展览馆的存在而形同陌路。展览馆需要费用来维持，而长期以来，中国参观者一元、外国参观者五元钱的参观费，可谓杯水车薪。进入老年以后，王安廷先生贫病交加，无助的老人既看不起病，也买不起药，只能把病情一拖再拖。

由于缺乏经费，展览馆年久失修。因为漏雨，大量的文物正不断遭到腐蚀，一些书刊杂志和照片早已受潮、发霉，被腐蚀得不成样子。而金属制成的像章，也没有一个不生锈的。老人的生活环境更是每况愈下，为了防止文物被盗，王安廷先生只能一个人住在展览馆里。但展览馆夏天闷热、蚊蝇滋生，冬天寒冷、阴暗潮湿，如此恶劣的住宅环境，更进一步摧残了老人的健康。由于室内年年漏雨漏风，老人几乎一直是在污水和寒风中度过的。

其实，王安廷先生是有机会摆脱这种煎熬的。曾经有不少外国人士，愿意出高价购买展览馆的文物，但王安廷只告诉对方三个字“我不卖！”正如他本人所说，支撑我的是对毛主席的信仰，我绝不能把信仰也一同卖给外国人。这，是一种怎样的气节？！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这个人人都想升官发财的时代，竟然还有像王安廷先生这样重精神轻物质的“迂腐之人”！在某些“精英”看来，是不是非常可笑呢？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自身难保的人，整天守着这些文物，坚决不卖，这与守财奴有什么两样？其实，对于真心崇拜毛主席的国人，王安廷先生是不止一次的慷慨相赠。他之所以选择不卖，是为了不让有关毛主席的文物沾上过多的铜臭。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不是随随便便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认为，这些文物，比起古代的那些坛坛罐罐，对于后代人来说，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具有凝聚人心，保持红色江山水不变色的作用。

2011年，因为城市规划，王安廷先生的展览馆将被推土机铲平。一个现今只有靠捡垃圾生存的老人将何去何往，我们不得而知。还有那些他守护了半辈子的文物。也许会被送进废品收购站处理掉，也许会被丢进火炉里焚毁。总之，那些东西将会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吧……



被病痛折磨的王安廷先生，右侧全是垃圾，老人目前靠捡垃圾维持生计。

王老先生地址：四川省成都人金家坝天主教堂背后，五福街 23 号，毛泽东像章纪念馆

原文链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710>

重庆万盛失地农民考察报告

作者: 思余

公元两千零八年8月,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荣和梦想的第N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理所当然的迎来了万年不遇的盛世,各种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日夜赶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和谐社会的美妙图画。逢此盛世吾辈德感三生,原当在家收看奥运会,共庆繁华,却突然有事要去千里之遥的重庆。路途遥远多带了两件替换衣服,于是提了个旅行袋,刚出门就被“盛卫士”们要求开包检查,在火车站荷枪实弹的“盛卫士”又把我一把带了二十年的水果刀没收了,好在科学进步了,只要过一个什么门的地方就能把你一览无余,不然的话大庭广众下大家都脱的赤条条的岂不是又添盛世新景了,至于把包里的饮料都打开喝上一口,也算是小民为享盛世做的一些奉献了。

经过重重检查我终于到达目的地,重庆南边曾经的工业区现在是旅游胜地的万盛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逃离尘世的自由,我们一行人被扑面而来的农民的淳朴热忱所感染,当天下午就有几十位从各处赶来的农民代表和我们座谈,给我们递申诉材料。我们再三申明只是来社会调查的学生,无权无势根本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但那些冤屈的、义愤的、企盼的目光深深敲打着我的心灵,一位农民代表对我说,现在他们对待反贪官已经没有兴趣了,在位的是喂饱的“肥猪”,你就是千辛万苦把他告下去了,新来的却是“瘦猪”,他要捞更多来喂肥自己,受苦的还是农民。类似的话我以前当作笑话听过,但从一个农民嘴里说出来,却对我有着强烈的震撼力。随后的三天里我们马不停蹄的走访了解万盛的各处失地农民状况,万盛千峰耸峙,万山环抱的壮美景致无暇顾及,胸中的河山则渐渐清晰。短短几天里我们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惜别时我对农民们说:我们是来学习的,你们给了我们太多、太多,你们的认识远远超越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的收获很大,对于你们的境遇我们还无能为力,现在的中国也许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但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会把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写成调查报告,由于才能所限,我未必能准确表达大家的诉求,但我会竭尽所能喊出大家的心声,因为它是共同的痛苦、共同的血泪、共同的理想和希望!

漫漫维权路

血泪申讨状(略)

这是一封饱含重庆市万盛区万东镇莲池村中学社(莲池苑)全体村民十年血泪维权史的控诉状,后面附着写满整整八页纸的几百个签名和手印,以及一堆相关证据材料(我不是要打官司故从略)。大家看着这些写满各种法规、批文等术语的申诉一定觉得很费劲吧,“法律滋张,盗贼多有”,是一次次的告状、上访,把纯朴的农民变成了通晓各种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专家”,这本身就包含了农民多少的辛酸和成本!

我尝试着用陈述性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大家交代清楚。万盛区万东镇莲池村中学社位于万盛区政府和主要商业区旁,是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中学社有土地317.356亩,原来以养鱼为主,是全区主要的鱼苗和商品鱼基地,当地农民养鱼、养猪、种菜,日子过得也算小康。1998重庆政府发文建高速公路征地581.522亩,(涉及中学社的未见详情)建变电站征地127.584亩(中学社),后来这两项工程实际上并没有用到中学社的一寸土地。2002

年万盛区政府发文将中学社的 127.584 亩地作为万东镇小城镇二期工程征用（房地产开发），2003 年重庆市政府批文同意万盛区将土地收归国有（实际上是区政府所有），就这样变了几套戏法，原来属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的农民的土地成了当地政府（官员）的了。土地是收去了，总得给土地上生活的几百号人交代啊，于是补偿问题就来了，国家有国家的补偿标准；市里有市里的标准；自然区里有区里的标准；镇里有镇里的标准了，都执行高标准，各级官员吃什么啊？每人一万七千元（2003 年）的标准，自然补偿不了农民失地的损失，农民们不愿搬迁，于是 2003 年 4 月 17 日，演出了一目血腥的强制拆迁（奇怪重庆市政府同意万盛收回国有土地的批文是 2003 年的 4 月 30 日），万盛区政府勾结开发商强占农民的土地，并大打出手了（详见申诉状）。2003 年初 7 月当地农民去北京上访，万盛区监察科科长徐峰乘专机飞抵北京国家信访局，要把上访人员抓捕回万盛，发生了在信访局大院里殴打群众事件。2007 年 8 月 15 日，中学社村民 32 人联合赴京上访，被重庆驻京办事处人员诱骗、软禁、毒打、绑架押回万盛。

无数次的上访、申诉、告状到今天情况还是老样子，正如那些官员们说的，无论你告到哪里最后的处理还是要转到他们手里，山高皇帝远吗？民少相公多乎！

当然有受损者必有得利者，市区级的官员通过开发占地得了大头，镇村级的官员通过违规迁入黑户口来分享补偿费这杯残羹，以中学社社长王森容、会计皮开会、出纳万宗群三人一起勾结村刘道生、镇付双现、谭启元、区政府冉进红，在 2002 年征地期间，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的家族朋友谋私利，充当保护伞，以皮开会、王森容为例，违规迁入黑户口、违法划拨承包地、违法办理假土地证、违法办理房管证、房产证违规迁入黑名单户口。其中皮开会，为自己亲妹办理非婚户口为名，姑姑皮开秀（身份证号为 510225195502026341）与侄孙皮刚，当时才 16 岁（身份证号为 500110198702151616）结婚，姑姑当时已 40 多岁，皮刚确不到结婚年龄（皮开秀于 2002 年 6 月 24 日夫妻投靠，由江津迁入）。中学社 1998—2002 年常住人口只有 300 多人，区政府关于征地期间入户人员不准进，已经停办所有户口、房产证等一切手续，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多了新征人员 200 多人，区监察局公布的转非人员近 800 人，而实际上转非人员只有 500 多人，在中学社常住村民强烈上访时，关部门严查督办下，才找出 41 个公布。

前面讲的都是中学社总体的情况，其中的每一个受害者都有辛酸的个案，试举几例。

申诉状（略） 曾润兰 2008. 5. 20

行政抢劫报告书（略）霍仁学 2008 年 7 月

还有娄必兰承包鱼塘被毁的诉状，刘正辉控告区国土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强制拆除民房的申诉状等等——实在是太多，无法一一举例。当然我们也很想听听政府方面的解释，但政府是不屑于理会我等小民的，我只能摘抄万盛报 2007 年 8 月 31 日特刊上的一段奇文共大家欣赏。

万盛大道二期工程征地拆迁户田玉书——舍小家为大家

上个月，在万盛大道二期综合开发工程涉及的原中学社拆迁地块，能经常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耐心地向其亲弟弟宣传拆迁政策——这位中年男子叫田玉书，是万东镇党委办主任，一名普通党员。

田玉书的家在万东镇莲池村原中学社，共有 6 间房屋 108 平方米。6 月 13 日，政府召开拆迁动员大会后，田玉书回家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动员父母和弟弟赶快搬迁。

7 月 3 日田玉书主动到万盛大道二期工程指挥部，签定拆迁协议，7 月 5 日，他又把自

家的房屋全部拆迁。征地拆迁人员都说，田玉书舍小家顾大局的举动使他们深为感动，也为拆迁工作开了个好头。

当时，曾有人到他家劝说：“不要带头拆迁，难道是担心政府扣发你的工资。”而田玉书却说：“如果你也不拆，他也不拆，旧城改造工程怎么推进呢？就因为我是党员干部，所以要起带头作用。”

田玉书的父母都是老党员，他们的想法跟儿子一样，支持拆迁的态度很坚决。他的父母说：“只有旧城改造了，环境才能发生根本改变，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如今，田玉书一家和其弟弟一家在万东镇卫生院附近租房住了下来，他们说，为了城市建设、为了大家的利益，个人困难再大，都能克服。

对于此文（我照抄，一个标点没改）我就不做点评了，细心的读者自然能体会，而无数次上诉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一位农民代表说的好：胜诉已经不重要了，所有的价值已经体现在过程中了，一切的付出是不会白费的。

失落的工矿

万盛曾是重庆重要的工矿企业区，有许多重要的工矿企业，特别是煤矿企业。改革开放前虽然企业在用地上也和农民有些矛盾，但在为了国家这个总体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招收征地农民进企业当工人等方式，基本上能处理好这对矛盾。企业改制后，大批工人下岗，而企业的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断将魔爪伸向周围的农民，使这对矛盾日益激化。下面举几列影响较大的案例。

2003年鱼塘角塌河事件：

南桐矿务局是重庆市的重点工矿企业，在体制改革中，搞企业承包制。为了利益最大化，不顾安全生产，乱采井下留设煤柱。造成2003年鱼塘角塌河事件，河水灌满井下三层，涉及东林煤矿、鱼田堡煤矿连续停产数月，通过整治，三个月才把井下的水抽干，造成南桐矿务局全局5个煤矿倒闭，损失国家资金数十亿元，把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推向社会吃低保。而煤矿经营者却乘机大发横财，他们一面继续煤矿生产，造成大量农田崩裂，农房垮塌，水源断绝，一面与地方政府勾结，篡改中央文件，克剥农民的农赔款，中央拨给的农赔资金达10多亿，农民所得不到1亿，造成数万农民栖身危房，生命财产首当其冲严重威胁。下面是一份采煤沉陷区受损农民向中纪委提交的南桐矿务局采煤沉陷区农赔情况的报告。

（略） 重庆市万盛区采煤沉陷区农民（*****） 2008年3月20日

这是一份出自当地农民之手的报告，尽管在遣词造句上还略显粗糙，它对南桐矿问题的揭露还是相当完整和明确的。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们经过不断的失败，已经从朴素的感情出发，尝试着把自己的痛苦升华到了民族的痛苦、阶级的痛苦！这正是我们时代共同的迷茫，也必将为我们共同奏响时代的强音，提供华美的乐章！

2004年胡家沟矿渣爆炸事件：

重庆市南桐矿务局下属东林煤矿，地址在万盛区万东镇新华村胡家沟社，该煤矿开采原煤数十年，煤井是竖井，井下排处的矿渣就地堆积在胡家沟的一个山沟里，陈年累月的矿渣堆积成高达数百米的矿渣山，未经处理含在矿渣里的硫磺矿在矿渣山内发热起火，遇雨水浸透产生大量硫化氨气体，2004年6月5日午后，突然发生强大的硫化氨气体爆炸，把数万立方米的高热量矿渣冲向1000米的鱼塘岸上，导致21人死于非命，后在矿渣里挖出14具

残缺不全的尸体，尚有 7 人至今尸骨无存。爆炸还导致 14 座民房倒塌，片瓦皆无。当时，声如惊雷、山摇地动、浓烟滚滚。顷刻之间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母；老人不见了孙儿，哭喊之声不绝于耳，悲痛之情长留在心。

肇事的东林煤矿（1971 年曾发生过类似事故，死 8 人）在 2002 年就向国家申请破产倒闭，在骗取了国家数亿资金后，只砍掉了一大批工人，而煤矿的生产照旧，经营者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置安全生产于不顾，不吸取 71 年的教训，是导致此次爆炸案的根本原因，但事发后，煤矿却和当地政府勾结，将这一重大的责任事故谎报成了山体滑坡的自然灾害。他们欺骗国家、诈骗人民，误导社会，当时万盛地区的大小学校，学生每人 1~5 元，老师干部 100~200 元，大小车辆大小车辆 20~100 元的任务捐献。而肇事者们非但不承担责任，而且乘机发死人财。

2005 年又发生一起矿渣爆炸，打死一学生。他们对农赔偿不直接与农民面对面，而是把补偿费给了地方干部，地方干部私分了补偿费，事发后，主要责任人至今逍遥法外。

关坝电厂的征地案：

关坝电厂已征地 1600 亩，涉及五个村，造成 1500 多农民失去土地，而地方政府又在补偿中贪污截留，不顾农民的死活。下面看一下失地农民的情况反映：

关坝电厂不依法征地安置补偿的情况反映（略） 重庆市万盛区关坝电厂失地农民代表 2008 年 3 月 20 日

后面附着失地农民委托签字表，整整十四页，共计九百五十七人。

万盛区南桐镇其临村，村民控告村支书刘显松，侵吞集体资产案（将 22 个企业不动产换成 564 万元私吞，将村水泥厂——厂房、机械设备等 3000 万固定资产侵占）。

万盛区开办联创煤矿，占地 600 多亩，农民不满补偿，关坝镇长黄召碧、书记毛朝艮，于 2006 年 5 月 4 日带着 100 多名警察，开着挖掘机强行挖掉农民鱼塘，并到处抓捕、关押农民。

树木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亿万年地火冶炼，变成了黑色的金子——煤。这个宝藏理应属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然而在这个黑金盛行的世界里，宝藏并没有给当地的农民带来财富，而是无穷的灾难。何时重整我失去的家园！何时夺回我无尽的宝藏！

淹没的土地

白龙湖因地处丛林镇白果村与七龙村交界处而得名，是一个集生产、生活供水和生态旅游功能为一体的人工湖。

该湖始建于 1993 年 8 月，竣工于 2001 年 6 月。其总面积 22 平方公里，水面 1000 亩，容量 1120 万立方米。水坝为全浇筑块石大坝，最大石块高 49.6 米，坝顶高 674.8 米，坝顶长 116.8 米，水库总长 43.6 公里，工程总投资 8931.18 万元，可灌溉 4 万亩耕地，解决 8 万人的生活和工业用水，是万盛的生命工程。

白龙湖风景如画，四周层峦叠翠，与湖水相映成趣，春日桃李与锦鳞相戏，秋季野鹤共白鹭翔集，若在烈日炎炎之时进入此湖，则溽暑顿失，凉风送爽；入冬对岸白雪皑皑，水落岛现。早晚烟雨迷蒙，云雾蒸腾，故而被誉为万盛“蓬莱”。

这是在汤家沟水库大坝上，竖着的一块石碑，其正面刻着“白龙湖”，背面就是上面那段文字。如果是游客站在坝上，面前是粼粼碧波，脚下是百丈深谷，一定会心旷神爽吧，说不准还会来篇《白龙赋》什么的，但读了下面的文字，还会有那样的诗兴吗？

举报控告状（略） 汤家沟水库移民代表* 2008年8月**

原来打粮种菜茶园，今个儿都喂了鱼虾龟鼋，良辰美景你的天，伤心血泪我家院！层峦叠翠，云蒸霞蔚，千顷波涛，万里江山，凭什么到头来是农民贱？

原区水电局长，汤家沟水库工程总指挥（现副区长）徐月芬，挪用工程资金3500万元去修建“银碗槽”水库，并交由她胞弟徐月斌承包该工程。该水库在征地手续不完善，用地手续不齐全的情况下，占用了关坝镇砖房社、祠堂社、长五间社的土地313.759亩，拆迁移民230人。由于安置补偿不依法，及层层的贪污克扣，使移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经济来源、无最低生活保障。水库在施工时忽视安全隐患冲垮了祠堂社农民犹章其的房屋，犹多次找镇长胡文斌（原汤家沟水库副指挥）及镇政府，都不予解决。2003年9月24日，犹在库区便道上拦车找领导论理，被授意工程车当场压死，司机逃逸，至今无人追查。水库采石场每半月放炮一次，每次两回100炮震动力有5~20吨，距放炮地100米便是村民集居点，造成村民房屋破损震坏，群众不满拦截施工单位的炸药车，找他们论理，被政府派警察驱赶殴打，并当场抓捕4人，有苗族：杨贞会、马艮生；汉族：张元生、谢敏。镇长胡文斌承诺放炮结束后一并赔偿损失，但至今砖房社分文不见。由于未贿赂镇领导，在还剩余土地814.28亩的情况下，长五间社的建制被强制撤消，社员被农转非了，失去了所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区政府又把市财政拨给汤家沟水库的工程投资款8077万元，（汤家沟水库和银碗槽水库）与重庆水资源公司合并组建“渝盛水资源公司”。重庆水资源公司投资8350万元又修建了张三塘水库，水库占地605.8亩，移民51人——

各级官员们为什么热衷于各项工程呢？无利不起早。汤家沟水库总投资11410万元（市财政8077万，自筹3333万），工程开支3682.462万元，非水利工程挪用2035万元，克剥水库移民补偿款建银碗槽水库3500万元，应余资金2192.538万元不知去向；银碗槽水库投资3500万元，实际开支1371.54万元，应余资金2128.46万元不知去向；张三塘水库投资8350万元，实际支出1558.469万元，应余资金6751.531万元又不知去向。

环山的公路

在我们即将离开的那天上午，我们去看胡家沟爆炸现场遗迹的路上，有一位农民代表到我们的车前，他说他那里比较远，靠近贵州了，他昨天就出来了，非常希望我们能到他那里去看一下，他叫冯帝月，是万盛区石林镇茶园村的失地农民代表——汽车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颠簸了近三小时（其间碰到滚落的山石将道路堵塞，我们一行人下车搬掉了石头），我们来到了万盛和贵州桐梓交界处的大山里。他们村就在那里，他指着一片被山石覆盖，至今寸草不生的山坡对我们说：“这里原来就是我家的耕地”。山坡的倾斜角已将近90度了，我们问他原来是怎么耕种的？他说，原来这里全是梯田，一层一层的，是修路施工推倒的山石将它变成了这个样子，这里再也不可能复耕了。我们在冯和其他几位村民的陪同下察看了现场的情况。下面是村民们提供的详细材料：

重庆市万盛区万桐公路的情况反映（略） 万盛区石林镇茶园村失地农民 2007年12月15日

当然这场官司后来被判输掉了，因为施工单位要求把当地政府作为共同被告人，法官无奈的对村民代表说：我没有能力判你们胜诉。而农民们的抗争还在继续，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万桐公路只是整个万盛区旅游公路的一个侧面，由于万盛区的主要经济命脉是景点旅

游，全区各景点连线涉及：青年阵、关坝镇，石林镇、黑山镇、丛林镇等 5 个镇 10 个村 30 个农业合作社，500 余户农户，2000 多名农民。重庆市万盛区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业，由万盛区旅游管理局出面，勾结沿线的 5 个镇，借口方便农民生产和生活，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推动扶贫开发，有力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私自以小恩小惠拉拢少数村社干部，瞒着广大农民，背地里形成协议，同意兴建和扩宽贯通黑山、石林、九锅箐、铜鼓滩、汤家沟等旅游景点的环山二级旅游公路，全线长约 70 多公里，占用农民承包地 2000 余亩，公路竣工至今，沿线农民的承包地，只有串通了的干部和他们的亲戚赔了一点青苗费外，其余被占地农民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费。为了生存，农民们多次上访区政府、区委、区人大、区政协、区国土局、区旅游局、重庆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局、市国土局，这些部门都置之不理。农民们赴京上访，又被区政府派人去北京追捕回来。写材料给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单位，都是石沉大海。农民们是多么盼望着中央政府能为他们做主啊。万盛无日月矣！神州有青天乎？

选举与黑道

2004 年 8 月 24 日，重庆晚报“法制·民生”栏目有这样一篇报道：

一张选票价值 30 元？

——有关部门已决定对万盛沙坝村换届选举进行调查

因为觉得 100 元钱来得不明不白，8 月 3 日，万盛区南桐镇沙坝村民石东生在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投票现场当众提出上交。据悉，万盛区有关部门已决定就该村的换届选举进行调查。

100 元的由来

今年是万盛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之年。在沙坝村的选举中，原村主任，现任村总支书记张成和村民喻金生竞选村委会主任。7 月 30 日正式选举时，两人选票均未过半，镇里决定 8 月 3 日补选。

8 月 3 日选举前，石东生找到南桐镇有关负责人。他称，其妻在村办某洗选厂务工，2 日下午下班时，老板池某对职工们说，张成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意思，明天大家都投他的票，否则发的钱在 7 月工资中双倍扣除。石家有两张选票，一张票 30 元，两张就是 60 元，另给他妻子算两个工作日，每个 18 元，共 96 元，“老板给了个整数。”石妻这样告诉记者。

“这样的钱不明不白，拿起烫手。”石东生如是说。为此，选举当天，他一大早赶到投票点，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没有人去接石东生送上门的百元大钞，选举仍旧照计划进行。那次选举，张成获得 1610 票，喻金生获得 1270 票。如今，张成已拿到区民政局颁发的大红聘书。

没得钱者喊“拿钱”

洗选厂池某是否真的表示过意思？记者赶到该镇时，由于老板池某不在，无法求证。

但部分村民向记者证实，有人选举前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大家投张成的票，有的村民在选举前就收到了钱，有的事后才给付。村民称，石东生的不知趣之举让人不敢再继续表示“意思”，而一些没有得到钱的村民至今还在追着当初的承诺者大喊“拿钱”。

“老板让我要工人选‘原班子’，每人计算两个工作日”。采访中，另一个洗选厂的某班长在要求为其保密的情况下，向记者证实。

据他透露，沙坝村拥有几个煤矿和洗选厂，村委会主任竞争激烈是情理中的事。

当事人称“有预谋”

“我们也接到了很多反映，是否属实尚需调查。”南桐镇党委书记游邦令告诉记者。游介绍，村民署名反映引起万盛区相关部门的重视，区纪检、组织、民政、审计等部门已决定组成联合调查组就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该镇纪委书记证实了石东生在选举现场坚持交钱的事实。

张成对此有何看法？昨日他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没有委托过任何人动员村民选他，有人将钱当众上交是“有预谋的”，原因是让他无法当选。张成称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将坦然接受调查。

区里的调查是不闻不问，村民又托重庆晚报的记者向重庆市纪委举报，市纪委答复“调查处理”。嗣后听说张包了15万元去重庆，以后市纪委一直无人过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下面是群众揭露的张成1999~2005年的贪污事实：

1、2003年出售沙坝煤厂55%的股份给方建洪，售价295万元，落入张成的腰包。

2、1999年张成恶毒诬陷李佐坤挪用公款，强行将苏家塘煤厂每年18万元承包费从李手中夺来，以每年15万元承包给其弟张承佐（为夺苏家塘煤厂的承包大权，方建洪一次性给张650万元的红包），承包期五年目前足足三年承包费45万元未入村帐上。

3、2000年，张成独断专行，将烂凼煤厂夺回来，以4万元承包费用，由喻长凯替张承包（实质上喻每年交纯利润1000万元），目前该煤厂日产值已达5万元。

4、2004年，张独断取消村民烧煤（实质给村民的烧煤3400人*0.5吨=1700吨被他出售吞没）。

5、2004年强行霸占苏家塘社麻竹山，毁掉麻竹私自无证开办烟花煤厂，据家人口漏，出售4万吨给雷神店高速公路承包商铺路，获利192万元。

6、在退耕还林中，沙坝村退耕还林2100亩，张多报3倍，侵吞国家退耕培植费94.5万元。

7、张下令将村茶园132亩毁掉搞果园，上报349亩，骗取4.9万元。

张成至2005年，共计贪污侵占将近3000万元，而侵占、搞垮了沙坝村的龙头企业（沙坝煤厂、苏家塘煤厂、烂凼煤厂），断绝了沙坝村村民的发展之路，坑苦了沙坝村的农民。

据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在綦江县（重庆）古剑乡召集黑社会份子近三百人成立“梅花党”，任党主席。被告发后綦江县政府调动刑警、武警及松藻驻军联合围捕，张漏网潜逃后回家乡潜伏。当时万盛区黑势力头子段昌俊闻讯后，通过区委书记何国清找到南桐党委副书记张中贵，由张保下安排在沙坝村洗选厂任厂长，1999年又有张中贵保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上了村长、村党支部书记，还被上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我们再来看看上面提到的另两个名字，他们于2007年6月9日，被公布为“重庆市十大企业家”。

段昌俊，重庆市万盛区关坝镇人，青年时代读初中时，在当地成立虎头帮，自任首领。曾被公安人员武志本多次传讯（有档案），被学校开除回家后，多次组织虎头帮成员在外抢劫，搞了一笔钱（与方建洪有关）回家。1992年左右，他用一笔钱买了一辆皇冠车行贿万盛区委书记何国清，何把万盛区财政交给段掌握，让其给万盛承揽工程。在次阶段段与加拿大外商联合在万盛办了个“庆丰合作基金储蓄所”。在朱熔基任总理其间，取缔了一批不合法的金融机构，段和加拿大外商卷起储蓄所有的所有存款，偕全家潜逃加拿大落户。段卷款潜逃后，万盛区区长魏学彬利用财政款偿还了储户存款。2005年，段又以外商身份回大陆，在贵州省铜仁市松坎镇的马虎塘开了四个煤矿。其生产的原煤一律由万盛区南桐矿务局总经理刘德中包销。万盛群众知晓后向中央举报段是黑财团头子，后来听说被贵州驻军抓捕，通

过高额行贿又放了出来，现是重庆市十大企业家之一。

方建洪，是在车匪路霸盛行时期从江西的鹰潭至贵阳，由贵阳至三江铁路沿线抢劫旅客及国家财物的总指挥。方在沿线抢劫火车多年，在这其间与段昌俊有密切关系，最终方被捕落网。刑满回家后方找到了段，段把方带到南桐矿务局找了总经理刘德中，把方交给他管吃、管住、管钱用，后来刘把矿务局的稀羹煤给方经营，只收成本让方赚钱。1995年后，方建洪行贿万盛副区长（经贸委）刘光才，把万盛3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国营企业“万盛食品公司”以130多万元卖给了方，方改名为“渝旺集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他在生猪收购上大量敲诈剥削农民（收购扣农民的肉，出售猪肉打水），有的农民不愿卖猪给他，方与政府勾结，利用黑社会人员把农民压下去，后来强行收购，垄断了万盛的生猪行业，农民有苦难言。2002年，方又串通张成廉价购买了，沙坝村的三个煤矿。他们取消了村民的烧煤，煤矿采煤损坏了农民的房屋、水源、农田等一律不赔偿。农民怨声载道，无处申冤。方建洪近年来与万盛检察院的一女人结了婚，有后台，他能调动公安、法院的警察，农民惹不起他，任由他在万盛横行霸道。他投股占了东林农贸市场，价值数千万，又在万盛区广场构建一栋楼房，开宾馆、宴会厅、歌舞厅，搞色情服务等等，单此楼造价就值7000多万元。这个万盛的恶霸，已经是数十亿资产的十大企业家了。

2008年1月，又到了沙坝村换届选举了。张成他们指定罗元洪为村长候选人。并通过操纵选举（选举总有效票应为2488张，可统计票数为3075张，超出有效票587张），贿选，恐吓威胁村民（把监票歪曲为监督写票人），行凶打人（綦江丁山小学教师刘宗信路过，在选区会议室门外观看社员参选。张等怕刘把违法选举之事捅出去，叫来亲信殴打刘）等手段再次把持了村政权——

“4年后我们一定会回来。”农民代表的誓言深深刻在了我的心头，斗争未有穷期，革命征途漫漫，不怕千磨万击，百炼才能成钢！这是农民们的希望，也是新中国的希望。

燃烧的客车

2007年10月2日下午5点，万盛公交公司的一辆客车，从万盛开往重庆陈家坪，途径綦江时车内突然起火，全车乘客38座，死亡人数（包括小孩达）达33人（政府报死亡27人）。在死难者中有一位万盛的农民，她叫：罗淅、女、19岁，刚大学毕业，在客车起火时，她为了营救其他乘客，放弃先行跳车逃生，最后牺牲在车内——一个多么年轻的生命消失了；一个多么美丽的心灵玉陨了！罗淅家是万胜大道二期工程拆迁户，合同两年后住进回填房，而两年后政府单方面毁约，说合同无效，购房款也不退。全家老小从2002年到现在，寄居在别人的破房子里。整整五年，在艰难困苦中培养出的一个大学生却这样被推上了焚火台。

事件的纵火者肖永华，是万盛公交公司的副经理，年50岁，在公司工作兢兢业业，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受公司员工的尊重。从他的遗书中，我们知道事情的原委。万盛公交公司经理杨建飞，利用手中的职权，把一位工作几十年的老工人辞退，每月只给100多元的生活费。老工人上诉到重庆南岸区法院（公司所在地），南岸法院转给万盛法院裁决。无权、无势、又无钱的人自然赢不了官司，败诉后，老工人天天上访，杨烦了，就认为此次事件是副经理肖永华挑起的，勒令肖夫妇去做工作，作不通就下岗处理。肖没有能做通老人的工作，公司就让肖夫妇一起下岗（只发400元生活费），肖上访无路、上诉无门，最后，只能用一把火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什么是悲剧？将美的、有用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就是悲剧。这个社会中象罗淅、肖永华这样的悲剧又有多少啊！一把火可以烧掉一辆汽车，一把火也可以点燃千万把火，烧掉整个旧世界。

此次到万盛的时间有限，收集的材料也有限，所写的报告难免挂一漏万——万盛十七万农民中，就有十万失地农民，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而在全中国范围内，这里的土地情况还不是最严重的，一些沿海的地方存在更大的非法占地问题。尽管那位国务院领导一直在高叫：一定要保持 17 亿亩的耕地总量。但每年成百上千万亩的耕地在流失，中国的土地在告急；中国的农民在告急；中华民族在告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后记：塔山上的思考

临行前一天的傍晚，几位农民代表陪同我们从小道，爬到了万盛城区的制高点——塔山上，从这里可以俯瞰万盛新城，农民代表——中学社村民理财小组组长邓复全指着远处一块地方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原来我们的鱼塘和住房”。一位北大的学生问他：对城市的拆迁问题怎么看？邓说：我们也希望国家强大，我们也愿意城市建设好，就我个人来看，城市建设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对我们农民的补偿。我在拆迁前新造的房子 200 多平方米，如果是按这个标准赔偿的话，我可以拿上下两层，上层居住，下层可以开店做个买卖，自己做不来的话，转租给别人也可以增加收入。现在只给我家 60 平方，没了耕地和鱼塘，我们是农民，又缺少其他技能，整个谋生的手段都断绝了，男人 40 以上、女人 30 以上，出去打工都难找活干，现在只能拿不到两百块钱的低保，什么前途和希望都看不到。

夕阳下沉，我们沿大道往山下走，一路上我和那为同学就这次万盛之行，进行了探讨：

那位学生问：如果政府在拆迁和征地的过程中，多照顾一些农民的利益，自己少拿点，不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我答：十七大后，好几位新任的封疆大吏，在履新后都高调：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改革到今天还有什么思想还没有解放呢？我们只能听它背后的意思，按法律、按规定办事能叫解放思想吗？叫解放思想就是要为违法、违规开绿灯。官员们如果不搞各项工程，如果不违法违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无政绩可言，那他在官场上是混不下去的。

那中央呢？他们能不能调整政策？

去年底，我听说了两件事，其实和这个问题有关。一件事，我有一个在政法部门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和一些精英学者（都是政府幕僚）宴会，学者们私下很认真的探讨，认为现在的体制糟透了，官员是任期制的，每个人在任期上，只管自己的政绩和私利，没有人为长远打算。还不如搞帝制，最少皇帝要为这个江山负责。另一件事，据传，胡为了节省财政开支，在海关等机关搞了一个削减公务员收入的试点。也就是将万元多收入的水平减个两三成吧，结果被以怠工等手段顶了回来，最后不了了之。如果所传不谬，我以为，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我想到了明崇祯皇帝上吊时的感叹：朕非亡国之君，尔等都是亡国之臣！历史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旧的统治没有崩溃之前，它总有调节的机制，它的手段也比反对者多得多，但却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长存。何况封建王朝是家天下，国破意味着家亡，而现在是“利益多元化”的时代，也许对于有的人，卖国可以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那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怎么才能避免新的革命党，在革命胜利后，不再次成为执政党而走上历史轮回的老路呢？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曾思考过，还没有系统的答案，只有当革命的实践到了那一步，才能全面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一些粗略的想法可以和大家交流：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荣光，但我们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在今天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上前进。历史是有反复和循环，但每一次的轮回都是历史的进步。就拿前面所提到的帝制来说吧，我几年前就说过，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公有制经济由于企业所有权主体不明，必然效率低下，企业家没有积极性，所以要经营者收购；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共和制

导致了国家所有权的不明，必然使国家的管理者们也没有积极性，只能搞封建帝制和领主制了。历史前进了，封建王朝一去不复返了。否则以精英学者们的能量和作为，他们就不会只是在私下里发发牢骚了，早就是“劝进表”、“吾皇万岁”，满天飞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因我们的认识水平的不足和错误，经历种种坎坷，但就像我们不能因封建制度的某种“合理性”而复辟帝制一样，任何对“社会主义”的添加、修饰，都是伪社会主义，其本质都是反社会主义的。如何跳出黄宗羲的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就已经回答了：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其晚年的实践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事实证明了，人民无法被收买，而官员却可以被收买；人民不会背叛自己的利益，而“人民代表”却可能出卖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那么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后，就必须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这个权力应该包括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而为了实施这些权力，就必须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结党、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各项自由。如何使我们的民主、自由，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区分呢？我以为是基础的不同，我们的民主自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个平等包括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平等。其中经济上的平等是极为关键的，国家要保障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要保障在同等劳动下有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当然在不同的岗位、职位和地域会有适当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会影响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建立在这种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对于民族资本家（包括守法外资）允许其合法的经营，也允许其组成资产阶级政党，允许其通过合法的选举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赢得执政权力。我们不是要人为的消灭资产阶级（除了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而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随着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强大，让其自然的消亡（可能要数十年到上百年）。

短暂的重庆之行结束了，收获是如此巨大。汽车穿行在万山丛中，夜幕降临，窗外星光灿烂，而我的心潮涌动，久久不能平息。贺敬之的诗句在我耳旁不断回响：啊，祖国的万里江山！啊，革命的滚滚洪流！

思余

2008-9-10 子夜，初稿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9>

中流击水

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哄！又是论战！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形成的。

——弗拉基米尔·列宁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斗争才能发展巩固起来。

——约瑟夫·斯大林

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过来的。

——毛泽东

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CCTV狗血连续剧

——近年左派和民族主义，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变化观感

作者：马前卒

一、正剧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旧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脏，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这是163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GDP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

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19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也知道在某些要緊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的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用于养老，或是用于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

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程度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没有了退回农村的可能性，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 16 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募集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极度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道德那一套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 200 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过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而且人身也完全归奴隶主所有。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

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辞，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得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 911 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再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我）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染！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他宣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颂扬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上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 1988 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

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二、闹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50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60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采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即刘少奇认为，问题出在地主富农等坏人身上，他们还拉了一批基层干部下水，这应该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钦差的身份下去抓典型，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即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下去揪基层干部的问题。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县城，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

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得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西安“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的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发生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出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而把持着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完全是

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辞地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到了。92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凄苦。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连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

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这种政府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抨击。那个时候网上的政治帖子，不是从底层的苦难说到政府丧权辱国，就是从军备不振扯到民生凋敝。总之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政府被视为买办，军队被视为溃疡，毛泽东作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兼顾了列宁和俾斯麦的角色，既是平民的革命领袖，也是小资们眼中能振作国势的铁血元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革被重新审视，从一个被唾骂了 20 年的疯狂时代重新成为值得思考甚至效仿的对象。面对振振有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听着他们声称要为美国入侵带路，为教育、医疗产业化辩护的言论。不管是左翼共运还是右翼民族主义都恨的牙根痒痒。一边怀念文革，一面暗暗的琢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政府还没有主动控制的意识。翻翻各个 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一一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过，中国的运气不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转机到来的时刻。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人的既定国策已经从工业立国转向金融立国，这样美国就能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来和苏联一国死磕。等到冷战胜利，美国已经陷于发债印钱的金融毒品中不可自拔，甚至整个西方都在转移产业，印钱买东西的狂欢中迷失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更何况中国信仰混乱，统治集团那么好忽悠，转移点工业过去有啥大不了的？不知不觉，按照购买力体现的实际汇率折算，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虽然这个工业国的大部分红利都被西方用金融陷阱剥削走了，但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另一个运气是拥有苏联这个老朋友。苏联在 1991 年挂掉，让中国减少了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还给中国卖了一大批白菜价的军事技术。不过，死掉的苏联最宝贵的援助是休克疗法。苏联所谓的 500 天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原教旨市场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寡头官僚们的抢劫盛宴。中国的官僚倒不是不羡慕这种抢劫，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划到自己名下的才算好东西。但是，再仔细一看苏联，抢劫之后，制造业已经完全垮了，剩下的只有资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中国要是这个抢法，以中国的军工和人均资源水平来看，抢劫犯们手里剩不下什么东西，只有十亿饥饿的民众。俗话说贼不走空，抢劫犯再有作案的欲望，也不会干这种亏本买卖。再一看俄罗斯国势日衰的惨样，哪个大国的统治集团也不想过那种日子。所以，尽管官僚们迷茫无知，尽管自由派的学者鼓噪游说，中国终究没有拆散自己最核心的工业，同时保持着对西方产业转移来者不拒的态度。

这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工业体系缺乏资本和升级的技术——西方正好在拼命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不要都不行，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如此看来，当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彻底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瘾头越来越大，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早晚会和俄罗斯一样乖，假装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实力，为了眼前的利润和廉价消费品，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自己也是半梦半醒，看着苏联的

榜样，觉得的确不能自己拆自己的核心产业；但眼下还的确是那些外资和民企主导的加工业赚钱。犹豫不决之下，两边都得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态度更是让西方国家转移产业、开放市场玩的更放心。

所以，尽管中国自己发展思路不清，但熬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和统治集团的自信心是已经到底了。2001年-2002年左右，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就业、技术积累都明显开始好转，老企业那些缺医保的下岗工人能死的也死差不多了，不再给政府添麻烦。帝国主义的配合和苏联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了中国一个神奇的机会。

三、狗血剧

谷底的时候，可以说是希望最大的时候，但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家伙，觉得中国变成第一工业国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想趁这个谷底扼杀这种趋势。宁可少用点廉价消费品，也要打击一下中国。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飞机，都是美国一步步紧逼，拉架势要动手的表现。那时的中国，第一批歼11（国产su27）服役才几个月，国产神盾舰还要两年才能下水，解放军的主力装甲部队以59坦克为主，导弹核潜艇还是80年代初下水的老货色。最要命的是军队涣散了20年，还没从开妓院、走私柴油的美梦中缓过来。要是美国那时候就全面进逼的话，后果还真的很难说。至少中国会丧失接下来1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另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911事件。阿拉伯恐怖分子从侧面杀出来，一家伙撞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其实呢，世贸大楼被撞，美国的实际损失不算大，要是考虑到上千金融蛀虫提前见上帝，美国人实际上可能还省了不少钱。但从心理角度来说，这让安定了几十年，还沉浸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人人自危。曼哈顿岛上的滚滚浓烟让美国人弄错了战略方向，本来已经伸向中国的拳头拐了个弯，去中东了。美国人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对着伊朗挥舞一阵拳头后发现阿富汗还没有搞定，这一折腾就花了10年时间，上万亿美元。打仗要花钱，要养兵，美国人就自然更需要从中国购买工业品，更需要中国产品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美元。于是中国工业继续指数化膨胀，甚至还有了资源重新搞产业升级。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中东用兵，抬高原油价格。至于当年美国提携的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并称“金砖四国”。原因是中国工业大跃进，让另外三个国家出口资源发了点财，其他的一切照旧。等到美国人打了10年，意识到自己的拳头打到了空气上，真正的对手已经成长成超级大国，在反卫星，反导弹，试飞自己的四代机了。

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俺为中国经济奇迹而总结的原因，这也不影响俺接下来想说的。前面这一堆文字，就是说明一个观点，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2002年的中国算是一个发展谷底，已经用最残酷的方式在底层甩掉了包袱，挖到了吊命的资源，之后进入了快速上行道。到了2005年，甚至连内地中小城市都从90年代的暮气中开始露出亮色。取消农业税、提高转移支付的举措则安抚了农村。只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描述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他们描述的没有错，只是实际上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比如那本抨击买办的《刷盘子还是读书》，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滞后于经济发展才有了些销路。

这种局面给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出了个大难题。本来这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90年代底层的苦难和国势的相对衰落。现在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在这场肮脏的比烂游戏中，胜利者居然是掌握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底层的矛盾已经从最激化的时期开始缓和，国力开始相对上升。倒是一直被描绘成超级恶霸，强大无比，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西方帝国主义，这10年却是王小二过年，越过越凄惶。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同时兼顾思想中的左翼倾向和民族主义，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

落，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甚至连一些工业化进步也完全指认为恶魔的工具，比如转基因。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至少能维持这个群体的政治自信心，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

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在官僚集团看来，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都是自己的。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赌博赌来的，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但客观来说，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议会民主？这个转弯有点大，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所以，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问政体，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府。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举措——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于是，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当然了，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在 90 年代对文革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文革的色彩。文革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个文革预言中的官僚集团（或者说它的后代）要收编这个带着文革色彩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吴国和越国人是世仇，但在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也必须同舟共济。即最好的团结方式是寻找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把外敌的威胁放到无穷大，那么再大的分歧也可以抹杀甚至歪曲。正好，泛左翼因为 90 年代的政府无能，认定西方帝国主义是重要敌人，自由主义是他们强大的代理人。要是能把这两个敌人无限制地夸大，再用资金支持和政治秀来表示善意，打着文革旗帜的泛左翼也未必不能和红色贵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客观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声势大，但无论如何谈不上对中国政治有什么主导作用。的确，官僚中有许多人还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经常谈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但这不过是潜意识里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官僚，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斯大林铁血作风的崇拜者，经常因为某个新来的上级“没魄力”（比如拆迁时不肯派出武警方阵）而抱怨。从高层来看，赵紫阳固然一度大谈自由主义，但一旦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反腐败、反官倒，把赵紫阳那个倒彩电的公子赵大军也列入批判行列，赵紫阳的反应绝不是“我爱儿子，更爱自由民主”，然后大义灭亲。而是悄悄谈判，让自由主义从官倒名单里拿掉赵大军，然后才出来搞政治秀。俄国的叶利钦，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和自由主义一起欢呼，跳到坦克上演讲。轮到别人对他玩议会政治的时候，叶利钦立刻叫了忠于自己的装甲部队，炮轰议会大楼。所以说，官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个玩票的水平。有苏联解体的先例在前，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真诚地玩一把自由主义理想。

在政府之外，我得说自由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大潮中相对失落的文史科知识分子保住了 80 年代的自由主义传承。但在扩招之后迅速增加的知识分子大潮中，他们的声音还是相对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为了解决理论神圣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在宗教（默认为基督教）中寻找终极价值来源。这基本上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这样的自由主义，谁要说能在中国建立一个买办政权，我第一个不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中也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和 80 年代末的时候正好相反。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喜欢谈自由民主，普通城市居民则只是简单的抱怨腐败。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老百姓的抱怨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

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坐出租车，健谈的司机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的就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听工厂门口无聊的保安对话，往往把社会问题归结到缺乏选举上。这可能是目前的左翼最担心的一种倾向。但实际上，普通人之所以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抱怨，并不是他们真需要自由主义，而仅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的不满。80年代以来，普通人看着官僚一天天堕落，看到基层政权口是心非地重复空洞的口号，已经本能地对贴有共产主义符号的那些政治语言体系有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所以，80年代的老百姓看到社会丑恶现象和基层官僚的腐败，会说：“中央知道这事不？”；到了21世纪，新一代年轻人只会说：“真tmd烂透了，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这种趋势，扫一眼网易、新浪的新闻评论就能看得到。

此外，虽然普通人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没什么好感，但很明显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更愿意描述一个圆圆的外国月亮，用来表达对眼前那个月牙的不满。至于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帝国主义那一面来说，要说看着中国崛起而不着急，那当然是扯淡。他们绝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和你作对的怨妇，而是一个要首先保证自己生存的利益集团。现在的英法，打个利比亚尚且筋疲力尽，造个空壳航母都得中国机械上。显然不具备搞中国的能力。日本折腾自己的老龄化和核电站自顾不暇。德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几个营。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美国——万万离不开中国廉价商品的国家，仗着冷战遗产还很是威风。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集团就算因为美国的印钞权而出让了一部分利润，依然有能力不断扩张。过去的10年，他们已经错过了压制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机会，局部战争和平演变是没法压制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倒是他们自己，在金融毒药的压力下日趋空心化。除非发动同归于尽的战争，否则西方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挡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当然，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了，中国正在大步地往工业霸主的位置上迈进。这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中国这个超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问题。对世界的资源、市场、后发国家的前途，乃至中国人民的长久幸福都作出了巨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崛起，从来是要对内压迫，对外扩张并行。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泛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点事，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但事实正好相反。

近年来左派第一个变化是仪式化。

10年前的左派，无论网上讨论还是网下聚会，大部分言论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至于讨论模式，倒不必太拘泥。现在有了网聊软件，聚会更方便了，我也经常参与一些左派网上聚会。内容暂且不论，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类似基督教会唱诗班的气氛。大部分聚会本身只有一个主题——赞颂毛泽东，花样翻新的赞颂，唱红歌、念诗篇、讲故事。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讨论现实问题，结果大家只需要两种表态——咒骂和赞颂，从来不需要辩证的思考，也没人去给出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死脑筋，总喜欢问具体问题，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刚刚咒骂过的那个问题到底该咋办，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督教有个话叫“因信称义”，即你要当“义人”，充分和必要条件都是信上帝。信了你就不用考虑别的细节了，唱赞美诗就行。现在的左派也喜欢这样。

必须承认，仪式化的东西好操作。中国古代总强调“以德治国”，实际下来都是“以礼

治国”。就是因为“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搞一套既能让人有参与感，实际上又足够简单的东西来保证一个底线规则。但是呢，现在是21世纪，你谈政治，谈的是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总唱赞美诗算什么政治讨论？毛泽东的路线或许不错，但是具体操作方式呢？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原则性讨论，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政治讨论永远是空头政治，不可能。空头政治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很容易就让参与者获得激情的刺激，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威胁。如果那些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也只好说，随便吧，采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化。

当然，90年代末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翼运动几乎完全不可区分。但现在的左翼运动，除了挂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壳，把文革和阶级二字习惯性地放在文章标题里之外，实质内容几乎全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目前的左翼运动如果要攻击一个人，首先挂上的称号是“汉奸”，而不是“阶级敌人”。而左翼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声讨这些汉奸，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老板。只要你骂汉奸——骂一个你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人当然很容易，也没有心理负担——你就算是参与革命活动了。

一般来说，这个汉奸、买办主要指那些私营老板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除去这些人，剩下的就都是伟大的群众、可敬的领导核心。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即不打算当西方代理人的那些官僚，那些占有最多的中国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就这样被悄悄地划为了同志，至少也是同盟。

在许多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宣扬中国人相对外国人优越性的文章，即否认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种生物，拥有同样的权利。再进一步，宣扬汉民族主义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在左翼内部得到一致叫好。这样一群人宣称自己在“推进共产主义”，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极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个变化是最重要的：去理论化。

左翼阵营从来是一个理论争吵不断的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左翼一般来说会宣布自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把建设一个新社会作为大目标。既然要建设新社会，一切方案在没有落实之前，充分的讨论、辩论和争论都是必要的。天底下没有不需要修正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左翼主流中，这种争论正在渐渐减少。因为大家渐渐地不去谈如何建设新社会了，剩下的只有怀旧与一致的攻击——对自由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正确性——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不唯权威只唯真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理由非常不可理喻——马克思和列宁是外国人，所以理论的可靠性不如本土的领袖。毛泽东的神性光环可以结束一切争论，同时也把一个政治运动变成一个安抚人的宗教。

去理论化不仅仅限于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泛左翼的思路也是一团糟。比如说现在左派阵营中最风行的“反转”，即对转基因的批判，大部分人根本不去讨论技术问题，直接声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我曾经认真地向几位左派同志请教，问他们到底转基因的害处如何详细论证。他们不是为我认真解答，而是立刻翻脸：“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出于什么目的问这个问题？”也有几位同志要热情一些，会让我去读某某人的书，但当我问他自己读没读过，关键点在何处，是否对书里的数据有自己归纳的时候，人家还是拂袖而去，到别的QQ群里说刚刚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总之，现在的左翼运动认为立场比事实和逻辑更重要。反转基因可以煽动反美的狂热性，在国内又没有真正树敌，所以只要指出转基因的技术来自美国，就足以证明这东西的邪恶性。

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所以方舟子就成了敌人——这个家伙正好在美国。而方舟子的敌人就是盟友——肖传国也值得为之辩护。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盟友。主动捉头猪来当同盟，这种事还真少见。

当然了，去理论化背后颇有深意。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所以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哪怕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字面意思的探讨，也可能把运动的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所以，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足够简单的逻辑，可以把肖传国和一些中医骗子拉到自己一边，同样也可以把美国（西方）之外的社会集团描绘成同一个阵营。所以说，逻辑简单倒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聪明人，或许有人聪明过头了。

第四个变化是体制化，完全可以说这其实是前三个变化的目的，同时也是原因。

迄今为止，左翼天生站在批判社会的一面。因为少数人占据社会大部分稀缺资源，少数人统治社会是几千年来社会的通例。左翼自称站在人民一边，自称要为大多数人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自然有必要批判已有的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当前最主流的剥削制度。现在，全世界的工业国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按说左翼的批判矛头应该及时修正才是。但实际上，中国左翼现在还是集中火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那些“买办+代理人”。同时，在现政权越来越国家资本化的今天，左翼却开始逐渐对现政权产生认同，声称这是一个能带领共产主义者反对内外敌人（重点是“外”，内部的敌人都被解释为外部的代理），走向共产主义的先进集团。这不仅仅是认识不清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倒退。

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随着文革被重新审视，以及苏联解体提供的教训，本来左翼内部已经逐渐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官僚集团的行事方式和阶级地位有了明确的界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左翼越活越回去了，开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退民进”而欢呼，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当年的左翼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中共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今天却越来越多地看见左翼给这个统治集团写血书、诚心诚意地进谏。要求“党内健康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全国7000万党员，如果真有百分之一的“健康力量”，全国2000多个县区，每个县区也应该分到几百。我不知道那些逐渐转向拥护体制的左派到底见过几个党员兼共产主义者，以至于对这个党如此有信心。反正我是没见过。但无论如何，对现有执政集团的全面批判已经开始在左翼内部边缘化，甚至被指责为“偏执”、“妄想”。不过，要是连这一点偏执都没有，左翼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公平的说，现在的主流左翼，并不是对整个官僚集团一味赞美的。对于党内一部分缺乏红色贵族背景的技术官僚，他们敢于大胆地影射、讽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罪名则毫无例外地是：“买办”“汉奸”“走狗”。同时忘不了对另一派官僚集团的称颂。尤其是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用肉麻来形容已经有点不够了。这种夸一派骂一派的做法，本质上是政治投机。即认定中国的统治集团将越来越民族化、贵族化，希望使用西方化政治外壳的官僚将日趋衰微。因此，提前选择赢面大的一方下注会有较大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政治投机本身连“投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个外包项目。到此，官僚集团应该很满意，因为90年代在城市中下层人口中很有影响力的泛左翼阵营，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维稳工具。最近，重庆公布了36首红歌的名单，第一首是《走向复兴》，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说我造谣，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觉得我说的太空泛。好在有一个网站为我这些叙述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是十年来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左翼网站。另外，这个网站没有附带的bbs，所有文章都必须

通过编辑审核后才能上传，因此倾向性特别明显，可以直接认为这里的文章反映了乌有之乡的政治态度。下面我分类列了几篇文章的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直接看看

1 关于左翼运动仪式化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1101/206873.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372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3/218474.html>

2 民族主义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884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76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30841.html>

3 去理论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5/23105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2/214886.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3/22221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548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4612.html>

4 体制化的例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5/231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647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809/50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103/224444.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6792.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9319.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2/202730.html>

更多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搜索。如果读者有心的话，还可以搜索一下过去几年的文章风格和现在的文章风格，看看变化趋势也很有趣。比如说，看看过去的五六年，谈阶级的文字，占同期文章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谈民族主义的又增加了多少。针对红二代的文章多了多少，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工运的报导数量有什么增减，和红歌会的消息哪个多？近十年来泛左翼和乌有之乡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上有明确的体现。看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现代社会的节奏真快，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群体就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

这个群体的变化，不仅我感受到了，那些“正牌”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谈什么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感受到了。我的朋友里就颇有不少这样的人，眼里从来只有中华民族（汉族）帝国的伟大与光荣，从来不在乎这个帝国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只要能让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照搬美国制度也好，纳粹也罢，都无所谓。在政治光谱上，

这显然是极右派。前几年，这批人谈起乌有之乡的时候，满嘴都是不屑，说那里都是一群喜欢造谣的疯子。但在那些民族主义者朋友看来，乌有之乡这几年是越来越“进步”了。评价从“满是疯话”变成了“脑袋开始清楚起来”。其实，客观来说，不论是前几年还是现在，乌有之乡的确都有喜欢耸人听闻的毛病，对文章的可靠度审查不严。但是呢，这个毛病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的。前几年最多是传点花边新闻，近几年就干脆赤裸裸的使用谣言。这样一个网站之所以被极右翼认为“疯话”少了，少的显然不是真正的不靠谱文章，而是少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疯”话。

在乌有之乡常开讲座的，还有杨帆这一类纯粹的技术流民族主义，他们和我的那几个民族主义朋友差不多，也是只谈国家不谈阶级，只提民族主义不提共产主义的。前几年，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演讲，被冠以“左派”的名头。对于这个名头，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杨帆经公开表态：“我不是左派”。原因是当时的泛左翼和请他们开讲座的乌有之乡还经常谈阶级斗争，谈革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决不能挂上这个名头。

最近几年，我再次听到“我不是左派！”这句话。不过发言者不再是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些坚持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保持距离的人。他们觉得“左派”这个词在中国变了味道，从共产主义者的代名词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打手，所以宁愿把这个头衔留给民族主义者。

说到近年的乌有之乡，绕不过一个人——张宏良。我在左翼圈子里朋友很多，不过，2005年之前网上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据说是中央民院的一位教授兼研究所主任，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他在最近五六年之所以名声大噪，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网文和演讲，其中至少有一半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他很善于在演讲时调动听众气氛，善用惊人的数据，但缺点是激情压倒逻辑。听他的演讲几个小时，往往出门时忘了他都说过什么。上网翻翻他的文章，长短凑到一起几百篇，文风浮夸，形容词比一般文章要多一个数量级。抛开这些修饰的东西，他的观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如下：

1 转基因是美国的基因武器，中国人即将失去生育能力

“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民族劫难，将成天谴。30多年来，中国对科学与民主亵渎得太过严重，所有罪恶都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泛滥于世，甚至把数百万妇女逼良为娼，都歌颂为是科学与民主的文明进步。所以，上苍便借助科学和民主这两把利剑来惩罚中国，让科学家和民主派联手把转基因主粮强加于中国人头上，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把眼睛盯在中国人身上，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做出何种反应以后，再决定被称为生物学世纪的21世纪人类的发展方向。

2 中国现在濒临亡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3 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当前中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融于民族利益之中，首先是民族利益，其次才是阶级利益，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保住民族利益，才能谈得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所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逻辑链倒很完整，即美国对中国有阴谋，中国要亡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对付美国。

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8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2009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此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

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

即按照他和乌有之乡的号召，向重庆的薄书记致敬。这就是张宏良的答案。

张宏良是推崇毛泽东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泛左翼里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期也有秋石客等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同样推崇红二代的红色新政，但风头都被张宏良盖过去了。但是，张宏良到底对毛泽东了解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段发言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和前面毛泽东评四清的话放在一起看。张宏良和他推崇的重庆模式到底离毛泽东有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张宏良还喜谈文革。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不过说到张宏良和文革，我倒有一段故事要说来听听。

2007年的时候，在龙的天空这个网站，有人发帖讨论文革问题。有人说到了张春桥在文革结束后的审判中一言不发，我饶有兴趣地回了个贴，说如果张春桥当时知道审判的确在全国直播，估计还是会说几句的。于是我就动手在回帖里写了个“张春桥演讲”，内容如下：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

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然后呢？然后那个帖子讨论了几个回复就结束了，我忘了这事。

过了两年，我忽然在张宏良的博客里发现了这段话，他老人家还郑重其事地给我随手写的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按语：“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 30 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 1975 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

“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然后，由于张宏良先生的广泛影响，我的这段无心伪作就在网上传开了。不止一个人推荐我去读这段“张春桥讲话”。我自己辟谣也毫无用处。现在用这段话的第一句当关键词一搜，还是无数的人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文件。我想，不管张宏良先生是故意弄错还是无意弄粗，这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说服张宏良对文革、对历史的看法，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和可信度。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由张宏良这样的人当旗手，一方面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一方面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主动地为毛泽东文革要打倒的那个官僚集团的的长治久安而鼓吹。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搁到 10 年之前，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当然，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历史没有编剧，反而无所顾忌，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最时髦的政治标签，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三次呢？马克思没说，看来马克思的想象力也有限，没料到已经被证明是闹剧的东西还会被人重演一次。最近这几年，中国泛左翼的转变明显地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力。在反思文革、寻求新社会主

义的标签底下，是红色贵族的合法性论证，是抹杀阶级斗争的和谐颂歌，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呼唤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当年文革时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现在居然再一次被贴上了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被左翼视为文革精神的传承。这算什么剧？

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正剧。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笑，但不乏严肃和真诚。

1966年，高干子弟以革命的名义捍卫特权，提出《出身论》，这是闹剧。缺乏真诚和严肃，唯有狂热的仪式、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

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出身论》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今天的“左翼”在做什么呢？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为红色贵族欢呼。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一定要找的话，只有今天CCTV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

CCTV的古装剧里，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CCTV的感情剧里，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临死还要说活得值；

CCTV的现代剧里，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

CCTV的史诗剧里，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意气昂扬地演讲，然后革命就胜利了。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廉价到不像人的血，倒像狗血。在刚刚过去的10年，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唯有到CCTV和狗血剧为伍，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后记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习惯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这在民族主义看来是一种威胁，我却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机遇。随着教育和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牢骚，已经在“后革命时代”重新意识到谈论政治、推动政治变革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本是大时代的先声。面对这种机遇，左翼主流不是积极应对，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度奔走鼓吹。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自绝于人民”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但是，谈共产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很多人看着共产主义是个笑话，我不怕被人笑，但我们搞共产主义，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还笑我们傻逼。这是我个人划定的一条底线。

关于“玩革命”与革命理想

作者：马前卒

从 21 年起，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分部的身份介入中国政治。共产国际虽然比不得殖民政府财大气粗，但毕竟背后有苏联这么一个工业大国撑腰，每年随便拿点钱，在半殖民地养个千八百的职业革命者还是很容易。当时包括毛主席在内，如果直属中央机关的话，一个月大约有那么 15 块大洋拿，顺利时还有 20 块大洋。这个收入，想发财不容易，但过个平民日子确实不难。我们今天如有人每月每人保证发 3000 块，恐怕大家都愿意扔了工作专心革命吧，毕竟革命比工作好玩多了。同样，广州国民政府也是靠了苏联援助起家的。没有苏联的现金和商船运来的军火，偷偷跑过来的浇灌，黄埔军团也就是个民兵组织。靠上苏联的大树，其他几个暂时没有工业国家倾力支持的军阀简直不堪一击。黄埔军校其实也就是个士官学校，和北洋军事体系的完善军校体制根本不能比。最初几期中，有的只上了半年学。放在当年，我们这样的人物，检查一下身体，有个介绍人就能进去，除了 1 个月新兵训练外，最多用几个月学学看地图、基本战术动作和小分队指挥，然后就要出去打遍中国。结果，军阀是如此脆弱，27 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不可抵挡的占据中国精华地区了。

这么一批人轻松拿了天下，里面自然鱼龙混杂。当然，北伐有许多牺牲，但当时的中国，其实你什么都不干，危险也不会小。我的意思是说北伐打到武汉上海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兴起过程比后来的革命要容易的多，甚至比许多军阀崛起的过程都容易的多。这是一个小资的黄金时代。

在一个社会里，最高层和最底层都是身不由己的活着。底层要谋生，只能把一切精力放在工作养家上，不逼急了不造反。但造反的时候，失去的绝对只是锁链。最高层么，进了那个圈子，是想退就能退的吗？最近几个高官的下场就是榜样。所以相对自由度大一些的反而是中层，这个中层，上到我们在大学混的比较好的导师、小业主，下到我们这种月薪数千但还有空上网写文章的小喽罗，覆盖面很大的。还有一些纯粹的食利阶层，最多半代人就堕落的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了，我们不去考虑他们。中层的特点是不安于现在的生活。因为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脑子和精力能腾出来想想生活以外的生活。不管你叫它理想还是梦想，在我看来其实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27 年以前的共产党基层其实就是这么一票人组成的，国民党也是。共产主义也好，民族复兴也好，或者三民主义也好，反正都是离现在很远的一个理想，莫斯科也不太在意第三世界的革命者是追求民族革命还是共产主义，反正能给帝国主义找麻烦就是好同志，就可以从苏联拿物资去支撑你们的理想。当时也没网络游戏好玩，好多人就这么走上了。

有理想有组织的军队肯定不是军阀部队可比的，但问题在于军阀以后怎么办。

靠大树的想法人人都有，因为靠大树很舒服啊，无论是拿日圆贷款、美国剩余物资还是苏联军火、现金。反正你是精英，那些庸俗的衣食问题，那些琐碎的基层问题都可以用靠大树来解决。除了毛主席和彭湃，鬼才愿意下乡去从基层解决问题。李立三 47 年到了东北，还不服气，一定要走城市路线，拒绝把机关从哈尔滨搬到乡下，林彪问他从城市里怎么搞补给，怎么搞兵员，他立刻说可以指望苏联红军来帮忙打么……这种人，真是祸害万年在，早死早干净。

说远了，27 年的时候，北伐军一到，进去就有钱拿（虽然不多），有面子，也没什么大危险。最关键的是可以扔下平日的琐碎生活，把自己的梦想都寄托在三民主义或是共产主义上，换了今天的小资，难道不去吗？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倒是毛主席他们在乡下大搞农

民运动，想彻底把中国翻个身，惹的不少北伐军中精英（认真的说，不分国共）大为不满——你干“革命事业”的军饷，在家买了几亩地，被农民分了，或者不交租子了，能不生气吗？好比今天你在上海养了套房子，贷款还了一半，结果你的一些野蛮同志强行宣布为廉租房租给穷人，房租还不够你还贷款，入了革命党的小资能不火吗？

靠大树靠成了习惯，就不在乎靠什么大树。对于那些“玩革命”的家伙来说，反正理想就是很遥远的，英美商团只要出钱，只要让我过上又有面子又轻松，还能让我享受理想的生活，那和共产国际也没什么区别。如果杀农会是革命任务，那他们也会象打军阀一样去打。于是，蒋校长很容易的就带着这么一票人去杀剩余的革命党，不管你是国民党左派还是共产党。开始还有点人跟上汪主席抵抗，这些人也是小资，但没蒋派那么识时务。结果谈谈打打，觉得对方还是有道理的，于是携手杀共产党。这样搞来搞去，国民党里除了旧军阀势力、外国商团势力，主体就是这么一批“玩革命”的小资，或者说小地主子弟。这些人比起旧势力来说有点理想，有点忠诚，蒋校长一直用他们维系党政军，混到 49 年。这期间旧势力虽然还在，但肯定没法和蒋掰腕子——有理想和没理想是质的差别，比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区别还大。

反过来看共产党呢，当初和国民党成分差不多，多了几个主席和彭湃这样的死脑筋，但也实在没多几个。27 年分共，其实好多人死的也很冤枉呢，本来是和对手差不多的小资，只因为当初随机选择了共而不是国，甚至多说了几句倾向共产党的话，交了个左翼女朋友就死掉了。这种“玩革命”的小资要么被杀，要么立刻投诚，要么就逃到上海，把根扎在租界和秘密机关，拿苏联津贴（虽然比以前少多了，比国民党拿的少多了）过日子。时不时还可以跑出来玩个暗杀，带上红队和军统比比枪法什么的。一时跑到上海的，还可以走走上层路线，叫上几个军阀搞兵变。至于主席那样的死脑筋，也被杀了一批，而且被杀的比例肯定比小资高，因为他们不投诚。好在死脑筋还剩下几个，跑去乡下，决心从此当一辈子死脑筋。

从此共产党分成两部分——上海的洋党和山上的土共。两者各有各的经济来源，各有各的路。上海洋党总想插手乡下的势力，但路不好走，乡下好玩不多，送命的机会却不少，也就放手让他们搞了，反正自己的根基也不在那边。直到上海站不住了，才跑过去祸害根据地，一路糟蹋到遵义，几个能闹的糟蹋到延安。还好主席运气不坏，把他们给压服气了。

说实在的，那些“玩革命的”，有时候玩的真挺专业，脑袋一热也不怕牺牲。比如顾顺章，带上红队搞暗杀，劫法场的时候也是身先士卒，送密信的时候也能镇定自若。许多人甚至 27 年被抓的时候也够硬气，要杀就杀，没话说。但如果你给他个思考时间，摆摆道理，谈谈人生，讲讲另一条道路的幸福生活，一般他们都会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该投诚就投诚了。或者说，关个一二十年，天天在另一边摆上光明道路，不怕他不投降。这种人的关键在于：他们不是享受革命的目标，只是在享受革命本身。资本主义把这些小资的生活弄的单调无聊，他们就要找条出路。革命成本低的话，革命就能提供这么一条路。他们可以脑袋一热，当水浒好汉，带人冲机枪阵地，但耐不起寂寞，经不起高墙二十年。他们可以在上海街头杀叛徒，反正不是牺牲就是去苏联避难，但绝对不会到农民夜校去搞社会调查。如果你告诉他干了某件事可以名垂青史，他们可以冒险，但如果说这件事需要你默默无闻的干 20 年，他们恐怕第二天就不见了。

总而言之，某些人玩革命玩的是浪漫和刺激，革命的目标反而没那么重要。前面说了“如果杀农会是革命任务，那他们也会象打军阀一样去打”，他们其实很现实，很识时务，比起老官僚、老军阀来，不过多了点年轻时的轻狂而已。过上 20 年，他们也会成老官僚、老军阀。有句老话么“三十岁前不当左派没良心，三十岁后当左派没脑子”，说的就是这种人。他们并不热爱人民，不真热爱这个世界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热爱的是一个轰轰烈烈、浪漫刺激的革命。或者说一切轰轰烈烈、浪漫刺激的东西，可以是足球，也可以是毒品（左翼组织蜕变后贩毒真不少）。老蒋一分共，然后又反共 20 多年，杀了一批这种人，招降、吓跑了

一批这种人，最后的结果是替共产党清洗了内部。反过来国民党只能靠这种人来维系一点利益以外的东西。所以有人评论：“一般以为清党最大的受害者是共党，实际是共党没跨，国民党在事实上跨了，受害的程度不比共产党小”。这个评论恰如其分。

共产主义运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考虑某些特殊机关的工作人员）相信现在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带着点理想主义来混这个行当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升官发财实在和共产主义靠不上边。但这批人大都是小资出身，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也有小资的浪漫幻想。暂时这两者还分不开，一旦世道变乱，在辉煌和寂寞的轮番考验下，区别肯定一下子就出来了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07>

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一些问题

作者：阿土

少年中国按：转基因技术是近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项全新的生物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步入了新台阶，而转基因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又让人们对解决“粮食危机”和消灭广大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等现象充满了期待。但是，由于当前的转基因技术主要是被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美国的垄断企业所控制，这就让许多普通老百姓在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含量充满惊叹的同时，又对其安全性充满了怀疑。左派积极地顺应了群众的这种心理，发起了反对转基因的斗争，一波盖过一波。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转基因会对人体产生确定的危害，但全球的确广泛存在着质疑转基因技术的呼声，这种质疑声不仅来自普通群众和绿色环保人士，据说也来自生物科学界。在国内，官方媒体之外，许多民间人士提供了大量转基因存在危害的证据。种种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互相矛盾的解释，让许多同志也陷入了迷茫之中，不知该如何看待当前反转基因运动。针对这种现象，我们特地发表这篇有关转基因的文章，文章作者是一位生物学硕士毕业的左派同志，值得同志们学习参考。当然，由于我们不是生物学科班出生，专业知识不够，对于行业内的信息了解也不多，如果有同志对文中的观点有疑义，可以联系我们进一步探讨。另外，文中提到了一些有关转基因技术的具体事实，为了信息的全面，我们特意添加了较为详细的注释。

2009年底农业部批准了2种转基因水稻和1种玉米的安全生产证书的事情被披露后，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及其对国内农业的影响问题成为热点。因为这个安全证书意味着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也为期不远了。但是国内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以及转基因相关产品背后的巨大利益了解仍旧很少，基本上是糊里糊涂地就“被转基因”了。一方面，以方舟子黄大昉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认为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转基因主粮能够有效解决粮食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一些民间组织又发布了很多转基因食品对生物机体产生危害的例子。而政府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上的态度却并不明朗，而对相关部门和学者可能得到的好处更是闭口不提，同时国内外的种业公司都对抢占中国种子市场这块大蛋糕摩拳擦掌。剩下我们普通的民众，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下面，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就是涉及到民众利益最广泛的一个问题做些探讨。我们力求从生物学科一些基本的、公认的原理、观点出发对这个问题做个说明。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些传统的育种方式和目前所进行的转基因育种方式在生物学上有什么区别。

我们以袁隆平杂交水稻的育种过程来对传统育种方式做个说明。水稻在自然条件下是自花授粉的作物，而要对其进行杂交改良，就需要人工去雄，但这样要消耗很大劳力，不适合商业化生产。于是袁隆平等利用基因突变产生的雄性不育水稻与其它水稻进行杂交，得到具有经济价值的种子。其生物学原理就是两种水稻间大量基因间重新组合的过程，重组后的基因里很可能会产生同时含有我们所需要的形状（比如粒大、抗倒伏）的品种。经过筛选、进一步实验，而得到最后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品种。

而转基因技术则是将我们已经清楚功能的一段基因序列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转到相应的生物体内，并让它发挥我们所预想的作用。比如转Bt棉花中的Bt毒蛋白的基因序列就是来

自于一种细菌，科学家研究了该细菌中产生的可以杀死棉铃虫的毒蛋白的这一段基因序列，并且把它转到了棉花的体内，使之产生这种毒蛋白，棉铃虫吃了转基因棉花的叶子就会中毒死亡，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并且增加棉花产量。相对于传统育种方式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将育种变得更直接更有效。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育种方式，主要是在各种作物之间，比如水稻和水稻、玉米和玉米之间，将我们所需要的性状，比如一个是粒大，一个是抗倒伏的两个品种经过人工培育来综合到一个品种上。从技术上来讲，传统育种方式实验的周期比较长，并不能很快地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品种，一些好的品种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培育。而转基因育种方式则可以将其他植物、细菌、动物内的某些已知功能的基因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转到植物的细胞内，让它发挥人们所期待的作用，比如抗虫性、抗药性。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前提是，我们对于某段基因的功能很了解，而且有相关的技术把这段基因转到我们需要的生物体内，并让这段基因发挥我们所设想的作用。应该说，从人类了解自然规律并利用自然规律的水平上来讲，转基因技术是一个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种跨物种的基因转移，在自然条件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可能都不会发生，而我们让它一下子成为了现实，这种技术所产生的食品对人体对环境会不会有什么潜在的危险？这都是需要长期大量的试验来验证的问题。

分析一下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材料，可以发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上现在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绝对无害，也有人说吃了转基因食品就要断子绝孙。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并做一些分析。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美国超市里出售的70%以上的食品中都含有转基因成分。美国自1994年转基因番茄上市以后，其普通民众已经食用了十多年的转基因食品，但尚未听闻有直接因转基因技术而造成的身体伤害。但也有奥地利研究人员2008年发现，长期食用MON810型转基因玉米可能影响试验鼠的生育能力，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①还有一些转基因食品中可能会含有一些我们本不想制造出来的过敏物质，甚至是毒素，因为尚未检测出来而导致一些不知情的人产生过敏反应，而对身体不利。

还有某视频里提到的食用转基因土豆后会导致试验鼠的胃上表皮细胞成倍增加，而这个现象被认为可能是胃癌的前兆，但是究竟这种现象和胃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还并没有研究清楚。还有转基因作物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已经发生的加拿大“超级油菜”事件^②让一些人担心，一些抗虫抗病基因会跑到一些杂草中，产生出除草剂杀不死，虫子不能吃的超级杂草，对于农业生产反倒更不经济。还有可能把不是害虫的虫子杀死，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转基因不像毒药，可以对人体产生立竿见影的巨大危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眼前没有发生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可以认为几十年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对这样一种新事物作出有害或者无害的结论，都是需要长期大量的实验数据作支持的。

另外对于某些公司所宣传的转基因作物能够有效地提高产量解决粮食问题和种植者的收入的说法，也有很多反例。比如，袁隆平等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在四年内的增产幅度是20%，而转基因水稻的增产率则是8%，并未有很突出的增产效果。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Bt玉米较常规品种的收益依赖于虫害发生率，由于较高的种子价格和专利费用的支付，在一些年份，Bt玉米较常规玉米种植收益是下降的。Carpenter and Gianessi（2001）的研究发现，1997-1999年间美国Bt玉米的平均产量高于常规玉米，但是1999年Bt玉米的种植农户在收益上不如种植常规玉米的农户。2006年，因一种丝核菌肆虐导致印度一些转基因棉花大面积死亡，当地科学家称这种病菌只在转基因棉花中存在。

据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2009年全世界有10亿左右的人口在忍受饥饿，2008-2009年度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亿吨以上，其中有近8亿吨用作饲料，4亿

吨用作生物燃料和其他用途。并且，越是发达国家，用于饲料和生物燃料的粮食就越多（美国近30%的玉米用于生产乙醇）。一边是发达国家生产了过多的肉类，甚至是将粮食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另一边却是一些落后国家的人民在忍饥挨饿。如此看来，单纯的粮食增产是不可能解决粮食问题的，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所有权和分配上。

无论如何，转基因技术被应用到农业方面成为一种直接影响我们饮食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它在应用之初，都应该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而各国政府的做法又是怎样呢？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国家，自从1986年首批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1994年延熟番茄“FlavrSavr”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进入市场，前后不到十年时间。然后各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开始迅速推广。而80%的美国民众希望能够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因为很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是抱着很谨慎的态度。但是目前70%的食品都是由转基因作物生产出的美国，却没有对此进行标识的规定。甚至1992年美国就公布了除非转基因作物引起新的安全性问题，否则不需要作市场前评价。2000年4月，在国会科学委员会下属的基础研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坚持认为没有科学的证据之前不能将GMF作为一个新的食品级别，从而免去很多审查。而这些政策无不极大地维护了美国各大生物技术公司的利益。

而中国则是第一个商品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1992年便开始种植了一种抗病毒的转基因烟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在1998年-2003年中增长迅速，2009年已达近370万公顷，居世界第六。品种集中在棉花、甜椒、番茄和动物微生物。而现在又开始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预备阶段。如果不是民间组织的透露，普通大众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给转基因主粮颁发安全证书的事情。

与美国正好相反，欧盟是世界上对于转基因态度最为谨慎的地区，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和欧盟消费者的态度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上落后于美国。

推动转基因食品这一备受争议的事物如此快地来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力量无非是它背后巨大的经济利润。

以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生物公司孟山都来说明，借助世界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公司自己的努力，目前孟山都控制了全球90%的转基因种子的专利，其转基因种子价格不仅比常规种子贵上3-5倍并且还会对种植者甚至加工者收取专利费用。公司2009年财报显示，其营业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17亿美元，同比增长3%。净利润21亿美元。类似孟山都的从事生物技术改良产品的公司为了保证他们所拥有的高额利润，每年都游说于各国政要之间，控制舆论，甚至打击那些不利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言论或者实验结果的人士。想尽一切办法走私、倾销将产品打入别国市场，然后不断加强对当地的种业市场的控制，而由于转基因育种方面的实验经费相对于其他传统育种要高出很多，并且新品种的研发速度快很多，也使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倾向于转基因育种方式。国内各大公司，一方面排斥国外的种业巨头的转基因品种，一方面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转基因品种的研制。

应该看到，转基因技术只是一种科技手段，它可以让人们更有力地利用大自然的规律来进行新的探索。然而，任何一种科技手段，只要是被资本家掌握，那么唯一的目的就是更快地挣到更多的利润。目前不论是传统育种方式还是转基因技术所产生的种子都是商业化运作，也就是说它们的所有权都是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都是资本家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利润更高的技术手段，而不是公众的食品安全或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安全，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一些人所说的转基因作物能够有效增产并解决粮食问题则更是做表面文章。^③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那些食品、环境问题也好，粮食问题也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注释：

①新研究证实转基因玉米影响生育能力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8334205.html>

奥地利研究人员日前发现，长期食用 MON810 型转基因玉米可能影响老鼠的生育能力。结果显示，长期食用这种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有所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奥地利卫生及食品安全局 11 月 11 日公布了有关研究结果。这项研究是受奥地利卫生部委托，并由维也纳兽医大学负责实施的。研究旨在探索长期食用转基因玉米饲料是否会对老鼠身体造成影响。

研究人员将实验鼠分为两组，一组用添加了 MON810 型转基因玉米的饲料喂养，另一组则用添加了奥地利本地普通玉米的饲料喂养。20 周后研究人员发现，两组实验鼠产下的后代出现了差异，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实验鼠产仔数量减少，幼鼠的体重也偏轻、体质较弱，又经过几代的繁殖养育，一直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雌鼠的生殖器官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研究结果目前仅适用于实验鼠，不能简单断言它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和人类。转基因玉米是否会对其他动物和人类的生育能力造成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MON810 型转基因玉米由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今年年初，法国曾宣布暂停种植 MON810 型转基因玉米。促使法国政府做出这项决定的最直接原因是，法国转基因产品临时最高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勒格朗提交的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严重怀疑”MON810 型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并声称“存在一些新的科学事实”，证明转基因玉米对“动植物存在不利影响”。不过，许多科学家对这种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仍有争论。

②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

<http://biology.aweb.com.cn/news/2007/9/13/15063520.shtml>

有人认为，外源基因的导入可能会造就某种强势生物，从而破坏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1995 年，加拿大首次商业化种植了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转基因油菜。但在种植后的几年里，其农田便出现了对多种除草剂具有耐抗性的野草化的油菜植株，即超级杂草。如今，这种杂草化油菜在加拿大的草原农田里已非常普遍。因为一些转基因油菜籽在收获时掉落，留在了泥土中，来年它们又重新萌发。如果在这片田地上种下去的不是同一个物种，那么萌发出来的油菜就变成了一种不受欢迎的野菜，而且这种能够同时抵御三种除草剂的野草化的油菜不但很难铲除，而且还会通过交叉传粉等方式，污染同类物种，使种质资源遭到破坏。

应当指出的是，“超级杂草”并不是一个科学术语，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有“超级杂草”存在。同时，基因漂流并不是从转基因作物开始，而是历来都有。如果没有基因漂流，就不会有进化，世界上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钟的植物和现在的作物栽培品种。

③转基因棉花酿印度农民自杀潮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620/02113359583.shtml>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849>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志诞辰140周年

作者：黑夜里的牛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再现，死去的幽灵们又奇迹般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复活了。反动派身陷囹圄，暂时无暇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进步势力因而渐渐稳住了自己的阵脚。资本主义各式各样的批判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迎来了列宁诞辰140周年的日子。我们能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纪念伟大革命家的诞辰，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我们的存在证明了只要私有制还残存于人间，社会主义理想就不会消亡。有很多种纪念列宁的方式：心里默默想念，一起公园里聚会拉横幅怀念，或者是到人民大会堂开大会纪念。但客观地讲，纪念列宁最好的方式，也许不是像以前那样周期性地回顾他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而是认真学习列宁的思想，继承列宁的事业，把社会主义运动向前推进。列宁对于左翼来说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符号。他的思想必须重新注入到运动中来。今天的左派同志们面临着许多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左派们能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以解决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这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状况。借着纪念列宁的机会，我想谈谈如何从列宁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决我们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一、民主主义的必要性

跟列宁一样，我们也是一个专制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在列宁的时代，就狭义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是民主主义者，而今天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敌视民主。这种奇怪的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专制制度是从无产阶级专政演变而来的。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共产党专政始，以“大民主”终，一直未能实现列宁所说的，“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①。无产阶级专政逐渐退化为官僚专政，最后导致资产阶级复辟，这一历史进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未能阻止。这样一个专制机构，在它依旧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不仅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利器，而且还能以高效率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在这个机构“移交”到复辟的资产阶级手中之后，由于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没有罢工的自由，没有相对独立的媒体，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比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身处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更加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展开自己新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历史悠久，充满了智慧的民族，尤其善于辩证地看待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的方面，这当然是极其恶劣的；但社会主义专制的方面却很好，可以有效地压制反抗，而且由于“羊头”在老百姓心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使在当权者卖“狗肉”的时候，老百姓往往也能从善意的方面去理解。所以，在成功复辟之后，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表达过分表达自己的喜悦，像东欧那些国家一样，把共产主义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我们的当权者始终自称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自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西式民主”更加彻底的民主制度。领袖也比西方政客更加亲民，更加真诚。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这么好呢？不都是因为咱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缘故嘛。

这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支持专制政府的原因。老同志们是跟着共产党一路过来的，经历过红色岁月，感情太深，即使在政党变质之后，仍然抱有幻想。还有一些年轻左派，由于接受了大量关于西式民主的负面信息，同时对当代中国的黑暗又知之甚少，所以一反常态，支持政府而反对民主派，或者即使不支持政府，也用共产主义的真民主把自由派呼唤的假民主给打倒在地。于是，在主流人群的印象中，保守派就成了社会主义者或左派的代名词。所谓保守派，就是高喊过时口号，支持政府，崇拜专制，抵制民主自由的极端派别。保守派批判零八宪章，声称要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共产党。但是“我们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保卫么”，一位左派同志曾经这样质问过。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中国应不应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呢？许多左派，特别是左派中最正宗的社会主义者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持排斥态度，认为那是虚伪的，不完全的民主。他们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在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就不那么热心了。对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中说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也要在工人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必要活动表现，认识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认识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使他们了解，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工人中间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官方对工人，对这些一般说来是俄国公民，特别是最受压迫最无权利的阶级的工人所施行的欺压手段，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②列宁所说的，不正是中国的现实么？难道中国警察不是在每一次罢工中都非常及时的出现以维持“秩序”么？难道数以万计的上访者的存在还不能表明官方对中国公民，特别是对无权的工人和农民的肆无忌惮的欺压么？难道志向远大的社会主义者，还要帮助官方维持这样的警察统治么？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专制制度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沙俄时代的专制制度是封建专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而中国当代的专制制度则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是为数量只占中国人口不到5%的“权贵”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相当一部分资本家都是通过国企改革获得了第一桶金，他们或者自己就是权贵，或者通过各种关系跟权贵结成利益集团。这一大中资产阶级的集团，通过专制政府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任何有同情心有正义感都会痛斥这一制度的反动性，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反而支持它。难道仅仅因为他在卖狗肉的同时还挂着羊头么？

所以，如果当代的社会主义者还想名副其实，就必须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出发思考民主问题。民主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划分左右派的思想，从根本上讲，民主是一种制度建构。这种制度虽然是从启蒙学者的头脑里产生的，却直接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即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的需要。客观地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使得无产阶级可以公开地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使得社会主义者可以公开地开展运动，并且能够更好地把斗争成果保存下来。而且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恩赐，不如说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长期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那种把民主看成是洪水猛兽，以为民主为瓦解中国的看法是极端可笑的。他们仅仅看到民主带来了社会动荡，却忘记了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他们看到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可以合法地罢工，影响了资本家投资，却看不到，这种中国人眼中的稀罕事，恰恰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式。专制制度下的稳定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一直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稳定就意味着默默地流血。社会主义者在遇到劳资矛盾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工人，但同时又对资本家的帮凶——专

制制度——抱有极大的好感。这让我们觉得十分诧异。对于那些善良的社会主义者，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法，而不是立场有问题。因为，只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人才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敌视民主。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国企改革讨论会上，我提出工人阶级需要争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当即有一个毛派同志反对了我的观点，他们更希望把斗争局限在党内。这个例子表明了现在的左派们多么忽视群众的需要，总是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分开，而不是力图把它们结合起来。针对这一点，列宁指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和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在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里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改成政治压迫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派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③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重温列宁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我们的斗争能否走出书房，走向街道和工厂，就看我们能否像列宁那样抓住群众的实际利益。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最渴望的民主都不赞同，也不要指望他们能聚集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民主主义运动不仅不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对立，而且还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人民民主权利的扩大，哪怕这种权利仍旧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利，对于现在的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无产阶级必须独立地参与民主运动

有的左派同志领会了列宁同志的思想，认识到民主的极端必要性。在他们看来，只要反对专制当局的，推动民主发展的势力或者运动，左派都不应该反对，甚至应该给予支持。比如，自由派炮制出《零八宪章》之后，随即受到大批铁杆左派轰击。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就看不过去了，认为《零八宪章》旨在追求民主，是有利于运动的，左派不应该充当当权者的打手。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但是，这只是一条原则，抽象的原则。当这条抽象的原则遇到具体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往往就会遭遇康德所谓的“判断力”的问题。到底应该把《零八宪章》归入到民主运动呢，还是把它视为右派的猖狂进攻，这一点左派把握得很不好。

其实，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零八宪章》的问题，就是列宁所谓的“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④的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定了基本的原则：“社会民主主义者支持社会中的进步阶级去反对反动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⑤但是，列宁随后着重指出，“这种支持并不预订也不要求去与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一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自己并不期待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方面获得丝毫东西，同时也决不把丝毫东西让给这些同盟者”。^⑥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任何自称自由派或者民主派的团体抛出的纲领，预先表示任何赞同或反对。在认真研究了这些纲领，确认这些纲领有利于打倒敌人，同时又不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损害的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确地表示对这些纲领的赞同。反之亦然。比如，《零八宪章》中提出的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就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很不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差别很大的国家，如果实行联邦制，很可能使得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对立加大，这样不利于国内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所以，对于《零八宪章》，我们需要赞同的是其中的某

些民主要求，而不是整个纲领。即使在表示支持的时候，也必须指出其中的反动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表示赞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往往靠不住。无产阶级想要不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尾巴，就必须独立地进行战斗。

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关注具体的利润甚于抽象的民主，常常在反动当局和人民群众之间来回摇摆。比如某些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曾经大声疾呼结束极权实行自由制度，但是当他们发现自由制度下工人有更多与资本家作对的手段的时候，又恬不知耻的解释道：“我们说的民主不是一人一票”。这简直是笑话！如果民主不是一人一票的话，那就是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或者是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民主的彻底实现同时就意味着民主的消亡，自然就用不着一人一票了。但是我们不是在玩科幻，现实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一人一票至少意味着无产阶级有通过民主夺取政权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只有在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势力——比如在东欧——作斗争的时候，他们才会向老百姓许诺民主。既然中国不用民主化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那就没有必要来讨好群众了。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比他们的外国同志更精于此道。他们知道，如果在人民群众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之前就实现民主，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非常老道的认同了当权者的专制统治，只是在饭桌上发上一通“自由主义”的牢骚，到两会上投票的时候，仍旧会把贪婪的手高高举起。

列宁指出：“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彻底的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绝对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反对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⑦近几十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列宁的判断，资产阶级不仅向后返顾，而且还跟当权者相勾结，结成共生共荣的利益集团。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支持民主主义的，除了工人阶级外，恐怕就只有小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锋，他们与专制制度的斗争是最直接最频繁，而且在每一次斗争中，都能非常直接地感受到整个制度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工人以最极端地方式感受到人民在官僚机构面前完全无权的地位。这种不受监督的官僚就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真正的左派应该联合一切力量与之作斗争，而不应该保卫这个用于遮羞的招牌。但是，在开展这种斗争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不应该指望任何势力。民主主义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力量极端薄弱而自由派极端强大的情况下，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自由派这些暂时的同盟者身上。

既然无产阶级必须独立地参与民主主义运动，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社会主义者就必须首先认清形势，跟反动势力划清界限。特别是不要乱去保卫，应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上。一方面，不应该尾随自由派，不应该公开支持任何一家公然诋毁共产主义理念的报纸或者杂志，只能在各个具体问题上与自由派联合；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理念，但完全不应该去保卫实际的资产阶级掌权的和谐国，更不应该为此得罪大众。在诸如此类问题上，列宁给了我们许多的教导。只要同志们能认真学习《列宁选集》，就不会闹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笑话了。

结语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就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民主问题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除此之外，还有组织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诸多问题。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因

为马列主义的光辉不仅是理想的光辉，更是现实的光辉。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在混乱的现实中摸索出一条新路。我们难以赞许齐泽克所说的“重述列宁不是重述列宁做过的东西，而是他没能完成的东西，他错过的机遇”⑧，坦率地说，我们要做恰恰就是回到列宁那里，在他活过的地方重新活一次。这既是继承，也是发展。如同相对真理在被别的真理超越之后，在它曾经适用的范围内，仍然适用一样；列宁虽然已死，但是在在他活过的地方，他将永远活着。社会主义者会继续这样子活下去，直到神圣的天国在人间实现。

2010年4月22日

注释：

- ①《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8页
- 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9页
- ③《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05页
- ④⑤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01页
- 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02页
- ⑧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970>）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975>

张宏良的左转理论及其对中国左翼运动的变革

作者：实存之城

少年中国按：

近来，经常听到某几个同志又因为张宏良问题闹翻了，曾经相处融洽的同志甚至坐不到一张桌子上。我本人也多次被人逼着表明对张宏良的看法。可见，张宏良的问题，已经是左翼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要不要分手，以及如何分手的问题。编者曾经在少年中国网站转发的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蜜月期结束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已经到来。但左翼内部深有影响的一部分人却坚持树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大旗，不愿意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的这种考量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虽然根据革命导师的教导，社会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坦率的说，我们并不热心制造左翼的分裂，也从未积极推动别人去制造分裂。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坚持认为，某些知名人物的个别观点，是可以商榷的；某些不太合理的说法，是应该接受众人批评的。我们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回避或者压制讨论虽然可以给左派带来一团和气的错觉，但却会给运动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因此，我们接受实存之城网友的投稿，发表这篇批判张宏良教授的文章《张宏良的左转理论及其对中国左翼运动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文中的一些理论表述不太确切。譬如，文中提到的“欧洲的工人阶级罢工运动仅仅是小资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宣泄”，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人的思想或者情绪来划分阶级，而是根据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诸如此类的问题，文中还存在不少，恕不一一列举。我们相信读者的鉴别力。如果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的观点，也不胜欢迎通过邮件向我们投稿。

2010年12月26日，被鸟有之乡称为著名“左翼学者”的张宏良公开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的网络演讲。然而，该演讲却在所涉及的全部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对此，有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予以公开回应。

一、张宏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错误认识

（一）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幸福彼岸

张宏良声称：“毛泽东和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同样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指出了幸福彼岸；毛泽东比他们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毛泽东同时还指出了如何到达幸福彼岸”。

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幸福彼岸就是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在写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马恩基于其唯物史观，指出资本主义基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必然灭亡，而代替这样人剥削人制度的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只是人类史前时代的结束，不是什么人间天国和极乐世界。这里的共产主义不仅不是彼岸的同义词，而且还是立足于此岸的现实运动。

真实的毛泽东并非如张宏良所说，是某种指引人类抵达幸福彼岸学说的创立者。恰恰相反，他既没有指出所谓幸福彼岸，也没有发明一条通向幸福彼岸的途径。事实上，在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上，他始终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

1958年，毛泽东让“秀才们”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8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学习参考材料。

当年11月份，毛泽东特地致信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要求县以上党组织的重要干部认真开展对该书的学习。这里不妨将此信原文抄录如下：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553页）

要求县以上土共领导干部，每人用心读三遍，还要加以分析。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二）社会主义不是需要巩固和坚持的社会

基于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张宏良荒谬地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创建人民社会，巩固和坚持人民社会”，其实这从根本上是违反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暂时过渡状态。正如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过渡时期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他指出，“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邓力群：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7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经其本人亲笔修改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上，更是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长期历史时期，都处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转变时期”，不能算“建成”社会主义。

根据最起码的逻辑，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一个过渡阶段是不存在所谓“巩固”的。针对解放初，中共党内流行的“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念，毛泽东曾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在同篇文章中，他明确地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1页）那么，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难道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的吗？

当然，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也不是最终要坚持和维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的目标在于解放全人类，而不是仅仅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消失，“人民”一词势必成为历史，也就不存在所谓人民社会。

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性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只能在过渡期中逐步显现，绝非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开始建立，就具有资本主义无比的优越性。正因如此，任何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会同意，前三十年绝不是张宏良吹嘘的天上掉馅饼的理想社会，而是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不足，在实践中曲折探索的社会。

毛泽东在 1970 年代曾经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见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22 日）。

可见，毛本人就认为，他建立的制度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必然事实并不能通过主观意志予以消灭，最多只是加以“限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例如同样存在商品经济——并无明显区别，绝不是什么理想社会。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张宏良对于共产主义及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论述都是同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既然，张宏良预设的理论目的“创建人民社会和维护人民社会”都是虚假的，他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造反有理和为人民服务——当然也是错误的。

二、张宏良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

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脱离历史实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规范，更不是某种没有人格神灵的新宗教，而是一种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有过很多论述。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致威·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742—743 页）

列宁也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219 页）。而毛泽东早在其思想体系尚未成熟的 1930 年代，就明确地反对一味依赖经典著作个别字句和上级指示的“本本主义”，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青年卢卡奇更是带有一点儿极端地说：“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这样简单地提出来的。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衷主义。”（【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 1992，第 48 至 49 页，参见张西平译同书，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毛泽东思想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是其鲜活的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这一方法就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毛泽东的代表作《论持久战》正是历史辩证法的杰出

应用。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作为相互矛盾的敌我双方，如何因为矛盾变化，弱小的转换为强大的，成为敌人的否定力量的逻辑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毛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将唯物辩证法阐发得淋漓尽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发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社会，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不同的手段。

当我们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向来将毛泽东和马克思根本对立起来的张宏良、韩德强们当然很不服气。他们轻蔑地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然而很不幸，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各不相同的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理论模式，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内之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抽象理论，在运用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引入具体的实际情况。读过《资本论》的一般读者都知道，马克思坚决主张在分析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须使用抽象力舍弃具体表象，由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步步地推向比较具体（理论意义上的具体）的东西，即必须采取“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的很多结论其实是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推导出来的，并不能成为对未来的具体预测。一旦走进具体的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必然要引入更多的现实内容，其结论也就需要经受大小不等的修正。所以，马克思尖锐地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至342页）。

其次，各国的接受者也必然更加关心具体的时间、地点中最急于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特别重视。例如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回忆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李方淮梁民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第116页）这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显然还来不及仔细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庞大体系。

最后，接受者理解外来理论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的潜在作用不容忽视。由于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必然带有译者个人的文化心理和个性特征，翻译过程并非是完全透明的，原著和译著也绝非完全相等的。翻译的过程已经是一个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读者同样需要基于其固有的文化心理理解原著。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就不能不逐渐带有某种民族形式。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然而，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变种，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新儒家理论。以“实事求是”一词为例，该词本出自《汉书·河间王德传》，后被清儒引为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而毛泽东是怎么解释这个词的呢？这里不妨重温这段经典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新版第三卷，第801页）。不带偏见的人立刻就能从这里发现其中蕴含着客观事物第一性，意识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并且利用认识改造客观事物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意其实有着质的不同。

因此，毛泽东思想不是从传统文化“出发”，而是从传统文化“出走”，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是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那种认为中华文化无论何时何

地都要远高于西方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从来都不是毛泽东的想法。相反，他明确承认，“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毛泽东也公开谈及，他和他的同志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憧憬并无直接的渊源。“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新版第四卷，第 1469, 1470,1471 页）

毛泽东晚年曾经说过，他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理论的确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理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然而，即使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也不是毛泽东的凭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其他研究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马克思率先指出：“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4 页）。因此，清除旧社会道德和精神方面的痕迹，进行“文化革命”，就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1923 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化革命”概念，他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3—774 页）斯大林在 1927 年至 1939 年，多次重申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于两个方面，即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但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取得可能并不同步。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而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某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其文化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参见程巍：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 年 1 月 3 日）。

可以发现，毛泽东也讲过，“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 年 9 月）。这一论述和葛兰西的观点何其类似！

青年卢卡奇还从辩证法的实践基础出发，提出只有通过总体性的辩证法，实现总体性的革命，才能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进一步提出所谓“总体革命”，是指“在总体上”进行反抗现行制度的斗争，因为，革命是总体性的、全面的，不仅要搞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文化上的斗争、人的本能结构上的革命。

可以发现，马尔库塞主张的“总体革命”的确是可以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对话的。1968 年的西方左翼青年之所以推崇三个 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作为其思想领袖，确实能从三位思想家的理论论述中发现文本依据。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一般认为基于以下两方面理由：一是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是相

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将毛泽东和马克思根本对立起来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第一条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质疑的是第二条，依据世界观确立阶级属性，和依据经济结构确立阶级是否一致？在他们看来，这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明显说明毛泽东和马克思是不一致的，至少是不完全一致的。

遗憾的是，这些轻率做出结论的人们不清楚，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曾经依据世界观和立场来划分阶级。马克思论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难道知识分子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吗？难道依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划分其阶级属性不正是马克思的原意吗（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以上论述意在说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所谓东方文化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最有意义的部分并非其个别词句，而是贯穿于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如果论述者一定要将毛泽东和马克思对立起来，那么只会犯极为荒唐可笑的错误。

张宏良的演讲正是这种荒唐可笑错误的集大成者。根据他的杜撰，“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矛盾在经济领域的深刻反映”。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笔者还将论及，这里暂且不予评论。只是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理解为某个政治矛盾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就已经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问题在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现在也普遍承认马克思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的理论命题的正确性。张宏良先生居然可以捏造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神话。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张宏良先生竟然是一位高校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教师，也就是说，其实是吃马克思这碗饭的。

令人惊异的是，张宏良不仅公然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公然篡改毛泽东的理论原意。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都坚持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由之路。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这一意识形态分歧始终是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中国一度经济上非常困难。但是，毛泽东始终坚持支持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地区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对他们给予了大量无偿援助。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更是公开发表声明，号召武力推翻美帝国主义。声明提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事实上，该声明的题目“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显然是对于武装革命的公开呼唤。

但是，张宏良对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暴力革命论述视而不见，公然编造说：“以街头革命和网络造反为特征大众政治运动，取代此前的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武装革命运动，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成果”。张宏良甚至说“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斗争，便从以往的军事斗争转向了现在的街头斗争。从军事斗争为主转向街头斗争为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带有根本性的巨大进步，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事实上，张宏良先生所发现的转变，不过是文革落潮之后，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普遍低潮的表现。

将低潮理解为进步，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蓄意造谣，那么就只能让人怀疑作者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理论能力，又怎么能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实？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与张宏良的冲突

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正是基于这两个伟大发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才由空想变为科学。毫无疑问，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新特点的分析和考察，始终应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令人遗憾的是，十年以来，乌有之乡的核心作者，从韩德强，到秋石客再到张宏良，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视为他们的最大思想障碍。在他们看来，一切历史变局没有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各种因素的交互运动，完全是一群阴谋家的阴谋造成的。乌有之乡的一个青年作者，最近居然将中国经济恶性通膨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执政者的恶意或者无能，完全无视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因。

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恩格斯早在 120 年前就曾经予以尖锐地批判。他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根本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9 页）。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能够理解为某些人的一场阴谋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大多数人民已经彻底厌倦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吗？难道四人帮的审批不是获得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支持吗？

马克思正是始终追寻这种“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最终发现历史的真正奥秘隐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88 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7 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进路是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根据经济结构的对抗性发现现存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根源，而不是从某种抽象价值观念出发，例如所谓“精英”和“大众”虚构社会矛盾。只是在掌握了真正的阶级冲突现状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才进入精神历史等其他上层建筑领域，研究分析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复杂的交互运动。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最终形成对历史和现实的科学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进程绝非孤立的，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乃至越南、古巴都曾经或者正在进行同类性质的改革。这一波肇始于 1950 年代末期的改革浪潮尤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张宏良吹嘘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 30 年理想主义和现代政治文明

的高度发展时期……又经历了后 30 年物质财富喷涌、道德伦理坍塌的极端物欲横流时期……上述两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经历”。

事实上，张宏良先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理解与其说与马克思主义较为相似，毋宁说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并不依据抽象的人性善恶判断社会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然，世界上并不存在永恒的事物，这种合理性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在矛盾的交互作用逐渐失去依据，转变为不合理的和走向灭亡的事物。简单地道德谴责，“人性”和“兽性”的标签，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引入真实的历史观察，就会发现人性永远是具体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人性早晚都会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抽象的人性法则其实并不存在。马克思曾经这样批评维克多·雨果对于拿破仑第三政变的道义批判，“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0 页）。而张宏良先生对于当代中国某些现实的批判，除了人性、兽性的道德谴责，还有什么具体的历史内容呢？他没有注意到，当他高呼所谓人性社会的时候，他和他所诅咒的普世价值派，其实立场已经百分百相同了。他们都在先验地假定存在某种理所当然，超越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的公平和正义。不幸的是，“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绝不是抽象的善恶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阶级对立始终根源于经济结构之中，脱离具体的经济结构分析，将某些人随意称为“精英”，另一些人褒称为“大众”，只能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任意图解和想象。张宏良声称：“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非常遗憾，他始终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弄清哪些社会力量构成“精英”，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构成“大众”。

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中的个体的行为都不得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确可以想象，确实存在个人品行高洁，修养良好的资本家。然而，一旦这位资本家开始履行资本家的职责，也就是充当资本的人格化身的时候，他就不能不遵循资本的逻辑，否则严酷的资本主义竞争足以使他遭遇倒闭、破产，面临血本无归的危险。所以，资本来到世间，不得不“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我们马上发现，韩德强先生发明于十年之前，被张宏良先生极力讴歌的道德市场经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幻象。即使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制约市场的也只是法律、财政和金融手段，而不是某一只道德的手。

可以发现，张宏良对于当代历史和现实的错误分析方法，必然要得出极端荒唐的结论。如上文指出，他将 1970 年代以来世界左翼运动的普遍退潮讴歌为历史的巨大进步。又如，他将欧美社会最近持续出现的罢工风潮理解为所谓“大众民主运动”，视为社会主义复兴的一部分，然而欧美社会的罢工运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策划和领导，也从未提出普遍性地颠覆资本主义的口号，始终只是资本主义体制内一些小资产阶级不满声音的宣泄。张宏良对于形势不切实际的判断，让我们不能不质问，他希望将中国左翼运动引向何方？

四、张宏良理论对于左翼运动的现实危害

首先，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于民族主义，有意识地用民族矛盾消解阶级矛盾。无疑，马

克思主义者同样支持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但是他们始终记得，这种反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无产者不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反对另一个国家，而是联合另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共同反对垄断资产阶级。

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鼓吹的民族主义恰恰与此相反。大家记得，几年前，他们组织了对李安导演三级电影《色戒》的批判。在那场批判中，他们始终和民族主义者王晓东站在一起，互相吹捧，遥相呼应。当时，只有一位边缘化的学者指出了这一场景的荒谬，那就是和孔庆东交恶，彼时旅居国外的旷新年先生。至于今天，张宏良对民族主义的肉麻歌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以致一些思想混乱的愤青们，居然将自由主义者和汉奸当成同义词来使用。

从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张宏良由衷地认为爱国就意味着热爱政权。其实，就连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都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潘恩所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心声。列宁也辛辣地嘲讽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与此不同，张宏良不仅自己相信爱国等于爱政权，而且要求所有中国人信仰权力与人民的利益一致性。为此他虚构了一个精致的比喻，中国所有的官僚集团成员和穷人们同在一条风雨飘摇的破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到达彼岸。当然他不会忘了补充一句，这条船的名字是“中国号”。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群是分为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的，更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阶级矛盾和其他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认为他们所有人都处于同一条船上。毕竟，他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每一次大规模发展，都和权力的支持和鼓励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权力与资本正处于同一条船上，反而和实际更加接近一些。当然，民族国家、民族资本和外来资本之间也不是只有共同利益，同时也存在尖锐的利益分歧。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质疑的是：权力和资本的距离总是比权力和人民的距离更近一些。

基于其独创的沉船理论，张宏良虚构了所谓姓中姓外的第三次大讨论。其意显然是要淡化国内阶级矛盾，将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跨国阶级矛盾歪曲为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然而，谎言绝非重复多次就变成真理。只要稍微关心国内外时政的人都清楚，这一大讨论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次，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于反对马克思主义。概言之：由于他们基于阴谋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奇特混合，任意解释历史，使基于唯物史观观察本来已经明晰的历史领域变得根本无法理解和分析。于是，只能求助于永恒的公平和正义，对于某些社会现象进行道德性谴责和批判。由于抽掉了唯物史观这一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他们进而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毛泽东思想变成毫无意义的价值理念和空洞的宗教。马克思主义始终教导无产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韩德强却宣称：中国的左翼需要一个神。乌有之乡多年以来，正是秉承韩德强的意旨从事造神活动。

因此，张宏良在这一演讲开端，那些神秘主义的开场白并非无的放矢：

“今天12月26日，是真正普天同庆的日子，此时此刻，世界东方和西方在共同庆祝各自的圣诞节，西方在庆祝耶稣诞辰，东方在庆祝毛泽东诞辰。在毛泽东诞生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有圣诞节，有圣诞节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有圣诞节的民族，往往是世界上站起来的民族。所以，上苍也给了中国一个圣诞节，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大救星，也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然则，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有圣诞节，12月25日，绝对算不上普天同庆。而有圣诞节的国家，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处于极度野蛮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是通过文艺复兴，摆脱宗教裁判所的野蛮统治，又经过高扬人性的启蒙运动，才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因为造神而强大的民族，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过。倒是印度人因为过于迷信宗教，直接就成为了

殖民地。

鉴于张宏良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上文已经做过很多论述，这里不再深入展开。

最后，张宏良及其同伙热衷于党同伐异，有意识地制造无产者思想混乱。他们秉承自己的阴谋史观，不许其他人争论。任何出于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较为客观理性的历史分析，都会遭遇谩骂和恶毒攻击。他们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只要和他们稍有不合，就对人家进行生命威胁。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声名狼藉。

张宏良及其同伙的这些浅薄理论，居然影响了这么多青年人。这一现象令我自己也不能不思考：他们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如醉如痴？我以为，可能的回答是这样：首先，表面上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批判中国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他们对一些现象痛心疾首，其愤懑程度很适合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青年的口味；其次，他们有乌有之乡这个所谓左翼网站的支持，在很多青年心中，乌有之乡代表的就是真理；最后，他们动辄援引毛泽东的个别词句迷惑无知群众，他们对于理论的简化满足了一批不愿意思考的左派幼稚病患者的心理。

然而，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实践可能产生正确的结果吗？我们看到，张宏良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唤就是相当可疑的。

张宏良声称：“目前中国复兴社会主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就主观条件而言，一是 30 年后再次高举革命的理论大旗，表明党内社会主义中坚力量已经形成；二是重庆模式表明已经找到了新时期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平台，能够再次形成毛主席生前所谆谆告诫的“两个相信”；三是当今中国的最优秀人才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周围，国家已经具备了人才更新的能力；四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已经完全走上前台，全部完成了亮相，矛盾已经完全成熟，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然而革命理论在哪里？张宏良鼓吹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已经被党被悬置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甚至遭到张宏良这样靠马克思吃饭的人（张宏良教政治经济学）任意侮辱。

优秀人才又在哪里？自 2008 年了，最优秀的人才距离乌有之乡越来越远，汪晖、黄平、黄纪苏都已经不再主动于乌有之乡发布文章。一些被乌有之乡热捧的青年人，其实理论水平并不高，甚至经常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复制和粘贴。

社会矛盾仍然继续加深，强拆事件在全国层出不穷，被拆迁户与政府对立情绪日益增强。新一代工人和资本家也发生了目的明确的经济斗争。在富士康十三连跳的一年中，张宏良居然敢于说矛盾已经完全暴露，不知是何用心？

至于张宏良鼓吹的重庆模式，稍微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其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因子。

在支持者看来，“如果将重庆模式简要归纳，最重要的突破，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参见田磊：“红色重庆”的价值与挑战，《南风窗》2010 年第 26 期）。

2008 年底，重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拿到交易所去买卖，引入金融机制，通过地票交易，而不是征地拆迁来获取土地开发权，这一试验的效果已经初步得到了现实的检验，根据公开资料，该交易所成立以来的 5 次拍卖中，每亩成交价格平均为 10 万，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拆迁。

这种农村土地流转，完全不顾土地对于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强迫农民放弃农村户籍，早就已经被广泛诟病。农民不管受到多数补偿金，今后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而土地流转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后路。

2009 年以来，重庆对隶属于市政府的城投、高投、地产、水投、水务、开投、渝富、高发等八大国有建设性集团增资扩张。这就是所谓公有制经济增强。其实无非是扩张了具有投机、垄断性质的国有经济。事实上，就是通过权力资本分割市场，公开压榨民营资本。这种运营过程绝非社会主义的，和西方国有经济毫无本质区别。用政府权力公然经营房地产之

类投机业，只能使投机规模更大，最后遭殃的是老百姓。

除此之外，重庆模式的特点就是所谓唱红打黑了。然而重庆的红歌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教育实际上相距甚远，抒发的主要是爱国、爱党、爱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打黑，是任何一个政府，包括蒋介石政权都会做的事情。重庆打黑的成果可能更多地与王立军先生的个人性格特征有关，很难归结于某种模式。

2010年7月份，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一行9人曾经前往重庆考察，在与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座谈时，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弗拉迪米罗·贾克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基于民主的模式，而不应该是斯大林模式那种集权式的社会主义。那么重庆的模式，是不是民主的模式？苏伟坦陈，中共的党内民主、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还任重道远，所以，重庆也一样，党内民主、政治民主都还不足。

可见，即使是苏伟这样的御用左派，也不能不承认，重庆实际上是一种张宏良所谓的“强人政治”。这种政治体制，和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甚至是截然相反。

重庆试验在意识形态层面另外一个被广为诟病的问题在于对传媒的严密控制，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辖区范围内，传媒上清一色的颂扬声。这种对社会舆论的强力控制，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宏良一伙反复强调党想要复兴社会主义，就能够复兴社会主义。但就是不提生产关系领域是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广大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成熟，群众力量是否壮大，马克思主义是否得到广泛认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因此，在实践中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因此反对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乌有之乡为核心的反动“毛派”党人，揭穿他们的危害，不能不成为当前中国左翼最为紧迫的理论任务。不和反动毛派决裂，左翼必将走向死亡。

有些人畏惧决裂，其实团结总是一个政党内部的团结，而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政党。列宁不和孟什维克决裂，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如果不发生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的决裂，会有1921年中共的建立吗？今天的中国只有一些有着不同程度左翼思想的个体存在，左翼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力量的思想派别。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拖泥带水，一团和气，不敢于进行思想决裂，左翼最终是没有任何出息的。

不要害怕决裂，要主动促成这个决裂，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695>

以无产者的名义

——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四十周年

作者：高流

巴黎公社的号角自吹响至今已有一百四十个年头。在近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产者走出最初的懵懂与幼稚，并曾一度于马列主义指导下成功在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直接影响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巴黎公社的建立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为此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闪耀着永久光辉的宏伟丰碑，是人类史上无产者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意义上的第一次演习，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值此纪念公社一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当重温巴黎公社的革命历史，以继承并发扬其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一、革命前夜

一八六七年的法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这一年中，法国棉花消费量比上年减少 25.3%；此后一年，铁矿石产量下降 15.6%。于此同时的是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全面恶化。冒险家与投机者路易·波拿巴为维护其统治，企图对外谋求出路；于是三年后，普法战争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1]**

普法战争爆发于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同年九月四日，巴黎革命的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第二帝国的大厦，共和国再一次被建立在法兰西的土地上。新生的政权刚一上台就面临着虎视眈眈的敌人，而旧帝国的军队或被死死围困，或已经在德国当了俘虏。在面临存亡的危机的关头，所有能够为保卫新共和国的巴黎人都加入国民自卫军武装了起来，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等资产阶级趁机上台组建了“国防政府”。在这群“国防政府”中，有臭名昭著的伪证制造者法夫尔，有与财政部暗中勾结交易的皮卡尔，最有名的还是当政首脑梯也尔。身材矮小的梯也尔以其一贯的反复无常与险恶居心，被马克思讽刺地称为“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2]**由于在两百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中，大部分都是工人，梯也尔及其同僚无比害怕武装工人在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后会调转枪口。因此，“国防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阶级利益置于首位，卖国开始了。

资产阶级自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向人民伸出了獠牙。早在共和国成立当夜，任“国防政府”陆军部长的君主派代言人特罗休就公开说，企图打退普鲁士军队而保住巴黎，纯粹是一件蠢举。准备投降的他甚至认为，须使巴黎人民在决战中死掉两万人，才能得到他所向往的“和平”。法夫尔更是直接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说，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军队，而是巴黎的工人。为此，法夫尔积极地与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然而“国防政府”对巴黎人民的宣言却极尽一切可能之辞来表达战斗的“决心”。

谎言只维持到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就终结了，“国防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国民自卫军并未缴械，胜利的普鲁士军队只在巴黎城中的一个角落盘桓了数日，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公园。巴黎的武装工人将侵略者团团包围，使得这支打败了帝国军队的普鲁士部队面对工人们畏惧恭敬地敬礼。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序言时，曾感慨地说“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3]**

为早日签订合约并扼杀工人革命的火焰，“国防政府”即刻召开“国民议会”选举。一

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以保皇党为主的“国民议会”上台，正式公开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并于三月中旬，通过了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决议。至此，资产阶级撕去了伪善的面具，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对无产者的疯狂反扑。

二、震撼世界的七十二天

无产阶级掌握了武装，使资产阶级如坐针毡、寝食难安。因此，解除工人武装成了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首要大事。在卖国以取得普鲁士支持后，梯也尔之流开始专心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屠夫莱康特在梯也尔的调派下，率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在这危难时刻，无产阶级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直接投降，放弃革命机会；另一个是以刺刀面向刺刀，殊死决战。巴黎人民选择了后者，开启了历史上最为壮烈的篇章之一。

巴黎无产者革命的炮火如同春雷般炸响在躁动不安的欧罗巴大陆上。十八日当晚，自卫军就攻占了所有政府机关所在地，令梯也尔仓皇逃赴凡尔赛，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临时政府。历经与普鲁士对抗数月后的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4]旧政府官僚们裹挟着公文与档案逃离巴黎，外交部大楼里只剩下一个看门人和一个擦地板的清洁工。留在巴黎的剩余官吏与职员以消极怠工表达他们对新政权的不满。

在与巴黎市内的梯也尔政府残余力量几次交锋之后，在三月二十六日，共计二十二万八千人浩浩荡荡走过巴士底狱广场参加了公社选举，并在二十八日庄严地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公社正式成立。此前暂领临时政府执政权的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移交了权力。公社在三十日发出的第一条法令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替代以一切能够武装作战的巴黎人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四月一日制定了公社公务人员的薪金标准，规定年薪不得超过 6000 法郎。四月二日公社宣布政教分离，并在八日进一步决定将一切带有宗教意识的事物从教育机构中革除。十六日将各工厂工人组织为合作社恢复生产，并进一步组织成更大的联社。

败逃的梯也尔自然不会就此罢休。正规军撤至凡尔赛后，借巴黎公社选举的时机，重整了军队。梯也尔在巴黎公社时期充分发挥了他的表演才能，为了积累足够推翻公社的力量，梯也尔从败逃凡尔赛起直至五月下旬，始终在同公社“谈判”。大量奸细潜入巴黎进行反革命活动，窃取到自卫军最高指挥职位，摧毁公社的防御计划，制造弹药厂爆炸等等。四月二日梯也尔聚集四万军队展开对巴黎的进攻，并于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签订与普鲁士合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支付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作为交换，俾斯麦提前释放了十万被俘的波拿巴军队帮助梯也尔向公社进行镇压，使梯也尔反革命势力自五月初就占了决定性优势。各个政府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时达成了空前一致。

梯也尔在与公社的“谈判”中，再也不谨小慎微或闪烁其词，气势上变得咄咄逼人。凡尔赛军队自五月初在西线和南线不断推进，五月二十一日，在国民自卫军疏忽的情况下，凡尔赛反革命军队与巴黎城内叛徒相策应，攻进巴黎市。同时占据巴黎东部和北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悍然不顾停战协定，为凡尔赛军放行。凡尔赛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就经过了西半部富人区，到了东半部工人区后，遭遇到顽强的抵抗。无产者的武装英勇地同反革命军展开巷战和街垒战。在历经八天的战斗后，最后一个街垒被攻破，公社的最后捍卫者在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坦高地上倒下。对公社男女老幼已一星期的屠杀愈演愈烈，最后的屠杀是在拉雪兹公墓附近的公社战士墙边完成的。凡尔赛反革命军先后屠杀了三万人，逮捕四万余人，此后还陆续对犯人进行处死与流放。早在一八四八年镇压六月起义时，资产阶级就展现过狰狞嗜血

的嘴脸，可六月起义的镇压与巴黎公社的屠杀“伟业”相较，却黯然失色了。

三、反思

巴黎公社作为划时代的革命里程碑，在一百四十年来被革命的追随者不断反思与总结。公社失败的原因大都从以下几点出发：公社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没有没收银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没有与农民结盟并与其它地区革命团体取得联系；没有乘胜追击梯也尔军队，使其得以恢复元气等等。

这样的“失败原因”恰恰是公社失败的偶然性因素，并没有结合公社事件发生背景。从法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无产阶级运动的成熟程度来看，或许会得到全然不同的结论。

事实上，巴黎公社的主要活动者，分为多数派布朗基主义者和少数派普鲁东主义者。只有少数人略懂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在公社经济方面做得极差。讽刺的是，不论是布朗基还是普鲁东的理论学说，都以其背离无产阶级的利益趋向与极为错误的执政方法在公社实践中被自然地摒弃。尤其是对联合痛恨的普鲁东主义，在公社最初就遭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有两个必要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与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巴黎公社时期，这两个条件都不成熟。法国还是小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当时法国并没有工人政党，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其政党的教育和训练，因而法国工人阶级普遍对自己的任务及实现任务的方法全无明确概念。连像样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生产力的不够发达，意味着无产者尚未创造出足够借以达到革命解放手段的现代生产资料。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得还很差，而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应的。只有在大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巴黎一城之革命提升为全法革命。而无产阶级的无充分准备，在法国工人阶级中表现尤为突出。充分发展的现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只在法国个别工业地区零散地存在。因而在巴黎公社革命后，公社自身力量薄弱，还无法得到任何外界帮助，个别如里昂的起义也都被简单地镇压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是因为普法战争后，巴黎人民面临是放弃还是反抗的抉择的结果，除了反抗建立新政权，没有任何一个统治团体能够让事情不会变得更坏——巴黎工人已经不能够允许再坏了。恰恰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促成了巴黎公社的偶然性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不成熟也可以从其思想上体现出来，尤其是“共和”口号。公社中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普遍不高，因而有大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残余。而民主共和制度，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到巴黎公社革命为止的八十二年间，在法国分别交替了两个王朝、帝国、共和国，而共和国时期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个帝国时期，共和国的悲惨境况使之长期作为革命要求，并深深影响着无产阶级。面对银行带来的“神圣感”，工人驻足不前，也正是对这种幼稚的表现。

公社没有彻底粉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取代以无产阶级专政。在解读的过程中，更重要的后者却往往被忽视。公社的失败不在于是否彻底地打碎了旧国家机器，而是没有坚决、充分地运用新国家机器。公社在建立之初便迅速建立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运行。但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公社没有足够多地运用掌握了武装并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政权，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公社革命由于其指导理论的混乱与匮乏，使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一般的泛泛谈“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说，并不正确。从广义上说，国家机关是多样性的，即使是同一统治阶级的不同国家，其国家机构也有着不同。因而很多机构在过渡期仍然会被保留。“彻底”是针对国家机器的狭义概念，是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官吏机关、警察，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至于银行，不过是一个执行统计登记工作的机构。社会主义革命要的不是打碎它，而是要斩去其资本主义性质，并进一步扩大，使之能够为过渡时期政府的生产分配提供巨大帮助。

此外，工农联合，对巴黎公社而言也困难重重。一方面公社根本没有机会与农民从事生产交换，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争取农民。另一方面，法国封建生产关系解除得较早，早在大革命时期就造就了一批小农，而资本主义发展得较差，使得很多小农得以保留。这使当时法国处于小农占统治地位的情况。这些小农的私有土地介于家庭自给与家庭耕种能力范围之间，同小手工业者一道，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小农意识形态对工农联合无疑是巨大的阻隔。没有农民作为后备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单薄无力，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马恩曾认为，无产阶级无法在单独某一国家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无产者的联合攻击才能够取得胜利。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恩不同，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尤为明显。列宁因而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一的国家内取得初步胜利，并以此为契机，将革命的战火燃烧到全世界。

巴黎公社的独立革命的失败，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紧密相关的。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攻，撕碎了一切建立花园式伊甸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梦。

四、结语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开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四十个年头。巴黎公社的伟大精神指引着无数后继者的前行，传承革命的火种。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写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雄壮的国际歌鼓舞着革命者，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在一百多年里一次比一次更加壮大，更加势不可挡。

我也谨以《国际歌》的最后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2011.03.18 夜

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28页，中央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57页，同上。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29页，同上。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819>

关于学生中的成功学

作者：月满青山

一般总在强调对于信息的取舍，无论以何种方式。然而作为现实的前提，又所能意识到的——那种不劳而获的告诫与教诲，往往粗暴简单，不过看来是直接有效的。需要反省和实践吗？然而我们仅仅是在既有的观点里面挑选几条出来予以“无情而忧郁”的剔除。先不管这些东西的来处，因为所谓成长的疼痛已经蒙住双眼，然后泪流满面。剩下的倒深信不疑——这些道理正是眼中世界的准则与自己的追求所在。个人飞上天了，高处不胜寒，心里又时而恐惧。事实上，左右自身的多是一种对于陌生现实的呼应，反过来自己的幻想又在呐喊。

站在一个普世的将要胜利的角度，看起来，如今的自己幻想将来的自己的荣耀本来就是荣耀的。有时以为自己在战斗，在世俗的草原上撒腿奔跑，不时扔出回飞镖，打败的人以百十位计。然而作为受骗者引以为快的荣耀，其中对于名利的期待是羞于表露的，因为个人价值不可亵渎。当教育中隐含的一以贯之的主线逐渐清晰，某些共通之处成为着眼点，理想就已经近在眼前。名利之臣已经被他们吹嘘成一种具有绝对历史意义的上层人物了。

有这样想法的青年学生中，大致分为两种人物。一类是急功近利的，想要跃入资产者的心情强烈到激奋的程度，抓耳挠腮，绞尽脑汁，尝试着各种使自身得以具备某些成功特质的方式来试炼和创业。市场——在此时或许仅仅是无知无识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一个永远张着嘴向自己吐钱的巨大储蓄罐。他们或无意更多是有意的、接触最多的学说是成功学——“用催眠师来代替演说家，用暗示来代替雄辩，用宣传来代替议会讲演艺术。不再需要去说服民众，而只要用戏剧的方式去激发他们采取行动”（《乌合之众》，斯塔夫·勒庞）。化用宗教内核来叙述某些颠簸不破的道理（那是一种不断提醒和规矩自我的方式，比如让你每天站在镜前高喊：“我一定可以成功！我一定可以更加细致！我一定可以做的更好！”），通过鲜明形象和浅薄形式——一个商业人物的伟大胜利或者说某些传奇人物的失败事例的高度浓缩和加工，伴随着不同寻常的、又类似断言的分析——来刺激听众、读者的想象力，效果果然是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不断的重复和渲染也是必要的，渐渐使他们忘记起初是谁在头脑里植入的这种主张，作者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他们认为这正是自己一直忽略或者缺憾的地方，正是成功必然具备的素质——对此已经毫不怀疑。《乌合之众》提及，广告同样具备这样的效果，“如果我们有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士，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成功学的受众如此之广，在于它已然成了一种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见别人专于攀爬之道，业已采取实质的举动了——这种强力的刺激，迫使自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意见和模式。所有制的改变、集体精神向个体自由的转变，个体的物质上的诉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无限制放大，最终形成一种狂热的传染病。

另外一种学生比较特殊，特殊在于稀少。他们存在着向资产阶级上升的愿望，同时对下层阶级——在他看来属于劳苦大众的人群仍怀有较大的同情。声称自己成功后将转过头来帮助他们。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几种可能。一是生长环境，自己或许就是长于一些贫苦的无产者之中，而此时头脑还未完全被利己的打算充斥；知识分子家庭则产生第二个可能，他们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差，周围有些知识分子，道德教育不少，然而父辈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和社会

地位随之产生的动荡，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作为一个堪比小资家庭带给他的物质上的小优越，也能见识到生活的艰难，其中觉悟较高者，能从中体会到现实生活中阶级对立的残酷性，倒有意愿此后做个牺牲。不过，他们的同情与以后的慈悲则是动摇、狭隘的。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企业家，然后是慈善家。殊不知自己的企业家身份能不能实现首先是个问题，另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们在掠夺他人的血汗，积累自己的财富的同时对他所同情的人群造成了多大伤害也是没有考虑的——这种矛盾体现的是这种回报精神的虚伪性质，而这种成功理想最终也将建立在利己主义的打算之上。

中国当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有绝对的统治力。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理论辩护者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而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对当下的青年学生看待事物的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以及自身道德观念有深刻的影响。而他们这种在物质、利益上强烈的成功欲望不过是这种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罢了，而其自身也难免因此被异化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一样工具。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来指挥这样的工具为其发展廓清道路。

马克思 17 岁时说：“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当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时，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

2010-11-22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452>

资本主义时代为何如此漫长——一点个人看法

作者：DesertHX

自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世界的划分变得简单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矛盾、斗争，都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展开。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不合理，而那个唯一能够消灭它的阶级——无产阶级，又是大多数受压迫人民的阶级。单单从数量上看，只要无产者们都联合起来，那资产阶级的灭亡不过是一眨眼的事。

然而，纵观历史，无产阶级进行了无比漫长的斗争，经历了马列毛时代，如今世界却依然被资本主义统治着。尽管罢工随处可见，反抗随处可见，可资本主义统治却依旧顽固——在重重矛盾中存在着。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无产者从未真正联合起来。可是，这些同样受到异化、受到压迫的人们，是被什么东西所分化了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信条与理念——

1、个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2、追求个人“成功”，“人生所在的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朝的方向。”

3、通过“奋斗”，每个人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

诸如此类的“箴言”非常之多，不必一一列举，它们几乎贯穿了我们生活的始终，教会我们“克服困难”、“发掘自己的潜力”、“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等等等等。乍看之下这些效果全都是正面的，似乎这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具有且要努力去争取的属性。

而问题并不出在这些理念的假象性的效果，而是它的根源——这根源便是“个人”。一切的信念，一切的人生引导，都是从个人出发。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四面八方就传来这样的声音：“如果你努力，如果你做了XXX，你就比别人强！你今后就会比那些不努力的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于是，“个性”被笼罩上了美丽而令人向往的光辉。成长期的孩子们常常围绕在充满“个人魅力”的同伴或偶像身边，带着羡慕甚至崇拜的眼神看着他们，而私底下暗暗抱怨自己“没有特殊才能”、“平庸”、“不被人重视”……当他们长大之后，努力地为生存而挣扎，混得好的人沾沾自喜，混得穷的，或许抱怨自己不成器，或许“乐观地”使自己“知足”，而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甚至没有精力去抱怨，整天只能像一台机器一般痛苦而艰辛地运转。

就这样，人们被孤立为一个个的“个体”，过于看重狭隘的“自我”的价值，彼此隔绝，每一个人都“独特”到甚至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程度。工厂的分工使工人孤立，而所谓“梦想”、“追求”则让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们自视清高，自诩“孤独”，离群索居甚至消极遁世。隔阂成为常态，人们经常抱怨自己不被他人认可，毫无阻碍的交流与沟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不可能……有些人甚至断言：“人性”的本质就是孤独的，任何一个人永远无法理解另一个人。

既然孤立，既然隔绝，既然各自为政，各有各的想法和所谓追求，那么作为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怎么可能联合得起来呢？更何况如今的无产阶级之中也有各式各样的阶层，就算

同一个阶层的人也往往被个人主义所洗脑，于是革命就更加困难了。没有一个统一的阶级意识，就根本谈不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意识形态是比暴力更强大的机器，是比压迫更深刻的奴役。当每个人眼中只看到自己的时候，历史是盲目甚至停滞的，只能被自发的规律拉扯着行进。（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控制不了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又将绝大多数人的眼光局限于“自我”，从而顺理成章地使无产阶级分化，无法团结起来反抗。意识形态在当今高度发达的信息世界里已经无孔不入，其渗透力之强，几乎可以使一个人顺顺当当地植入统治阶级制造好的脑子并且用它“恰当地思考”。而当一个被异化的人因使用不好这个脑子而陷入疯狂时，资产阶级的走狗们——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便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治病”，使之能在其世界里“正常行动”。

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又是从何而来呢？

毫无疑问，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之所以强调个人，就因为当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达到极大的富足，甚至可以说，还相当的欠缺。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动物属性——为生存而竞争、彼此厮杀抢夺资源——必然占了我们人性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我们当今的“文明”时代，不过是野蛮时期的一个量上有所区别的变种：我们还处于互相残杀的动物的历史，而远没有进入真正的“人”的历史。于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们都知道，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一样，不断地再生产、巩固和扩大自身。在这个不间断的过程之中，意识形态原先就存在的不合理性和荒谬性渐渐被抹杀、被淡化、直至退居历史舞台的幕后深处而不被人察觉，一切的否定因素经历漫长的演变与改装而彻底走向了它的反面，一切的不合理逐渐获得了压倒性的“合理”外观，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假象之中生活，并且日渐沉迷于“自我”的幻觉，理所当然便脱离历史，脱离人民，哪怕在共同的命运面前都无法团结为一个整体。人们不知不觉按照意识形态行动，其结果是再生产了意识形态本身，因此统治的根基越来越顽固——它获得了新的话语权：我牢不可破，你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当然，人的主观能动性决不允许坐视自己被异化为机器而不管，决不允许人类自身就此毁灭，更不允许历史终结。一切革命，都是客观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无法被任何个人的“英雄主义”所左右。唯一永恒的只有历史，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实践当中反思，不断地破坏不断地重建，不断地达到否定之否定，永无止境的螺旋式上升。资本主义越发展，意识形态机制在不断扩大自身的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固有的空洞，如同一个不断胀大的肥皂泡，极限就在眼前，越膨胀，外壳就越脆弱，令人恐惧的、毫无内容的“巨人”一般庞大的外观假象必然会炸毁。而此时，无产阶级的实践，无产阶级夺取话语权的整个历史行动就显得迫在眉睫而至关重要了。

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抵制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文化腐蚀，如何确立一套无产阶级自身行动的方案。世界各地的无产者每一天都在逐渐认识自己的处境，每一天都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团结起来，尽管是以松散而极不稳定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算在左派阵营内部，都常常出现质的分歧，起初是以不太明显的形式，而最后总以最激烈的冲突导致组织内部的分化。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彻底，从新夺取的政权当中又分化出了资本家阶级，于是革命的果实被摧毁，“专政者”再次脱离群众，再次将绝大多数人民的未来置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世界重又陷入黑暗的恶性循环。

根源究竟在哪里？意识形态赋予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究竟还能持续多久？毫无疑问，不可能坐等它自行爆炸，革命每时每刻都在以或明显或微妙的方式进行。在这个被异化得如此深刻的世界里，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行动？而事实上，从没有僵化不变的框架，从没有“给定的”甚至“先验的”革命道路，一切的答案只能在实践当中寻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

产主义对我们说来并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06>

理论视野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卡尔·马克思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弗拉基米尔·列宁

科学之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

——约瑟夫·斯大林

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

作者：王虹

[内容提要]女性主义问题并不局限于女性群体的范围内，事实上，女性主义和女性群体本身常常被种族和阶级这两个根本性的社会等级结构所持续地分裂/分化着，如何团结更多的力量，将被分化/分裂的女性力量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和穿越与性别制度（男权制）扭结在一起的阶级和种族问题。由于性别、种族和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相互作用，导致了单纯实现女性解放理想的不可能。这种现状要求理论研究着眼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以更稳健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三种基本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它们之间关联性，立足于社会性别问题，将性别问题放入到由性别、种族、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度交错构成的社会政治整体结构中去观察三者之间的联系、作用和矛盾，我们就会认识到，女性解放不会独立于或者早于社会的解放，而一个真正的社会解放也必然包括女性的真正解放。

一

黑人女性主义者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黑人女工，她应当如何面对女性问题？很明显，撕裂她身份和立场的种族乃至阶级问题，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女性团结和解放的障碍，那么阶级和种族的问题又该如何去对待和处理？是放在性别问题之上/之前去解决，还是一切以性别问题为中心？由于无法解决各种等级制度相互扭结的情况，无法深入认识到对女性的多重身份对她个人的分裂作用，将女性视为单一群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在个体女性的诉求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而因为同样的原因，女性群体的严重分化状况也一直存在。这种分化除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说的“男权制意识”的影响作用外，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女性并不仅仅拥有女性这一种身份，并不仅仅处于女性这一种境遇中。事实上，她们除了由于生理性别的缘故被划分到女性群体中，被赋予女性的身份，并因为这个身份，在性别制度中和其他女性都处于“女性的境遇”外，还同时由于身体的其他特征（肤色、骨骼形态、毛发和眼睛的颜色等）被划分到不同的种族中，被赋予某个种族的身份，并因为这个身份，在种族这个等级制度中和其他同种族的人都处于类似的“种族境遇”里。不仅如此，她还同时由于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所处的位置，而被划分到不同的社会阶级中去，被赋予了这个阶级的身份和地位，并因为这个阶级身份而自然地和其他同阶级的人都处于类似的“阶级境遇”里了……

缘于女性群体的分化，女性主义本身也被分裂了。由于她们在阶级和种族这些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不同位置，出现了几种倾向不同的女性主义：第一种倾向是站在虽处于劣势性别位置，却同时处于优势阶级和优势种族位置立场上的女性主义者（比如白人中产阶级妇女运动者）提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忽略掉了女性群体中实际存在着的巨大的阶级和种族差别，而将女性视为无差别的一个整体，相当于仅仅关注到女性作为性别中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却忽视了女性在其他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对这种女性地位和价值的影响。从18世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们都假设女性是处于一个有着共同社会基础的层面之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由于这种缺陷，常常引起遭受着阶级和种族压迫的妇女的反对，因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常常被黑人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者斥责为“白人中产阶级女人

的女性主义”。而最早的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们成立的妇女组织，比如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 NOW）和“妇女公平行动联盟”（Women's Equity Action League，简称 WEAL）以及历届世界妇女大会，都因为其中充斥着的各种对立（这种种对立正是由于性别立场之外的种族、阶级等立场的不同而造成的）或者种种歧视（比如处于优势阶级上的女性主义者对处于劣势阶级及劣势种族地位上的女性主义者的歧视）而陷于混乱。另一种倾向是站在处于劣势阶级和性别位置，却同时处于优势种族位置的立场上的女性主义者（比如白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者）提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两种女性主义理论鼓励女性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致力于促使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的全面社会化，其目的是摧毁作为基本经济单位——资本主义制度支撑结构的家庭。不过，批评者指出，这种对家庭的看法过于简单，起码对于受压迫的种族中的妇女来说，家庭不仅仅是经济单位，也是她们作为种族中的一员，与种族内成员相互连接以获得地位和权益的结构。

女性主义理论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告诉我们，只有重新认识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社会等级制度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加全面地思考关于社会解放的议题。社会分层的第一重要因素是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对生产资料有相同关系的一群人。而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因素是种族：“种族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组社会关系。个体和群体据此进行定位，并根据生物学的特征被赋予不同的属性或能力。种族差别不仅是描述人类差异的一种方式，也是重新塑造社会内部权力和不平等模式的重要因素。”^[2]种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为随着历史的演变，从“种族”这个概念衍生出的“族群”是“纯粹社会性”的概念，不过身体上的不同，如肤色的差别常常被作为确定少数族群的定义因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性别与种族（族群）的交接点：“少数族群”这个指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的词也常常用来形容女性：“女性有时候被描写为少数族群，是因为虽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她们在数量上占多数，但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因而这个词也被用在她们身上。”^[3]同时，也发现了一个种族与阶级的交接点：“族群间的差异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而且伴随着族群之间的对抗。”^[4]同时，我们从社会对种族、族群问题的定义上发现，身体差异不过是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的偏见、刻板印象的想象性的基础。比如认为身体特征的差异必然说明这些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同，甚至认为某些身体特征的群体不仅是低等的，而且是“邪恶”的，但这些“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偏见和对立往往是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的。因此，无论是从性别等级制中，还是从种族的等级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阶级，也就是由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不同而存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等级制的存在，它往往是作为性别和种族划分的现实性基础存在，并使得性别和种族的等级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在三者之中，阶级问题是更为本质性的问题。

以阶级作为基本元素，种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重叠，指向的典型群体是黑人男工；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重叠，指向的典型群体是白人女工；性别、种族、阶级三种压迫的重叠，指向的典型群体是黑人女工。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只受一种等级制压迫的情况，比如只受到阶级压迫的典型群体是白人男工，只受到性别压迫的典型群体是白人资产阶级妇女。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面临种族和性别压迫问题，但必然面临阶级压迫问题（白人男工），

而另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面临阶级和性别压迫问题，但必然面临种族压迫问题（资产阶级黑人男性），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不会面临阶级和种族压迫问题，但必然面临性别压迫的问题（资产阶级白人女性）；一部分人面临着阶级、种族压迫的问题，但没有性别压迫的问题（黑人男工），一部分人面临阶级、性别压迫的问题，却没有种族压迫的问题（白人女工），还有一部分人同时面临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问题（黑人女工）。）

通过越来越丰富和深入的对女性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女性不仅被性别制度分裂为和男性群体利益相对立的另一个群体，而且女性群体同时还被阶级制度和种族制度在另外的维度上继续分裂。女性的团结和女性的解放，起码必须在同时解决阶级和种族问题造成的分裂对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都将目光从单纯的“女性问题”转移向更为广阔的由各种社会网络和等级构成的整体世界，认识到各种制度体系是同构的，是相互勾连、促进和维护的。比如资本主义和男权制就是相互联系、交错和共生的，同时又相互滋养、促进和维护。虽然动摇其中一种制度可能会波及其他制度，但不可能有单个领域内的扭转和胜利。意识到这点，就必须着眼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具有更稳健的战略眼光来重新思考女性解放的问题。

二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权力都是核心。在男权制的性别制度中，性别权力是由男性所掌握。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的这种共时性，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已经指出了：“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5]“最初的阶级压迫”是指与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同时产生的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压迫。也就是说，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是同时产生的，两者密切相关：“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6]个体婚制产生的同时，最初的阶级压迫（奴隶制）也诞生了，而且阶级和性别两种压迫机制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纯粹是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7]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不仅仅是性别压迫的表现，也是阶级压迫的表现，因为男性只有在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够让性别压迫得以维持下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还将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作了一个对比：“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现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8]恩格斯在这里指明了阶级与性别压迫的相似与不同，并试图将女性的解放放到阶级的解放中去解决，然而阶级解放所指向的目标，往往不仅受到阶级压迫的阻力，也会受到来自性别压迫的阻碍，正如性别解放所指向的目标，往往不仅受到性别压迫的阻力，也会受到来自阶级制度的阻碍。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现实中，阶级、性别这些压迫结构不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维护的，当然同时也会有摩擦。比如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女性成为劳动力，以实现更大的资本增殖，因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适

当地教育女性要“独立”和“自强”，以促使女性步入到生产领域里来。另一方面，无数男性对这种女性投入社会大生产的情况心怀不满，认为这样会导致“母职”的缺失，影响到后代的成长。由于“资本主义究其本质，它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仍然是父权制的”。[9]因此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是作为个体的男性，它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只是公共领域的男权制和私人领域的男权制的矛盾。而二者的矛盾，不过是家庭内部的压迫阶级（男性）的利益与社会范围的压迫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矛盾的表现，也就是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之间的矛盾的表现。

当然，由于两种压迫机制的互利性，它们之间会有妥协和协商。比如公共领域男权制对女性利益的回避（鼓励女性走入生产领域，但却保留了“家务和生育是女性的天职”这一传统男权观点）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私人领域男权制的维护。因此，约瑟芬·多诺万在《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引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爱森斯坦的话说：“女权主义者要求揭示这样一个真相，即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在不动摇其自身的情况下无法兑现它的‘自由主义的’平等诺言，甚至不能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10]资本主义在最初时期为了剩余价值会鼓励女性走入生产领域，然而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为女性设置了种种障碍，如“职场天花板”、同工不同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将女性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又以各种方式诱使女性回到家庭中，充当纯粹的消费者。因为消费社会是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体现，需要有更多拉动经济的消费因素，而家庭正是为商业消费贡献最大的团体；女人如果都能做一个安静顺服、听从指挥的消费者的“主要购买力量”，而家庭就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最佳的微型代理机构。正如安妮·金斯顿在《妻子是什么》中所说的那样：“家庭主妇待在家里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经济上的一个目标。作为采购全家消费物品和服务的那个人，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代理商。”[11]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女性受自由主义影响，开始反抗男权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没有资源来反抗男性，因为资源始终都是被男人所掌握的。这里凸显出的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对性别不平等的巨大影响。

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意识到，虽然可以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性别不平等，但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12]这意味着，性别可能跨越阶级和种族的界限，所用的手段就是性别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只是男性所拥有。比如一个下层黑人男性会因为性别的优势而宣称自己强于白人中产/资产阶级妇女，而一位底层白人男性也能够以性别的优势认为自己优越于任何阶级地位上的黑人妇女。“在男权社会里，阶级或种族道德观的作用取决于大男子主义道德标准的公开程度和宣扬程度。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面临的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在社会的下层，男性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而在中上阶层阶级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13]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还认为：“也许可以说，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种阶级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性的阶级关联比男性要少。”[14]这表明性别问题有溢出阶级与种族问题的部分，这个“溢出”的意思包括两层：1、女性与阶级的关联比男性更少，更容易变更。这是因为“大多数女性的物质地位倾向于反映出她们的父亲或者丈夫的位置，因此我们有理由主要从阶级的角度来解释性别的不平等。”[15]2、在阶级和种族矛盾解决后，性别问题还需要面对自己独特的矛盾，必须用不同于解决阶级、种族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属于性别问题的特殊问题（比如性别分工和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因此性别矛盾的解决以及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比阶级和种族解放更为漫长的过程。

阶级、性别和种族是等级性的制度，而黑人女性由于同时受到多重等级制度的压迫，所以她们在强调性别压迫的同时，还认为：“阶级和种族等因素是理解非白人妇女所遭受的压迫的重要因素。”[16]用黑人女性主义和全球女性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性别、种族和文化

及其结构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种族、性别、阶级及它们赋予妇女的身份意义，造成了妇女所不得不面对的“多重危险”，因为其中任何一种等级制——无论是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还是属于社会性别制度的——都对她们的存在、权利和自由构成了威胁。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前被铲除，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它压迫形式被消灭之前寿终正寝。”[17]因此要想终结这些问题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整体作为发起攻击的准确目标。

在种族-性别-阶级这个相互扭结的不平等的制度整体上，种族-性别（以及性）的关系是黑人妇女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贝尔·胡克斯意识到黑人男性在描述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本质时，几乎都是将自由等同于男子气概，这些性别/性的比喻在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逐渐缔造了一条纽带，使他们共享了父权制的信仰。因而黑人男性甚至以性压迫的形式释放其他压迫形式所造成的愤懑。比如他们有意无意地将强奸当作一种恐怖主义的工具，用以“反抗”和在臆想中“摧毁”被反抗阶层——白人男性的某些方面，甚至在一些黑人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强奸黑人妇女成为最终强奸白人妇女的练习。因此黑人妇女不仅在白人统治者手下受压迫，而且也同时在黑人男子手下受折磨，并且后一种折磨对于黑人妇女来说未必就亚于前一种压迫。直面这个问题，意味着直视性别和种族这两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之间的相互浸淫的关系。

种族隔阂直接造成了女性内部的分裂：女性群体本身就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妇女组成，她们会站在自身的阶级、种族和信仰的立场上选择支持或者不支持受害者。假如受害者是受过高等教育、身处中产阶层的妇女，女性群体中相对弱势的妇女就会觉得受害者并不属于她们中的一员，她们就很难支持受害者。而女性群体中的大部分黑人妇女，也极有可能因为受害者的阶级与自己的悬殊，而将受害者视为“白人”和“有钱人”（尽管受害者是黑人，并且也未必就属于真正的中产阶级），而不愿意支持受害者。因此，性别-种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白人妇女的女性主义观点的哪些部分是能被黑人妇女所接受的，而哪些部分又是必须被黑人妇女修正，甚至重造的呢？对于白人女性主义者来说，反色情（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和反对家庭（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是很时髦的，但黑人女性主义者常常对这两种观点发出质疑。比如她们认为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的反色情运动，是只有那些衣食无忧、受过教育、有工作和被宠坏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才有雅兴去表达大惊小怪和发泄愤怒的方式。而那些自以为懂得什么是色情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甚至都没有能够明白真正值得反对的是暴力的色情作品（妇女在其中惨遭折磨），而不是一般的色情作品。因为假如一味地否认色情，也可能同时加重对“与性联系起来的女人的意义”的鄙视。在家庭观点方面，黑人女性主义者指出，和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不同，黑人作为少数族群，他们的家庭能带给黑人妇女一种保护，使她们有可能免受一些来自白人阶层的直接伤害，同时黑人妇女和家庭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提高她们在黑人群体中的重要性。因此家庭对于种族不同、阶层不同的妇女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不同的境遇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以及女性主义思想对家庭所做的评价必须被重新审视。

黑人妇女受到来自黑人男子和白人男子的双重压迫，缘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对黑人妇女的双重否定。这常常使她们处于困境：一方面，假如黑人妇女控诉黑人男性对她们施加的暴力剥夺，就会被黑人群体指责为憎恨黑人男子，进而被指责为憎恨和背弃黑人群体；另一方面，假如黑人妇女控诉白人男性的种族主义压迫，又会导致对黑人男性应承担的在性别关系上的责任的策略性的忽略。因此，无论黑人妇女控诉的对象是种族主义压迫还是性别上的压迫，或者是对种族-性别压迫及种族-性别-阶级的压迫，她的控诉的合法性都常常是被否定的。

无论黑人男性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黑人女性面对的问题则可能更为严重，因为她们

总是要比黑人男性所面对的压迫更多一层，即性别的压迫。如果说黑人男子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那么黑人妇女则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受害者；如果说黑人男子遭受的是种族-阶级压迫，那么黑人妇女则是种族-阶级-性别这个制度整体的受害者。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部分，黑人妇女的生活状况与需求和其他种族的妇女是不同的，而她们之中不同阶层妇女的生活状况与需求则和本种族其他阶层及外种族其他阶层的妇女也不一样。而正是因为她们的吁求不同，才真正地实现了对等级制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质疑和瓦解。

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及解放理论不仅重点关注女性解放（在将种族和阶级作为次要因素的情况下），还关注到种族的重要性（在反思女性立场和阶级差异的情况下）和阶级的基础性（在全面分析女性境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既包含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处于劣势性别位置，同时又处于优势阶级和优势种族位置的立场）的理论元素，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及激进女性主义（处于劣势性别和劣势阶级位置，同时又处于优势种族位置的立场）的理论元素。而其后的全球女性主义更将理论的视角扩展到了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霸权国家）和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上。这种以女性解放为核心的对整体社会解放的思考，使黑人女性主义和全球女性主义的思想及解放理论成为当今女性主义理论中最丰富、最全面的理论，而这种将世界视为一个由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多种政治维度构成的有机整体的理论发展倾向，是符合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也是整体社会政治状况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策略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而有力的帮助。

三

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此时，各种解放的呼声——无论是女性解放、民族解放还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呼声——都开始在世界各处此起彼伏。真正的社会解放是必然包含了阶级解放、种族解放和性别解放在内的社会整体性的解放，单方面的某种制度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社会解放，也不能促成全面的社会解放。恩格斯曾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8]但是透过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紧密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是因为她们被排斥在公共劳动之外，然而即使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也会被边缘化——同工不同酬、职场天花板等等现实已经说明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虽然是一个女性解放的重要前提，但女性解放并不是仅仅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就能真正的实现，因为无论她们参与社会生产的程度如何，她们处境（尤其是性别地位）的改善仍旧是极其有限的。2、如果说女性呆在家庭中是被性别制度所束缚和异化，那么女性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将要面临的是另一种异化——更为普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造成的异化。因此，从经济角度看，女性的真正解放只能建立在社会的普遍解放之上，尤其是阶级的消除和异化劳动的消除上面。另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进一步提出，女性的解放依赖于一些社会性的改变：1、公共食堂、幼儿园等公益设施的进一步完善。2、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的广泛运用。然而在现实中，公益设施的完善以及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了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无产阶级的被压迫和女性的边缘化还会被延续下去。

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重要的社会等级制度相互交缠，仅仅着力于消除其中的某一种压迫的话，也许会导致另外两种或者一种压迫的激化，而最终导致所有的压迫机制都不仅没有被消除，甚至得到了强化。“当前左派理论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三折屏里，过分地强调阶级这个范畴有时让人感到有可能会陷于左右和歪曲对其他两个范畴的探索的危险中。目前，后两个范畴在左派的理论框架里尚未稳固地确定其地位，因而极易为怀有偏见的阶级政治所利用。”^[19]一些女性主义者，由于她们身处中产阶层/资产阶级，但同时又受到性别的

压迫，她们就很容易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点。但她们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鄙视劳动者，她们就越是走到了自己的立场的反面，背离了女性主义本身对“平等”的追求。这让我们意识到，女性运动不能作为和自视为独立的运动，而且这样也是不可能取得值得称道的成果的。因为不同时改变社会阶级和种族方面的压迫，女性运动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会部分地成为反动的力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解放。这说明，某方面压迫的消除假若滞后于其他方面的解放，往往会反过来阻止其他方面的解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他的《新帝国主义》中指出：“争取社会改善的内部斗争与帝国主义的外部替代特征之间的关系经常遭到忽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工人运动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像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一样到国外寻求利益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借助于帝国主义来达到这一目标）。”[20]这样的结果是，原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内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斗争（性别的、阶级的、种族的）一旦被割裂来对待，仅仅重视某一种斗争，而忽略另外的两种斗争，就会造成受压迫者的分裂，斗争者就不仅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他们分析社会全景和做出斗争计划的能力。

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普遍问题在于，过于重视性别问题（生存空间的政治）而忽略了阶级问题（起源于工作场所和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的根源性和意识形态（植根于阶级问题的观念价值系统）的普遍性。这样的结果是，不仅无法实现性别的解放，甚至会走向解放的反面，在种族解放问题上也是如此。正如齐泽克在《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一文中指出的：“如果今天有人直接展开行动，那么这种行动将不是在一个空场上进行的，而是内在于霸权意识形态构架之内：那些‘真正希望做些事情来有所帮助’的人，纷纷（无疑是感觉很自豪地）投身于诸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等等运动之中。即使这些运动看起来已经涉及到经济领域，但它们仍得到了媒体的宽容和支持。只要不踏入一个禁区，它们就可以继续得到宽容和支持。”在这里，齐泽克指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运动在未能撼动真正的社会等级制度根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阶级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无论是何种运动，都往往只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框架之内的自我能量的消耗。甚至，这些运动在未能撼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瓦解阶级事实的情况下，还会成为继续维持现状的手段和方式——因为这些运动的能量由于没有能结合阶级解放的能量，而仅仅沦落为阶级矛盾的解压阀——它们都被利用来巩固，而不是削弱现有资本主义体制和阶级制度。各种“行动”都能给受压迫者一个发泄的途径，而阶级制度中的压迫阶级（资产阶级）也就堂而皇之地掌握了社会力量的主控权（因为各种“运动”都和资本运作有或明或暗的关系，它们都受资本主义体制的赞助或者支持，因而最终也都将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调整及修正过程中来，所以它们最终也是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另外，资产阶级往往通过激化种族和性别矛盾来转移阶级矛盾这个最根本的社会矛盾。这种转移和替代往往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的作用。比如，在阶级压迫严重的时候，资产阶级往往通过激化种族矛盾和性别矛盾，让在阶级制度下受压迫的群体中的男性成员享受到种族和性别的优越感，同时将他们的斗争矛头转向可能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不同种族和性别的人群——有色族群和女性群体。阶级矛盾的缓解乃至粉饰，常常就是通过这种对人群的分化和转移矛盾焦点来达到的。

另一方面，由于性别问题有溢出阶级与种族问题的部分，也就是说，性别制度与阶级制度同时产生并且有部分是独立于阶级制度之外的，所以在性别分工随着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的去资本主义化，被消除了不平等的境况后，女性解放还要面对自己独特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黑人女性主义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比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更强大、也更有力地维持了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她认为：“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证明其合理性，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压迫就不可能继续下去。”[21]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由于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合谋状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男权制

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存在的，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逻辑、消费主义、市场至上）是更直接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中，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而男权制意识形态依赖并总体上服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直接服务于性别等级制度以维持性别压迫的结构。因此，解决性别压迫的问题，同时必须着眼于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22]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不仅必须通过改变经济和政治地位来解决，还必须同时改革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女性解放在意识形态层面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革新：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教育女性争取平等和权利。

性别压迫绝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和分析，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它们所衍生出的意识形态都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掩饰的。从更大的范围内来看，性别压迫也同时和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引起的压迫（导致了所谓三个世界体系的划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压迫，而且针对不同的女性，压迫的内容和严重程度也是不同的。全球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各种压迫都纳入女性主义的视域：她们“同意多元文化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即女性主义的定义必须扩展，进而把所有压迫妇女的事情包括在女性主义的思考里；不论是基于种族、阶级的压迫还是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所引起的压迫，女性主义都应该考虑。”[23]而这种超越单一的压迫类别的、以结成妇女联盟，乃至受压迫群体的联盟为趋向的思想，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思想。重新审视各种压迫制度，将各种相互联系的压迫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有助于理解压迫体系的运作方式及如何从根本上消解压迫。

全球女性主义者强调：“世界各地妇女经历的各种压迫，它们之间都有联系。”[24]个体的解放与整体的解放是同一过程，个体的解放最终形成整体的解放，整体的解放同时也是个体解放的前提，个体的解放或者某种等级制度的解放，如果没有社会整体的解放作为前提，无论如何都会是不彻底、不完全的。女性解放、种族（民族解放）与阶级的解放最终形成社会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又为女性解放提供条件。因此，解放不仅仅是“我的解放”，而是“我们的解放”，这个“我们”是不断扩展的，不同种族、性别、阶级，不同世界体系的人们都慢慢汇入“我们”这个差异的共同体中。这导致女性主义的实践必然是最终穿越种族-阶级-性别-帝国殖民的划分的实践。恰如作为无国界的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一样，穿越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的阻隔和话语的屏障，女性的真正解放才会伴随社会的彻底解放而到来。人类真正的解放不仅是阶级的解放，同时也必须包括性别和种族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世界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而群体之间也被日益分化。妇女不仅因为性别制度而与男性分离，其自身也被阶级、种族和帝国主义所分裂。要实现女性的解放，必须结为联盟才有可能超越这些导致分裂和压迫的制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整体社会的解放。因此女性的解放，绝不会独立于和早于整体社会的解放，而真正的社会解放必然包含真正的女性解放在内。

[参考文献]

-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 [2][3][4][12][15][16][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赵旭东、齐心、王兵、马戎、阎书昌等译：《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第317-318页，第318页，第386页，第376页，第175页。
- [5][6][7][8][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第55页，第72页，第72页，第72页。
- [9][17][21][23][24][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晓明等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第320-321页，第322

页，第 332 页，第 334 页。

[10][美]约瑟芬·多诺万 (Josephine Donovan) 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5 页。

[11][美]安妮·金斯顿 (Anne Kingston) 著，吴宏凯译：《妻子是什么》，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3 页。

[13][14][美]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t) 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 页，第 47 页。

[19][英]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著，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审美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

[20][英]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8 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35 页。

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0 年第 5 期，本文较杂志版更完整。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217>

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些必要的分析

作者：黑夜里的牛

首先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进行明确的、不含糊的分析，因为甚至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十分混乱的。从1936年斯大林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一刻起，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就不断地误导着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同时又为修正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依据。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历三个阶段。I、“长久的阵痛”，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II、“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III、“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一、过渡时期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镇压是必要的，但是这已经是被剥削者的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而这个从事镇压工作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对此，列宁指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度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其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的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列宁选集》第三卷248页）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这个道路前进，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苏联或者红色中国没有极其复杂的镇压机器，客观的说，这个机器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机器更加复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武装的群众组织不能代替这个机器呢？因为此时，大部分剥削者并没有被消灭，在国外，还有剥削阶级的异常复杂而强大的镇压机器，它们时刻准备绞杀无产阶级政权。如果此时无产阶级政权不用最复杂的国家机器与之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即使此时镇压国内的剥削阶级的任务可以由武装的群众组织来完成，但是为了对付外部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不能使国家机器变得简单而只能变得更加复杂。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异常复杂的国家机器掌握着社会权利，在没有实现列宁指出的“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特权官僚阶层。这里我们遭遇到了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之时面临的问题。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了，以后另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难题。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只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且严格说来还没有能够完全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论述的那个过渡时期。因为剥削者的政权还在外部存在着，他们的武装甚至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权更加强大。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此时仍旧处于革命中，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实际上相当于一系列“解放区”。

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如果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把革命推进到全世界以创造改变国家机器本身的条件，如果没有能够找到某种监督官僚阶层以保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办法，那么从过渡时期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危险是极大的，二十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边缘国家革命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革命性，将革命推到全世界以进入到马克思列宁讲的那个过渡时期，是一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说法，也许让许多人感到惊讶。毕竟我们的教科书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社会主义完成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的，因为在阐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各个历史时期时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这一词（至少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的）。但是在列宁那里，我们找到了明确的说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五章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一节中批判拉萨尔的时候讲道：“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我们并不是本本主义者，但概念的明晰有助于问题的分析。尽管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含义进行再造，比如用它来指示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但是一旦我们把社会主义这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这样的转变，就不能再用“社会主义”去对应列宁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相关论述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如同我们可以把猫叫做狗，但却不能把别人对他们的“狗”的定义和相关属性加到我们的那个“狗”的身上。还有些人认为过渡时期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介，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而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界限不是非此即彼的，比如生和死的界限不是那一个确定的瞬间，而是一个过程。所以，过渡时期也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的荒谬在于，说事物之间没有精确的边界并不意味着事物之间没有确定的差别，过渡时期这一称谓不正表明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渡地带”而存在的吗？对此，我们不想用更多的言辞来批驳了。但是把过渡时期称作社会主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后来的人学问不够造成的误解，而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故意制造的一个术语的混乱：这一切都要去请教斯大林，因为他一定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先看看在马克思列宁那里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什么吧！

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社会，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差别，这就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特定时期的特定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历史性的消灭了。

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消灭了阶级差别，但确实还没有完全消灭“国家”，这是由于“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而“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资产阶级法权（或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跟剥削没有任何关系，这里并没有剥削，也谈不上不平等（因为真正的平等就是平等与不平等这一对立的消灭，真正的平等也就意味着平等的消亡），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马克思较真去分析一下所谓的“不平等权

利”的确切含义的话。但是这里至少要维持一种平等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和列宁一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着“国家”或“半国家”。由于此时阶级差别已经消灭，已经没有任何阶级可以去专政了，所以它的任务是完成基本的公共管理职能，以及强制维持必要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文革时期的那些造反派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中国当时的问题恰恰不在于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在于还未能将社会推进到这一程度，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里的扣除肯定不包含快速工业化需要造成的相应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工人的剩余价值依旧是被“榨取”了的，虽然这个时候“剥削者”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资本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了。因此，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讨论如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是件很怪的事情，因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任务是必须在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能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消灭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核心职能即阶级压迫工具的职能的消灭，而最后的那一点“国家残余”也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被新时代的人们彻底地抛弃掉。

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问题上，回顾一下列宁的论述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教益的（鉴于人们有过多的误解，我不得不大段引用列宁的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自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 252 页，1972 年版）

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在苏联建成的，所以斯大林就必须把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塞进他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要加强它；国家不但不能消亡，还必须大大的扩张它的疆域；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差别。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就去修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基本概念，这种修改不但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且还为以后的篡改留下了理论依据：既然斯大林可以往社会主义里添加很多过渡时期的东西，那么某个人也可以制造出一个初级阶段，把资本主义甚至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往里装。这个问题值得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反思。

三、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注：1891 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此时资产阶级权利已经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了，对平等的追求最终导致了平等的消亡，同时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那一点最后的国家的残余也必须去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去到博物馆，如同恩格斯说的那样，跟青铜器待在一起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人类进入了完全崭新的阶段。

我们的教科书对于这方面的论述是相当含混的，比如肖前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关于阶级差别有这样的说法：“……消灭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束缚人的才智全面发展的传统的旧式分工，消灭人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一切差别和重大的社会不平等，主要是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发展。只有这些重大的社会差别消灭之后，才标志着阶级差别的最终消灭。”这段话之中存在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束缚人的才智全面发展的传统的旧式分工”，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平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富裕或者贫穷。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存在着阶级差别。列宁给阶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而“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阶级差别，也不存在阶级差别的物质性残余，可能存在的只是某些落后分子头脑里面的阶级差别的古老回忆。实际上，旧式分工等差别的消灭不仅不是阶级消灭的基础，恰恰相反，阶级差别的消灭是旧式分工等差别的消灭的前提。教科书犯这种错误自然不是因为编著者的水平过低，或许我们可以将原因归结到某个“核心”的“与时俱进”的神秘召唤和那“理论创新”的魔咒的恐吓。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作者：柳知秋

一、所谓生产性和非生产性

（由于劳动这个词本身含有生产的意思，为避免对劳动定义不同产生的混淆，这里改用“活动”这个概念，将所有人类活动一并讨论。由于不存在“生产性非劳动”，生产和非生产性的界限在这里是不变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把人类活动作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分的目的。

因为某些活动不创造使用价值（对社会整体无益），我们将这种活动称为非生产性的，表示它纯粹是人力的耗费，应尽量减少这种活动。

（一）所谓物质和非物质生产

某些使用价值并不固化在实物上，比如书的使用价值在于其中的知识，并不固化在纸张上；或者并不耐久，比如音乐在演奏结束后就消失了。由此提出非物质生产的概念（这个提法并不准确，但这里不做物质本质的哲学讨论），即承认创造知识和提供服务也是生产性的。

这种观点接近正确，但应注意，经济学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因而这种区分通常是不必要的。

（二）所谓改造自然

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必须改造自然，而服务的对象是人，所以不属于生产性活动。但是应该先明白改造自然的目的：满足人的需要。那么凭什么说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不是生产性的呢？比如按摩师和制造按摩机器的工人，创造的是同种使用价值，不能说后者生产而前者非生产，最多说使用机器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里的自然是相对社会而言，而不是相对人体而言，人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谓间接生产

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产必须有实物被创造，但不得不承认某些服务是必要的，因此将其说成是维持劳动力从而间接生产。比如将医疗说成是劳动力修理的耗费，但医疗的使用价值是满足人健康的需要，和它的对象是否劳动力没有关系。间接生产的说法实际颠倒了手段和目的。

只有一种情况下服务具有间接生产的性质：教育（这里仅考虑培训劳动者）。但从抽象意义来说，教育也是生产的一部分，教育劳动物化在劳动者身上，并在受教育的劳动者劳动时输出。一个极端的反驳是：如果生产劳动者也算生产，妇女生小孩也算生产性劳动？但是教育是提高劳动能力，和创造一个主体-人-是不同的，我们没必要讨论这种边界情况。并且从人类繁衍的需要看，生小孩属于生产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三) 所谓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

还有一种意见不论是否创造实物，而以是否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来判断是否生产性。这是把是否生产性与是否获取货币联系起来，错得更深刻，但也更明显。

比如一个农民，自己种粮自己吃，没有交换也就无所谓价值；如果拿粮食出售，种粮就创造了价值；如果他受雇于农场主，还创造剩余价值。同样的种粮的活动，竟然分化成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很荒谬。

小结

认为生产活动必须实物产出的观点，不过是把重农主义的“纯产品”扩展到工业品上，可称为“泛重农主义”；而认为生产活动必须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的观点，不过是将金银的货币性扩展到一切商品中，可称为“泛重商主义”。

那么什么才是区分生产性非生产性的标准呢？我们必须回到这种区分的目的上，考察一种活动的有用性。

有用性是历史的概念

制造武器是否生产性？从一国来看，武器是有用的，但从整体来看，武器是人类内斗的工具，不具有有用性。由此看出有用与否并不是绝对的，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当人类分裂为对立的国家时，武器是有用的。

社会主义者对是否生产性的判断

由于我们已经能看到社会主义的希望，对是否生产性的判断就要以社会主义下是否有用为标准。

销售工作，除少部分配置产品的作用外，大部分人力耗费在买卖双方的斗争上，这部分是非生产性的。广告业，除提供信息和娱乐（广告费为收入的娱乐产品）外，资本间斗争的部分，是非生产性的。

国家的功能，暴力镇压、意识形态统治和国际斗争，是非生产性的。

协调市场（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市场）主体间斗争的法律工作，是非生产性的。

补充

在严格定义下，劳动即是生产性的。但由于有用性是个历史的概念，有些非生产性活动还不能立即消除，我们可以“非生产性劳动”定义这个中间地带。

二、所谓价值转型中的总量二相等命题

根据价值转型理论，商品的生产价格由价值而来，利润由剩余价值而来。于是，许多学者在研究转型问题时总是试图证明两个命题：总生产价格和总价值，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在数量上相等。

但是马克思并未提出这样的命题，并且这两个命题也不成立，我在这里做简单的说明。

首先必须明确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的条件，《资本论》第三卷第9章：

“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注意：需要总体来看，不考虑生产部门间的内部交换），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从总的计算来看，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这个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的总成本价格一方，而不能再算在利润一方。如果这个利润算在利润一方，那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已经是最终产品，它的生产价格不加入另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1975年版第179页）

也就是说，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只对最终消费品成立。接下来马克思写到：

“……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第184页）

这个误差也表明了，对于所有商品，马克思并未提出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

同时，已经以生产价格计价的最终消费品，在两大阶级中的分配，马克思也没有讨论。因此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命题。

（一）所谓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

为简化讨论，考虑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全部利润用于奢侈消费。

假定社会生产分为a、b两部分，分别对应工资品和奢侈品，价值用纯活劳动表示，有：

$$Va+Ma=Sa$$

$$Vb+Mb=Sb$$

$$Va+Vb=Sa$$

$$Ma+Mb=Sb$$

假定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程度）一定，用e表示：

$$Ma/Va=Mb/Vb=e$$

假定a部分资本周转时间为Ta，b部分为Tb（资本构成高，对于活劳动相当于周转时间长），平均利润率为r，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有：

$$(1+r)^{Ta} \cdot Va' = Sa'$$

$$(1+r)^{Tb} \cdot Vb' = Sb'$$

由于a、b产品都是最终消费品，有：

$$Sa+Sb=Sa' + Sb'$$

但是工资品和奢侈品是不同的生产，它们的周转时间不会相等： $Ta \neq Tb$ （除非极偶然的情况）。

于是有一般： $(1+r)^{Ta} \neq (1+r)^{Tb} \neq (1+e)$

但是工资和利润仍然要买回相应的商品：

$$Va' + Vb' = Sa' \neq Sa = Va + Vb$$

$$Ma' + Mb' = Sb' \neq Sb = Ma + Mb$$

也就是说，在考虑资本家奢侈消费时，总利润不等于总剩余价值。

这与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不矛盾，只不过是作为剩余产品的奢侈品，按照生产价格重计价而已。同时工资品也重新计价，劳动力价格需以工资品的生产价格重新计算。

社会主义者认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相应的工资（如监工的）是从剩余价值中分得的。对应的消费品也有和奢侈品类似的性质，此处不再赘述。

在一般的经济学模型中，并不考虑奢侈品和工资品的区别，现实中也难以做绝对地划分，只有在某些人试图证明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时，我们才提出这点以说明其不成立。

如果认为利润全部投入再生产，考虑到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各部门等比例扩张，剩余产品与必要产品的结构完全相同，此时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

（二）所谓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

我们可以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实际上可分为很多部类，这里只讨论最简情况），以活劳动表示价值有：

$$V1+M1=S1$$

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购买一部类的产品：

$$V1+M1+V2+M2=S2$$

假定剩余价值率一定：

$$Ma/Va=Mb/Vb=e$$

假定两大部类工人消费结构相同，不考虑奢侈消费：

$$V1'=V1; V2'=V2$$

假定一部类资本周转时间为 T_1 ，二部类为 T_2 ，平均利润率为 r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有：

$$(1+r)^{T_1}V1=S1'$$

$$(1+r)^{T_1+T_2}V1+(1+r)^{T_2}V2=S2'$$

可是如果我们假定两部类整合在一起，总周转时间为 T 。并考虑到 $S2$ 是最终消费品：

$$(1+r)^T(V1+V2)=S2=S2$$

$$\text{所以 } (1+r)^T = (1+e)$$

因为 $T \neq T_1$ （若认为工资为一次全部预付，则 $T=T_1+T_2$ ），所以 $(1+r)^T \neq (1+e)$

即 $S1' \neq S1$ ，又有 $S2=S2'$ ，所以 $S1' + S2' \neq S1 + S2$ ，也就是总生产价格不等于总价值。

大家可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这个区别就在于 T 和 T_1 的区别。

它的经济意义是：在市场上同时出售的一部类和二部类产品，并不是同期的产品。我们知道，一部类产品总是对应将来出售的二部类产品。商品的价值只有到最终消费品（生产的目的）才完全实现。

也就是说，在考虑产业链分工时，总生产价格不等于总价值。

资本论中一般假定工资是预付的，这样总生产价格总是小于总价值，差额为 $r^T S1'$ 。但现实中工资是按期支付的，并且可能由工人垫付，因此总生产价格可能大于或小于总价值（不考虑极偶然的相等），取决于产业链整合的方式。

由此看来，百余年试图证明着两个命题的学者实际上是在“大战风车”，无法取得任何成果也在情理之中。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由于不理解马克思，无法指出“大战风车”的荒谬，而去“大战大战风车者”，亦颇为可笑。

三、超额利润

在讨论生产价格时，我们假定由于竞争所有利润率已经平均化，但现实中总有一些因素

阻碍资本流入，使得一些部门获得超额利润。

最常见的是对自然力（经济学中统称为土地）的占有形成的超额利润。对于同样的产品，较好的土地能节省人力，仿佛自然力等效为一份人力，而土地的所有者仿佛作为自然力的化身索取它的回报。由此产生一个不会因竞争被均分的超额利润，当投资者不是土地所有者时，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支付给土地所有者。

需注意，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土地，超额利润还是形成了，虽然没有地租被支付（相当于向自己支付）。

在考虑地租时，平均利润的意义已经和原来不同，不再是总利润的平均而是除去超额利润的平均，我们将其改称为一般利润。

（一）级差地租 I

我们以耕地为例讨论地租。级差地租 I 是静态讨论不同生产率的结果。

将已耕种的土地分为 A、B、C、D……若干个等级，A 级最差，依次由差到好。假定各级土地充分小，不考虑同级土地不同生产方法的情况。

设在单位面积 A 级土地上的投资为 K_a ，其余依次为 K_b 、 K_c 、 K_d ……

设单位面积 A 级土地的产量为 I_a ，其余依次为 I_b 、 I_c 、 I_d ……假定已经考虑产品优劣，较好的产品等于较多的产量。

一般利润率 r ：

则 A 级土地产品的生产价格 $P_a = (1+r)(K_a/I_a)$

设 x 为好于 A 级的任意土地，则 x 级土地产品的生产价格 $P_x = (1+r)(K_x/I_x)$

A 级土地的生产率最低，在竞争中处于濒临废弃的状态，因此认为最差土地不能获得超额利润，只能获得一般利润，市场价格由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决定（如果市场价格更低的话，经营 A 级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从而退出市场；如果 A 级也能获得超额利润，则更差土地会被耕种）。

即： $P = (1+r)(K_a/I_a)$

x 级土地上单位产量的超额利润为： $P - P_x = (1+r)(K_a/I_a - K_x/I_x)$

x 级土地单位面积的地租为： $I_x(P - P_x) = (1+r)[K_a(I_x/I_a) - K_x]$

（二）级差地租 II

级差地租 II 是考虑在土地上追加投资的情况，假定需求增加需要追加投资扩大产量。

设在各级土地上追加投资为 ΔK_a 、 ΔK_b 、 ΔK_c ……

设增加的产量为 ΔI_a 、 ΔI_b 、 ΔI_c ……

设 y 为包括 A 级在内任意土地。

若 $\max[(1+r)(\Delta K_x / \Delta I_x)] < (1+r)[(K_a + \Delta K_a)/(I_a + \Delta I_a)]$

则在其他土地上则在其他土地上追加投资有利且能满足需求，A 级土地被迫退出市场，市场价格由新的最差土地决定 $P = \max[(1+r)(\Delta K_x / \Delta I_x)]$

若 $(1+r)(\Delta K_a / \Delta I_a) < (1+r)[(K_a + \Delta K_a)/(I_a + \Delta I_a)](1+r)[(K_x + \Delta K_x)/(I_x + \Delta I_x)]$ 也就是 A 级土地由与追加投资被改良，则原先更好的土地排挤出市场；若非如此，则保持原有土地。

若 $\max[(1+r)(\Delta Ky/\Delta Iy)] > (1+r)[(Ka + \Delta Ka)/(Ia + \Delta Ia)]$

此时追加投资的生产价格低于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追加投资可能投在比 A 级土地更差的 A-级土地上。

市场价格不再由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决定，而改由追加投资的生产价格决定（在已有土地上追加投资生产率降低，相当于在更差土地上投资。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追加投资的生产价格，追加投资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从而不会有追加投资）。

$P = \max[(1+r)(\Delta Ky/\Delta Iy)]$ 。

此时 $P > Pa$ ，最差土地也获得超额利润，也有地租。

（三）建筑地段、矿山等地租

凡是自然力能被占有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自然力所有者都会以地租形式夺走超额利润。它们的决定方法和耕地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四）“地租”

讨论级差地租时我们假定资本能自由结合土地，从而生产价格最高的土地产品只能获得一般利润。但现实中存在产品的生产需要、法律甚至文化原因，资本不能自由结合土地，从而有不由土地好坏差别产生的超额利润。

通常的情况是垄断。垄断价格将高于一切生产价格，并且不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而取决于买者的欲望和购买力，以及垄断产品的可替代性（另一篇将讨论使用价值的可替代性问题，这里不再赘述）。当土地垄断作为生产垄断的基础，垄断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部分转化为地租。

（五）土地价格及其上升的趋势

土地能像其他商品一样交易，但交易的并不是等价物，而是地租（超额利润那部分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从而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

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自然力会趋向匮乏，决定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越来越高，地租有上升的趋势。但如果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大于土地产品需求的提升，这个趋势可能被抵消。

同时由于资本构成的上升，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这也并非绝对的趋势，资本论第三卷的章节安排造成了普遍的误解），而利息率取决于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因此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土地价格通常有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绝对的。

（六）超额利润的一般情况

生产率的差别不止来自对自然力的占有。技术壁垒可能产生超额利润，虽然技术是劳动产品（正如被开发的土地也是劳动产品）但在这里起的作用超出劳动产品。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使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下降（我们将在另一篇详细讨论这种情况），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但由于技术壁垒，新技术无法普及，使用新技术的部门的生产价格下降得比

市场价格更快，对新技术的占有（就像对自然力的占有那样）能获取一个超额利润。但是技术可能以低成本传播而无法被占有。并且与土地相反，技术的取得总是越发容易，因此若非不断投入保持技术领先，这种超额利润可能不长久。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规模效益或消费者信息不足导致的市场壁垒，也能取得类似对自然力占有产生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会随着追加投资不断加大，通常相应的行业形成垄断或寡头，但仍不如地租稳定，垄断可能被打破。

还有因为行业准入和贸易保护导致的超额利润，这部分相当于垄断地租。

超额利润是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看，一切投资者都可认为在经营“土地”，或以股权的形式占有一份“土地所有权”。

（七）过渡时期的政策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建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因此仍然存在超额利润的问题。例如，仍存在个人或集体土地所有权，公有（根据严格的定义，公有=全民所有，普遍流行的更改了的定义是为政治需要）土地经营也不能全部纳入统一的计划。

不受限制的商品经济会复活资本主义，超额利润也必须受到限制。

1. 土地：

全部地租归公。其中一种形式是收取足额的土地税（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税不是足额的，土地所有者仍能获得地租收益）。

2. 技术：

现实中的知识产权已经背离它的本意，由鼓励创造变成了鼓励投资，并成为进步的障碍。知识技术应对社会开放，同时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充分奖励其创造者。

3. 市场：

所有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情况必须对消费者公开（例如在价格中标明各项成本，每笔交易留档备案），禁止任何有误导或强制收看的广告。垄断企业的价格需由民主决定。

四、所谓小资产阶级

在左派话语中，小资产阶级是被混淆得罪严重的概念之一。

最常见的是以政治态度划分阶级的观点，限于口头上普遍承认的唯物史观，少有人公开明确这样提。但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混淆：各种带有反抗、异议性质又非社会主义的观点，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而不说明它和现实中的小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关系！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左派或多或少受过去宣传的影响，把无产阶级理想化为品德高尚并天然支持社会主义的“革命群众”。一切不符合心目中无产阶级特点的东西，自然被说成是非无产阶级的，甚至自利狭隘、贪小便宜、追求享乐等现实中见于不少工人的品质，也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或受小资影响的），将无产阶级打造成满足自己想象的神像。

这样，不从实际上的经济地位出发，而从表现出来的品质和观点出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无人不小资，左派只能去寻找“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即使这样，也和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小资也成为左派论战中信手拈来的帽子。

（一）小资产阶级的本来意义

我们要正确地分析阶级，就必须回到阶级的本来意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一定地位的人

的集团。

1.传统小资

在传统意义上的小资与现代一般理解的小资大有不同，指的就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店主等独立的小生产者。马克思等经典作者都是在这个意义提小资这个概念的，左派在引述经典作家对小资产阶级的评价时却常不注意这点，造成混淆。

2.现代小资

现代社会仍然存在传统小资的职业，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不同。现代的平均资本构成远高于过去，小资的资本构成偏低，因此作为劳动者的小资创造的价值，很多在市场中被大资拿走。小资在经济上不一定优于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其中生产力较低者（比如包产后实际上的小农）收入会比城市无产者的更低。

在经营上小资也越来越处于受支配地位，可能作为大资本的附庸，比如农户需要和大企业签订合同保证供货，比如品牌加盟店，比如依赖电子商务平台的小店，包括原先独立的自由职业（比如艺术创作）在商业化浪潮中也越来越依赖资本。

此外，由于无产阶级地位改善和现代分工，原先标准的无产阶级也有了掌握生产资料的可能。出现了一批既是雇佣劳动者，又占有生产资料的新型“小资”，他们既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又作为剩余价值占有者，常常表现出既反对大私有又维护小私有的立场。这类人在现代话语中被称为小资（也有人使用中产这个词，但“中产”提法更加使概念模糊），也与历史上小资的经济地位相近。

基于前面两者，我们不能固守原先小生产者的定义，而应当实际分析有资产收入的劳动者生产关系中的地位。

（二）对资产收入的分析

所谓资产收入即是由占有旧财富而获得分配的新财富。

除了小生产的利润外，劳动者可能有的资产收入一般来自股权、债权、地产。

红利收入和证券增值（排除波动情况），属于资产收入。

这里要指出，住房虽然是生活资料，但是住房相应的土地（其位置是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是作为在当地工作的条件，即作为生产资料的。房租的主要部分是地租，“工资”在扣除了地租之后才是真正的劳动收入，而自有住房者的“工资”中包含了这部分地租收入。

在借贷消费盛行的今天，劳动者往往负有债务，产生的利息作为负收入从资产收入中扣除（正如获得的利息作为资产收入），总的资产收入可能是负数。

（三）对劳动的分析

这又涉及所谓生产性的问题。现代的非生产性工作通常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相应的工作者亦常倾向于资产阶级。

通俗话语中被认为是小资的工作：

1.设计和技术工作

这部分工作直接参与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相应的工作者是标准的劳动者。

2.经营管理工作

这部分工作就配置资源协调工作，有生产性的成分，但与普遍观点相反，越到高层其非生产性的成分——与创造财富无关，而主要是帮助所服务的资本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越多。

3.广告和市场工作

市场部门的雇员经济地位上接近无产阶级，但其工作主要是非生产性的。

（四）政府的影响

现代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对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有重要影响。比如货币和土地政策，直接影响各种资产收益；税制和税率，以及财政使用的方向，决定负担和收益。各阶级的负担收益并不相同。政治上占优的人群通常能借此提升经济地位，但不如财产权直接，要取决于法律和文化等具体情况。

（五）“资产阶级权利”问题

复杂劳动所需的教育和训练，对生产来说仍是过去的劳动，由此获得的财富分配权，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复杂劳动的概念是变化的，普遍使用的复杂劳动使得逐渐变为普通的劳动。劳动能力较强的劳动者，本身就认为是有产者，并且他们很容易也占有一份生产资料。但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必须承认此种资产阶级权利，因此单纯的劳动能力强收入可以认为不是小资。

（六）知识分子

这里知识分子特指不直接参与生产，与各阶级相对独立的群体。在左派话语中，常将知识分子与小资混同，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不同于小资，其思想的独立性也远强于小资。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群体与各阶级的关系也不相同。

1. 科学技术研究者

这类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在物质和思想上都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其中部分人亦能感受到资本主义造成的异化，可能倾向于批判资本主义。

2. 上层建筑生产者

这类人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多数文史类学者以及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工具——法律和经济类学者，某些艺术家，媒体人，等等。这类人作为阶级统治（尤其是意识形态统治）的一部分存在，通常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但也有作为知识分子独立的一面。此外，现代的上层建筑生产，向职业化方向发展，其中基层雇员的地位亦近似无产阶级。

3. 教师

学校是继教会之后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生产地，但是现代学校更多被用来培训知识型劳动者。教师亦更倾向于普通劳动者。在商业培训机构中，教师更是直接作为雇佣劳动者。

4. 学生

将学生称为小资（左翼学生亦常自称小资说要向工农学习之类）是不准确的，学生是各阶级的后备军（对现代教育，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只是在心理上常不成熟。

（七）无产小资化和小资无产化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定义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也存在有产的可能。越是发达的社会，越不存在“纯粹”的无产阶级。拥有少量资产会增加维护私产的保守性，更容易接受主流灌输的私有制偏见。但我们也同时看到，即使成为了小有产者，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资产收入非常有限且不稳定，劳动者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经营自己

的资产，基本不可能改变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的幻想破灭可能成为反思乃至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因。

而现代小生产者，在高度发达的市场中，事实上已经并入大生产，很大程度上受相关大资本支配，地位亦趋近于雇佣劳动者。

（八）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首先应当明确，资本主义日趋腐朽是相对于日渐发达的生产力而言，并不是要发生社会倒退，必须抛弃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一厢情愿。

其次，不能指望“纯粹”的无产阶级来“净化”工人运动，小资化的无产阶级就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工人群体，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无产化的小资，相对于传统小资，亦更倾向于社会主义。

将来的革命，不是生活不下去的革命，而是要生活得更好的革命。小资化的无产阶级，虽然不复“光脚不怕穿鞋”的勇气，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更高自由有更大追求。知识化的劳动者，更容易受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但也更容易理解社会主义。

我们将来要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与过去革命者完全不同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相信自己的使命是改造社会——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原文链接：

一、所谓生产性和非生产性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19>

二、所谓价值转型中的总量二相等命题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21>

三、超额利润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30>

四、所谓小资产阶级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735>

YCA 学习活动讨论总结

作者：黄铭

“旧的社会主义，虽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果，但不能说明它，因之也就不能克服它。”——恩格斯，《反杜林论》

为着说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有必要了解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那些经济理论——主要是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泛左翼的同志们往往对劳动价值论了解的很充分，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却很少去研究。这样，在批判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时候，只列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做法完全可以被反过来，结果任何一者无法否定另一者。

那么我们必须更加进一步，不应只是看到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两个平行的理论所以无法用其中之一否定另一者；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试图告诉听众，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解释的那些东西，用劳动价值论同样能解释——这样边际效用价值论至少不强于劳动价值论。

我们说到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认为对某物的消费增多会引起它的边际效用递减……呐，用高素质高品质右派青年曾经给过的一个模型来说吧——生产桔子的人手里有大量的桔子，如果是他自己来消费的话，他吃第一个的时候会觉得很美味，第二个就差些，吃下一斤以后已经觉得不想再吃了——他大量拥有的桔子对于他而言的边际效用是低下的。那么这时候来了个生产麻布的人，对这个生产桔子的人而言，他手里没有麻布，他如果想要麻布，可以用他手里的桔子来换……那么以怎么样的一个比例交换合适呢？麻布对于他是稀缺的，边际效用发生的递减不如桔子那么严重，对于他而言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所以他愿意用较多的桔子去换较少的麻布……嗯，但愿我的解释是对的。

那么劳动价值论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高中的政治教科书的说法——对，就是那个熟悉的等式——10 斤桔子=1 丈麻布，在这里等号意味着什么呢？是说 10 斤桔子的使用价值和 1 丈麻布相等吗？教科书的说法是“不能”，理由是桔子和麻布的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东西，因此不能进行量的比较。那么这个等号的背后是什么呢？

用通俗一点的说法，这 10 斤桔子可以去换的东西（可以写在“10 斤桔子=”后面的东西）不会只有 1 丈麻布，还可以是 1 件上衣或 2 张电影票或 1 把斧头或 5 斤羊肉或 1 盎司银——诸如此类的各种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在考察这个等号的时候，就必须把等号连接起来的使用价值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是能满足吃还是能满足穿还是能满足臭美的虚荣心——统统忽略掉，而只有把它们化为某种同质的东西才可以说它们相等。套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例子——如果说乙醇=甲醚，我必须忽略掉乙醇和甲醚在物理化学性质上的不同，而只考虑组成它们的各种元素比例（C:H:O=2:6:1），在这一意义上才能说它们相等。

而劳动价值论认为，根据商品的二重性（参见商品的定义），如果忽略它们的使用价值的不同，那么它们只能剩下一种属性，就是劳动产品。而且我们说到这个“劳动”时，还必须忽略掉生产出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形态的不同——譬如“种和收”是生产出桔子的那种劳动形态，“纺织”是生产出麻布的那种劳动形态；我们何以说“种和收”=“纺织”呢？如同我们忽略掉桔子和麻布的使用价值一样，生产出这种使用价值的劳动形态也应被忽略。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劳动形态，那么“种和收”与“纺织”还剩下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会造成人的体力及脑力的耗费。无论是果农还是纺织工人在干了一天的活以后总是会累的（呃，那位同志，机器人的问题我们以后挑时间再谈好么）。这种对体力及脑力的耗费，便是我们

要寻找的隐藏在“10斤桔子=1丈麻布”的等号背后的那种“同质”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价值被归结为必要劳动时间。（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什么的请自行参考教科书吧。）

——好，那么问题来了。劳动时间是隐藏在这个等号背后的唯一同质的东西么？同样是以乙醇=甲醚这个例子，我说之所以用等号连接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元素组成比相同，保罗·史密斯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他会认为是因为这两种物质的分子量相同，所以可以用等号连接。那么隐藏在“10斤桔子=1丈麻布”背后的“同质的东西”，除了劳动时间是不是还可以有点别的？

有一点微观经济学入门知识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无差别曲线——我们考虑两种不同的商品，比如同样是桔子和麻布，桔子的数量用X表示，麻布的数量用Y表示，然后建立一个XOY坐标系……然后我们可以总可以画出这样的一条曲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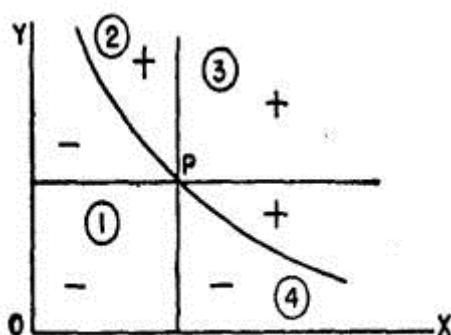


图 2.15

我们且不去管那些数字和正负号，只看这条自左上到右下的曲线就好。假设P点对应的是(100, 10)，即这个人目前拥有100斤桔子和10丈麻布，然后我们沿着曲线从P点往右下走那么一点点……譬如说走到了(110, 9.2)，即这个人目前拥有110斤桔子和9丈2尺麻布，那么我们说，相比在P点的情况，他手里增加了10斤桔子，减少了8尺麻布，但是他拥有的“满足感”并没有变，或曰，效用期望值是相同的。

是的——看过上面有关劳动价值论的同学会说，桔子带给人的是舌头和胃的满足，麻布带给人的是皮肤的满足，这两种满足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微观经济学的教师们或许也会这样教导我们：你应该把带来满足的具体形式，无论是好吃还是好看还是温暖还是馨香统统忽略掉，只留下一个一般的“满足感”，才能将它们作为某种“同质的”东西相加。

OK，那么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具有“同质性”的东西嘛，即商品带给人的一般的“满足感”，或曰，效用。

然后我们回到上面的图，假如在P点做曲线的切线，会得到什么呢……瞧，如果我们求出P点曲线的斜率是0.1，即 $y/x=1/10$ ，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上我可以用1丈麻布换10斤桔子……那么往右下一些的点呢？从曲线上可以看出那里的斜率必然小于1/10，譬如说，1/11，也就是说在那里（有更多的桔子和更少的麻布）要像换同等数量的麻布，就必须要用更多的桔子……瞧，随着桔子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从而其价值）是递减的，多么完美啊！

唉，那么就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了：用效用来定义价值有什么不好？或者说，能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效用价值论？

回到交换的场景。尽管买者对于他要买的商品所带给他的效用可能了然于胸（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未必如此），他也不能就由这个商品带给他的效用来得出商品的价格。只有当卖者标明了商品的价格的时候，他才能知道自己要用多少他所拥有的东西来换，并评价这个出价是高还是低——商品的最后价格并不是由它对买者的效用大小决定的（因为商品决不会先天地认得自己的买者是谁），而是卖家竞争的结果。那么众多卖家面对买家展开竞争不断地提

出越来越低的价格……会不会为了让商品出手而赔的血本无归呢？不会，卖家对于自己的要出售商品是了解的，他知道自己生产这个东西花费了多少成本。如果自己定出的价格低到了这个成本线以下时，他就要在心里犯嘀咕了。卖家不是傻瓜，他当然希望能赚到，至少也要收回成本……于是众多的卖家通过竞争给出的这个最后的售价，总是和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脱不开的关系。

那么买家呢？买家之间不是也存在竞争么？为了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他们不是会竞相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么？但是买家的竞争也不会出现花一架波音 747 的价钱只买一两米的荒谬情形，因为总还有个叫“买不起”的令人恨的牙痒痒的词语。是的，买不起！——只要考虑到在交换的时候买者同时也是另一个角度下的卖者，那么买者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和上面讲的卖者之间的竞争有相似之处。买者在让渡自己持有的商品的时候，对自己这些商品的成本也是心知肚明的，当他出价过高——用过多的自己的商品去换别人的商品——的时候，实际上对他也存在“卖得太贱了”这样的嘀咕的。在以物易物的时代由于买天然地同时也是卖，这样的关系是相当显然的；货币的出现使得买和卖可以在时空上分离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关系，但并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实质。

如果承认这一对于个人消费提出的“无差别曲线”有其合理性的话，不妨将其扩展到社会的层面。整个社会对于不同种类的产品也会有一个效用的评价，从而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需求。譬如，夏天到了，为了满足我们躲避酷暑的需求，用于驱动电扇、空调、冰柜等制冷设备的电力会显得比夏天未到时更加地有“效用”，于是整个社会对于电力的需求也会增加。

对电力的需求增加意味着什么呢？那么我们将投入更多的物力和人力去生产“电力”这一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依据自己的需求自动地调节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那么我们增加了投资之后，来看看生产出同样多的电力，耗费的劳动时间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说到这里便会让我们想起规模效应。大规模的生产可以节省劳动时间——但这句话的成立要受到很多的限定条件，比如自然条件的限制——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电力需要更多的电煤（是的，这意味着社会对于煤炭的“效用评价”也升高了），于是我们有必要在那些易开采的煤炭资源之外，额外增加那些难开采的煤炭的开采量。在同等的技术条件下，从更深的地层开采出煤炭总要比从浅一些的地层开采出煤炭耗费更多的劳动时间。又比如人力条件的限制——一定条件下单个工人所能驾驭的机器和材料数量总是有限的，为了扩大生产还需要额外招募一批工人。但是新招募来的这批工人，其工作的熟练程度不如那些已经工作了相当时间的老工人，于是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生产出单位产品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被延长了。或者我们可以在这批新工人上岗之前先对他们进行培训以使其熟练程度达到和老工人同样的水平，但培训本身也需要时间，这相当于不仅“预支”了这些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加上了进行培训的教员的劳动时间，结果等价于生产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延长。

那么根据劳动价值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意味着商品价值的增加——表现到市场上是商品的价格比过去更高。当然，价值的变动引起价格的变动的规律不会这么简单。在价值规律充分发展的地方，也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内在矛盾使得所有商品不以其价值出售（这不是波动）而以其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类似西经的包含机会成本的成本）出售。再加上地租规律，才是我们能和西方经济学对话的长期价格规律。再加上引入弹性概念（需要揭开其障眼法，做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才是一般的价格。至于这些，则是以后讨论才能涉及的内容了。我们这里只是指出长期的价格平衡点的变化要用价值变化来说明。

《资本论》中谈及级差地租的时候也采用了类似的推导过程。随着社会对于粮食的需求增长，农场主会向土地上追加投资，这时就有可能会有一部分更加贫瘠的土地（过去并未开

发的)被开垦,用来生产粮食。这更为贫瘠的土地在同等条件下产出的粮食当然不如一般的土地,倘使一般的土地上小麦每年亩产800斤,贫瘠的土地上每年的亩产可能只有600斤。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在贫瘠的土地上要产出同等的产品必须耗费更多的劳动时间……瞧,这样小麦的价值也上升了。

以上这些推导有一个前提,即最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已经处于“生产上的饱和状态”,为了增加产量,必须动用那些较差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一前提与现实情况还是比较相符的。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因果链条:社会对某种商品的效用评价升高—社会对其需求增加—生产这种商品的投资增加,这种追加投资在某些情况下是会增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依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增加—商品价格较过去升高。

而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那种经济学更多地只是作出一种现象上的描述:“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愈旺盛,则它的价格一般也愈高。”上面那条因果链条中的许多环节(尤其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那一环节)被省去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未尝不能解释效用价值论所解释的问题,而且可以更深刻地解释它。(嗯,我知道会有人吐槽说这不是更深刻而是没有必要地多绕弯子的,所以先把话说在这里了。)

有没有这样的因果链条,即“社会对某种商品的效用评价升高—社会对其需求增加—生产这种商品的投资增加,这种追加投资在减少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依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减少—商品价格较过去降低”呢?有,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规模化效应,如果在自然条件和人力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会发生的,比如电子产品即是如此,当一个新玩意出来的时候,曲高和寡,价格总在高位徘徊,但随着社会上对它的需求不断增加,用于生产它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规模效应使得生产同样多的产品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少,其价格也就不断降低。

原文链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68>

国际共运遭遇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

作者：左派星火

前言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 1917 年成为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取得胜利：苏联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共产党人在 14 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的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中屡次落败，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已显败势。短短半个世纪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用了两百年才获得的胜利，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这时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但是，就在人类这个伟大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场始料未及的历史悲剧发生了：1989 年秋冬，东欧 8 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一个个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之后不到两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蒙古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从 14 个减少为 4 个，社会主义失去了 251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4.22 亿人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后又骤然遭遇了空前的挫折。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失败：拥有强大实力的集权统治在外无入侵，内无内战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有效的暴力抵抗就安安静静的失去了权力。

在这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甚至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遭到了围攻和谩骂，右派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声称“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这是对国际共运辉煌历史的无视，对人类历史的歪曲，是知识份子良知的泯灭，更是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践踏。

苏东剧变发生之后，我们应该冷静认真的思考其中的原因，并且应该将 1917 年以来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以往的制度变革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相对比，来分辨是制度本身的成功还是客观因素的作用。

本文概括出了三个非制度性的根本原因，以说明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且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论述了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制度变革的影响，提出了制度变革的交替性和地理边缘性，然后通过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对比，说明科技进步打破了地理边缘性造成社会主义革命遭受了旧制度发达国家的最有效的干涉；第二部分通过对共产国际解散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分析，论述了民族利益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所导致的不团结；第三部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例，批判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倾向。最后一个部分论述了以上三个失败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和如何共同作用导致失败的。

一、制度变革的交替性和地理边缘性

十月革命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爆发绝不是偶然的。那种认为“俄国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①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论战中区分了“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具备与革命时机是否已经到来”，②但这还不够，恰恰相反俄国作为一个制度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才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前提。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社会主义要经由发达的资本主义，但这只是说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条件，而在革命实践中何时发动革命，何时建立无产阶级

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

本文提出“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制度变革的交替性”或者简单说“新制度首先在旧制度不发达的地方取得胜利”。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世界上通行的或主流的社会制度，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人为因素）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制度健全完善，生产力发达经济文化先进，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有些地方制度弊端明显，生产力和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处于边缘地位。新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将在旧制度落后的地区战胜旧制度的统治阶级，获得政权来建设新的社会，再通过新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在科技和经济上追赶和超越发达地区，最后向旧制度的中心地区挑战摧毁全世界范围内的旧制度，使新制度成为通行的或主流的社会制度。这样旧制度落后的边缘就成了新制度发达的中心，这就是制度变革的交替性。

新制度之所以要在旧制度落后而不是发达的地区获得胜利是因为：一、与发达地区相比，由于它的旧制度存在先天缺陷，坚持旧制度很难摆脱贫落地位，所以穷则思变，社会制度有其变革的内在动力，而完善的旧制度给制度变革增加了惰性；二、经济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相对困苦，阶级矛盾容易激化，政权的易主往往是借助人民的力量，而吃饱穿暖的老百姓是不会为新制度去冒险的；三、发达地区作为旧制度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力量强大，对革命运动可以进行有效镇压，革命难度较大。

在现实中，制度变革的交替性也得到了证明。资本主义也是在封建制度落后的西欧首先获得胜利，然后利用先进的制度在经济和科技上超越了封建制度发达的东方，通过暴力和战争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主义化的。与中国相比，西欧的封建社会明显处于封建社会的边缘，而中国则处于中心地位，有着发达的经济和完善的封建制度。中世纪的西欧在经济和生产力上一直落后于中国。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朝初年。在制度上，中国的封建制度更是臻于致治，而“西欧盛行的是一种比较落后的和低效率的封建主义”^③。中国的完善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而西欧的封建割据则导致了诸侯间的争斗；中国的科举制度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吸收了知识分子，而西欧的世袭制则造成了官僚层的无能和知识分子的叛逆；中国通过纳贡制度维持了与邻国的和睦关系，而西欧则陷于三十年战争和英法百年大战的厮杀中。而恰恰是封建主义的失败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制造了条件，相反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反而造成了它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落后和屈辱。当西欧因封建制度的衰落，穷则思变，进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中国发达封建制度带来的繁荣稳定也就变成了阻碍制度变革的惰性，成了“可咒诅的东西”^④。另外中国的统治者有着运转高效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专业化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式的革命看起来十分幼稚可笑，像法国大革命那种巴黎市民暴动就可以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的事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清朝嘉庆年间北京曾有一次起义进攻紫禁城但被迅速镇压，嘉庆皇帝为此作诗曰：“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这种方式和规模的起义在中国只有先秦时期的“国人暴动”取得过成果。由此可见西方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统治能力的差距。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兴起、发展以至胜利而不是在中国就可以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了。

在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述了“制度变革的交替性”后，本文着重要提出的是：新制度在一个地区的胜利需要这个地区不但具备制度的边缘性，还要具备地理的边缘性。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但要有落后的旧制度，还要远离旧制度发达强大的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制度在萌芽阶段免遭被扼杀的厄运。毕竟一个落后的国家利用新制度的优越性赶超发达国家需要时间，巨人降生时也是弱小的。而那些发达国家往往能够意识到这种新制度迟早有一天会来挑战自己或者鼓动起本国的革命威胁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加以干涉。地理距离是削弱这种干涉的最传统和最有效的因素，其次是历史机遇，如发达国家自身出现危机、内战或卷入世界大战。

西欧在元朝灭亡后就与强大的中国隔绝了。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地理大发现，对于当

时中国的科技水平来说，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不可能对西欧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干涉。而在西欧，最先取得胜利的影响较大的英国革命进一步说明了地理边缘性不仅在全球范围而且在一定区域内仍然发挥作用。英国远离欧洲大陆，偏居一岛，处于欧洲西端边缘，所以革命中受欧洲大陆封建势力干涉很小。相比之下，位于欧洲大陆的法国就很不幸了，处于西班牙、奥地利等封建国家的包围中，这使法国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中最艰苦和最为残酷的革命。而美国则是地理边缘性的最大受益者，它远离亚欧大陆，远离世界大战的战场，才得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所以如何削弱和抵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就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取得胜利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发展的时机，制度的优越性也无法发挥作用，超越和战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更无从谈起。

在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半段，即二战结束前，充分利用了地理边缘性和历史机遇两个因素。俄国处于欧洲的东端，而中国则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帝国主义的混战中得到政权的。

但是在二战以后，科技的飞速进步对传统的地理意义提出了挑战。在军事上，航空母舰、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以及军事侦察卫星的使用，打破了地理边缘性，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跨洲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打击更为便利和频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证明。在经济上，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封锁或经济渗透。而美国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在欧洲组织“北约”与苏联为首的“华约”构成了对峙局面，又在太平洋两岸构造了对中国的包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理边缘性被彻底打破了，他们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根本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明朝的百万禁军可以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跨过大洋去镇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是只能坐以待毙，连两大阵营的对峙都不可能形成吗？

地理边缘性被打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面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尽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胜利挫败了美国的军事侵略，但战争干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军备竞赛拖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在 80 年代经济陷入衰退，而中国和朝鲜也由于巨大的军事科技投入导致了经济困难和大饥荒。有人指责朝鲜的饥荒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这是很荒谬的。朝鲜能够与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对峙几十年而且研制出了可以打到美国西海岸的导弹，其制度优越性所带来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的制度是不先进的，它根本无法维持这么久。朝鲜的饥荒是西方经济制裁和为了对抗美国军事威胁所造成的。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因为它的新制度不能容于旧制度的资本主义世界。

地理边缘性被打破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长期的军事对峙，使社会主义政权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权要生存下去，就只有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稍微缓和一些的集权领导，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实现。而这种状况给了反共分子诬蔑社会主义的口实，说社会主义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特别是极端情况下，如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严重丑化。而实际上在外来军事压力强大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难于避免的，这与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关系。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同样由于巨大的外部军事威胁。出现了雅各宾的恐怖专政甚至拿破仑独裁统治。因为在对抗强大的外敌时，专制统治要比民主政治有力得多。新制度、新政权只有在彻底战胜旧制度后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所以地理边缘性的打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最根本障碍，它使“制度变革的交替性”作用发生了紊乱，使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扼杀或畸形发展的危险。而这一障碍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是科技进步的一个后果。

二、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的矛盾

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就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共产主义运动无论从它世界大同的理想还是从它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看，它都是具有先天的国际意义的。严格地说没有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的团结统一，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一国内都难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是各国共产党又代表着本国的民族利益，无产阶级革命往往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体的。这就使共产党人不能真正的抛弃民族主义，统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各国共产党的真正团结统一应该从共产国际算起。因为第一国际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组织，而只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而第二国际则只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联合组织，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国政党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需要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的是真正的统一，而不是形式上的团结。第二国际的“独立自主”原则虽然动听，但不能有效地统一领导各国共产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更无力协调各国工人阶级由于民族冲突所引发的矛盾最终破产。在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问题上，那种“和稀泥”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列宁和斯大林对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作出过明确的否定评价，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又出现了对其的肯定评价。这实际是为迎合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苏联的政治需要。本文明确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最终需要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1919 年建立的共产国际，则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原则的世界共产党，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党是它的支部，第三国际要求严格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服从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对不执行决议或违反第三国际章程的党和成员，第三国际将可以绳之以纪律，直至开除出第三国际；各支部的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同意方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由第三国际执委会批准；执委会有权指定自己的特派代表参加支部的一切会议。总之，第三国际执委会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当时苏联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又是一个大党，列宁、斯大林又是公认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因此，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处于实际领导地位、支配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执委会的全部工作，其他共产党则处于不平等的从属地位。^⑤与对第二国际组织形式的‘平反’一样，第三国际的集中领导和苏共的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共产党人在东欧 8 国和中国的胜利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无可争辩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的存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意义。

有观点认为：在帝国主义还未走到绝境时，在它还有相当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时，大多东欧国家夺取革命胜利的条件尚不具备，想依靠一个高度集中领导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来实现世界革命和建立“国际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⑥但共产国际解散的背景却证明，共产国际不能存在的原因不是各国不具备革命胜利的条件，而恰恰相反，是 1943 年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转折，东欧和中国的共产党得到了壮大，有望获得政权或参与领导政权，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执政党，这与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地位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实际上各国共产党越强大，离革命胜利越近，离国家政权越近，其民族性的一面就越强，也就越难统一到一起。

民族利益是导致共产国际解散的唯一原因和各国共产党统一的唯一障碍。其它一切理由都只是粉饰或攻击之辞。1943 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的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中是这样解释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的。“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式已经

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⑦可是像苏联、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内各地区的情况也不相同，甚至比东欧几个国家的差距还大，可仍然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共产国际就不可以一面坚持集中领导，一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呢？实际上《提议书》中的理由是在回避真正的本质的矛盾，在避免承认各国共产党因各自代表的民族利益而产生的“各自为政”情绪。同时那种通过指责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造成了一些国家革命遭到挫折来论证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论调更是荒谬的攻击。领导水平和组织形式是两回事，中共中央在 1931 年后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做出过错误的指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可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认为中共中央应该解散呢？应该代之以更能适应地方特点的相互独立的各地区党组织呢？可见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斯大林在就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答路透社记者问时的讲话中明确的指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真正原因：“（1）它揭破了希特勒匪徒的谎言，这谎言就是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并将他们‘布尔什维克化’。（2）它揭破了劳工运动中共产主义敌人的诽谤，这种诽谤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是为奉外来的命令。（3）它便利于诸爱好自由国家中爱国者，把各国进步力量（不管其党派及宗教信仰如何），联合在一个单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中，把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开展起来。它便利于一切国家爱国者把所有爱好自由人民联合在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中的工作，以便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将来组织基于平等的各国亲善联合扫清了道路。”其实这都是在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国共产党首先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能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民族利益，不能出让主权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最为一针见血的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⑧

共产国际的解散由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各支部都未提出异议的，甚至处于领导地位的苏共也支持这一决定，所以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不良后果，也没有破坏各国共产党的团结。但是随着东欧 8 国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事业以及国家主权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国际形势越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这种矛盾也就表现的越尖锐，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一报告无论从自由、民主、法治价值上如何值得歌颂，但是，由于它引爆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积怨，破坏了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都是不可饶恕的。首先，这一报告在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客观上也否定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造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各行其是，群龙无首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借口，互相攻击指责，使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致命的一击就是中苏关系破裂。60 年代末和整个 70 年代，美苏争霸的局面越来越有利于苏联，可以预见如果此时中苏关系能如 50 年代一样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就指日可待了。但是 60 年代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甚至在美苏争霸较为关键的 70 年代末，中国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虑，把自己这枚砝码加在了美国一边，中美关系的改善，使美国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本已向苏联倾斜的天秤，又回到了平衡状态，这样苏联永远的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在以后的平衡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

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是其自身必然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个因素，加剧了这一矛盾。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有着贫穷落后，倍受欺凌，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历史，所以民族意识过于敏感。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自不必言，以最具反苏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波兰为例，前者曾长期被奥地利吞并，后者多次遭遇被瓜分亡国的命运。在这些国家里，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远比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敏感得多。无论为了什么目的，出让民族利益的行为都不可能被人民接受，甚至遭万人唾骂，即便

毛泽东这样具有极高威望的伟人也不敢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事实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使反共分子获得了指责共产党“卖国”的口实。第二，共产党人在发动人民的宣传过程中，过分地利用超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论证自己的正义性，结果使共产主义运动背上了完全不必要的道义负担，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须知道，政治无道德，是不择手段的。资产阶级所谓的为了自由民主的革命，实际上充斥着殖民扩张、奴隶贸易、肮脏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外镇压、对外侵略、相互勾结。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阶级推翻阶级的暴力行动，要想取得胜利就不可能按照超阶级的道德和正义行事。它必然需要暴力革命、红色恐怖、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内镇压反革命分子，对外打击反共势力。无产阶级革命是暴力血腥的而不是浪漫和粉红的。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也一样，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那种理想化的“同志加兄弟”“完全平等”“互不干涉”的，更不可能“群而不党”。苏联对威胁自身安全和背弃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军事行动，从共产主义事业的立场上看，是完全正当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一贯的“家长作风”才导致了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第三，苏联、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存在。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讲，这本来应该是好事，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由此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局面。中国即便不能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但至少有实力“另起炉灶”。再加上两国绵延 2000 哩长的边境线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愈发刺激了两国的对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指责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因为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取舍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坚持民族利益会破坏各国共产党的统一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但另一方面放弃民族利益，各国共产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同样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本文是在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对各国共产党超越民族国家统一起来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对此的阻碍作用。这一矛盾是国际共运的“瓶劲”，就像一根一头钉死在地面上的绳子一样拴住了共产主义运动，它越向前迈进，距离胜利越近，这条绳子也就绷得越紧。

三、资产阶级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倾向的存在

在我们认识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和它与民族利益的纠葛后，我们应该想想作为这一运动领导者的共产党本身是否具有某些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

首先我们从中国共产党谈起。一提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不能不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提到“民主”“科学”这两大口号。

“民主”“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位“先生”启蒙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号召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去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确实有功于中国。但后来同样推崇过两位“先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使中国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出现的其它思想一样，都是两位“先生”带来的，但又并非两位“先生”的初衷。这就使“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复杂的关系，它们的作用已不完全是积极的了，而且从这场革命的前途看，它们在促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现的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孕育过程中就具有了先天的缺陷。

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激励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方面认识到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相信没有阶级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更大的民主，另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病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本着“科学”的精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更为科学的救国道路，于是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而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就决定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方面很不彻底，中国马克

思主义运动内部包括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进而影响了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它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就是“民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科学”导致的实用主义倾向。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为了追求“民主”，他们虽然认识到了平等与民主的联系，但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主的阶级性，因而他们向往的平等仍带有资本主义的博爱观念，他们还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仍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民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认识到清政府衰败、帝国主义入侵条件下，人民利益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利益的深刻对立是中国灾难的根源。而民主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仍然把“民主”当作目的而不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和衡量社会是否完善的标准，还没有把无产阶级利益当作价值追求。

与资本阶级价值观未被完全去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被完全视为一种信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抱着一定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它视为科学的或仅是有用的，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救国方法。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敏锐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本质缺陷，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同样以实用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这一论战中站在了胡适一边，足见实用主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倾向”的存在是无产阶级政党致命的先天缺陷，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隐患，前者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相冲突，造成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混乱，信仰不纯；后者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产生动摇和怀疑。二者相互作用就可以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退化为社会民主党或者崩溃。

更为严重的是这两大缺陷不是只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而是各国共产党普遍具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以外，都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按照苏联的或者说是斯大林的意志，依靠苏联红军的军事控制建立起来的，是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左派力量和共产党人与中国共产党相比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而且更具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也必须接受的、符合自己利益的、有帮助的工具。所以在这些政党中“实用主义倾向”非常严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依赖于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当苏联陷入危机时，社会主义者成为了“无用的”、“过时的”了。另外在这些国家和政党内，纯粹的共产主义也没有获得绝对优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非常强烈，甚至共产党人必须迎合这些偏好。例如：斯大林在被问起“波兰的宪法”是否将是“共产主义的宪法”时明确表示：“当然不是。波兰必须有民主的宪法，私人所有制和自由的经济生活必须保留。”⑨在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45年10月捷共尚不愿意超出“国家民主”纲领的范围或者“伤害中产阶级政党的感情”。⑩而德国更不用说，这是一个具有悠久社会民主党和议会革命传统的国家。

那么，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又怎么样呢？俄国由于与中国有某些相似的历史背景，所以苏共同样存在着上述两点缺陷。而且苏联的解体从思想信仰角度说就是这两大缺陷相继发难的结束。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有着强烈的民主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前者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提出为表现，后者以推行私有化、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为表现，二者最终使其背叛苏共和马克思主义，苏联也由于上层的背叛最终解体。

四、三个根本原因的联系

本文通过前面的论述已经指出了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遭遇重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即：由于科技进步打破地理边缘性所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强大干涉，由于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裂以及共产党本身存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

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三个原因相继发生作用的结果。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有效的遏制，把社会主义国家拖入了对峙和“冷战”，干扰了他们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但即便如此，苏联和中国还是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发展了起来，在70年代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战略优势，胜利近在咫尺，可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断送了大好局面，也使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取胜无望。相反，当资本主义取得优势的时候，共产党自身的缺陷又使其内部出现了思想混乱和对马克思主义怀疑放弃，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最终背叛社会主义，转而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原因并不是孤立的，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资本主义强国的干涉是最主要的原因。它的存在是后两者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像二百年前资本主义的萌芽远离东方一样远离西方，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了。另外资本主义的“一边打一边拉”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南斯拉夫为了得到西方的援助曾经谴责过北朝鲜侵略南朝鲜。而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抵制干涉长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无法满足那些对自由民主的偏好，引起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渴望。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瓶劲”，而且国际形势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间出于自身利益的矛盾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把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论战，相互攻击对方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和争取民族利益的可能随心所欲的工具。这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党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励。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隐患。它具有强烈的两面性，对共产主义运动可以锦上添花，也可以釜底抽薪。在社会主义蒸蒸日上时，这两点缺陷不但不产生危害，反而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广泛的基础，赢得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当社会主义面临危机时，它们就成为了压垮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实用主义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之道，当作民族主义的工具，这就导致在共产主义事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出现民族利益至上，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局面。

结束语

本文在指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的同时，也得出了下面两个结论：第一、由于这三个原因的存在，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以往的制度变革所没有遇到过的巨大困难，这不但导致了上个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还将继续困扰幸存下来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这三个根本原因都是非制度性的，本文实际上驳斥了以苏东剧变为论据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攻击，从反面论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只是暂时的挫折。苏东剧变并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本质，也不能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并且只要有人力图用合理的、公正的社会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只要无产阶级不甘于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受剥削的地位，共产主义事业就将继续进行下去。

注释：

- ①周尚文 叶书宗 王斯德:《苏联兴亡史》1993年版第27页
- ②周尚文 叶书宗 王斯德:《苏联兴亡史》1993年版第28页
- ③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1997年版第412页
- ④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1992年版第75页
- ⑤姜琦 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991年版第7页
- ⑥姜琦 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991年版第69页
- ⑦许俊基 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1987年版第三卷第382页
- ⑧许俊 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1987年版第三卷第383页
- ⑨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1998年版第6页
- ⑩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1998年版第21页

参考书目:

- ①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 ②许俊基 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三卷、第四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③姜琦 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④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 ⑤周尚文 叶书宗 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转自《国际·先锋》

原文链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004>

纯经济学还是现代社会的巫术？

作者：萨米尔·阿明

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一门奇特的科目，叫做经济科学或者干脆就简单地叫做经济学，就像我们说物理学一样。其研究范围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它立志要对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特征做出科学的解释：价格、工资与收入、利率、失业等等。

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可奇怪的是经济学却采用一种对现实不予理睬的原则立场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这种观点采用以个体为核心的方法论，认为社会可以被看成是构成社会的个体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体，则因其行为的合理性而被经济法则定义为“经济人”。我们不太清楚，根据这样“科学”的意图，从个体行为互相作用出发建立起的详细那个世界应该构成一幅近似现实的图画呢？还是由它提出一个标准模式，设定理性社会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说无论什么类型的社会，其基本构成要素都是单个个体的话，那么谁还能否定这样平庸的看法呢？问题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呢：那是社会不是由个体行为的直接较量构成的，它始终都被这复杂得多。因为在它内部还有社会阶级、民族、国家、大公司、社会计划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等等的较量。可是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不感兴趣。因为这妨碍了他们建设“纯经济学”并发觉它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一种假想的、抽取了其他社会范畴的纯粹经济领域内，由个人计划和个人之间较量所产生的法则。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纯经济学是令人开心的某种思想的杰作，但它和现实由什么关联呢？这就好比一个医生有意忽略各种器官（心、肺等）的存在，而只从构成人体的唯一的基本元素——细胞——来着手“重塑”人体机能！还好，医生们还没有像“纯经济学家”那样也制造出一种“纯医学”。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真是万幸。不过，即使细胞经过最复杂的互相作用能够形成类似人体的东西，这种概率和一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用爪子胡乱敲打键盘就居然凑成了莎士比亚全集是差不多的！仅仅通过 50 亿人在市场上的互相作用就能够达到普遍的平衡——而且还是最佳平衡——它实现的概率和细胞变成人、猴子创作出莎翁全集的概率是一样的。

为了证明以这种荒谬立场为出发点的正当合理性，社会上出现了惊人的玄学长篇巨论。哈耶克，我们这样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良师，强迫自己对民族、国家、社会阶级和其他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而仅满足于从中发现某些剩余的“非理性”的东西。因此，他不是尝试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醉心于创立某种虚构的合理性。

人无疑是一种理性动物，而它的行为举止——即使是最奇特的——也是可以解释的。而解释的前提是将隐藏在行为后面的特殊理性动机重新纳入与之有关的环境，然后再说明事物发生的机理和影响。换句话说，从整体事实（公司、阶级、国家等）出发进行推理、思考的立场才是科学的，才是可行的理论出发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还有凯恩斯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政治这一形容词不是无中生有的）就都采用了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

此外人类还是有智慧的，会按照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纯经济学的行为反映模型应该建立在集中各种反应后再得出的理性基础上（如果我认为价格还要大幅下降的话，我就克制不买），而不应该建立再某些愚蠢的、暂时的合理性上（如果降价我就多买）。把所有这些个人“资料”都集中起来建设纯经济学是可行的吗？这是问题的关键呢，还是无关紧要？

如我们所知，深陷孤岛的鲁宾逊，以如何选择即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行为启发了纯经济

学。但是，我们这些新鲁宾逊并没有就此止步。经济学家们假设全球社会由 50 亿个鲁宾逊组成，于是就有了这样惊人的开篇。开篇写道：这 50 亿个配备了馈赠物资的（和鲁宾逊一样拥有一箩筐物品）基本单位都是“纯粹的消费者”，他们在—个完美的竞争市场上尝试用自己富余的东西取交换自己短缺的东西。

寓言故事的风格在这里清晰可辨。我们知道，寓言通常假借动物虚构一些合乎情理的行为，从中得出道德的古训教育，警示人类。经济学完完全全是以这种模式构建起来的。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引进一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假设，佐证它希望说明的事理。

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方法论带来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证明这些合理的个人行为在互相作用下，再加上预期愿望能共同导致出现确切的平衡？就是说，导致出现一种可以描述出特性（以价格、收入分配、失业率、失业率的上升等）的系统，而且只能有这么一个系统。显然，这里借用数学工具是绝对必须的。

但数学工具恰恰证明，一般情况下这系统时不可能成立的：一个这样的方程系统（这里涉及到的是几十亿个方程）先天就是不相容方程。就是说，这个方程没有解。如果加上多种假设条件的话，它还可能有几个解，但是都是无法确定的解（即有无穷解）。只有增加更多的假设前提才能得出确切的解（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解）。

因此，纯经济学派的专家们尽力扣除所需的假设条件，以便实现其目的。然后他们就借此做出如下结论：某些曲线呈凹陷状，某些曲线呈凸起状，根据事业的需要让收益保持平稳，上升或者下降。为了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弄个举出例子来证明其论点，他们就见机行事地编造出一些合适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就有丈母娘经济学和中美老太买房的寓言——录入者注）。

阿罗·德布鲁模式 (The ArrowDebreu Model) 是纯经济学引以为荣的典范。它表明，在放弃了前述的最佳假设后，人世间至少存在着一种普遍平衡。但是，这个普遍平衡必须以完善的竞争为前提。然而，完善竞争意味着这将是一位掌握了一切供求信息的拍卖师。有趣的是，这一模式竟指出，一个对这 50 亿被管理者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中央计划者能够采取措施以实现它们能够孜孜以求的平衡！这一模式并没有指出，目前这样的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这样的平衡。极端自由派的纯经济学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大哥（奥威尔《1984》中的集权形象——录入者注）才是解决它们这些问题的好办法。仅凭这样一点就够大家开心了。很显然，因为拍卖师不在那儿，由于个人行为在市场上较量结果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所以这一制度时时刻刻都在变。平衡——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而且即便实现了也是出于偶然——也只是演变过程中的产物，而不是行为人合理性的特征。不过这种平衡也可能永远不存在。此外，索纳·思凯因 (SonnenSchein) 的定理也证实，我们不可能从如此众多的行为中推导出供求曲线上的形状。但是，即使严肃的数学能证明纯经济学误入歧途，又有什么用呢？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问题不在这里。

如果出现奇迹，供求关系通过市场碰撞实现了平衡，这个普遍平衡也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既不了解就业水平，也不了解生产增长率。失业的确不是纯经济学感兴趣的话题，它始终把失业看成是一种自愿行为。显然，这个假设不是失业工人自觉自愿的。传统经济学家除了荒谬地生产单靠市场（它是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就可以使吸纳普遍平衡外，还说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废话（或者风凉话），他们刻板地将失业归因于“工资过高”。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仅堂而皇之地忽略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事实，而且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逻辑内，工资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普遍平衡的所有已知条件。

人们接下来就声称如此的来的普遍平衡可以实现“社会最佳配置”。这一断言构成了纯经济学的第二大命题。但是，他们“证明”该命题的一句是毫无意义的最优化定义：如果不恶化某个个人的境况，就无法变动这个平衡力的任意一个参数。换句话说：任何一点改变只要恶化了一个人的情况，比如地球上 50 亿居民中最富有的一个亿万富翁，那么目前这个使

40亿人注定只能勉强度日的平衡就是最好的。

为了回应马克思的分析，纯经济学从19世纪末就开始凭空创立自己美妙绝伦的理论建筑。但是，它一开始就忽略了货币，而真正的经济活动都掩盖在货币的帷幕后面。鉴于货币的真实存在，纯经济学无论如恶化也要在建设过程中把它穿插进去。最智慧的数量经济理论则是它唯一可行的办法。步其后尘，货币论作为纯经济学的最后嚎叫声称货币和其他物品一样也一种商品。它擅自再50亿个个体的供求方程中加入了他们的货币需求方程。而供给则被假设为一个外源数据，其数量可以由中央银行决定。但对货币发行做过科学的基本分析后，我们便可以证明货币和其他的商品不一样。因为货币的供给取决于对货币的需求，而货币需求则由信贷利率和经济活动水平共同决定。此外，由于中央银行具备货币供应量的神奇能力，所以人们希望他们在管理上保持中立或独立（独立于谁？），但它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能那么做，他们不可能影响货币供应量，而只能通过制定利率的办法，部分地且间接地影响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这么一来人们便忽略了利率会反过来（通过投资活动、延时消费等）影响经济活动总体水平，并因此影响构成经济平衡的所有已知条件。货币纯经济学拒绝所有对立的分析，也就是说，根本不考虑我们这里所谈的金融逻辑（及与其相关的资逻辑）与生产性投资逻辑（资本战略）之间的差别。因此，他们拒绝寻找利率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以纯经济学为代表的如此荒谬而却贫瘠的理论活动是如何让有着正常智力水平的人们感兴趣的。我们本来应该努力取证明，社会思想领域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偏见、利益以及为了证明他们合法所进行的种种徒劳的探索，这一切将摧残科学的批判精神。如果办不到的话，除了发明经济学以外，我们也不见得能做得更好。

纯经济学自称像物理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其实它不是。因为它想要否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殊区别。它想忽略以下事实：社会是自己产生的，它不是什么外力造就的。然而，尽管有以上的原则性声明，它还是立刻就自己戳破了自己的谎言，因为它引进了期望的概念，而该概念恰恰证明被它当做客观事实来对待的个人是能够造就历史的主体。

纯经济学只是一门伪科学，它对社会科学如同伪心理学之对心理学。然而像所有的伪科学一样，他什么都证明，无论正反，不分黑白。“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吧，我会给你发明一个证明它的模式。您是不是想重新把利率从6.32提到8.45，或者降到4.26？或者干脆让它保持目前的水平？我给您制造一些理由，它可以乔装打扮成某些模型的样子。瞧，这就是它的威力：它是为统治资本服务的工具——屏风，统治资本可以用掩盖自己的真面貌：失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等。因为它不能用来描述自己的真实容貌，所以它在其他方面变得有用起来，比如用它来“证明”自己是一种有益的方式，能够带来经济飞跃和充分就业，明天我们就可以免费刮脸喽（喻诺言从来不会兑现）……

因为是伪科学，所以经济学只可以调动一些业余的数学家为它服务，就像伪心理学对心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既然结论是否正确对它所证明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证人们要强制推行的论点——那么证明过程是否无懈可击又有什么关系呢？该“科学”雇佣了那么多的、任何一个物理实验室都用不着的平庸数学匠（哈哈），这实在会让人觉得奇怪。当然也有例外，如德布鲁（GerardDebreu）。但总的来说，这些人都选择了临阵脱逃的路。他们从传统的经济学转向去研究博弈理论，研究包括预期行为在内的战略较量的规则。该理论对促进智力开发的作用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它还能促进数学工具自身的进步。然而，博弈理论每取得一个进步就远离社会现实一步。我对这个现象不能不感到震惊。混沌数学中的逃逸理论和上述现象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中，社会现象仅仅是个借口而已。丰富数学理论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该目的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对今后提高人们在其他领域中的认知水平也时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数学家，如乔吉·伊斯哈艾尔（GiorgioIsrael）伯纳德·盖里彦（BernardGuerrien），正因为他们不是业余的，所以必然由他们完成这项论证

工作，说明纯经济学的荒谬和缺乏逻辑。

在特例之外是默默无闻的模型制造军团。他们通常是贫困的而操劳的大学教师（尤其是美国的教师）。他们的事业取决于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这些论文通常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其实也不想说明什么问题。在领导阶层，纯经济学奉承着工程师和专家出身的高级官员，这些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真诚地认为——自己权利无限，是他们的决定造就了社会现实。

魔法和巫术是并存的。妖术披上科学的外衣，也可以一步步论证自己的结论。为了让让自己具有说服力，他们首先得将一些合乎情理、说得过去的事情，但目的是从中得出符合其巫术的结论。在其他社会形态里，离我们久远的年代里，巫术-魔法师占据着前台。聪明狡诈的大巫师都知道国王对他们的期待，所以总会按照国王的心思去说。在我们这个异化社会的经济领域里，纯经济学扮演的恰恰就是现代巫师的角色。它用类似的手段发挥着类似的功能，语言的深奥晦涩（今天非数学家对数学的使用）就是其中的主要手段。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巫师，他知道人们想要听什么：工资太高了（即使在孟加拉也是如此），而收益始终不足所以无法刺激富人去投资……他虽然头脑糊涂（他差不多什么都懂，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术上不诚实却依旧得到了成功。甚至可以说，这些不足正是赢得大巫师称号所必需的品德，因此诺贝尔奖也非他莫属。

和巫术一样，帮派在理论界也是大行其道。小巫师们分宗别派站在大巫师后面，大巫师们则把属于本门的弟子们组织起来。这里我发现，经济学家们的帮派活动和伪科学-伪心理学的拉帮结派是一组平行的标志，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潮流的一个方面。

大政客们利用“纯”经济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不久以前的国王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巫师。小政客们则相信纯经济学，如果他们的眼光更差的话还会加入其中的一个派别，就像他们常常相信伪心理学那样。

关于现实社会及其经济，最平庸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版本都比库存的所有纯经济学谈得多。但是，如果说社会理论需要经常性的接受批判性检验的话如果始终有必要对现实里的新鲜事物加以关注，并因此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的话，如果这一争论始终应该保持公开、自由、无偏见的话，那么纯经济学开辟的道路就是死胡同一条。事实必定如此。因为这种理论完全是反历史的，它不想了解社会现实的任何领域。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也不想了解未来的任何情况。它只认识个人，而这个个人纯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粗俗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喜欢的寓言是孤岛上的鲁滨逊——被放逐于时间和时空之外的人——的缘故。它是种科学精神的对立物。社会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自己改变自己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靠规定了个体的游戏规则就能办到的。

被马克思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庸俗”的资产经济学，更不必说它的极端表达形式，毫无证据地自诩为“新古典主义”的纯经济学。它完全是为了解决“市场”法则而构建起来的，它要证明“市场法则”就是自然法则。它不仅能带来“普遍平衡”，而且这个“普遍平衡”还是可能实现的各种平衡中最好的，即能保证社会充分、自由就业的“社会最佳配置”。这个“市场法则”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本需要的表达，即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让资本主义成为“理性”的同义词。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理性的完整内容就是：个人追求商业利润合乎人性天理。以这些可疑的论点为基础，资本主义就可以自称“永恒”了，自称就是“历史的终结”了。然而，经济学不仅从来没有以科学的态度证明它的基本命题，而且其论证方法也已经被证明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言论的真实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让资本的自由活动合法化。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种非科学的言论形成强烈对照。它完全摆脱了为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它不是理性的同义词的）辩护的偏见，提出了社会发展的真正

问题：阶级斗争是如何每时每刻决定了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物中的“平衡”？社会的基本矛盾：劳资双方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金融投资商（或者投机者）和实业投资者之间的对立；企业管理人员和所有人之间的对立；垄断寡头间的相互对立等等，上述的这些基本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统治集团（阶级联盟和社会妥协）在其社会、政治逻辑支配而采取的种种国际干预，共同决定了实现平衡所需的所有条件，第一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生产）第二生产部门（消费资料生产）之间，或者这两部门和第三部门（消化剩余）之间的平衡，决定了就业水平（我们不能事先宣布就业是充分的）、相对价格的结构与收益、利率、作用于普遍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的压力以及能在国家市场上决定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可以使社会走向普遍平衡的假设，没有任何一个是事先预定出来的。阶级斗争不干扰真实存在的、转瞬即逝的平衡，或者非平衡。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现实主义的，而纯经济学则不是。它对现实（阶级、国家、世界体系）视而不见，并将它从自己的言论中删除干净，因此纯经济学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寓言。

纯经济学一般都没能占据社会思想史的前台。它通常被流放到学术界的殿堂里，而政治界和社会生活界则傲慢地忽略了它。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时不时地搬出这个“观点”或者那个“结论”来用一下。为了把这种反动思想推到前台，目前的情况真是这样，必须集中所有的特殊条件，为了资本单方统治的利益打破所有的社会平衡。哪怕是引用上述反动的空想，资本的单方统治也是暂时的。因为它统治的结果和反动空想所鼓吹的完全不同（它鼓吹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管制、没有限制、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将会保障它取得最辉煌的进步），它除了造成更深刻的社会危机之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因此，纯经济学几乎成了治理这种危机的良方，因为它可以延长有利于资方的社会失衡状态（目前指全球化的金融环节），而绝对不可能帮助社会走出失衡状态。如果社会需要步出危机，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确立新的平衡。在这个新的平衡中，阶级、民族、国际、公司等等，也就是说，纯经济学忽略了的所有现实都将找到它们的位置。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听到人们谈论纯经济学，它将被遣送会它在学术殿堂的流放地。

《时代旋律的批判》第八章全文

我写作的时候，总是以一群投入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目标读者的。——阿明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117>

文艺评论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偽善行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偽裝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弗拉基米尔·列宁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着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

——鲁迅

电影《托洛茨基》观后感

作者：黑暗骑士

此时此刻，当远处的钟声敲响了2010年10月14日的最后一秒以及15日的第一秒钟，我依然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胸中充满着澎湃的热血，而今夜的无眠为的却是一部名叫《托洛茨基》的加拿大电影。

这样一部电影或许让很多的人认为这是一部描述列奥托洛茨基一生人的纪录片，然而事实上这却是本片导演和编剧为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托洛茨基》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勇于改变社会不公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故事，他年轻然而他的思想让所有同龄人觉得刻板与腐朽，他充满激情然而他却为大多数人所误解，他的一举一动荒诞离奇然而他敢于追求真理与真爱，他疲惫不堪瘦弱无力然而他却勇于肩负改造社会的重任。他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不顾整个世界的冷眼与嘲讽，挥舞起骑士的长剑向整个世界宣战。

在绝大多数观众眼中，主人公是一个严重的妄想症患者，他总把自己比作列奥托洛茨基，并不断的在寻找他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同时把他看作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希望在一切领域（主人公的学校）消除不平等不公正的切格瓦拉。然而导演与编剧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现实，那些严肃的批评者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习以为常，对改变这种现实的努力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而他们本身往往也是这些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我们究竟该嘲讽的是愚蠢的精神病患者还是绝顶聪明的“智者”呢？

毫无疑问，面对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现实，我们个人能够做的的确微不足道，或许我们无力去改变这一切。然而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有努力去改变这样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吗？难道我们仅仅只是作为旁观者看待这样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吗？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手中，世上没有从未来世界来的人、没有多拉A梦，当我们身陷困境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拯救自己。我们个人的确无法改变什么，然而无比幸运的是，事实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能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去主宰属于我们自己的命运。

电影以小女孩所钟爱的“HAPPYEND”结尾，然而就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与故事主人公如此相似的我也多么希望能有一个“HAPPYEND”。然而，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为世人所误解与耻笑，我们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勇敢执着的追求真爱，我们不牺牲的追求真理，我们能够面对现实，我们能够忠于理想。我们或许遭遇失败、遭遇众叛亲离，或许我们永远都得不到一个“HAPPYEND”，哪怕我们的躯体都被摧毁，现实都无法抹灭我们斗争的意志！每一次的失败与牺牲都将把我们锻炼得更加成熟，只有灰烬中才能诞生凤凰。一个切格瓦拉倒下了，还会有无数个切格瓦拉重新站立起来，因为我们从事着的事业为了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哪里有贫困有剥削我们就斗争到哪里！未来属于我们！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364>

《集草为巢》影评：印度农民工的苦难

作者：路易的学生

《集草为巢——印度农民工的新型反抗和阶级形成》(Many Staws Make a Nest – Proletarian Unrest in Delhi’s Industrial Rust Belt) 是一部述说印度古尔冈劳工状况的纪录片。该片于 2010 年发布，是几个德国人在《古尔冈工人新闻》的帮助下深入当地，与劳工们进行了大量访谈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全片以异常平实的方式展示了印度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劳累、毫无尊严的生活以及在对现状忍无可忍之后的艰难抗争。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莫名感伤，只有那些从遥远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青年们的诉说，还有无法掩盖的印度统治阶级的罪恶。

对于正在构建中华崛起伟大宏图，编织幸福温馨的“小资”美梦的当代青年来说，影片中发生的一切也许太过遥远了。印度是什么呢？它是常常出现在中国时政报刊杂志上的名词，与它相伴的，是诸如“金砖四国”、“新兴市场”、“民主”这样一些让人充满了期待的时髦术语。近年来，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使得这个古老的国度成为继崛起的中国之后，又一个有可能成功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大国。欧美的政客学者预言了印度的美好未来，印度政客们自然随声附和，而中国的许多精英因为“民主”的缘故也对其大加赞扬。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印度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市政建设的落后又让这个崛起中的巨人成为许多中国人取笑的对象。印度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朋友们，这部片子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印度。你将从中发现所谓的印度经济奇迹的秘密。那就是，印度经济增长不是靠占 GDP 不到 10% 的软件外包业推动，而是用印度普通农民工的血汗铸就的。

印度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呢？从影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信息。在制衣厂上班的女孩说她一个月的工资是 4200 卢比，按照 1 印度卢比 (INR) = 0.146 人民币 (CNY) 计算，差不多六七百人民币。她还算幸运的，据说每天只干八小时，而另一个受访的小伙子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也在制衣厂工作，但每天要从 9 点干到凌晨 1 点，而且没有休息日，拿到的工资也只有 5500 卢比，差不多 800 人民币。还有一个工人说自己每天干 16 个小时，回到住处倒头便睡，生活与奴隶无异。实际上，也许比奴隶更不如。因为资本家不像奴隶主那样还关心劳动力的长期使用，他们的想法是工人用完了就换，所以连干净水都省了，给工人喝的水常常导致工人感冒发烧。尽管工资低，许多农民工都只给自己留 5 百到 8 百卢比做生活费，其他的钱都寄回给家乡的父母或者供养弟弟上学。他们必须拼命工作，才不至于被淘汰。由于印度工业不算发达，新增岗位少而需要工作的人又很多，大量涌入城市的贫困农民，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却难以寻得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由于巨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在岗工人在跟资方的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动不动就会被开除。一位工人甚至提到，他们进厂的时候，要签好辞职书才能工作，因为这样公司就可以随时让他们走人。他们没有办法，农村劳动力已经过剩，回到农村也没有出路，在城市里还有摆脱赤贫的可能性。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 90 年代第一批进城打工的叔叔阿姨，他们不就跟这些印度工人一样吗？自己辛苦工作，把钱寄回老家，供孩子读书，赡养父母。不同的是，在后来十几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民工要比印度兄弟幸运得多。因为与印度相反，中国是在建立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才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于是才有后来的工业高涨，使得工人不愁工作，甚至闹起了民工荒，从而导致工人工资的全面上涨。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状况，也远不如印度农村那样恶劣，毕竟经过了土地革命，不再像印度那样，还有大量黄世仁把喜

儿逼成白毛女。在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年的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谁呢？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还是“保守封闭”的前三十年？我想答案并不像官方说的那样清晰判然。

影片也谈到了印度的政治。但这里的政治跟国内的自由派精英夸夸其谈的“印度民主”没有任何关系，在工人眼里，没有一个台上的政客会倾听穷人的呼声，遇到工人抗议，就使用暴力镇压，而保护公民权益的法制，也演变为资产者统治无产者的工具。工人们根本不谈选举，根本不谈代表，因为统治者太会操纵选举，收买代表了。所以工人们更青睐联合，平等的联合，虽然这种方式不能给工人带来最终的解放，但至少在目前的经济斗争中，这一方法是适用的。影片中谈到了著名的法里达巴德大罢工，左派领导的这一总罢工最终以100多名工人被杀害而归于沉寂。民主的印度政府处理“群众性事件”的残暴，比起专制的中国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仅政府黑暗，连声称捍卫工人权益的工会也是黑色的。工人眼里的工会完全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靠着帮助资产阶级治理工人获利。所以，迷信工会的人们要注意了，资产阶级远比无产阶级更有实力去塑造工会的性质，使其变成奴役劳动者的工具。在崇拜金钱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解放远不是社会解放，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深入到经济生活中，让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只是几年玩一次在两个流氓二选一的游戏。这一点，中国的无产阶级现在还不明白，但终究会明白的，因为现实会教育所有人。

尽管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但印度工人并没有就此屈服，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失败有的成功，但无论成功失败都是阶级斗争的宝贵经验。通过这一系列罢工（或停工）斗争，工人们明白了单打独斗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益。就像片子里的那个裁缝所说的，“我们想知道工人联合起来了会怎样。这是由五千年历史的文明社会，需要花时间摆脱这个传统。否则政治领导将决定我们是获益还是被枪杀。”而对政治一窍不通，甚至连工会是啥都不懂得的小姑娘在谈到联合斗争的时候，也神气活现地说道：“谁要压迫我们，那大家都会抗议，而不是某一个人”。可见，联合斗争的思想已经在印度年轻农民工的心里扎下了根，这为以后更大规模的谋求阶级解放的政治斗争创造了条件。

影片中讲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难以一一表述。我想，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必然要站起来反抗极其不合理的制度，伟大的变革也许会从印度的贫民窟开始吧！希望大家都能看看这部极有价值的纪录片，关注印度的工人兄弟的命运，同时也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

纪录片在线播放链接：<http://v.ku6.com/show/FvDoE0MU08-nVh4K.html>

附录：

1 《法里达巴德打工者月报》

工人们创造的一种斗争方法是发行“打工者月报”，报纸的内容是在职和退休工人自己写的文章，主要是介绍印度各地及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反抗，还有对本地情况的分析与反资本主义策略的理论思考。来自劳动群众的志愿编辑团队每月把一万份报纸免费分发给当地各厂的工友，就逐渐形成了以报纸为平台的当地工人积极分子互助网络，每当某厂的工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网络来迅速组织多厂的罢工、集资等集体行动。片名中的“集草维巢”是指，通过报纸、口碑等方法，把个别的斗争网络化，以及个别的无产者，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无等级的、灵活的自我组织方法，逐渐地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相对老板们及其政府的统治阶级而言，他们能够提高自己的权利，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2 《古尔冈工人网》Gurgaon Workers News

<http://gurgaonworkersnews.wordpress.com>

Gurgaon Workers' News is a project independent from political parties or unions, trying to support workers' self-organisation in their struggle for a better life. One of the projects aim is to docu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workers' struggles in and around Gurgaon, one of the current boom regions of global capital. For this reason we publish a monthly electronic newsletter on this site.

GWS is not meant to be a purely documenting project, it is not supposed to be a one way street. We plan to distribute a regular newsletter/leaflet amongst workers in the area which, apart from local news, would contain workers` inform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companies or boom regions from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If you want to have your information distributed to workers of a specific company, see list of companies on this site, or if you would offer to do the same at your place, please get in touch.

原文链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798>

为了劳动者的理想

作者：黑夜里的牛

前途一定很艰险，旅途一定会孤单，只要我们大家心相连。
哦！擦去眼泪，莫要伤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孙恒《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听到新工人艺术团这首《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的时候，我已经 24 岁了，早已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然而这轻快简单的旋律，却几乎使我掉下泪来。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歌声完全是一个意外。虽然歌唱者宣称他们是在歌唱当代的劳动者们，但铿锵有力的歌词所传达的似乎不是当代劳动者的呼声，而是他们即将拥有的未来的呐喊。这张专辑使我感动的，正是它不仅展示了现实的残酷，还告诉我们劳动者是多么英勇地与残酷的现实做着斗争；不仅批判了一个与大众为敌的旧世界，还模模糊糊地渴望着一个充满自由与正义的新世界。

孙恒的音乐表达的很多思想，其实是社会主义者才具有的，因此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歌曲中表现苦难不是为了祈求富人们的同情，而是为了激发打工者思考自身处境；表达快乐不是为了赞美和谐，而是为了给予打工者宝贵的自尊。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音乐。歌曲中的苦难并没有特别引起我注意，因为早就习以为常，而其中所传达的那种作为一个劳动者，作为新时代建设者的自豪之情，却令我感到震惊。是啊，我到这时才真正明白，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自尊，是独立，是自觉为主人的精神。一旦我们意识到是自己建设了这个世界，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真正地做到掌握这个世界。孙恒走出了第一步，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都作出了一份重要的贡献。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听听这样的音乐，这是劳动者的心声，更是劳动者的理想。

中国的农民工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体，是新时代的工人阶级。虽然农民工已经是工人阶级了，但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依旧将自己视为农民。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这一群体目前还处于自在阶级的阶段，正处于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要获得真正的阶级意识以成为一个真正自为的阶级，不仅需要在经济斗争中意识到自己的阶级身份，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展自己，建构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

近年来，一些工人艺术家已经开始这项伟大的事业了。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工人艺术家们不是在真空中建立自己的文化，若真如此，他们倒还少了一些羁绊；不幸的是，在他们开始创作之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就已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郑晓琼的诗歌就是一个例子，最初在被刺破的疼痛的刺激下发声的渴望，虽然已经弥足珍贵，却总还是摆脱不了资产阶级文化所赋予的形式。意识形态是这样的东西，你生于其中，呼吸它，吸食它，被它融化，即使你要反抗，也只能利用他给你提供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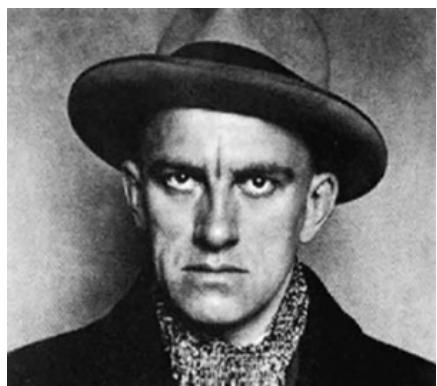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应该用更加热烈的心情来赞扬新事物的产生，赞扬工人阶级不再是逆来顺受的雇佣奴隶了。他们至少做到了在皮鞭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要奋力表达自己的疼痛。这表明了，工人阶级即使没有被人唤醒，他们也能因自身所遭遇的痛苦而觉醒。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高于工人阶级目前水平的新文艺都是完全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意识形态相对于现实具有落后性，那些能唤起工人阶级觉悟，扫除落后的小农思想残余的文艺作品才显得弥足珍贵。当代的新文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我们总是让农民工自己发出声音，然后坐等资产阶级社会观赏它们、吸纳它们，用以显示统治阶级的博爱和仁慈；而不是努力冲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用最火热的心去温暖这些幼苗。资产阶级的温室固然适合个别艺术家的发展，但是艺术之树一旦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失去了对人民苦难的感受，就失去了宝贵的自由，最好也不过成为装饰富人阳台的盆景。

要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已经非常困难的了，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则更加困难。我们不能坐等万事俱备之后，再去吹吹东风。这样的好事只能出现在神话和幻想之中。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同志恰恰喜爱这样的幻想和神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必须去做那些最渺小的事情，比如传播无产阶级文艺。具体的做法可以很简单：把流行音乐从自己的 MP3 中删去，换上这些真正表达无产阶级心声的歌曲。有能力有意愿的同志也可以练习艺术创作，为将来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启迪人民做准备。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750>

再读马雅可夫斯基

作者：季娜伊达



我在中学时代就十分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尤其是他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如《列宁》、《好》和《向左进行曲》等都曾给我心灵带来颤栗的震撼。当我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就曾用《好》的格调和那种诗行排列的方法写下了一首歌颂我所在的城市的长诗。除了这个城市的地名、人名和风景名胜之外，诗中几乎都是“好”这样的口号式的句子。我很得意，竟然将这首诗寄给了报社编辑部，更想不到的是编辑部的同志居然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表扬了我的热情，但却委婉地批评说，每个学习写作的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

这事已经过去好些年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要为自己的幼稚脸红。而现在，偏偏我每一次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时，总要想起这件事。但人长大了，读的书多了，也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由于好、好、好和向左、向左、向左这样的诗句，在我的脑海和思绪里就矗立着一个整天挥臂高呼革命口号的诗人的形象，似乎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总是双眉紧锁，呼号声如洪钟，狂歌革命和胜利。我想象中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柔情，没有爱情，一副严峻的面孔，有双愤怒的、仇视一切的眼睛。

其实，这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偏见。而这偏见恐怕不仅是属于我的，也许，在许多人的
眼中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种形象，或许就该是这种形象，就连他的国人也未能例外。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一处地方，在一片灰色和白色的墓碑中间，有一方极为耀眼的深紫红色墓碑，那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那深紫红色的中央依然是马雅可夫斯基那个怒目而视的头像。这深紫红色是生者对死者的理解和纪念，对于那些把他安葬在这个神圣地方的同代人来说，马雅可夫斯基永远是红色的，生前死后就该永远和红色在一起。

在墨绿和灰白组成的墓地世界里，在生者和死者对话的肃穆和寂静中，这深紫红色显得过于喧闹和不协调。马雅可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是个瞬息万变的岁月，他歌颂革命的诗歌几乎都是在文学家们所说的第二个时期，即在1917—1925年期间写出来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个时期大致分为：国内战争的行进凯歌时期、希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一段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就连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对这场革命的解释和指导方针都不相同，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当时，大家都热血沸腾，都相信用凯歌

行进的方式，走直接过渡的道路，很快就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谁也不怀疑革命的、武力的、“红色恐怖”的手段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充满着尖锐的斗争和弥漫着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的时代。

在 1917—1920 年间，马雅可夫斯基歌颂的就是这样的革命。他心中的革命就是一首进行曲：“尽情欢乐！尽情歌唱！我们的血管里充满春色。心儿啊！将战鼓敲响！我们的胸膛是一面铜锣。”而在国内战争打得十分激烈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执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革命就是公社，“公社决不能被征服”，“挺起英勇的胸脯前进！看无数旗子满天飞舞！”在这样一个激情的年代，马雅可夫斯基对敌人的愤怒也就自然而然在诗行中迸发了出来：“摆开队伍前进！这里用不着说空话，住口，演说家！该是你讲话，毛瑟枪同志。我厌恶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赶开历史这些瘦弱的老马。”当然，从这些诗行里我们不难发现，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是和毛瑟枪连在一起的，他对未来的渴望是和虚无主义不可分的。

《向左进行曲》可以说是代表了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典型。“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号是马雅可夫斯基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那个时代人群的倾向性思潮。然而，却不能再向左了，凯歌式的、直接过渡式的、剥夺式的，甚至是战争式的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停止。苏维埃俄罗斯已经面临危机的边缘，如果不立即停止这种向“左”的持续运动，就将坠下深渊。而马雅可夫斯基却在 1920 年 7 月依然呼吁：“真理，大睁着双眼，再加上长枪——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武器。”但列宁却是清醒的，他不认为共产党人的武器就只能是长枪。1921 年的春天，他及时地、果断地废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次伟大的变革，这是一场不是马雅可夫斯基歌颂过的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对这种变革并不能理解，一时也无法接受。于是，他感到了生活的沉闷，因为没有了那种凯歌式行进的喧闹了。在这期间，他在给他的几乎是共同生活者的女友莉丽娅的信中透露出了挥之不去的苦闷和忧郁。马雅可夫斯基已经习惯于那种轰轰烈烈的、如火如荼的岁月，所以他对于新经济政策下俄国较为平静的岁月感到难受。如果稍微注意下，不难发现，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期间没有留下什么激动人心的诗篇。他甚至连创作都感到吃力了。只是到了列宁的去世，这才重新激起了他心中的革命意识。伟大的著作《列宁》就是在那期间创作出来的。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423>

革命时期的爱情

作者：路德维希

在琼瑶式文艺百花齐放的今天，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宏大叙事都成了毒草，都成了任人唾弃的死狗。文艺批评家们忙于从垃圾堆里淘金，忙于颠覆与重写，并用他们的人性标准来丈量每部作品的高低。年轻人们忙于恋爱，如饥似渴地从畅销书专柜或者电影院里获取台词与剧情，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气息来演绎所谓的浪漫。而对于这样一部夹杂着意识形态说教的小说，似乎已经过时并且永远地过时了。但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原因，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指向的原因，斯皮尔伯格和梅尔·吉布森这些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大行于世就是明证。如果今天有哪位小资猎奇似拾起了这本古书，并用他们独有的眼光来审视这部作品，吸引他们的肯定不在于书中的革命故事（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少年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故事。

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穷小子，一个资产阶级的千金小姐，因为某种青春期的叛逆性格，萌生了一段罗曼蒂克色彩甚浓的爱情，这是无数琼瑶式言情小说和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而按照它们的故事逻辑发展下去，通常不外乎两种结局，或者男女主人公经历了种种误会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为一出喜剧，或者男主人公为救女主人公葬身大海成为一出悲剧。但保尔与冬尼娅的爱情故事背离了这种类型化，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而是一出正剧，保尔厌恶冬尼娅的资产阶级习气，冬尼娅也不理解保尔的革命意识，他们最终分手，阶级意识的信条在此过程中得以张扬。

但对于现在年轻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们会这样训斥保尔：“你个SB的革命理想去死，你个SB的阶级出身去死，在爱情面前，你这些东东算个屁！”这样的训斥有些粗鲁，稍有修养的文学青年如刘小枫们不会这样说，他们转换一下笔调，文绉绉地写到：“她（冬尼娅）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尼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所有同情的眼泪都为冬尼娅而流，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从冬尼娅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他们看到，这种高贵的“贵族气质”在革命面前是如何卑微，他们看到，保尔的革命意识是如何粗暴地轻薄了冬尼娅的爱情。于是，“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尼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这一段毫不吝惜甚至滥用形容词的引文，竭力烘托冬尼娅的美，并以此反衬保尔的不美，这种暗藏的对比式美学意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正因为革命是反个体的，因此革命者必须做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们不能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对个体生命的犯罪，“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于是，保尔对冬尼娅的爱情是个错误，而他的背叛更是罪过。概而言之，文学青年们通过种种风骚文笔所要证明的不外乎是：集体压抑了个体，革命背离了个人，爱情在集体、革命的名义下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也只是被排斥的对象，也就是说，革命时期的爱情

是不可能的。

听惯了对冬尼娅的赞美诗之后，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保尔，这个在文学青年眼中“形象暗淡”的少年怎么了，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仅仅是因为他忤逆了冬尼娅的贵族气质吗？抑或是他的革命意识刺痛了敏感的男读者的心？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本来这些都是小说着力要表现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刻意提起，但在这个时代，小资少女的歌谣梦幻远比革命硬汉的滔滔雄辩要吸引人，现代人读此书，心魂都已被冬尼娅勾走了，他们无暇顾及保尔的历练与理想。因此，我们还是先收起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怀，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男主人公保尔身上吧。

在认识冬尼娅以前，保尔在餐馆打工时，厌恶堂倌的不劳而获，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和堂倌、老板们是敌对，这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现在有的人一谈到阶级意识就歇斯底里，并且天真地把他归为一种等级观念，却闭眼无视背后的现实。“‘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正是这种不平等和压迫，萌生了保尔的阶级意识，藉此他获得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的目光，并开始认真审视周围的环境，但一切压抑着他，他不得不探寻着自身的拯救之道。他“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就在他青春的迷茫时期，“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他遇见了布尔什维克士兵朱赫来，随着情节的推进，他走向了革命，一种波澜壮阔的生活开始迎接他了。最后，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考验和战斗，以至于他完全有资格说他把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阶级压迫不应该被当成红色笑话，饥饿、疾病和死亡已经为它抹上了足够严肃的黑色，在它面前，那些无衣食之忧的“偶在个体”的温存缠绵，那些“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又在哪里呢？正是那种极限状态的生存境遇，产生了革命个体的阶级意识，让他们投身革命的洪流。而一旦我们明白了革命和革命者是怎么来的，他们的正当性也就无可质疑了。那么，当爱情遭遇革命的时候呢？这些革命的个体并非“偶在个体”，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埋藏着必然性的种子。存在主义式的生存抉择在他们那里是无效的，他们的诞生不是缘于自身的爱和怕，而是在某种历史境遇下的必然抉择。因此，革命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儿子，当爱情和革命冲突的时候，胜利的总是革命。保尔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这句话可以作为保尔与冬尼娅爱情失败的注释。冬尼娅的资产阶级习气激起了保尔的阶级意识，他感到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被清理掉。因为革命需要正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绝对对立，那种泯灭阶级界限的爱情是革命意识的天然敌人。是的，正如保尔对冬尼娅所说：“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于是，保尔与冬尼娅的分手成为必然。

那么，是否如敏感的男读者所说的那样，革命者应该弃绝爱情，做一个禁欲主义者呢？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常识：革命者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革命也不是要压抑个体的爱欲。集体性并不否定个体性，革命也并不否定个人，恰恰相反，集体性是个体性的最终实现，革命所要成全的正是个人。文学青年们有一点是对的，革命是集体性的，而爱情却是个体性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二者看成水火不容的。于是，当爱情遇到革命，问题的焦点便在于，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是如何可能的？事实上，这一切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保尔在对冬尼娅做最后的挽留时说道：“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保尔的爱情理想，两人一起在革命中生活，在生活中革命，在共同的奋斗中相濡以沫。在革命者那里，革命并不是形而上的东西，不是悬在生活上方的图腾，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的宗教。革命者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心灵里，一切彼岸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革命理想不是彼岸的救赎，而是现世生活的目的。如同儒家的修齐治平一样，革命者也是这样来看待生活和革命的关系的，二者并非一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而是相互缠绕在一起，寓革命于理想，寓理想于革命。把个体性汇入集体性之中，而集体性的革命反过来成全个人，如雷锋的名言所说的那样，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因此保尔感慨：“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在保尔看来，革命不是乌托邦，不是耶和华，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冬尼娅拒绝了保尔为他指出的革命道路，也就意味这她拒绝了保尔的生活，因此，横亘在保尔与冬尼娅之间的，并非如文学青年们所说的那样是个体性与集体性的藩篱，而是两种生活的鸿沟。冬尼娅最终选择了她的资产阶级生活，保尔也没有背离他的革命生活。两种生活，孰崇高孰高贵，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立场做出裁决。从对立的立场来看，冬尼娅酸臭，保尔粗鲁，这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斗争，是两种观念、两种立场、两种生活的斗争。文学青年们念念不忘冬尼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对保尔冒犯冬尼娅的生活心怀不满，他们难道没有看到，冬尼娅同样也冒犯了保尔的生活，她“别出心裁”的“花枝招展”不正是对保尔革命生活的讽刺吗？

与冬尼娅不同，丽达和达雅与保尔之间并不存在这条鸿沟，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阶级同志，他们一起年轻，一起革命，一起生活，一起恋爱。他们在革命中擦出爱情的火花，革命本身也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而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爱情。同时，他们也以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以他们的克制和奉献，回答了这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如何可能的？

但敏感的男读者不理解这一点，对他来讲，革命就是一种宗教，人民是这种宗教的无限恒在，个体偶在必然在汇入无限恒在之后消失无存，因此萦系在个体之上的爱情也就没有依据了。且不论革命是不是宗教，以这种逻辑，毋宁说基督徒不能谈恋爱，但事实上，基督徒从古至今一直是谈恋爱的好手，并且最善于扮成传教士诱拐文学女青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曾这样评论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宗教是人的无限类本质，但这种本质并非“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敏感的男读者非但假设出莫须有的“个体偶在”，还把无限本质与有限个体对立起来，因此，他也就完全不理解革命是什么，从何而来。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不厌其烦的回答，革命不是宗教，而是对宗教的扬弃，宗教里的神秘主义信条将在革命的实践中得以解决，对彼岸的期许转化为现世的行动，个体的无限本质从而在革命中得以实现，革命也最终成全了个人。作为个体性的爱情在革命中非但不会泯灭，反而会显露它最绚丽的光芒。

在一封革命时期的情书里，革命者是这样理解革命时期的爱情的：

“我们有两种生活。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亲爱的，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相爱是在延安毛主席的身旁，而我们的十周年，又是经过了几件艰辛。远征了无数高山大川，经过许多曲折的战斗，现在又要回到毛主席的身旁去了。我们的两种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为了战斗，我们分开过，似乎是牺牲了一段的爱情生活，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分开也是爱情生活的另一形式。亲爱的，当我回忆起那分开的无数个怀念着的夜晚以至于白天，我也同样感到丰富和充实，我真诚地说，我永远是那么专心地想念你，为了更好地和你一同生活而

指望，而准备着。我记得，在热河那些危难的、艰苦的日子，我总是一想到你就鼓起勇气，我坚信，我永远是属于你的，而且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无愧于心，当党需要我们谁，我们谁都没有退缩过，彼此也没有动摇过；爱情没有停顿过……”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46>

译文选编

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

——弗拉基米尔·列宁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代表着在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终实现），哲学便如马克思所说一样，停止“解释世界”。它变成一种武器去“改变世界”：革命。

马列主义理论包括一种科学（历史唯物论）和一种哲学（辩证唯物论）。因此，马列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两种理论武器之一。共产主义战士必须消化和使用这个理论的原理：科学与哲学。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同时是科学家（历史唯物论者）和哲学家（辩证唯物论者）的战士去协助捍卫和发展这个理论。

——路易·阿尔都塞

利比亚局势评论两则

作者：沃勒斯坦

转移视线的利比亚战争

译者：泥石流

所有上个月发生在利比亚的战争——利比亚内战和以美国为首的针对卡扎菲的军事行动，既不是人道主义干预，又与当前的世界石油供应无关。这是一次眼球大转移——绝对有意的转移——从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政治斗争中转移出来。在一件事情上，卡扎菲和西方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试图缓解、引导、操纵和限制这第二次阿拉伯起义以阻止它颠覆阿拉伯世界的既有秩序和阿拉伯世界在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角色。

要明白这点，就需要追溯历史。尽管各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和外部势力以各种形式干涉支持某些国家的现象在很长时期内是司空见惯的。但默罕穆得·布瓦吉吉（Mohammad Bowazizi）于2010年12月17日的自焚，也许会让这一切改弦易辙。

在我看来，这是1968年世界革命的精神延续。1968年的最后几个月，在阿拉伯世界，凭着勇气和决心发起反对政府抗议的不是其他人，是青年！促使他们起来的动机有：1.当局的专横、残暴和腐败；2.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3.对宗教和政治这两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我政治和风俗文化命运的权利诉求，这也是最重要的。当然，他们同样反抗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压迫和其国家领导人甘于国际压迫的殖民道路。

至少在一开始这些青年人不曾组织起来，也没有行动的政治意义，但他们极具锐气。和1968年一样，他们的行为同样颇具传染性，很快地在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冲击起旧秩序来。他们在最关键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展示出的强大力量迫使（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开始认真考量起这一变局。考量得出了两种解决办法，其中一种是参与暴动并掌控它；其二是采取强力手段镇压。这两种办法都已经予以实施。

如萨米尔·阿明的分析所强调的，还有其他三股力量也参与了埃及暴动：1.传统左翼和新兴左翼；2.中产阶级技术官僚（即萨米尔·阿明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支持者，见<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789>第三篇《埃及的运动》——译者注）；3.伊斯兰激进分子。这些有政治倾向的人群在各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对比和特征各有不同。阿明看到了左翼和中产阶级（就他们是民族独立分子和非跨国新自由主义者得意义来说）的积极意义和赶搭末班车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反动性。至于军方，这个一贯以维持旧秩序著称的坚固堡垒，在后期倒向埃及完全是为了左右起义的规模和方向。

利比亚的起义，是其两邻国——突尼斯和埃及造反成功的直接结果。卡扎菲是一个相当残酷无情的领导人，他已经发布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如何惩处叛徒的声明（就译者的了解，卡扎菲并无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反倒有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的公开声明）。不过，法英美在极短时间内做出了军事干预的决定，差不多只是因为卡扎菲是它们的眼中钉，尽管他主动把石油卖给西方，并帮助意大利遏制住了非法移民潮，尽管他在商业利润的蛋糕上切了很大的一块给西方。

干涉阵营内部有两种声音：1.坚决要求军事干预的，虽然有着部分还是全面干预的争执；2.主张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时给予干预。但他们都遭到了美国军方的极力反对，在军方看来，

这场在利比亚的战争胜算无几，而且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军事负担。当阿拉伯联盟的决议打破这一僵持不下的局面时，貌似后者的意见胜出了。

那么这项决议是怎么回事？这是沙特努力争取到的一个同意建立禁飞区的决议结果。为了争取到阿拉伯国家的一致首肯，沙特做了两处让步：1.只保留了建立一个禁飞区的要求；2.接受了反对任何西方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的建议。

是什么让沙特积极推动了这项决议的通过？是不是有人从美国打电话给沙特要求它这样做的呢？我认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沙特试图影响美国决策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相反。它试图通过这样来打破僵局。

沙特想要的和它得到的就是这次混淆斗争方向的视线转移。从他们觉得最迫切要干而且确实着手在干的伟大事业——对阿拉伯起义的镇压的转移出来。在它看来，这会威胁到沙特，然后是海湾国家，然后是整个阿拉伯世界。

在 1968 年，这种反政府的反抗给予被影响的国家以莫名其妙的分裂，同时也创造出了出人意料的联盟。呼吁人道主义干预就是变相分裂。我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指责就是我从不认为那玩意就是人道主义。人道干预主义的拥趸们声称没有人道主义干预的地方就有卢旺达，但他们无视被干预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没错，在短期内，貌似确实阻止了一些有可能发生的屠杀，但从长远来看，它真的做到了吗？为了阻止萨达姆-侯赛因的短期屠杀，美国入侵了伊拉克，在这十年内被杀的人是否更少了呢？似乎并非如此。

人道干预分子们似乎有一个诡异的量化标准：当局杀掉 10 名示威者这码事若值得来点口头谴责的话，那就是“正常”；若当局杀掉 10000 名示威者的话，那就是犯罪，需要人道主义的战车干预。照此逻辑，当被杀的人数达到多少时才是“正常”和犯罪的临界点？100 个？1000 个？

今天，西方列强对利比亚发动的战争，结果并不确定，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泥潭。它能成功把全世界的视线从阿拉伯起义转移开吗？也许吧，我们不知道。它能成功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吗？也许吧，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卡扎菲下台，谁将接他的班？连美国自己都担心取代他的不是他的老部下老跟班就是基地组织，或者二者合流。

即便从美国自己狭隘的角度看，即便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美国队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也是很失策的，而且将不会很快结束。奥巴马给自己做了一个充满政治辞令技巧的、微妙的辩护。他能说的基本上就是：作为美国总统的他通过慎重的判断认为这次干预是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益，他能够而且应当如此。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痛苦地总出了决定，这个决定还不够好。那是一个糟糕的、很不靠谱的并最终自食其果的决定。

此时可此。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这第二次阿拉伯大起义重新焕发生机（也许希望不在此刻），并首先席卷沙特。

本文转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布罗代尔中心网站：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

布罗代尔中心评论中文版：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commentaries/chinese-simplified.html>

利比亚和世界左翼

译者：路爱国

在利比亚事态上存在如此之多的虚伪和混乱分析，以致我们都不知该从何说起。形势分

析中最被忽视的方面是世界左翼的深刻分裂。几个左倾的拉美国家，最明显的是委内瑞拉，他们对卡扎菲上校的支持引人注目。但中东、亚洲、非洲、欧洲乃至北美的世界左翼发言人则表示坚决不能同意。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分析似乎主要或完全集中在如下事实上，即美国和西欧威胁和谴责卡扎菲政权。卡扎菲、查韦斯以及其他有些人坚持认为，西方世界要入侵利比亚，“窃取”利比亚的石油。整个分析完全无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削弱了查韦斯在世界其他左翼人士中的声望，也使他们看轻查韦斯的判断力。

首先，在过去10年直到几星期前，西方媒体对卡扎菲几乎全是正面报道。卡扎菲试图以各种方式证明，他绝不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而只是希望全面融入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的主流社会。利比亚与西方世界已达成一个又一个利润丰厚的安排。至少就他过去10年的表现来看，我很难把卡扎菲看作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英雄。

利比亚陷入骚乱是因为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获得成功。卡扎菲则企图以最残酷的方式镇压第二次阿拉伯起义中所有反对派。假如卡扎菲得志，他就向该地区其他所有受到威胁的暴君传达出一个信息，即严厉镇压而不是让步才是正路。

这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所认识到的，而拉美的某些左倾政府却没有认识到。正如萨米尔·阿明在他分析埃及起义中指出的，示威者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青年、激进左翼、中产阶级民主派和伊斯兰激进派。激进左翼由被压制的左翼政党和再现活力的工会运动组成。毫无疑问，利比亚的激进左翼要小得多，军队也弱得多（因卡扎菲蓄意制定的政策所致）。因此，那里的结果非常不确定。

或许用世界左翼的两个证词来结束此文不无裨益。爱尔兰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海伦娜·舍安姆，受卡扎菲政权之邀到利比亚的大学讲学。她到达时正当骚乱爆发。在大学的演讲被取消，她则干脆被其邀请方弃之不顾，不得不靠自己艰难脱身。她每天写日记，在最后一天即3月8日，她写道：“任何有关该政权的矛盾心态都消失、消失、消失了。它残暴，腐败，欺诈，妄想。”

我们还可以看看南非的主要工会联合会和左翼之声即南非工会大会的声明。南非工会大会在赞扬了利比亚政权的社会成就后说：“但是，南非工会大会决不接受这些成就以任何形式，被当作屠杀抗议卡扎菲上校暴虐专政的示威者的借口，并重申它支持利比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和人权。”

让我们继续关注事态发展。现在，世界范围的主要斗争是第二次阿拉伯起义。在这场斗争中要取得真正激进后果将非常困难。卡扎菲对阿拉伯左翼乃至世界左翼都是一个主要障碍。或许我们都应该记住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格言：“让自己自由意味着让别人自由。”

本文转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布罗代尔中心网站：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

布罗代尔中心评论中文版：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commentaries/chinese-simplified.html>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844>

与埃及社会主义者的谈话

译者：赵丁琪

译者按：这是记者对埃及革命社会主义领袖的访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埃及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在埃及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媒体一直强调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的作用，而社会主义者所起的作用却被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忽略。1月 25 日的开罗大游行，是埃及革命社会主义和其他左翼团体共同组织的。而之后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频频出现的埃及最大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因为自认为无法控制运动的发展，而拒绝参与示威游行的策划工作，只是在形势明朗之后，才参与进来。从运动的第一天开始，工人阶级就一直是运动的中心力量，在示威中死亡的第一位烈士也是工人。

这篇文章反映出埃及示威者中的几股主要力量。埃及最大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在示威者中所占人数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却因为他们严格的纪律性和出色组织工作，在运动的某些阶段起了关键的作用。但现在穆斯林兄弟会有面临分裂的危险，因为党内有一些人图淡化政党的宗教色彩以争取更多的支持，但保守力量坚决反对。总体来说，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力量，并不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在运动中涌现出了一些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反对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力图推动向军政府施压，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但他们对工人的要求和运动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力图将革命保留在资产本主义的框架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部分自由主义者的恐慌，他们在 FACEBOOK 中号召集中力量袭击罢工工人。

在埃及革命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则不仅要求政治改革，而且要求在政治革命之后，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社会改革，这些要求包括没收穆巴拉克及其政权的资产、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减少失业、建立独立的公会、提高失业工人福利等。

埃及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和斗争，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在现在和将来的某些关系。为了反对政治上的独裁者以进行政治改革，自由主义者需要取得工人的支持。因此，他们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会以代表全社会利益的面目出现，装出一副关心工人的伪善面目，目的是利用工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一旦他们的目的达到，政治改革的目标完成，工人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马上会凸现出来。自由主义者们止步不前，力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人则要求进一步进行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的改造。这样，在反对政治专制中结成的同盟便会破裂，工人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便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我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自由主义者是进步的，但他们总会有一天站在工人的对立面上，他们是工人今天的同盟者和未来的敌人。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埃及的工人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仍然是同盟者。因为埃及的政治革命还远没有完成，穆巴拉克的下台并不意味着埃及民主化的实现。穆巴拉克并不是被示威者推翻的，而是因为示威者的压力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现在统治埃及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而是军政府。军队正在整合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反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而埃及的工人阶级也在迅速积累、扩大自己的力量，并正准备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政党。可以预见，工人阶级与包括军政府、自由主义者在内的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是未来埃及的主要矛盾。这场革命的最后结果到底如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Conversation with an Egyptian socialist

问：对于埃及所有的革命者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时刻。但是在 1 月 25 号，一切都发生了，在这之前，你预见到了这一切了吗？

答：当然，在理论上，埃及的局势已经动荡了数年，所以革命的爆发时可能的。但我们没有料到它会在 25 号发生。大量的示威者参加了抗议并且他们的斗争性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已经习惯人们号召群众大规模示威的要求被扑灭，一般仅仅有一百到两百人出现，并且迅速被国家安全机关击溃。但是在 1 月 25 日，抗议的数字迅速在开罗、亚历山大和一座又一座城市迅速膨胀起来。

抗议者成功的避开了警察一次又一次袭击。他们向警察扔石块。人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加入我们。妇女向我们扔糖果。在 25 日晚，我们意识到一个革命的时刻已经开始了。

问：在 1 月 25 日抗议的动员工作中，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答：我们和其他左派，与“四六青年运动”在 1 月 25 日的行动动员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支持在那天进行行动的号召，因为按通常的情况来说，他们并不喜欢支持他们无法控制的行动。因此左派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我们和其他左翼力量详细制定了 25 日的行动策略。比如，我们决定抗议在埃及不同的地方开始，然后在塔利尔广场游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国家安全机关集中在我们的行动开始之前，在任何一个中心位置集中他们的力量摧毁我们的行动，就像他们以前做的那样。那是一个有用的策略。

另外，平心而论，安全机构也确实没有料到最后会有这么多人参加行动。他们措手不及。

问：西方和埃及媒体一直强调这仅仅是一个青年人通过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网站组织的革命。在那些最初的日子里你能看出这场革命的阶级本质吗？

答：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在鼓动这场革命时起了先锋作用。但是工人阶级从第一天开始，就是革命的中心力量。

举个例子，在苏伊士，一个有着很长的反英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工人阶级的城市，是这场革命的前线。大批的工人从工厂中走出来涌向街头，在第一天他们牺牲了第一位烈士，哈菲兹·谢赫·萨拉马，一位 40 年代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领导人，在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他也曾与街头的革命者一起战斗。他也加入到塔利尔广场的行动中。

在埃及也有一位类似的工人，Alexandria 和 Mansoura 在从事件开始的所有行动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在那个时候，工人并没有以集体的形式加入革命斗争，因为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罢工和关闭工厂。这在 2 月 11 日穆巴拉克下台之前即将改变。

问：在塔利尔、亚历山大有数百万人参加了革命。你呢？作为一名组织和参加革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什么是你的重点目标呢？

答：从事件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纳萨尔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在领导抗议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参加者的数目迅速增加并且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地区超过了一百万，我们必须集中精力重点做一些事情。我们选择了五个要集中精力做的事情。

我们把工人阶级的要求放到我们进行宣传和鼓动的中心位置。在工人运动中，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同盟者和联系人联络，力图推动他们通过罢工来推动革命的深入进行。

我们号召没收与穆巴拉克政权有联系的大公司的资产，并且要求这些资产在工人的控制之下国有化。

我们号召把这场革命从政治革命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号召普遍建立 1200 英镑的最低工资制度、独立的工会，解决失业问题，提高失业工人的福利以及满足其他工人阶级的要求。

我们发表了六个声明来详细阐述我们的分析和要求。我们在广场分发了成千上万份声明，并且也使用了我们的网站来使我们的声明能被国家其他部分的人民知道。

问：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国家最大的反对派，在这次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答：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没有签署 1 月 25 日行动的声明。他们通常不支持他们无法控制的行动。但是在第一天之后形势变得明朗之后，他们才决定参加。

他们在塔利尔和其他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 2 月 2 日政府派出带着自制的燃烧瓶骑着马的暴徒袭击示威者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的人数起了作用——在街头，他们仅有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政治支持者，13 个烈士中仅仅有一个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出色的组织水平起了作用。他们高度严明的纪律帮助他们保卫广场。

他们现在正准备公布另一个新的政党的信息。一些人希望他们建立在公民和非宗教的基础上。保守派反对这个提议。也就是说，他们的队伍可能会发生分裂。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更解放的组织的正在形成，EtilafShababAlthawra，革命青年联盟，提出了许多政治要求，并且在上周一同军队进行谈判。

这些成员中包括了许多参加革命的行动者。但是，他们代表了中产阶级中争取解放的一翼，希望把革命限制在争取民主改革的政治革命的范畴内，并不准备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体制。这些自由主义者把他们的角色定位为通过建议或者向军队施压，用政治的技术专家代替这样或那样的腐败分子。

许多自由主义者现在敌视工人的罢工。他们说工人是自私的。一些人正在 FACEBOOK 上组织针对罢工的袭击。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只想要政治革命。他们反对工人运动。

当然，我们支持和要求民主改革。但是我们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被置于中心位置的激进民主而战斗。但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者在政治革命的时候并不想止步不前，我们要组织埃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

问：在埃及有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左派。你们和其他激进左派的关系是怎样的？你正在发表其他政治声明吗？

答：我们总是和其他左派力量相互配合。举个例子，我们是激进左派前线的一部分。我们一起配合支持罢工，游行，媒体和共同发表公共声明。那是重要的。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并且许多左翼和右翼力量正在发表倡议组建政党。

我们也发表我们的倡议和主张。首先，我们帮助在学生和工人中间组建保卫革命的委员会。我们现在已经在激进工人中间收集了数千份要求组建新的工人政党的签名。这个政党能组织和代表、阐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推动革命更深入的发展。

问：埃及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是庞大的，并且罢工是人数众多并且广泛的。你们准备从哪儿着手去组建这样一个政党？

答：是的。那确实是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不准备从头开始。我们已经和前些年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建立了联系。同时，我们精力集中于经济的中心部分：纺织业、邮局、铁路、运输业、通讯和水泥产业。

我也认为组建独立的激进团体来代替亲政府的同盟的运动将会成功，并且这将会支持我们组建工人政党的努力。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你将采取主动并且看到将要发生的一切。

军队正统治着这个国家，发表声明并且解散议会。你觉得军队下一阶段将会做什么？他们将使用暴力反对罢工吗？

军队是埃及经济的关键部分。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中，它占有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

军队强迫穆巴拉克下台并且取而代之，目的是试图延缓革命进程并且解救现在的统治秩序。革命的压力引起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穆巴拉克，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坦塔维，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想利用武力结束革命。阿南中将萨米哈菲兹，1月25日在美国的军队参谋长，拒绝使用武力。在那个时候，除了使穆巴拉克下台别无选择。

现在，军队正在呼吁罢工工人结束运动。这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禁止罢工和袭击罢工工人。从现在来看，他们还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在军队袭击罢工者之前，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动员整合反对罢工者的公众意见——不仅仅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最后，军队现在正在一个困难的处境。埃及革命引起了巨大的宗教和国际影响。世界正在关注我们。革命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潜在的向社会革命过渡的趋势。这不同于80年代菲律宾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反对苏哈托的斗争。与上面提到的两次革命相比，埃及工人阶级在我们的革命中处于更中心的位置。

埃及工人阶级通过从04年以来激烈的阶级斗争，在1月25日的时候，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因此，统治阶级试图限制政治革命的行动必然会更加困难。

赵

2月23日

原文网址：<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1/02/23/conversation-egyptian-socialism>

译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16>

生活水平对比：苏联 1980 与美国 2008

作者简介：谢尔盖·洛帕特尼科夫—数学模型方法实验室主任，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学者，现任教于美国特拉华大学（(U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著作遍及物理学，声学，地球物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有数十篇关于地缘政治，政治评论和经济分析的文章在苏联-俄罗斯大众媒体上刊载。《生活水平对比：苏联 1980 与美国 2008》一文完成于 2009 年。

作者：谢尔盖·洛帕特尼科夫

译者：KGB1986

从“改革”开始算起，24 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至今仍未能恢复到 1985 年的水准之上。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以 1980 年的苏联经济数据为基础。还应当注意的是，1980 年，正是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 35 个年头——而离“民主剧变”也还有十年有余。

在开始比较前，我想先揭露一至关重要的事实真相，而这个真相正是那些满脑子豆腐渣的“高等人类”（译者注，эльф=elf，这里指那些高傲，自视聪明，实际上带有偏见且异想天开的人）所断然回避的。那就是，苏联仅在 1941 年-1945 年抗击德国侵略的过程中就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若细化到物质损失上，请看下面：

那些被德军侵占的苏联国土，在战前对于整个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上面生活着占苏联总人口数 45% 的居民，为全苏联提供了 33% 的工业产值，47% 的作物播种面积和 45% 的牲口（大型家畜），铁路里程占全苏铁路总长的 55%。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在那里焚毁了 1710 座城镇，7 万多个村庄。150 万栋房屋和建筑遭到彻底毁坏或受到部分破坏，致使 2500 万人失去家园，无处容身。31850 个工业企业被摧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那些机械制造和冶金企业，在和平时期，总产品中近 60% 都是由它们生产的），还有数不清的小型企业车间，1876 个国营农场，2890 个拖拉机站，98000 个集体农庄，216700 家商店，食堂，餐厅，和其它商业企业，4100 个火车站，36000 个邮政电报局，电话局，广播站和其它通讯企业，6000 家医院，33000 家诊所，防疫站和治疗所，976 座疗养院和 656 个度假地，82000 个中学小学，1520 个职业教育机构——技术学校，334 个高等教育机构，605 个科学研究所和其它科研机构，427 个博物馆，43000 个图书馆以及 167 座剧院。

德国占领军及其帮凶破坏、掠走了 175000 台金属切削机床，34000 套击锤——压力机，2700 台采煤机，15000 套风镐，5 百万千瓦容量的水电设备，62 座高炉，213 座平炉，45000 台织布机及 3 百万个纱锭。苏联最宝贵，最主要的工业基地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和平时期修建的 122000 公里铁轨中的 65000 公里在占领之下遭到破坏，15800 个机车头，428000 节车厢被击毁。侵略者击沉或俘获了 4280 艘客运，货运和内河摆渡轮船，舰队技术支援船和 4029 艘无动力船只。26000 座铁路桥中有 13000 座被炸断。有 2078 公里长的既有电报——电话通讯线路在沦陷期间被侵略者破坏和窃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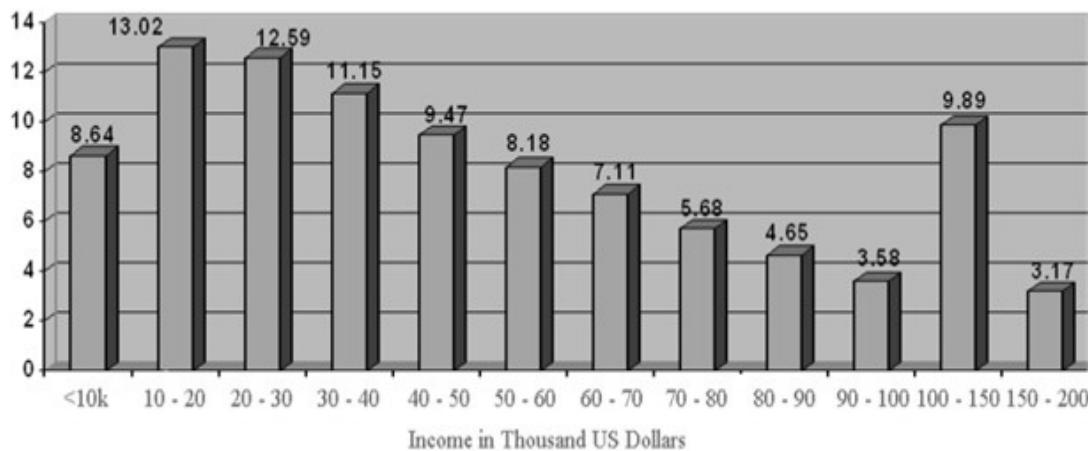
苏联居民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爆破及纵火焚烧。2567000 座城市居民住宅中有 1209000 座在沦陷期间被破坏，这些毁掉的城市住宅加起来占到了城市规划居住面积的 50% 以上。在农村，1200 万个住宅中有 350 万个在沦陷期间被破坏。

而如此惨重的浩劫与美国毫不相干，相反的，美国人还大发战争财，GDP 获得了增长。

自然，在“高等人”的病态大脑臆想中，苏联所蒙受的巨大损失是凭空复原，且不费吹灰之力的。然而，在这里必须再次指出，从“改革”开始算起，24 年已过去，我们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至今还未恢复到 1985 年的水准之上。

综上所述，在进行对比时，我们有理由以 1980 年的苏联经济数据为基础，并且要清楚的是，1980 年，正是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 35 个年头——而离“民主剧变”也还有十年有余。

还要注意第二点——苏联国民收入体系与美国国民收入体系间存在着差异。



上图展示了 2007 年美国家庭的收入结构（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资料，单位：千美元）

根据这一收入结构柱状图，可以得出当今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 5 万美元左右。

我们会发现，收入结构柱状图的高低走向犹如两个隆起，看似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下的“低层阶级”构成了第一个，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上层阶级”构成了第二个，“上层阶级”得数目大约占了总人数的 13%。而在过去的苏联，人们的收入结构分布却是另外回事：真正意义上的“上层阶级”并不存在，高收入家庭占有的比率迅速而又均匀地下滑。

与此同时须指出的是，“上层阶级”的大量存在导致美国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形一直被歪曲和掩盖。首先，“上层阶级”在外来访问者面前历来显眼，而通常来讲，也鲜有人去造访那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如此一来，美国“中产阶级”就拥有了十分“引人神往”的轿车与洋房。但过去在苏联，能够与“中产阶级”对得上号的，恰恰是那些常有机遇外出访问的人，此类人数量不多，收入水平换在美国至多算得上是“中下阶级”。这种收入结构的差异特性凸显出苏美两国在贫富收入比（10% 最富有居民的收入与 10% 最贫困居民的收入的比值）上存在着巨大落差。

知晓这样的情形后，更为合理的比较方法便是：以美国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为参照，去与苏联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做比较。其实要算出美国这类家庭的实际平均年收入并不难，若去掉收入结构柱状图的峰值，即可得知他们的实际年均收入不超过4万美元。

这个“4万美元”就是我们在本文中用来衡量1980年苏联中等收入家庭生活水平的标尺：众所周知，1980年，苏联中等收入的两口之家月工资为340卢布（平均月在职工资为170卢布），全年总收入约为4000卢布。那么单从数值上来看，2007-2008年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以美元表示）正好是1980年苏联中等家庭收入的十倍之多。

不过，这仅是表面上的比较而已，我们必须要去分析的是，1980年苏联卢布在生活消费计划中的相对实际购买力，以及当今美元在生活消费计划中的这一能力。

还必须要比较1980年苏联卢布的日常购买力与当今美元的日常购买力。

必须要比较苏美两国民众日常开销中，生活必需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率。

分析生活必需品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分析那些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或必不可少减少的商品。在此我将生活必须开支归为了四大类：

1 购房支出

2 交通出行支出

3 食品支出

4 穿着支出

相对来说，前三类支出更具有“随意”性，因为它们不受气候限制，也不是“每天必须”。穿着支出则更类似于长期性开销。尽管衣物具有相对较高的“一次性”价格，衣物的使用期却是足够长的，因此在日常消费中占有的比重并不大。

当然，这样的道理也能适用于其它一些商品，比如电视和家具：商品相对较高的“一次性”价格因它们自身的使用周期长而被“稀释”——电视机只要未报废就能看，家具可以一连放好几十年。正是鉴于此，我们将对比范围限定在最基本的，占必须开支比重大的日常消费项之内。

住房

1980年苏联住宅（租赁）价格

1. 莫斯科两室“国有”住宅每月租金为12.5卢布
2. 电话费4卢布/月
3. 平均电费0.02卢布/度

4. 不限量使用点燃起 2 卢布/月

5. 暖气 2 卢布/月

2009 年美国住宅（租赁）价格

1. 在大城市租赁单卧住房的价格不少于 700 美元/月。知名网站 www.realtor.com 在亚历山德里亚（华盛顿郊区）的最低租赁房价为 900 美元/月，面积 590 平方尺（少于 50 平方米）。1000 美元/月以下价位的，仅有 15 栋位于远郊的房子供出租。

http://www.realtor.com/realestateandhomes-search/Alexandria_VA/beds-1/baths-1/price-na-1000/type-rentals?sby=1（译者注：作者在文中给出来源网页地址）

2. 固定电话费 36 美元/月

3. 水费 30–50 美元/月

4. 电费——按美国平均价格—0.11 美元/度

5. 天然气——根据用量而定。我个人，冬天三个月实际花费 360 美元，也就是说，120 美元/月。实际上，暖气和热水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那么租房价格比例就是：

苏联两室住宅月租金总额为 25 卢布（译者注：按两口之家算的）

美国单卧住宅月租金为 1000 美金（译者注：租赁价格固定，两口之家，或是单身都没有影响）

这样的话，比例为：1000：25=40。也就是说，在住房方面，1 苏联卢布的购买力大约等于当前 40 美元的购买力。

交通出行

在比较交通出行开支前，须说明一点：这里的必须开支仅限于正常情况下，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达到目的地所需的费用。

此处我们再次遭遇了模式上的差异：在美国，大城市以外的公共交通几乎不存在，原因是工作地通常离居住地远不止十英里，而是几十英里（译者注：1 英里约等于 1.6 公里）。所以我们在这里仅就大城市中的公共交通进行探讨。

1980 年，莫斯科所有类型公共交通工具的月票价格为 3 卢布。

2009 年的纽约没有电车和有轨电车公共交通运输。公共汽车的作用仅限于运送乘客到达地铁站周围。地铁站范围以外的公交线路，据我所知，是没有。地铁与公共汽车月票的价格为 80 美金。

私家车对于美国的含义：在美国，人人都不得不购买轿车用于上下班，购买轿车的开支被视为是必须的。这不同于在苏联，是否拥有私家车是一种自由选择，没有轿车，也还有另外的出行方式可供选择。

在美国，轿车的年平均行驶里程为 12500 英里（译者注：大约 2 万公里）。轿车完全报废前大约能行驶 10 万至 12 万英里的路程（译者注：160000 公里至 192000 公里）。也就是说，十年的期限中需为轿车支出费用。根据统计，轿车均价 2 万美元，那么每年需支出 2000 美元。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油费：一台中低级品质的四缸发动机每 30 英里（译者注：约等于 48 公里）耗油 1 加仑（平坦路面上），它的全年总耗油量便是 $12500:30=416$ 加仑。油价为 2 美元/加仑，全年的油费就为 832 美元。将相关数据加起来：每月用于轿车的开支总额 = 月固定开支 + 每月油费 = 236 美元。最后还要为轿车购买必须的保险，否则上路行驶将构成违法；保险的最小额度（保险是一次性的，所以仅涵盖部分开支）为 60 美元/月。那么所有相关数据综合起来看，在美国驾驶轿车的月最少开支为 300 美元。

在交通出行费用比例上：苏联卢布的购买力大约是当前美元购买力的 30 倍至 100 倍。

美国的穷人住宅，如今这样的房子在亚历山德里亚要卖 523900 美元（经济危机期间）

食品

由于饮食习惯的差异，要比较食品上的支出是有些难度的，但至少有两类方法可以使用：

第一类，分析苏联（广泛存在的）公共食堂的午餐均价与美国最流行食品的均格。

在美国最便宜的麦当劳连锁店中吃一顿：有夹生菜的汉堡，肉饼（译者注，肉类和淀粉混合制成的大肉丸子），油炸薯条以及一杯汽水——碳酸饮料，要 6-7 美元。

在苏联公共食堂吃一顿含三道菜的午餐：红甜菜汤，陶罐炖肉，沙拉，再外加一杯咖啡或一杯茶，只要 0.60 卢布。而最便宜的午餐是：汤，肉饼配土豆泥或是配荞麦饭——只要 0.32 卢布。

所以“BigMac”（译者注：BigMac，麦当劳贩卖的一种汉堡包，其名称意为巨无霸）比例是：10-20——1 苏联卢布相当于如今的 10 美元或 20 美元。

第二类方法，比较具体食品的单位卖价

土豆价格上的比例：1980 年的苏联，土豆价格为每公斤 0.1 卢布。2008 年的美国，土豆价格为每磅 0.5-0.9 美元（译者注，1 磅约等于 0.5 公斤）或每公斤 1-2 美元。此等条件下，苏联卢布的购买力是如今美元的 10-20 倍。

肉类价格上的比例：一些年份由于实施商店半价销售而导致苏联国内的肉类供应紧张，但市场上的肉类价格却一直维持着每公斤 4-6 卢布的价格，相对于今日美国每公斤 8-15 美元的肉价，可以有把握的讲，比例是 2-4（既如今的 2-4 美元才相当于过去的 1 苏联卢布）

面包价格上的比例：一条 450 克的白面包在苏联的售价是 0.13 卢布。同样的白面包在今日美国的售价却是 1.5-3 美元。经过换算，比例为 10-20

还有类比例换算方法——比较家庭每月食品开支

苏联家庭的每月食品开支稳定在人均 60 卢布（三口之家算 180 卢布）

美国的三口之家每月在食物的支出为 800–900 美元——也就说说人均 250–300 美元。根据这一方法得出的换算比，可以认为，1 苏联卢布相当于如今的 5 美元。

穿着

要针对穿着支出来计算苏联卢布的购买力十分之复杂，但从主要的方向入手，可以确信：购买鞋子时，比例为 3–4——1 苏联卢布可以当如今的 3–4 美元来使用（购买同等质量的鞋子时），女靴的价格是例外，在某些情况下购买女靴时，换算比还会上升到 10（在美国，冬季保温女靴的价格是 500–700 美元）

同样的，在购买衣物——如男式大衣，西装上衣时，比例大致也为 3 到 4。

结论

结论就是：1 苏联卢布在用于交换不同类别商品和服务时，其购买力相当于如今的 3 美元，4 美元，甚至是 100 美元。

核算了各种消费支出的不同比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1980 年的 1 苏联卢布平均等于如今的 10 美元。美国人今天的生活水平，**如不包括高收入群体**，和 1980 年的苏联普通居民差不多。

过去正是由于错误地拿苏联中等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去和美国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及其不重叠的优先报酬（译者注，指美国高收入群体敛财方式多样化且相对穷人具有优先权）做比较，才造成了苏联美国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假象。在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能划归到高收入群体中（比如，1980 年，苏联科研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就低于建筑工作者，交通系统员工和工业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水平，仅排在第四位），而在当时的美国，高收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有高等教育背景。

不过为了公平，还须讲清楚，什么是工作条件——算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头上的又一项“成就”。事实上，在斯大林时期，甚至是战争期间，工程师的平均工资都是工人平均工资的 6 倍，而教师——教授的平均工资是工人平均工资的 6 倍到 7 倍多。斯大林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用位于索科尔山（译者注，意为金鹰山，莫斯科市区一地名），莫斯仁克（译者注，莫斯科市郊区的科学院士城），银松林（译者注，位于莫斯科河畔，莫斯科市西郊的森林高地），别列捷尔基诺（译者注，位于莫斯科州列宁区的城镇），克利亚济马河畔（译者注，奥卡河的左支流，流经莫斯科州）和其它类似地点的院士——教授别墅来评判。这些别墅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涨到了**百万美元的价位**——美国的任何一个教授都不可能买得起。

这就是真实的现实，而非“高等人”所想的现实。

当然，并不是说苏联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改革”的最新进程已告诉我们，与今日俄罗斯联邦靠**抬升物价去消除**那臭名昭著的短缺，以及丝毫不顾及人们在各个方面消费能力萎

缩这一事实的做法相比，过去的那些问题简直微不足道的——看吧，如今的肉价都已翻了两倍，难道小轿车还能幸免？

除了那些完全呆了的人，谁也不会尝试推翻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唯独有必要再提下房子的事，因为有两人发表过这种言论：“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拥有私人住宅。”，年轻人和父母是分居的。

就这种言论，我想引用弗·恩格斯讲过一句名言来提醒大家：“把鞋刷归入哺乳动物，它也不会生出乳腺来。”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自有住房在美国“屈指可数”。通常是认为 66% 的美国人“拥有”私人住宅（而剩下的人全是租房住），然而事实上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靠举债贷款来买房，还要作抵押。房屋产权其实是作为放债人的银行所有：购房首付占房屋总价的 7-8%，还款期 30 年。这意味着贷款全部偿付前，人们为每一美元的债务要向银行实际支付 2-2.5 美元，债务支出总额中有三分之二是“纯粹的租金”。还有两点：首先要讲清楚的是——“金钱的租户”（译者注，指贷款购房的人）被称作是房屋的拥有者，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房屋租户，他本人须对房屋结构全权负责：房顶破了，是他负责，马桶坏了，也归他管。一般情况下，租赁房屋的相关维修费会预估到租金里，但在贷款购房时，这类收费却会换种面目出现——更准确的说，是以支付给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形式出现。如此一来，房屋真正的拥有者——银行就不必为属于它的房子承担任何维修责任。

其次，贷款的分期支付受限于特定的方式：“金钱的租户”头五年仅能支付银行利息，五年中偿付的总金额仅相当于银行附加额外收入总额（译者注，银行利息总额）的三分之二，五年后才可以以最低额度偿还债务本身，而直到贷款期末尾时才能够全部偿还完毕。这意味着，头五年，人们实际上仅是银行持有房屋的租户，并且还要承担一切修缮义务。

最可笑的是，五年——正好接近于房屋持有的平均时间。通常，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因工作关系，每 5-7 年便会搬一次家。那么结果就是，贷款买房相当于租房，还成了“租房专业户”。

还有另外种情况：如果贷款还完了，会发生什么？获得产权？——答案是：所有者真的会得到一栋至少受过最低限度大修的折旧房屋，当然修缮费用已经值得上一栋新房子了。

换句话说就是，“自有房产”——事实上纯粹是扯皮。

怎么样？再顺便说下汽车产权：汽车贷款分五年偿付。而五年后，汽车的机械折旧率会是 75%，因为它已达到中等——最大行程。

现在明白了吧，高雅的《所有者》称谓麻痹着人们的心灵，其实那与现实没有任何的，哪怕一点的关联。

还有一种的言论是——在苏联存在着美国所没有的声名狼藉般的紧缺。

这话根本就不对，1980年，食物及其它商品能够完全自由地在市场上购买，仅仅是人们不愿意那样做。人们宁愿在商店中寻找国家定价的商品，也不愿意按市场价格去购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更严重的误区。

这就是（不清楚）：商店货架上商品空缺带来的不便不能等同于贫穷和低消费。相反，柜台上的琳琅满目并不意味着富足。

实际消费是一种符合事实的尺度，而非货架上的表象。

就是这么回事：所有基本类别商品（汽车消费可能除外）的消费，特别是食品消费上，新俄罗斯都落后于苏联。这个甚至连改革派都不否认。也就是说，当今俄罗斯人实际上——在丰盛的货架面前——变得更加贫穷了，不如供应紧张条件下的苏联时期。绝对意义上的最大消费是在1985年实现的。

当然，这不是为商品紧缺辩护，然而，这清楚的指明了供应紧张与丰富——既生活的水准——是呈现在质的不层次中。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苏联与新俄罗斯的比较，对比苏联与美国时也同样适用。今日美国丰富的货架不代表美国大众消费水品就高于1980年苏联的群众消费水平。

一些人存在着这样诠释事物的倾向：供应紧张即贫穷，没有供应紧张=高生活水平——这是欺骗，这种论调就象在说：贷款买房的人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者。

第三类人的言论最有趣：好吧，您证明了，从满足基本消费的角度来看——苏联中等收入的居民过得至少不比美国的中等收入居民差（除了“上层阶级”）。但生活水平绝大部分意义上是绝对于“奢侈度”的，也就是说，要看人们能不能够让自己去享受主要的高端消费。

好吧，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根据基本生活支出比例，1980年苏联人的家庭平均收入大致与2008年美国人的中等收入持平（如果将美国“上层阶级”排除在分析之外）。因此自由支配的余额差不多也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余额在具体项上的比例，并将它们用来比较。

这时，我们会发现两国人在消费习惯上的惊人差异，但也只会得到一个结论：在用于人的全面发展——如参加儿童（兴趣）小组，观看话剧，音乐学院演出，看电影，读书和休闲的时候，苏联卢布的价值是美元不可比拟的。

比如说，美国高水平但收费异常昂贵的高等教育与苏联完全免费的优质高等院校教育就不可比。想想苏联卢布的价值会是美元多少倍？——现在美国最一般大学的全年学费为3万美金（毕业时共花费15万美元），名牌大学全年学费为6万美金或更多（毕业时共花费25万至30万美元），还不包括住宿费用，而过去的苏联高等院校教学近乎免费，学校还会授予40-45苏联卢布的奖学金，宿舍住宿每月仅收3-5卢布…

又该如何去比儿童教育呢？——在美国，参加为期一周的夏季数学培训营，“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需花1000美元左右。那么相比之下，过去苏联为期一年的提高班，少年宫、文化宫的各种课程是不是相当于“一文不值”了？

不过，还是有东西可以拿来具体比比的。

过去一张莫斯科音乐学院演出的前排票价是 3 卢布 60 戈比（译者注，1 卢布=100 戈比），而这类演出在美国应该是没有。如果有谁对这方面较为了解，欢迎指正。在纽约倒有一个类似的卡内基中心。

这里找到了费城交响乐团演出的最新票价：

<http://www.tickco.com/schedule/philly-orchestra/april-7-at-8-pm/>

最便宜的票要 97 美元，包厢需 300 美元。

这就意味着：比例是 100。（译者注，在此等条件下，1 苏联卢布实际等价于今天的 100 美元）

过去苏联电影院票价并不统一——从 0.25 卢布到 0.6 卢布不等（相对于新俄罗斯和全世界的最低价）。而在美国，电影票价 6 美元起。因此比例最少是 10，若拿廉价票来比较，则比例可达到 24。

度假休闲。在美国，带薪休假一般是三周的时间，在苏联则是四周。比较度假上的花费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据我所知，疗养院、度假地，在美国也是没有的，有的是游轮和火车旅行。通常，前往佛罗里达游玩一周需花费至少 600 美元（还要外加迪士尼世界的门票 70 美元/人），这还不包括饮食在内。而过去到雅尔塔疗养 4 周的花费是 120–150 卢布，包含三餐，提供免费体检和免费治疗。

因为这里的比例至少是 $2400/120=20$ 倍。

书籍。苏联流行书籍的发行量以几十万计，是当今美国书籍发行量的十倍。此外，80 年代的苏联还出现过小说类书籍的供应紧张，原因就是书籍本身极低的售价。珍本书籍在苏联的售价是 2 卢布多，而同等的书籍在美国要卖几十美元。

这就意味着：比例不少于 20。

若再谈到苏联极其丰富的科学技术书籍——无论是国内著作，还是翻译作品，比例将会更大。苏联科学技术书籍的售价一般不会超过 3 卢布（基本的价格范围是 1.50–2.50 卢布），而美国同类书籍的售价常常是几十到几百美元。

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与苏联人自我提高有关的商品，即使不比美国的同类商品便宜百倍，也能便宜个几十倍，自我陶冶这个词对于苏联人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了，苏联也确实有在比例上“输给”美国的时候——那就是非生活必需商品的消费。（译者注，可以理解成奢侈品的意思）

这类比例大致是 1-2：1980 年的 1 苏联卢布仅能等同于如今的 1 美元或是 2 美元。而根据我的观察，近乎均等的比例是基于某几类的服装和鞋子消费数据得出的。换句话说就是：基于工资收入量来分析，非生活必需商品的价格对于苏联人来说更贵，实际比现在美国人所承受的价格高出 5 到 10 倍。

美元贬值已持续近 30 年，那么 1980 年时，苏联卢布对于一些非生活必需商品的购买力可能会达到当时美元的 4-5 倍。这也大致与那时的黑市价格相吻合。

但造成比例近乎均等这一状况的唯一原因是：苏联出国公民的兴趣仅会集中在非生活必需商品上——而这些人既没有租房负担，也不用养车。于是关于卢布真实效用的幻像就形成了。还有就是：为了节约开支，苏联公民在前往西方国家时通常都自带食品。尽管这清楚地表明了食品价格在苏联国内更为低廉，但还是无法纠正有些人完全错误的印像。直到现在，这些人还保持着他们“阿郎若德”式的不学无术。（译者注，Оранжонид — “阿郎若德”指的是那类人——虽讲着俄语，以俄式思维解读事物，在俄罗斯文化熏陶下成长，却最终强烈地厌恶着俄罗斯的一切，并否认自己是俄罗斯人。）

那么结论归总起来便是：苏联人在个性发展上的成本要比美国人的成本大概低两倍半，那时是真的“唯物主义”——而在非生活必需消费上，美国人的消费成本要比苏联人的成本低 5 到 10 倍。

也就是说：1980 年苏联基本类商品的价格与如今美国同类商品的价格相比，要低 50 倍到 100 倍。而今天美国最高端消费商品的价格与 1980 年苏联此类商品的价格相比，要低 5-10 倍。

孰轻孰重，大家按照自己的见解作出选择吧。

并且：要想精准对比 1980 年与 2008 年，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拿来作比较的两个年份间相隔了近 30 年！也不能忽略时间跨度所能带来的巨大进步，就拿苏联来说吧，它任何一个时期的生活水平与之前的三十年相比，都是取得了长足发展的。

文章来源：

<http://sl-lopatnikov.livejournal.com/185400.html?page=1#comments>

Сергей Лопатников's Microblog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614>

苏联生活水平统计

作者：M. 库德里亚采夫等

译者：KGB1986

在过往的很多年中，苏联官方一直以“赶超美国”作为宣传口号。因此不足为怪的是，拿苏联对比“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方式也就深入人心了。进而，某些人往往以苏联“落后的事实”为理由，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和进行“市场化改革”是有益的。事实上，要“客观”地对比美苏两国的生活水平相当有难度。仅仅按统计数字来简单对比人均收入 - 不考虑人们对于自身福利的态度，不考虑人们期待怎样分配财富，也不考虑消费结构和国民收入结构 - 显然是不正确的。

人的满足感取决于那些被珍视的事物。比如，新时代的中国已不再象鱼儿咬钩一样吞进英国廉价的消费品，不再被迫向英国出卖茶叶以换取白银，而当年英国人为了要征服中国市场就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所以当我们拿苏联人民所享受的福利去与美国人所有的东西做比较时，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部分俄罗斯公民会反对我们提出的类比数据，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牛仔裤比牛奶更重要。也有不少俄罗斯公民认为，如今不用早起去排队买牛奶了，远比全民牛奶消费量的降低要好得多。（这是不可理解的，难道为了不排队就要毁灭能产出许许多多牛奶的经济基础？）

哪样更重要些呢？——是给富人们机会去加拿大还是为全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根据消费偏好的不同，金钱所带来的满足感也会有差异。有的人愿意多要多玩多休假，并不在乎收入比那些“小职员”少，对于这些人来讲，生活不意味着更坏。是啊，有不少俄罗斯公民认为，苏联时期的生活相比于当时美国人的生活要坏上十倍，但应当明白，这是人们的主观评价。至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美苏两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还没有达到十倍那么大。我们想指出的是，俄罗斯的消费体系或其它国家的消费体系都应符合其国家本身的特点，不能违背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倘若全俄罗斯都认为富豪跑去加拿大并非社会富足的表现，那么这类消费就不应当被列入统计数据中。

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奢侈品在消费统计中就开始占有很大比重，而对基本商品（价值）的主观评价便强烈地下降。让我们回想下80年代苏联的状况：人们吃饱穿暖，有房住，也就是说基本生活福利得到了完全的保障。这意味着人们对于奢侈品的消费需求一下就上升到了首要位置。那时候，有许多苏联人开始追求昂贵的牛仔裤、最新款的录音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也证明了与名牌产品相比，他们已不太在意生活上的温饱。然而随着名牌产品价格的抬升，对于这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就明显地得不到满足了。我们想想吧，假定一个国家的居民只进行生活品消费，而另一个国家的居民花在名牌产品上的钱和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钱同样多，那么在此情形下，消费统计数字会显示出两倍的差额。不过，这并不能代表两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就相差两倍。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假设全部依靠市场价格来推动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相对贫穷的国家也会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来生产奢侈品以满足人们对奢侈品需求的增长，而此时，奢侈品消费给人带来的满足会被给予很高的评价。而苏联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在有能力完全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之前，苏维埃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了延缓发展奢侈品经济。

若排除了那些关于生活的主观评价后，又仅凭人均收入数字去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那么就会察觉不到在统计过程中遗漏掉的许多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状况的关键消费基金数据（译者注，消费基金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中用于个人和社会公共消费的基金）。

首先，苏联的交换、分配结构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假定“免费”消费是通过社会基金运作来完成的，那么即便是以某种方式记入到了对比统计中，其产生的实际影响也会因计划经济商品的不同定价原则而难以追踪。总体上讲，日本人比德国人要穷，但日本的人均 GDP 用货币指数表现时，就高于德国了，原因——在于 GDP 的核算方式：在自然资源消耗量同等的条件下，哪个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流动”的资金越多，哪个国家按照人均收入计算出来的所谓生活水品就越高。这种情况下，两种要素相互交织着：

1. 在国家内部，不能用于出口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因较高的土地租金而变得异常昂贵。比如，重型建材，交通工具，理发服务和酒店的共有住宿服务，又或者是国家消耗掉的商品和服务。这些不能用于出口——进口的商品和服务通常构成了 GDP 的绝大部分。

2. 在同一时期，这个国家的货币长远预期汇率主要由商品出口价格和商品进口价格的比值来确定。它近期的其它商品价格要比那些土地租金较低的国家的物价便宜。（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关税，因为它会使货币汇率产生额外的偏差）所以在日本，可以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电视，但酒店小房间一天的住宿价格顶得上德国酒店小房间几天的住宿费用。

其次，苏联人为地压低能载体（译者注，能载体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导致了其可见 GDP 的缩减，而西方国家在这个经济指标上的表现是“自然”的。人为排除商品流通环节中的价格增量效应带来了这样的影响：价格控制降低了按市场价评估商业服务的可能性，而在西方国家却相反，那些服务所产生的 GDP 都可被记入统计数据中。

最后，在统计苏联 GDP 时，常常排除了那些官方数据外作为补充的，以半合法形式运作的影子经济成分，比如未注册的音乐家教服务，维修住宅的私活外快，与医生进行服务交换（比方说，送孩子进高等院校）等等。也时常不记录苏联 GDP 中的自然经济成分——比如郊外的别墅和宅院中种植的粮食。综上所述，苏联自身的种种经济特性导致了 GDP 指数不能真实地反映它事实上的经济成就。

于是我们想提醒读者，在查看任何对比苏联——西方生活水平的统计数据时，都要小心对待。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眼中，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十分接近西方国家的水平，因为在比较生活水平时，他们参考的是对苏联人民更有意义的数据：如蔬菜，牛奶，肉类的消费量，住房，教育水平，休闲娱乐以及文化发展程度。不过在有些苏联居民眼中，他们的消费量怎么样都要比美国乞丐少上 100 倍：尽管美国乞丐没有苏联人民那样的基本生活保障，他却有牛仔裤，有些苏联人就认为牛仔裤要比生活福利珍贵 100 倍。用统计西方国家人均收入的一般方法去统计苏联的人均收入，那么结果就是它的人均收入比美国少两倍。再加上没有相应方法去统计“免费”消费，这一差距便扩大到了二点五倍。而根据勃列日涅夫时代领导层收到的生活水平数据来看，差距是很小的。按照 80 年代的人均收入统计，无论怎样看，苏联的数字都会比美国少两倍，但它绝不会比意大利要差。在与意大利比较消费水平时，是存在着差别，特别是在城市商店橱窗的美观丰富程度上差别最大，但绝大部分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而“社会主义”的捷克那是肯定比“资本主义”的意大利过得更好。

为了证明苏联时期的供应水平能在世界上排到前十，我们在这里列举出三张（译者注，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进行对比，我们在下文中还额外加插了一张 09 年俄罗斯官方统计农产品数量的表格，详见表格. 3——俄罗斯历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对比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数据表格。

Таблица 1. Отношение ведущих стран к
лидирующей (Селищев А. С.,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ка,
с. 422)

表.1 主要国家 GNP 领先指数（Селищев А. С著，宏观经济学，422 页）

Годы ⁴³	Страна-лидер ⁴⁴	Вторая страна ⁴⁵	Третья страна ⁴⁶	Четвёртая страна ⁴⁷
年份 ⁴⁸	领先国家 ⁴⁹	第二位 ⁵⁰	第三位 ⁵¹	第四位 ⁵²
ВНП GNP⁵³				
1984 ⁵⁴	США – 100%⁵⁵ 美国 – 100% ⁵⁶	СССР – 51% ⁵⁷ 苏联 – 51% ⁵⁸	Япония – 34% ⁵⁹ 日本 – 34% ⁶⁰	ФРГ – 17% ⁶¹ 西德 – 17% ⁶²
1950 ⁶³	США – 100%⁶⁴ 美国 – 100% ⁶⁵	СССР – 29% ⁶⁶ 苏联 – 29% ⁶⁷	Англия – 19% ⁶⁸ 英国 – 19% ⁶⁹	Франция – 13% ⁷⁰ 法国 – 13% ⁷¹
1938 ⁷²	США – 100%⁷³ 美国 – 100% ⁷⁴	Германия – 37% ⁷⁵ 德国 – 37% ⁷⁶	СССР – 37% ⁷⁷ 苏联 – 37% ⁷⁸	Англия – 27% ⁷⁹ 英国 – 27% ⁸⁰
1913 ⁸¹	США – 306% ⁸² 美国 – 306% ⁸³	Россия – 123% ⁸⁴ 俄罗斯 – 123% ⁸⁵	Германия – 113% ⁸⁶ 德国 – 113% ⁸⁷	Англия – 100%⁸⁸ 英国 – 100% ⁸⁹
1870 ⁹⁰	США – 117% ⁹¹ 美国 – 117% ⁹²	Россия – 117% ⁹³ 俄罗斯 – 117% ⁹⁴	Англия – 100%⁹⁵ 英国 – 100% ⁹⁶	Франция – 85% ⁹⁷ 法国 – 85% ⁹⁸
1830 ⁹⁹	Россия – 132% ¹⁰⁰ 俄罗斯 – 132% ¹⁰¹	Франция – 105% ¹⁰² 法国 – 105% ¹⁰³	Англия – 100%¹⁰⁴ 英国 – 100% ¹⁰⁵	Франция – 87% ¹⁰⁶ 法国 – 87% ¹⁰⁷
Военные расходы 军费开支¹⁰⁸				
1984 ¹⁰⁹	США – 100%¹¹⁰ 美国 – 100% ¹¹¹	СССР – 100% ¹¹² 苏联 – 100% ¹¹³	Китай – 18% ¹¹⁴ 中国 – 18% ¹¹⁵	Англия – 15% ¹¹⁶ 英国 – 15% ¹¹⁷
1950 ¹¹⁸	СССР – 106% ¹¹⁹ 苏联 – 106% ¹²⁰	США – 100%¹²¹ 美国 – 100% ¹²²	Китай – 18% ¹²³ 中国 – 18% ¹²⁴	Англия – 16% ¹²⁵ 英国 – 16% ¹²⁶
1938 ¹²⁷	Германия – 651% ¹²⁸ 德国 – 651% ¹²⁹	СССР – 483% ¹³⁰ 苏联 – 483% ¹³¹	Англия – 161% ¹³² 英国 – 161% ¹³³	Япония – 154% ¹³⁴ 日本 – 154% ¹³⁵
1913 ¹³⁶	Германия – 129% ¹³⁷ 德国 – 129% ¹³⁸	Россия – 125% ¹³⁹ 俄罗斯 – 125% ¹⁴⁰	Англия – 100%¹⁴¹ 英国 – 100% ¹⁴²	Франция – 99% ¹⁴³ 法国 – 99% ¹⁴⁴
1872 ¹⁴⁵	Россия – 127% ¹⁴⁶ 俄罗斯 – 127% ¹⁴⁷	Франция – 119% ¹⁴⁸ 法国 – 119% ¹⁴⁹	Англия – 100%¹⁵⁰ 英国 – 100% ¹⁵¹	Германия – 68% ¹⁵² 德国 – 68% ¹⁵³
1830 ¹⁵⁴	Франция – 148% ¹⁵⁵ 法国 – 148% ¹⁵⁶	Англия – 100%¹⁵⁷ 英国 – 100% ¹⁵⁸	Россия – 92% ¹⁵⁹ 俄罗斯 – 92% ¹⁶⁰	Ав.Венгрия – 54% ¹⁶¹ 奥地利帝国 – 54% ¹⁶²

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工业生产				
1984 ^а	США – 100%^в 美国 – 100%^в	СССР – 52% ^в 苏联 – 52% ^в	Япония – 30% ^в 日本 – 30% ^в	ФРГ – 16% ^в 西德 – 16% ^в
1950 ^а	США – 100%^в 美国 – 100%^в	СССР – 24% ^в 苏联 – 24% ^в	Япония – 19% ^в 日本 – 19% ^в	ФРГ – 13% ^в 西德 – 13% ^в
1938 ^а	США – 100%^в 美国 – 100%^в	Германия – 40% ^в 德国 – 40% ^в	Англия – 34% ^в 英国 – 34% ^в	СССР – 29% ^в 苏联 – 29% ^в
1913 ^а	США – 235% ^в 美国 – 235% ^в	Германия – 109% ^в 德国 – 109% ^в	Англия – 100%^в 英国 – 100%^в	Россия – 26% ^в 俄罗斯 – 26% ^в
1872 ^а	Англия – 100%^в 英国 – 100%^в	Китай – 75% ^в 中国 – 75% ^в	США – 51% ^в 美国 – 51% ^в	Франция – 37% ^в 法国 – 37% ^в
1830 ^а	Китай – 319% ^в 中国 – 319% ^в	Индия – 185% ^в 印度 – 185% ^в	Англия – 100%^в 英国 – 100%^в	Россия – 59% ^в 俄罗斯 – 59% ^в

表格中数据来源: Russett B. U.S. Hegemony: Gone or merely Diminished, and How Does it Matter?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Ed. by Takashi Inoguchi & D. I. Okimoto. Stanford, 1988. p.87

Таблица 2.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среднегодовых доходов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лларах (по паритету покупательн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1988 г. (Селищев А. С.,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ка, с.423)

表.2 以美元计的年度人均收入比较（按照购买力平价），1988年。（Селищев А. С.著，宏观经济学，423页）

Страна ^в 国家 ^в	1000 г. ^в 1000年 ^в	1600 г. ^в 1600年 ^в	1800 г. ^в 1800年 ^в	1870 г. ^в 1870年 ^в	1913 г. ^в 1913年 ^в	1950 г. ^в 1950年 ^в	1988 г. ^в 1988年 ^в
Китай ^в 中国 ^в	600-700 ^в	480-580 ^в	470-530 ^в	370-430 ^в	400-450 ^в	400-450 ^в	2450-2550 ^в
Индия ^в 印度 ^в	570-650 ^в	450-550 ^в	410-470 ^в	360-420 ^в	480-530 ^в	410-460 ^в	830-890 ^в
Бразилия ^в 巴西 ^в	– ^в	– ^в	610-680 ^в	490-540 ^в	530-580 ^в	1020-1090 ^в	3400-3500 ^в
Индонезия ^в 印度尼西亚 ^в	– ^в	– ^в	– ^в	310-360 ^в	490-540 ^в	440-500 ^в	1200-1280 ^в
Япония ^в 日本 ^в	250-300 ^в	310-390 ^в	410-480 ^в	430-490 ^в	850-900 ^в	1090-1160 ^в	10400-10600 ^в

Британия ⁴¹ 大不列颠 ⁴²	350-400 ⁴³	520-620 ⁴³	1050-1130 ⁴³	2180-2280 ⁴⁴	3100-3200 ⁴⁵	4150-4300 ⁴⁶	9500-9700 ⁴⁷
Франция ⁴⁸ 法国 ⁴⁹	350-400 ⁴³	520-620 ⁴³	670-720 ⁴³	1260-1320 ⁴⁴	2180-2280 ⁴⁵	3170-3270 ⁴⁶	10700-10900 ⁴⁷
Германия ⁴⁸ 德国 ⁴⁹	350-400 ⁴³	520-620 ⁴³	710-780 ⁴³	1050-1130 ⁴⁴	2030-2130 ⁴⁵	2650-2800 ⁴⁶	11300-11500 ⁴⁷
Италия ⁴⁸ 意大利 ⁴⁹	350-400 ⁴³	520-620 ⁴³	700-770 ⁴³	1050-1130 ⁴⁴	1510-1610 ⁴⁵	2000-2150 ⁴⁶	8350-8550 ⁴⁷
США ⁴⁸ 美国 ⁴⁹	- ⁴³	- ⁴³	770-830 ⁴³	1450-1550 ⁴⁴	3550-3650 ⁴⁵	6330-6530 ⁴⁶	13900-14100 ⁴⁷
Россия ⁴⁸ 俄罗斯 ⁴⁹	350-400 ⁴³	450-550 ⁴³	550-620 ⁴³	700-800 ⁴³	1000-1200 ⁴⁴	1600-1900 ⁴⁵	6500-7000 ⁴⁶

Источник: Мельянцев В. А. 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во втором тысячелетии: уровни, темпы и фактор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Восток. 1991. № 6. с. 68; оценки по России предложены Селищевым А. С.

表格数据来源: Мельянцев В. А. 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во втором тысячелетии: уровни, темпы и фактор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Восток. 1991. № 6. с. 68; оценки по России предложены Селищевым А. С.

Таблица 3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основных видо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тысяч тонн)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Росстат,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9, с 458)

表.3 俄罗斯历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 千吨)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俄罗斯统计年鉴 2009, 458 页) (译者注, 此表中 1970 年, 1980 年和 1990 年的数字仅代表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P. C. Ф. С. Р) 的粮食产量, 并非全苏联的粮食总产量)

		1970	1980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1	Зерно в ведрах (т)	谷物产量 (脱壳后 净重)	107364	97232	116669	63403	65420	85084	84678	66962	77832	77803	78828	81472	108178
2	Ткани	Сахарный свекла (фабричный)	23903	24130	32327	19072	14051	14552	15659	19356	21810	21276	30673	28836	28996
3	Семена подсолнечника	向日葵籽	3066	1995	3427.1	4200	3919	2682	3688	4887	4810	6740	6743	5671	7350
4	Картофель	土豆	53933	36971	52708	39909	29465	29498	26922	29358	27876	28136	28260	27195	30744
5	Овощи	蔬菜	10066	11101	10328	11275	10882	11170	10665	11739	11214	11348	11370	11509	12960
6	Фрукты и ягоды	水果、浆果	2321	1950	2385	4606	2690	2378	2645	2446	2537	2404	1940	2504	2401
7	Скот и птица	屠宰后畜肉，禽肉	6213	7427	10112	5796	4446	4477	4733	4993	5046	4990	5278	5790	6268
8	Молоко	牛奶	45371	46823	55713	39241	32259	32874	33482	33316	31862	31070	31339	31987	32363
9	Яйца и птица	鸡蛋 (单位：百万个)	23594	39540	47470	33830	34085	35242	36378	36625	35901	37140	38216	38208	38058
10	Шерсть (в физически сокращенном виде)	毛料(实重)	209	213	227	94	40	41	43	45	47	49	50	52	53
11	Мед	蜂蜜 (单位：吨)	59262	46917	46091	57748	54248	52960	49699	48496	52964	52469	55679	53670	57440

Таблица 4 Сравнение показател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и США в 1987 году
 (данные из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справочника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обратим внимание на разброс номинальных цифр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верхней таблицей, но сохранени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х цифр)

表.4 1987年苏美经济数据比较(数据出自美国手册: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请注意, 要将此表中的数据与上面表格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后, 才能得出相关的结果)

	Показатели 1987 года ¹⁾ 1987 年指标 ²⁾	СССР ¹⁾ 苏联 ²⁾	США ¹⁾ 美国 ²⁾
		СССР ¹⁾ 苏联 ²⁾	США ¹⁾ 美国 ²⁾
1 ³⁾	ВВП GDP ¹⁾ 人均 GDP ²⁾	\$2375 млрд. ¹⁾ 23750 亿美元 ²⁾	\$4436 млрд. ¹⁾ 44360 亿美元 ²⁾
2 ³⁾	ВВП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¹⁾ 人均 GDP ²⁾	\$8363 доллара ¹⁾ 8363 美元 ²⁾	\$18180 ¹⁾ 18180 美元 ²⁾
3 ³⁾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зерна ¹⁾ 谷物产量 ²⁾	211 млн.тонн ¹⁾ 2 亿 1 千 1 百万吨 ²⁾	281 млн.тонн ¹⁾ 2 亿 8 千 1 百万吨 ²⁾
4 ³⁾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молока ¹⁾ 牛奶产量 ²⁾	103 млн.тонн ¹⁾ 1 亿零 3 百万吨 ²⁾	65 млн. тонн ¹⁾ 6500 万吨 ²⁾
5 ³⁾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артофеля ¹⁾ 土豆产量 ²⁾	76 млн.тонн ¹⁾ 7600 万吨 ²⁾	16 млн. тонн ¹⁾ 1600 万吨 ²⁾
6 ³⁾	Добыча нефти ¹⁾ 石油产量 ²⁾	11,9 млн. баррелей/день ¹⁾ 1190 万桶/天 ²⁾	8,3 млн. баррелей/день ¹⁾ 830 万桶/天 ²⁾
7 ³⁾	Добыча газа ¹⁾ 天然气产量 ²⁾	25,7 триллионов куб. Футов ¹⁾ 25.7 万亿立方尺 ²⁾	17,1 триллиона. куб. Футов ¹⁾ 17.1 万亿立方尺 ²⁾
8 ³⁾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¹⁾ 发电量 ²⁾	1665 млрд. кВт·час ¹⁾ 16650 亿千瓦时 ²⁾	2747 млрд. кВт·час ¹⁾ 27470 亿千瓦时 ²⁾
9 ³⁾	Добыча угля ¹⁾ 产煤量 ²⁾	517 млн. Тонн ¹⁾ 5 亿 1 千 7 百万吨 ²⁾	760 млн.т ¹⁾ 7 亿 6 千万吨 ²⁾
10 ³⁾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чугуна ¹⁾ 生铁产量 ²⁾	162 млн.т ¹⁾ 1 亿 6 千 2 百万吨 ²⁾	81 млн. т ¹⁾ 8100 万吨 ²⁾
11 ³⁾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цемента ¹⁾ 水泥产量 ²⁾	128 млн.т ¹⁾ 1 亿 2 千 8 百万吨 ²⁾	63,9 млн.т ¹⁾ 6390 万吨 ²⁾

12 ^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алюминия ^в 铝产量 ^в	3,0 млн.т. ^в 300万吨 ^в	3,3 млн.т. ^в 330万吨 ^в
13 ^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меди ^в 铜产量 ^в	1,0 млн.т. ^в 100万吨 ^в	1,6 млн.т. ^в 160万吨 ^в
14 ^а	Добыча железной руды ^в 铁矿石产量 ^в	114 млн.т. ^в 1亿1千4百万吨 ^в	44 млн.т. ^в 4千4百万吨 ^в
15 ^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пластмасс ^в 塑料产量 ^в	6 млн.т. ^в 600万吨 ^в	19 млн.т. ^в 1900万吨 ^в
16 ^а	Добыча бокситов ^в 铝土矿产量 ^в	7,7 млн.т. ^в 770万吨 ^в	0,5 млн.т. ^в 50万吨 ^в
17 ^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в 汽车产量 ^в	1,3 млн.шт. ^в 130万辆 ^в	7,1 млн. шт. ^в 710万辆 ^в
18 ^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грузовиков ^в 卡车产量 ^в	0,9 млн.шт. ^в 90万辆 ^в	3,8 млн. шт. ^в 380万辆 ^в
19 ^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жилья ^в 住宅建设 ^в	129 млн.кв.футов ^в 1亿2千9百万平方尺 ^в	224 млн.кв.футов ^в 2亿2千4百万平方尺 ^в
20 ^а	Добыча золота ^в 黄金产量 ^в	10,6 млн.тр.унций ^в 1060万金衡盎司 ^в	5,0 млн.тр.унций ^в 500万金衡盎司 ^в

统计数据在客观上指出，若与西方国家在同一基础上进行比较，那么苏联的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为了商店橱窗上的表面差距，和奢侈品消费服务方面的不足（这符合苏联领导层制订的政策：只有在苏联经济可以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活后，才可以加大这类消费），难道就必须要毁掉已取得如此成就的经济基础？

M. 库德里亚采夫，C. 米罗宁，P. 斯科雷宁

发表日期：2007年7月28日

俄文原文网址：<http://analysisclub.ru/index.php?page=stalin&art=2563>

译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637>

在黑格尔之前的列宁

作者：阿尔都塞

译者：带Q过人

在一年前的一次演讲（其内容已由马斯佩罗出版社整理为题为《列宁和哲学》的小册子）中，我试图证明，列宁应当被认为是为辩证唯物主义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发现。这个发现可以总结为如下说法：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并没有产生一种新的哲学（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实践，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哲学中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哲学实践。

这个我认为十分必要的发现可以准确地表述为以下几点：

1. 哲学不是一门科学。它没有对象，而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必须有一个对象。
 2. 哲学是一种以理论形式进行的政治干预实践。
 3. 它在两个特殊的领域进行必要的干预，即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政治领域和作为科学实践产物的理论领域。
 4. 本质上，它是在理论领域内通过对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产物的结合而被自身生产。
 5. 因此，它在政治实践和科学实践两个领域内以理论形式进行政治干预。而就它在这两种实践产物的结合中被自身生产而言，这两个领域便成为它的领域。
 6. 在构筑了整个哲学史的，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宏大辩论中，所有哲学都表述一种阶级立场，一种“党性”。
 7. 哲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包括了对哲学（作为“对世界的解释”的哲学）中唯心主义观念的拒绝——它否认哲学表述阶级立场，尽管它自己也总是这样做；以及对哲学中无产阶级立场的引入——唯物主义的，即理论上导致了阶级分裂的效果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哲学实践的引入。
-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找到，直白的抑或是隐晦的。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开始让它们变得更加明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著于1908年，那时列宁还没有读过，或者说没有真正读过黑格尔。列宁只是在1914和1915年才开始阅读黑格尔。我们要注意，就在列宁读黑格尔——先是《小逻辑》（《百科全书》），然后是《大逻辑》和《历史哲学》——的不久之前，列宁读了费尔巴哈（1914）。

也就是说列宁读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1914-15年，正是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头两年，1905年10月革命的惊雷后的第九年，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社会民主党在这时背叛了第二国际，它对神圣同盟的实践宣告了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和第三国际建立中所做的伟大事业的决裂被推向了极点。

今天，1969年4月，我们正经历着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二次事实上的断裂，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九大，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党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时回顾列宁在1914-1915年间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读绝非没有意义。这不是学院主义，而是哲学。而既然哲学是理论化的政治，因此这是一种政治。相比于列宁我们具有极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战争年代，并且对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有着更加清晰的展望，尽管它正面临着分裂，而这眼前的分裂甚至也可以成为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对此还所知了了。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总可以做出一些思考。

列宁关于黑格尔的悖论可以在两个事实的对比中得到领会：

1. 第一个事实

在 1894 年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时，列宁显然还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只是读了马克思在德文第二版《资本论》的后记中对于黑格尔的说法，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黑格尔的叙述，但列宁在书中用了十二页来讲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十二页的内容是一个反黑格尔主义的明确宣言。引用列宁的话来概括，这十二页的内容就是在说明“就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指控的荒谬性”（《列宁选集》第一卷 174 页）。列宁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他的“方法是黑格尔方法的‘直接对立面’”（167 页）。至于马克思中的黑格尔的公式，即《资本论》中，尤其是第一卷第一章中出现的那些，列宁与它划清了界限，他说那只是“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涉嫌“教条化的起源”，并深有同感地补充说“这一理论不应因这个起源而受到指责”（164 页）。列宁继续说，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三件套的“空洞的辩证法诡计”，是一个“盖子”或“果皮”。人们不仅可以不改变碗中被盖住的或水果中被包裹的东西地去除掉这个盖子或果皮，而且它们必须被掀掉或剥皮以便看到其中的东西。

我想要提醒读者的是，尽管列宁在 1894 年还没有读过黑格尔，但他已经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的阅读，而且——尽管只有二十四岁——他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人，因此在列宁那里可以找到对《资本论》最出色的阐释。这似乎也证明了理解黑格尔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最佳途径就是首先阅读和理解《资本论》。

2. 第二个事实

列宁在 1915 年对《大逻辑》的笔记中做出了一个人皆能诵的陈述：“格言：如果对黑格尔全部的逻辑学没有通读和理解，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其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人理解马克思！！”（《列宁选集》38 卷 180 页—列宁的感叹号）

对于任何一个浅薄的读者来说，这个表述与 1894 年的是明显矛盾的，因为不同于那个彻底反黑格尔主义的宣言，我们在此看到的似乎是一个赞同黑格尔的说法。的确，这个陈述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我们将它应用于列宁自身，我们也可以，在 1893 至 1905 年间对《资本论》写出精彩文本的列宁，也没有“理解马克思”，因为在 1904-1905 年之前，列宁同样没有“通读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

我将要任由那些循规蹈矩的评论者为了从这个小小的“矛盾”中脱身而挣扎，但我怀疑他们是否能从中取得哪怕一点进步，不管作为对列宁其他文本的出色评论者的他们如何声称，“矛盾”是一切进步的无穷动力，包括在理解上的进步……

至于我自己，我要说像赞同列宁第一个论断一样赞同他第二个论断中的每一个字。我应该对此作一个直接的解释。列宁所说的对于“理解《资本论》”来说是非常正确的，尤其是，正如列宁天才地指出的，“它的第一章节”，即第一卷第一部，特别是因为它仍然是黑格尔式的，这不仅体现在术语上，而且同样体现在它的阐述顺序上。完全地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必要的，有充足理由的。

我只需要指出一点，即就在几行之前（《哲学笔记》中的前一页）有着另一个有趣的公式，那么这第二个事实，列宁的这直白的论断就会变得不那么矛盾。事实上，列宁声称，“黑格尔对三段论的分析……让人想起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对黑格尔的模仿。”这是对马克思自己的判断的重复：他与黑格尔的“调情”。如果一个帽子合适，那就戴上它。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列宁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掀掉黑格尔的“盖子”，不像列宁那样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去阅读，不将它——如果你能原谅我的冒昧——重写一遍，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第一章。

这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我关于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的论点的核心：在他对黑格尔的笔记中，列宁完全站在他之前在《什么是“人民之友”》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采纳的立场上，即他读黑格尔之前的立场上，这将我们引向一个“惊人”的但是正确的结论：

基本上，列宁不需要通过阅读来理解黑格尔，因为他已经理解了黑格尔，已经深入阅读和理解了马克思。记住这一点，我就可以冒险提出一个独断的定理：“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人理解黑格尔，因为如果没有彻底研究并理解《资本论》，就不可能理解黑格尔！”挑衅是愤怒的原因，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一点上被原谅，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里。

至于黑格尔主义者，他们可以继续他们对黑格尔的哲学沉思，包括一切哲学沉思的沉思者，哲学史上一切解释的解释者。不管怎样，作为优秀的黑格尔主义者，他们清楚历史已经终结，因此他们只能在历史终结的理论中，即在黑格尔中原地打转。

毕竟，不只是转盘可以旋转，历史的车轮同样可以。而至少不停旋转的哲学史的车轮，在黑格尔那里的优点——正如帕斯卡尔赋予人高于芦苇的优点——在于它“知道这一切”。

既然这样，是什么让列宁对黑格尔的《大逻辑》如此感兴趣？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学会阅读列宁对黑格尔所做的笔记。这是老生常谈，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出一个必要而基本的结论。我们只得相信《哲学笔记》的评论者中从未有人做过一本他们自己独立阅读的笔记。

因为在做笔记时，有些只是对刚刚读过的内容的总结，有些则是对其的评论。而且有些笔记是写下来的，有些却没有。例如，试图将黑格尔的《大逻辑》与列宁的笔记作比较的人们不会看不到，列宁几乎完全忽略了《存在论》，除了一些概括外没有任何评论。这的确很奇怪，或者说，这暗示着什么。这些人们同样不会忽视，列宁关于《本质论》的笔记变得如此丰富（不只是概括性笔记，还包括批评性笔记，而且大多是持赞同态度），这显然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同时列宁在《主观逻辑》上花了很大篇幅，并对《绝对精神》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尽管这显得令人惊讶。

我无法着手于每一个细节，尽管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要强调对列宁关于黑格尔的阅读笔记的批判的，即唯物主义的解读的重要性。这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是如何阅读黑格尔，其次是要找出黑格尔中吸引列宁的首要因素，而最后要试图解释其原因。

I . 列宁如何阅读黑格尔

当他阅读黑格尔时，一个短语经常出现，即作为“唯物主义者”。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列宁阅读黑格尔时是在将它“颠倒过来”。这个“颠倒”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简单地将唯心主义“颠倒”成唯物主义。但请注意，在实践中这并非意味着将这一事件置于精神领域，反之，亦非只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即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变种，或者至多是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列宁在他对黑格尔的阅读中加入了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与众不同的。

换句话说，列宁并没有在阅读中以唯物主义系统的形式让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体系重新用脚站立。在阅读中列宁采纳了一种新的哲学实践，这种实践服从于无产阶级立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黑格尔中吸引列宁的首先是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的效果，即涉及到黑格尔主要用来讨论什么叫做“知识理论”和辩证法的篇章所产生的效果。

如果列宁没有依照“颠倒”的方法来阅读黑格尔，那么他又是怎样阅读的呢？是严格按照他早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描述的关于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的方法：“解脱”的方法。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黑格尔的术语和阐述顺序污染的文本的阅读中感到十分坚固的部分在黑格尔自己那里显然更加坚固，坚固一百倍。因此必须彻底解脱。哲学笔记中的一篇核心文本就此说了如此之多：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 abstrusen

(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哲学笔记》117-118页)

通过这个“解脱”的隐喻,我们还能怎样理解“澄清”或“提取”(一个被到处应用的措辞),如果这不是指黑格尔之中有某种需要从其果皮中取出的“合理”内核,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的多重果皮,即简单地说,若干差不多厚的外皮(想象一种水果,洋葱,或者洋蓟)?因此这种提取需要十分费力地解脱。有时,比如在绝对精神的章节中,这种唯物主义内核几乎到达了表面,只需温和的解脱就够了。有时,果皮又是如此之厚,与内核混杂在一起,需要将内核剥离出来。无论何种情况,或多或少的转换工作是必须的。但有时却只有果皮:没有什么值得保留,全部都要被抛弃,没有任何合理内核。从而在《大逻辑》中关于存在的部分,以及所有包含,直接或间接地,被列宁称之为“神秘主义”(即逻辑被让渡[alienated]于自然)的东西的篇章中,列宁都激烈地写道:“愚蠢!笨拙!难以置信!”,而且他完全地拒绝“关于绝对的呓语”。“我总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来阅读黑格尔:黑格尔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上帝、绝对、纯观念等等。”(86页)

因而这是一种特殊的方法。这种颠倒只是无产者在哲学上基于党派立场的断言:把唯心主义颠倒为唯物主义。真正的行动,真正的唯物主义阅读的工作包含一种极为不同的行动:

1.对大量的论点和事件的拒绝。这些论点和事件让我们做不成任何事,它们之中完全无法容纳任何东西,是没有内核的果皮。

2.通过真正的转换工作,实现对某种精心选择出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它们的被小心翼翼地从与果核混杂在一起的厚厚果皮中剥离出来的内核的保留。“一个人必须首先将唯物主义辩证法从其中(黑格尔的胡言乱语)提取出来。然而,它的十分之九是糟粕、胡说八道。”(154页)

这真是浪费时间!这些与奇迹般的“颠倒”毫无关系。

II.是什么吸引了列宁

列宁从黑格尔和对其的修正中保留了什么?

我可以于此一直前进下去。我将要把我的观点归入以下两个标题之中。它们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在《哲学笔记》的任何一个认真的读者眼中都是如此。第一个讨论的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第二个是关于绝对精神这一章节。

A.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

这永远不会失败。列宁每一次从黑格尔的文本中找到对康德的批判时,他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当黑格尔批评康德将自在之物的概念视为不可知时。列宁接下来的证明是确凿的,而且甚至是抒情式的:

实质上,黑格尔对康德的驳斥是完全正确的。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自然界的 knowledge,把上帝和拥护上帝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哲学笔记》142页)

列宁在这里仅仅是对恩格斯的重复: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

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我们应当怎样解释这种态度？我们应当注意，当列宁对黑格尔从黑格尔式的观点批判康德这一事实表示赞同时，他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黑格尔式的观点，但他的确是百分之百地赞同康德被批判这一事实，而且我们可以说是赞同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背后的大部分争论。这样一个观点是十分明显的：两个人完全可以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共同陷入与第三方的争论，或多或少不同的原因。

在列宁眼中，正如在黑格尔眼中一样，康德意味着主观主义[1]。在一个准黑格尔的表述中，列宁说先验性是主观主义和心理学的。那么自然地，列宁偶尔将康德与马赫作比较便不会令我们感到奇怪。因而列宁从客观主义的观点出发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达成了一致……但这是怎样的客观主义？我们很快便会看到。

无论如何，他喜欢黑格尔对自在之物的批判。与黑格尔的公式一样，他表示，这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为了使不可知物可以被思考而作的杜撰，自在之物即是现象之中的本质的身份。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空洞抽象，而黑格尔要求的是与实质相符合的抽象。（《哲学笔记》76页）

在这个双重主题中：对自在之物以及与之相应的东西的完全的拒绝——这种东西：现象中的本质的存在，列宁将它解读为本质的身份和自在之物（现象的本质身份）——列宁是赞同黑格尔的，尽管后者不会把自在之物的“现实性”说成是本质。也许是意义的阴影，但是重要的一个。

为什么说其重要？因为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是在绝对精神的名义下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黑格尔并没有止步于本质理论，而是在精神理论的名义下对康德的批判，而列宁则止步于可能会被黑格尔称为本质理论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看到列宁是“在什么名义下”批判黑格尔的主观主义：在客观主义的名义下，我已经说过。这种措辞很容易成为主观主义的装饰，如果它不被立刻怀疑。我们甚至不妨说列宁对康德的主观主义的批判是以唯物主义者的命题为名，这种论点是（唯物主义的）存在和（科学的）客观性的结合。列宁在唯物主义的命题下同时从哲学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客观性的视角对康德进行批判。这正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立场。

但这仍然向我们泄露出一系列重要的后果。让我们浏览一下这些后果。

包含在列宁“解脱”黑格尔的选择性阅读中的对康德的先验主观主义的评论使以下成为必须：

1. 对自在之物的排除和对本质和现象的身份的辩证行为的回归；
2. 对主体的绝对性的排除（无论是先验的还是其它）；

3. 在这种双重排除和自在之物向现象中的本质的辩证行为的回归之下，列宁制造出一种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常常是加下划线的效果：科学实践的解放，最终从使其僵化的教条中获得自由，从而得以重建其合法的生命存在——这种科学的生命仅仅是现实性自身的生命的反映。[2]

这是区分列宁和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的明确界限。在列宁看来，黑格尔是从绝对精神的观点，或暂且说是从“上帝”的角度出发批判康德；然而列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即从科学的客观性以及与其相关的，其客体的唯物的存在出发，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来批判康德。

这就是解脱和剥离的实践，提纯的实践，我们可以在其成为可能的地方看到这一点：列宁从他的角度出发在黑格尔的论著中取出感兴趣的东西，而黑格尔则以大为不同的角度在其中追求着其它东西。决定了选择的原则的是角度上的区别：对于列宁是科学的首要地位及其

唯物的客体；而对于黑格尔，如我们所知，科学，在此指科学家的科学（停留在智力领域），是不具有首要地位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科学是服从于宗教和哲学的首要地位的，这是宗教的真理。

B. 绝对精神的章节

我们从一个悖论转到另一个悖论。我刚刚说过，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吸引了列宁，但是是从科学的客观性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其真相，简而言之，即黑格尔中以绝对精神为代表的真相的角度出发。但是，列宁对绝对精神的章节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几乎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来阅读的：

妙就妙在：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差不多只有一次偶然露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的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哲学笔记》202页）

我们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个悖论呢？

最终是以一种相当简单的方式。但是这样做之前，我必须稍稍后退一些。

去年，我在让·依波利特的讨论会上读过一篇文章，在其中我指出了马克思在理论上欠了黑格尔什么。在批判性地考察了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可以被称作观念上的试验的辩证法之后——其中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理论接受了一次黑格尔式的注射，准确地说是历史的异化的过程的注射——我可以展示出这种结合是站不住脚的和爆炸性的，而且事实上它已经在一方面被马克思所抛弃了（手稿没有被发表，而且其中的内容后来被逐渐地抛弃了），而在另一方面它制造了一场爆炸。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站不住脚的论点是，历史是对主体的异化的过程的历史，在“异化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

但正是这个论点产生了爆炸。爆炸造成了主体、人的本质和异化的概念的蒸发，它们消失了，完全分裂为原子；同时还产生了没有主体的过程[procès 或 processus]的概念的解放，这是《资本论》中所有分析的基础。

马克思自己在法文版《资本论》的注释中提供了证据（这很有趣，因为马克思一定是在德文版出版三四年之后加上的这个注释，也就是说，是在一段足够让他抓住这种类别的重要性并表述给自己的间隔之后）。马克思这样写道：

procès（过程）一词表述了一种在其真实状况的总体下考虑的发展，这在欧洲长期被认为是科学语言的一部分。在法国，它首次被略显羞答答地介绍进来是以拉丁文的形式——processus.然后，被除掉书生气的伪装之后，它钻进了化学、物理、哲学等等的书本，以及一些形而上学的著作。最后它获得了进入一切自然科学的通行证。让我们顺便提一下，在德语的口语中，正如在法语中一样，在法律意义[即审判]上使用 Prozess（procès, process）一词。（《资本论》，Editons Sociales，第一部 181页。）

现在，对于任何一个“知道”怎样作为唯物主义者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人来说，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正是可以从《绝对精神》一章中找到的东西。庄·依波利特决定性地证明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与任何人类学都没有任何关系。证据是：历史是精神的，是一个从逻辑“开始”、在自然中延续并以精神终结的过程的最后的异化，这种精神可以以“历史”的形式呈现。对于黑格尔，与科耶夫和青年卢卡奇、以及他们之后的几乎是以自然辩证法为耻的其他人的错误观点完全相反，辩证法决不是历史所特有的，那意味着历史并没有把其自身

的起源包含在其自身，在任何主体之中。马克思主义传统就回归自然辩证法的论点上而言是十分正确的，它具有一种争议性的意义[3]，即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作用于历史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主体的作用，无论是绝对（上帝）抑或仅仅是人类，因此历史既没有哲学的起源又没有哲学的主体。现在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自然自身并非在黑格尔眼中那样是自己的起源；重要的是它自身是并非起源于它的异化过程的结果：即一种起源于逻辑上的任何地方的过程的结果。

问题在正是这里变得十分迷人。因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在一句话中扫除了自然是逻辑的异化的产物这样一种荒谬的想法，而且他还说《绝对精神》一章是准唯物主义的。这很奇怪。

在黑格尔中，逻辑在实际上的地位是什么？它是双重的：一方面，逻辑自身即是起源，是不可能继续向上追溯的，而异化的秘而不宣的过程即随之开始。因此这个过程似乎确实有一个主体：逻辑。但当我们深入地考察这个理应是绝对的主体的“天性”的时候，就在《绝对精神》一章中，我们发现它是被否认为起源的起源。这尤其可以从两点中看到。

首先，通过立即否定虚无中的存在，《逻辑学》在一开始便否定了伴随它产生的东西，这只能表明一件事：起源必须同时被证实和否定，因此主体必须在其存在的那一刻便被否定。

其次，在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断中，绝对精神只是绝对方法，这种方法，就其仅仅是过程的运动而言，仅仅是关于作为唯一绝对的过程的观念。

列宁将他的唯物主义阅读法应用到了黑格尔的双重论点上。而这就是他之所以对绝对精神如此着迷的原因。他从而也解脱并提纯了这个概念，保留了绝对，但拒绝了观念，这就是说列宁从黑格尔中取出了以下的论点：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绝对的，那就是过程的方法或概念，它自己是绝对。如黑格尔自己在《逻辑学》的开头暗示的那样，存在=虚无，而且正是从逻辑的角度看，起源作为起源被否定，主体作为主体被否定，列宁在其中发现了以下事实的证据，即排除一切起源和主体是绝对的需要（正如他简单地从对《资本论》的彻底的阅读中学到的），也就是说：没有主体的过程才是绝对的，无论是在真实还是科学知识的领域。

既然这个论点取得了突破，即持续地触到表面，更确切地说是果皮，那么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将其解脱以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即唯物主义辩证法、运动的绝对性、方法的真正的绝对过程：准确的说，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在基础科学中的合法性的概念，正如可以在《资本论》中，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比如弗洛伊德那里所能找到的那样。

关于物质性存在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论点从而在《绝对精神》一章中找到了一个激进的和令人不安的证据。对于一个没有读过马克思的黑格尔的读者这是完全令人不安的，但对于读过马克思的读者来说却是完全正常的。我甚至要说，对于任何一个没有读过黑格尔的，可以完全无视地谈及他的人，即对形势具有完整知识的人来说，这都是完全自然的，尤其是对于我曾经提到过的在1894年写了关于黑格尔的十二页文字的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以这篇评论为起点，现在轮到你去尝试着重读列宁对黑格尔的阅读，并且告诉我，我刚刚提出的惊人论点是否并非这个事实：

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人理解黑格尔，因为如果没有彻底研究并理解《资本论》，就不可能理解黑格尔。

感谢列宁，他让我们可以开始，不是阅读或者解释，而是理解黑格尔的哲学世界，同时，当然地，将其转化。

请允许我重提一点，列宁对黑格尔的预言，以及对黑格尔的阅读，只有从无产阶级的角度以及随之而生的新的哲学实践出发才成为可能。也许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对现在和将来有用的东西。1969年的所有形势都不比1915年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时期更加严峻——这绝不意味着当前的任务并不艰巨——只是没有那么艰难，尽管它看上去是另一个样子。在

一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对读者所作的要求：他有“为自己思考”的勇气，并且思考什么是正在准备之中，甚至是温和的和长期的，什么是在群众中酝酿着的，因为是他们而不是哲学家们在创造历史。

1969年4月

注释

1. “黑格尔在这里也斥责了康德的主观主义。这是值得注意的。黑格尔赞成外观、‘直接现存的东西’的客观意义。”（《哲学笔记》111页）
2. “很好！！如果我们问什么是自在之物，那么问题本身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着不可能回答的成分了……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一般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既‘自在’，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90页）“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的‘空洞抽象’代替了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日益深入的活生生的进展、运动。”（76页）
3. 在其他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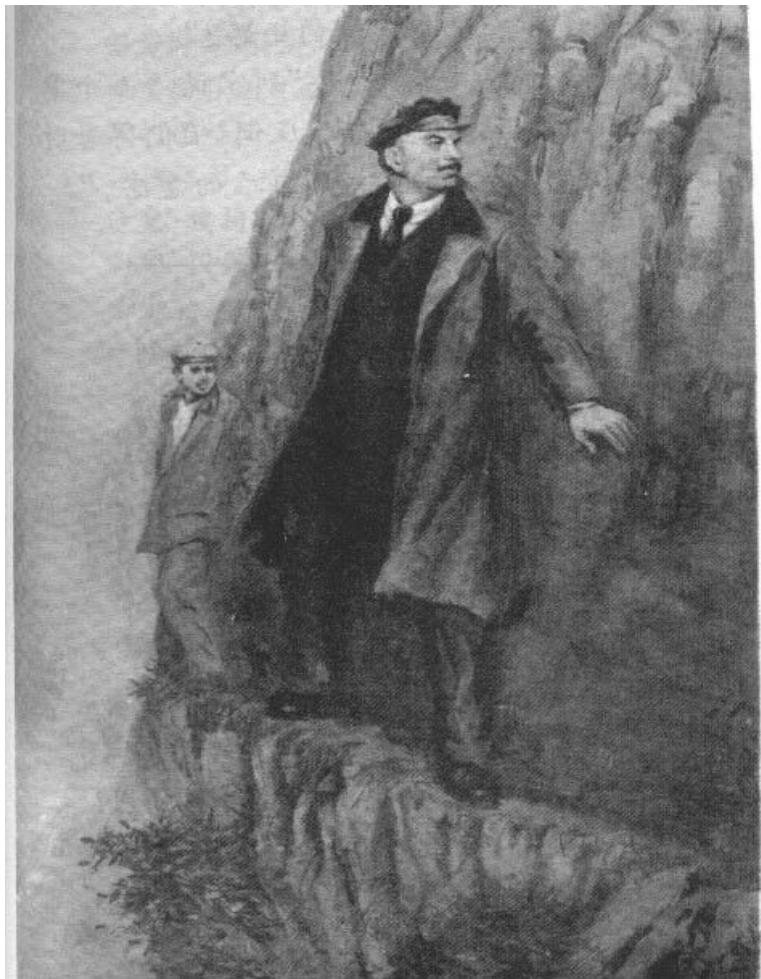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28>

如何从头开始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带 Q 过人等

(原文来自 NEWLEFTREVIEW《新左派评论》)



在其精彩的短文《政论家的短评》——写于 1922 年 2 月布尔什维克艰苦地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不得不退回为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留下了更大空间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中，列宁使用了一个为了抵达新的峰顶而必须沿其初次尝试的原路返回的攀登者的类比，以描述革命进程中后退的意义，以及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避免机会主义的违背原则的错误：

“假定有一个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空前的困难和危险，爬到了比前任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他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原定的道路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道：

“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仍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现在已经登到了世界上没有人登过的高处，要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更容易失足，很难观察迈脚的地方，同时没有勇往直前、走向目的地时那种兴奋

的情绪等等。现在必须用绳子捆在身上，花好几个钟头，用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把绳子紧紧拴住的地方；必须像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开目的地更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条极端危险和极端痛苦的下山道路是否就要结束，是否就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截地向前走，向上爬，登上山顶。

“一个人处于这样的境地，尽管他已经爬得非常高，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几乎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遥远的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看着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末灰心的时候会更多、更沉重。……来自下面的声音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他活该如此，别再发疯了！有些人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完全仿照尤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的方式行事：

“他们神情忧伤，目光悲戚，好像在说：‘不幸，我们的忧虑竟证实了！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定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这座高山吗？我们曾激烈地反对走现在连这个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看，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挪动一两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曾遭到最难听的辱骂！）。我们严厉地斥责过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伟大计划的热爱，千万不要糟蹋了这个伟大计划！”

列宁继续写道，“幸亏，我们打的比方中所假象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设想登山的‘真实朋友’的声音，否则也许要使他反感了。而反感，据说是不能使人头脑清醒、脚步稳健的，尤其是在那极高的地方。”

当然，隐喻不是证明：“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列宁接下来详细说明了苏维埃联盟婴儿期的真实情形：

“不仅同 1789 年和 1793 年相比，而且同 1871 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冷静、明确和清除地认识到：我们‘已经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没有反感和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

在列举了到 1922 年为止苏维埃国家取得的成就之后，列宁说明了还未完成的工作：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向来确认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我们暂时还是在单独地并且是在一个落后的、比别国破坏得更厉害的国家里做了很多事情。

“此外，我们还保存了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重新着手进行那还没有完成的事业。”

他还总结道：

“如果有些共产党员认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着手进行那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一个小农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一定要失败的。有些共产党员既不沉溺于错觉，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保存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这样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失败的，而且是一定不会失败的。”

这是列宁最为贝克特式的时刻，提前说出了《最糟糕，嗯》中的话：“再次尝试。再次失败。失败更好。”他的总结——从头开始——清楚地表明了他并不是在谈论仅仅放慢步伐和保住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退回起点：应当从头开始，而不是经过从前的努力已经达到的地方。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革命进程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重复运动，一次次从起点开始的重复运动。

乔治·卢卡奇在其前马克思主义的杰作《小说理论》中以这样一句著名的话结尾：“航行结束了，旅途才刚刚开始。”这是失败时刻的遭遇：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的航行结束了，但是真正的旅途，再一次开始的工作，才正要启程。但是，这种对倒退的接受绝不意味着放弃原则的开放，对政治对手的认同：“我们错了，你们的警告是对的，那么现在我们联手吧。”恰恰相反，列宁坚持这样的时刻需要最大程度的自律。几个月后，在1922年4月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列宁强调：

“在这里，我打个比方，假定全军都在撤退，那全军就不会有前进时的那种情绪。那时到处都会看到相当沮丧的情绪。……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用不着维持纪律，大家自己就会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更加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明白、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所看到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稍微有一点惊慌的言论，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确的退却发生混乱时，就要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列宁对这种立场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作为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教——“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向这么说，现在你们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复这一点吧。”——的回应，他告诉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我们就这一点回答说：‘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枪毙你们吧。或者是你们竭力不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们处于比白卫分子直接侵犯时更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如果你们想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做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

但是这种“红色恐怖”应当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区分开来。Sándor Márai 在其回忆录中为这种区别提供了准确的定义。即使在列宁主义专政最严厉的时期，那些反对革命的人被无情地剥夺了（公开和自由的）言论权，但却没有被剥夺沉默权：他们被允许收回言论自我流放。1922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推动下组织了臭名昭著的“哲学家熔炉”，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当得知一位老孟什维克历史学家被列入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名单，但他已因为重病而退回私人生活等待死亡，列宁不仅将他从名单上划掉，还要求为其提供额外的食物券。一旦敌人退出政治斗争，列宁的敌意就停止了。

然而，对于斯大林主义，即使是这样的沉默带来的回响也太多了。不仅大量的群众需要参加大规模的公共集会，以此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艺术家和科学家也不得不经常违心地参与官方公告的签署，或是为斯大林和官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吹捧。如果说在列宁主义的专政下，一个人会因为说了什么而被枪毙，那么在斯大林主义下，一个人则会因为没说什么而被枪毙。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自杀行为本身，最后的绝望的沉默，被斯大林宣判为最后和最严重的叛党行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这种区别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的一般态度：对于前者，社会是残酷的权利斗争的场所，这种斗争是被公开承认的；而对于后者，冲突，有时是难以察觉的，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外在于它的数量较少的害虫、叛徒的对抗。

苏维埃的力量分裂？

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这段文字是否必要？黑格尔式的回答会引起回顾的必要性：只要这段历史发生了，只要斯大林获胜，它就是必要的。一个辩证的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在变化中”设想它，找出斗争中每个可能带来不同结果的偶然事件，正如莫希·莱文（Moshe Lewin）在《列宁的最后斗争》中试图做的那样。莱文首先指出了列宁对组成苏维埃国家的每个民族国家的完整主权的坚持——毫不奇怪，在1922年9月22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斯大林公开指责列宁的“国家自由主义”。其次，他强调列宁把重点放在一个谦虚的目标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教育，普及识字、效率、技术；合作社，把农民转变为“受教育的商人”。这相对于“一国社会主义”而言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这种谦逊有时惊人的开放：列宁嘲笑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他总是将主题放在党的缺陷上，并强调苏维埃政策的临时性质，甚至引用拿破仑的话“*Ons' engage... et puis on voit.*”（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列宁反对国家官僚统治的最后斗争是广为人知的；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正如列宁注意到的，列宁一直在尝试用他提出的一种新的行政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实现民主和政党国家的专政的统一。尽管完全承认苏维埃政体的专政性质，但他试图在其顶峰建立一种不同元素间的平衡，一个“能够服务于相同功能的相互制约的系统——仅仅是不精确的比喻——就像在民主政体下的分权制衡”。一个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制定宏观的政策路线和监督整个党的机构。其中，中央监察委员会将会：

作为对中央委员会及其各种下属机构——政治局、秘书处、组织局等等的监察。其独立性由其同党代会的直接联系来保证，而不必经过政治局及其行政机构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介入。

检查和平衡，权力的分离，相互的制约——这是列宁对于“谁来管理管理者”这一问题的冒险的回答。这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想带有某种梦幻色彩：一个独立的、高素质的、有控制力的，由最优秀的教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非政治”的机构，来负责监督“政治化的”中央委员会及其组成机构——简言之，中立的专业人员规范着党的行政人员。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党代会的独立性——事实上这已经为派系禁令所侵蚀，这一禁令使党的上层机构得以控制代表大会并将批评者作为派系分子开除。如果我们记得这是出自这样一个领导人，他在其他方面对于政治斗争从来不给中立立场留下任何余地这一点都有着完全地认识，那么列宁对于专业人员的信任就显得更加天真。

已经吹起的风向在以下事件中变得很清晰。1922年斯大林提出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简单地宣布为同样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共和国政府：

“本决定如经俄共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通过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24页注文）

权力高层和基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不仅是被废止了——这意味着权力高层仅仅是强加其意愿——雪上加霜的是，这种关系被倒置了（re-staged as its opposite）：中央委员会决定了基层会将何种意愿提交给高层。

机敏和恐怖

列宁最后的战役中吸引我们注意的另一特点是他对于礼貌和文明的出乎意料的关注。列宁被两件事所深深地困扰：在一场政治辩论中，莫斯科在格鲁吉亚的代表奥尔忠尼启泽对一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肢体侵犯；而斯大林自己对克鲁普斯卡娅使用了言语辱骂

(因为发现她把列宁提议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信转交给了托洛茨基)。书信事件促使列宁写下了他著名的呼吁：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提议和对保持文明的重视绝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软化。在同一时期致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表述：“以为新经济政策已经使恐怖手段就此结束的想法是最大的错误。我们仍将采取恐怖手段，并将采取经济的恐怖手段。”

在其 1923 年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模式的设计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列宁暗示这一机构应当致力于：

“某种半开玩笑式的手法、巧计、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官气十足庄严堂皇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吃一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吏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同意。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引起人们的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快意的东西跟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开玩笑式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等等的东西呢？”(《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705 页)

难道这不是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严肃的”行政权力的可憎的孪生子吗？玩笑、巧计——美好的梦想，但也只是乌托邦。莱文强调，列宁的缺点是，他看到了官僚化的问题，却低估了其严重和真实的程度：“他的社会分析只是以三个社会阶级——即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而没有考虑到在一个主要经济成分业已国有化的国家里，国家机器也是一个明显的社会成分。”(《列宁的最后斗争》，莫西·莱文)

布尔什维克迅速意识到他们的政权缺少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行统治，但工人阶级已经在内战中不复存在了，因此他们是在以空虚的社会代表性实行着统治。然而，在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将其意愿加诸社会的纯粹政治权利的同时，他们忽视了一—既然它事实上占有，或作为缺席的占有者的临时代表占有着生产力——国家行政机构怎样才能“成为权力的真正社会基础”：

“没有一个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的‘纯粹’的政权。一个政体除了镇压机器本身之外必须要有某种其他社会基础。苏维埃政体所处的那种悬空的‘空白’很快就被填补起来了，即使布尔什维克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不愿看到它。”(《列宁的最后斗争》，莫西·莱文)

毋庸置疑，这一基础阻碍了列宁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计划。的确，在反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意义上，列宁坚持政治的自主权。但是，在巴丢看来，列宁的失误不在于如何让每个政治力量代表一定的社会力量或阶级，而在于怎样让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直接刻入其代表的层次自身，就像它自己的社会力量一样。列宁同斯大林的最后斗争从而具有了十足的悲剧的全部特征：这不是一幕好人同坏人战斗的情节剧，而是一出悲剧，英雄意识到自己是在同自己的继承者战斗，而且阻止他过去的错误决定的灾难性的发展已经太迟了。

另一条道路

那么在 1989 年的灾难之后，我们如今身处何境？正如在 1922 年，来自下面的声音带着恶毒的欢乐在我们身边响起：“你们活该如此！想要把极权主义的幻想强加于社会的疯子！”另一些人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哀叹着把悲戚的目光投向天空，好像在说：

“我们的忧虑竟不幸地被证实了！你们创造公正社会的幻想是多么高贵！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但是理智告诉我们，你们的计划只会以悲剧收场，并通向新的不自由！”在驳斥向这些惑人的声音做出的任何妥协的同时，我们当然不得不从头开始——不是在 20 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尽管这一时代从 1917 年持续到 1989 年或更早些的 1968 年——而是退回起点并选择另一条道路。

但是该如何去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问题在于缺少革命性主题：工人阶级为何没有完成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并成为革命因素？这个问题提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转向精神分析的主要理由，后者被用来解释深深嵌入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无意识力比多机制，这一机制阻止着阶级意识的觉醒。以此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的真谛得以保留：在中产阶级崛起的问题上没有理由为修正主义保留任何余地。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断致力于寻找可能成为革命因素的其他力量，以作为病态的工人阶级的替身：第三世界的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被排斥者。或许，对于革命因素的这种绝望追寻正是其相反状况的表现：害怕发现它，害怕在它已经蠢蠢欲动的地方看到它。等待别人来为我们做这一工作正是对自己不作为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兰·巴丢提出我们应当重新坚定共产主义的假设。他写道：

如果我们不得不抛弃这一假设，那么在共同行动的领域内不再有什么是值得做的。没有共产主义的视野，没有这一理念，历史的和政治的任何演变对一个哲学家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巴丢继续说：

“坚持这一理念，坚持这一假设的存在性，并不意味着其第一种表现形式，即对财产和国家的重视，一定要保持原状。事实上，被我们归于一项哲学任务，甚至一项职责的，是帮助将这一假设的新形态变为现实。”

人们应当注意不要用康德的方式来读这段话，将共产主义设想为调节性理念，从而唤起“伦理社会主义”的幽灵的重生，将其等同为先验的准则或公理。实际上，应当保持对一系列社会对抗的精确指涉，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正是从中产生；应当保持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产主义的正确概念，不是作为一种理想，而是针对实际存在的矛盾做出的行动。把共产主义当做永恒的理念反映了其从中产生的社会环境同样永恒，共产主义所针对的社会对抗始终存在。这种观点类似于一种解构性解读，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关于存在、关于废弃一切疏离的表征的梦幻，一个赖其自身的不可能性为生的梦幻。

尽管对福山“历史的终结”理论的嘲笑是容易的，但今日多数人都是福山主义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被公认为可能存在的最好社会形态的终极模式；人们唯一能做的是使其更加公正，更加容易忍受。一个简单而中肯的疑问由此产生：如果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即使不是最好的——最不坏的社会模式，为什么我们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成熟的方式委身于它，甚至全心全意地接受它？为什么要不辞艰难地坚持共产主义的假设？

阶级和共享资源

仅仅对共产主义的假设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当发现历史真实中的对抗，使其成为实际的迫切任务。在今天唯一的真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中是否包含着足够强大的对抗，可以阻止其无限的再生产？四种可能的对抗显现出来：生态灾难的隐性威胁；所谓的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合法性；新的技术-科学发展中暗含的社会-伦理问题，尤其是生物学领域；最后，同样重要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形式——新的围墙和贫民窟。我们应当注意到，在最后一点，隔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鸿沟，与其他三点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这标示出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说的“共享资源”的范围——社会成员的共

有财产，而共有财产的私有化是强暴行为，如果必要，应该暴力反抗。

首先，存在着文化的共享资源，认知资本的直接社会化形式：首先是语言，我们交流和教育的手段，同时还有公共交通、电力、邮政等等的共享基础设施。如果允许比尔盖兹垄断，那我们将处于一个荒谬的处境，一个私人个体将拥有与我们基本通信网络相关的软件组织。其次，存在着外部自然的共享资源，而它们正被污染和开采——从石油到森林以及自然产地本身。第三，还有内在自然的共享资源，即人类生物起源的遗产。这些斗争的共同点是意识到了，围绕公共资源自由运转的资本主义逻辑如果得到允许，会具有破坏性的潜力——一直到人类自我灭绝。正是对这些“公共资源”的关注让共产主义的概念得以复兴：它让我们能够将他们的进步围栏看做是那些被剥夺了自己的财产的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一个同样指向剥削的过程。今天的任务是复兴剥削——例如无名的“知识工人”被公司剥削——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只有第四种对抗，对局外人的关注，才能证明共产主义概念是正当的。没有什么比国家社群更私人的了，他们将被局外人视为一种威胁，为如何与他们保持合适的距离而苦恼。换言之，在这四种对抗中，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对抗是决定性的：没有它，其他的都会失去其颠覆之刃。生态学变成可持续发展难题，知识产权变成复杂的法律挑战，而生物遗传学则转变为一个伦理议题。一个人可以真诚地为环境而战，保卫知识产权的宽泛概念，反对基因版权，却不遭遇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对抗。这样，我们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只有康德意义上的“个人的”关注。全食食品(Whole Foods)和星巴克之类的公司继续享有自由主义者的喜爱，尽管它们都牵涉到反工联活动；他们的把戏在于以螺旋上升的方式销售产品：以“公平贸易”的价格买进咖啡豆制作的咖啡，价格昂贵的混合动力汽车，等等。简言之，没有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对抗，我们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比尔·盖茨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为消除贫穷和疾病而战斗；而默多克是最伟大的环保主义者，利用他的传媒帝国调集数亿资金。

越过康德往前，一个人应该在这里接着说，有些社会群体由于在社会等级的私有秩序中缺乏决定性地位，从而直接代表普遍性的社会群体：他们是雅克·朗西埃所说的社会群体中的“没有角色的角色”。一切真正的解放性政治运动都产生于理性的公共使用的普遍性与“没有角色的角色”之间的短接。青年马克思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共产主义梦想——将哲学的普遍性和无产阶级的普遍性结合起来。从古希腊开始，我们就为局外人介入社会政治空间取了一个名字：民主。

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同样关注局外人，但是以一种极端不同的模式：它关注于他们作为少数意见而被包纳。所有的立场都要被倾听，所有的利益都要被考虑，每个人的人权都被保证，所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习惯都被尊重，等等。这种民主摆脱不了的是对所有少数群体的保护：文化的、宗教的、性别的等等。这里的民主方案由谈判和妥协组成。在这里迷失的是局外人中体现的普遍性立场。新的解放运动将不再是一个特别的社会力量的行动，而是不同力量的爆发性结合。与“除了锁链无可失去”的无产阶级经典形象相反，将我们联合起来的是，我们正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中。我们面临着被降低到抽象的、空洞的笛卡尔式主体的威胁，失去我们所有的象征性内涵，我们的遗传基础被操控，在没有生活价值的环境中单调地活着。这种三重威胁把我们都变成了无产阶级，降低为“无实体的主体性”，就像马克思在《大纲》中表达的那样。“没有角色的角色”的身份使我们直面我们的真实处境；伦理-政治挑战正将我们指认为这种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已被排除在自然以及我们的象征实体之外。今天，我们都是潜在的“神圣牲人”，而避免让此成为事实的唯一途径就是预先采取行动。

马克思主义研习推荐书目

说明：毛泽东 1964 年 2 月 15 日曾批示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的三十本马恩列斯著作，当时对于提高干部理论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毛主席过去拟定的三十本书的基础上，为更贴近新时期青年的学习需要，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增删了部分书籍，制订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推荐书目，供有理论兴趣和钻研精神的进步知识分子参考。本书目排列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学习时可按个人需要，灵活掌握学习序列。一般应从较为浅显的概述性著作开始阅读。

1. 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走向成熟的认识论断裂期的标志著作。通过批判黑格尔死后的德国流行思潮，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开始制订新的世界观。该著作主体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完成和发表，手稿本身也遭到了老鼠牙齿的批判。由于后世整理者对于组版方式和手稿排序的见解分歧，在历次集结编撰过程中形成了众多不同版本。初学者可使用中央编译局编订的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该版以 1966 年新德文版为基础，阅读方便流畅，但无法把握手稿创作状况和原先排序。苏联梁赞诺夫版、日本广松涉版均已有中译本。欲深入研究者应以广松涉版（《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为基础文本。日本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内容的研究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岩佐茂等人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是由九位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专家采取集体研究方式，分专题对广松版进行文本解读的成果，代表了日本学界的整体水平。此外，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三章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值得认真对待。

2.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可对照学习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并参考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拉斯基《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许玉杰《解读共产党宣言》通俗简约，但无甚精义，可用于普及宣传。

3.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著作。在这三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一段连续的历史时期，对法国从二月革命、波拿巴政变直到巴黎公社的阶级斗争历程做了精辟分析，具体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后世的众多名家，如本雅明、福柯、萨义德、德里达、哈贝马斯和齐泽克等均受之影响颇深。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正面详尽论述。可使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三十至三十一卷。

5. 马克思《资本论》

初学者可使用中央编译局编订的节选本，并配合卢森贝注释。具政治经济学常识者可先

读恩格斯所撰第二卷序言。日人久留间皎造《〈资本论〉辞典》极精，但不易得。国内宋涛主编《〈资本论〉辞典》、陈征《〈资本论〉解说》、张薰华《〈资本论〉脉络》和孟氧《典故注释》亦有可取，且便于查购。陈岱孙《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胡代光《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密尔沃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史及其现实意义》和惠恩《〈资本论〉传》可作为补充读物。

6. 恩格斯《反杜林论》

曾被称做“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对传统教材的编纂体系影响极大。有中文新版单行本，资料收集较为完备。该书引论及第三篇被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适宜作为普及读物。

7.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浅显系统阐述，行文精练简要，极其适合作为入门读物。

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基本著作。有余力者可配合阅读《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内有马克思读摩尔根、梅恩等人著作的笔记。还应进一步阅读《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适当补充学习当代古生物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成果，勿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恩格斯的个别论述。

9.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普列汉诺夫以书信形式发表的论述艺术起源的著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是普列汉诺夫最有独创性的著作。《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两卷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和《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三联书店 1984 年），都收入了该作。初学还可使用王荫庭编《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局 2008 年）。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思潮。如对文艺理论有兴趣，可进一步阅读沃罗夫斯基《论文学》、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10. 列宁《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为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者必读。

11.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

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均有新版单行本。如欲深入理解列宁哲学著作，廓清流行谬解，应参考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已选入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和《在黑格尔之前的列宁》（已由带 Q 过人译出，少年中国学会网站发表）。

1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列宁《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应一并参照阅读。建议参考智效和关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等人社会主义观比较的系列论文。

1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斯大林最有独创性的著作之一，对包括巴赫金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在共运历史上曾起到了冲破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狂热的作用。

14. 毛泽东《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除《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选段外，还应参考邓力群主持编订、国史研究会付印的全本。

15. 葛兰西《现代君主论》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20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本书是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一部分，书中涉及对政党、政党的结构、权力分配、法律等问题的分析，内容极其新颖深刻。本书有陈越先生译本，书末附有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还可参考田时纲译《狱中书简》与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集》。

16.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路易·阿尔都塞是世界上无数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父，他的名字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为警觉和最为现代的阐释”（德里达语）。他根本性地提高了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理解水平，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科学哲学的深度对话，是当代不可绕开的巨大理论宝库。由于阿尔都塞曾对晚年毛泽东和文化革命予以高度评价和其他复杂政治原因，在中国，他的思想总是被知识界有意无意地进行遮蔽。陈越正主编六卷本《阿尔都塞文集》。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可供参考。《国外理论动态》杂志也曾发表有大量关于阿尔都塞生平和思想的文章。阿尔都塞曾经的得意门生、杰出的毛主义哲学家阿兰·巴丢（又译巴迪乌）业已出有中文版文集（《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阿尔都塞的其他著名弟子，如巴里巴尔、布迪厄、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普兰查斯和马舍雷等等在中文学界早是耳熟能详，思想倾向和术业专长各有差别，可根据研究需要选读。

17.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论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威齐是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作为可以与萨缪尔森、罗宾逊等人平起平坐的主流经济学家，奠定了当代英美激进经济学的根基。一个本可以名利双收的帅哥经济学家，不畏迫害和诽谤，长期主编美国进步刊物《每月评论》。《每月评论》也成为了二战后世界左翼思想的风向标。斯威齐晚年对共产党执政国家覆灭的反思，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重新评价，是冷战后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勇气的理论探索之一。《资本主义发展论》非常适合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入门教材。有余力者可进一步阅读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罗默《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社会主义的未来》、伊藤诚《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鲍尔斯《理解资本主义》等，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18.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权力与货币》

曼德尔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探索，有的观点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主流（包括斯威齐）并不一致，但苏东剧变后，更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曼德尔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点。作为第四国际的首席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在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掀起“曼德尔旋风”。曼德尔的部分观点与当时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主流（包括斯威齐）并不一致，并遭到共产党执政国家很多所谓“改革派”的敌视。但苏东剧变后，更多的人开始认真思考曼德尔为代表的托派理论家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曼德尔还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资本主义危机长波而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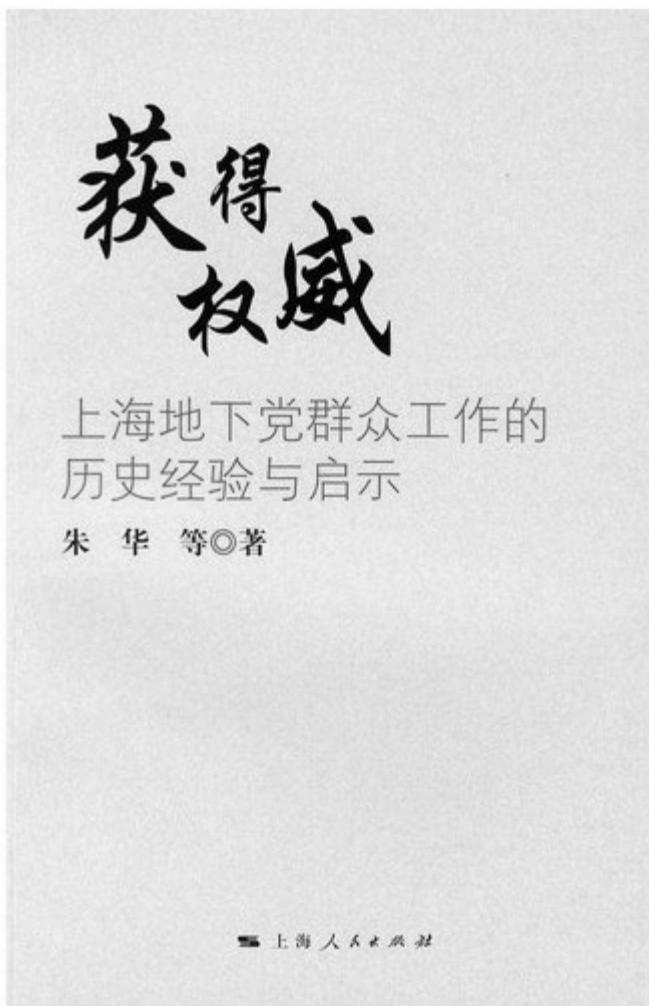
19. 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从维特根斯坦开始，分析哲学的主流向来有偏左的倾向。科恩（又译柯亨、科亨）深受阿尔都塞学派和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影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该书采用分析哲学手段梳理马克思使用的基本范畴和理论逻辑，论述清晰精确，回答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流行攻击。国内先后有重庆出版社岳长龄和高教出版社段忠桥两种译本。以段译为佳。科恩还以对罗尔斯、诺齐克的批判著称。读者可参考吕增奎编订的文集《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北大出版社2009年）是科恩晚年的演讲集，融自传、思想史和理论通俗解说为一体，集中表述了他的后期思想成果。新辩证法学派对科恩的批评可参见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本书目由边家村扯淡的人编订 黑夜里的牛、带Q过人、泥石流、王小晦协助宣传修改，鸣谢战斗猫猫熊、猫党基层党员、马前卒、庆辉、我靠。。。、清风任流岚、格拉玛号、荆楚巨子等同志支持）

豆瓣书列 <http://www.douban.com/doulist/314123/>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445>

少年中国荐书榜

这本书里虽然夹杂了大量无聊的官方语言，但是相信有思维能力的革命者都可以从众多纷繁芜杂的材料中找到有用的经验材料。

我们很多人已经关于从CCTV肥皂剧里了解地下党的所谓谍报工作，而根本不懂得地下党真正的价值在于群众工作。

革命年代，上海地下党从最初的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到被群众熟悉、接受，再到大批群众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听从号令，英勇战斗，这就是群众工作彰显效力的过程。而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实际上是尚未掌握国家政权的革命党获得权威的过程。这种权威，并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是群众的一种自愿服从、遵从。

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探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地下工作的失败。当时的共产党在工作中以“左”为荣，总是提出脱离普通群众认识能力的口号，搞冒险主义的集会。不但未能收到效果，反而导致了党组织的缩小。当时的江苏省委曾总结道：“缺乏精细的、切实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决不动摇的精神。”“因为地下党的宣传不易，便幻想来一个军阀战争或等

待一个革命高潮，爆发广大的革命宣传，因此忽略了日常的宣传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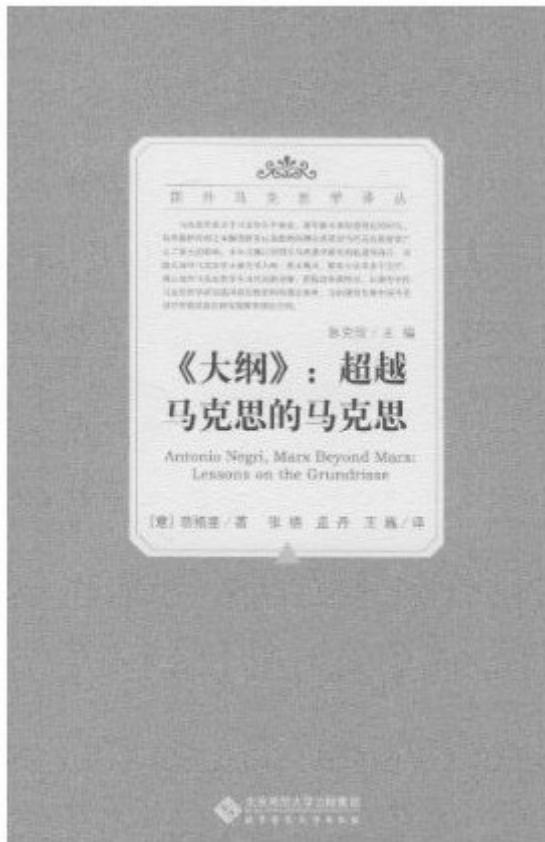
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进行政治革命，扎根社会不仅是党组织赖以存在的重要方法，也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策略。在抗战时期要求党员实行“三化”和“三勤”，使“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得以具体落实。“三化”指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三勤”指勤学、勤业、勤交友。

书中总结了地下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

地下党有两种不同政治环境的斗争模式：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两种模式下，都必须首先发动以群众直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斗争。然后通过经济斗争赢得群众信任，并逐步愿意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

要充分利用不同形式的民间组织来作为团结、联系群众的工具。这类组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工人阶级的工会或者工人俱乐部等。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会与招牌工会、黄色工会相抗衡。二是各种社团。通过工人夜校、读书会和读书小组等形式把群众集中起来进行政治教育，兴办不带政治色彩的社团，将群众联系起来，逐步施加影响。三是传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基于普通群众的思想水平，借助于同乡关系、裙带关系渗入有群众影响的传统组织中，如同乡会、帮会、慈善团体和基督团契等，借此接近群众，打开局面。事实证明，这种灰色组织和传统关系，有时候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

《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朱华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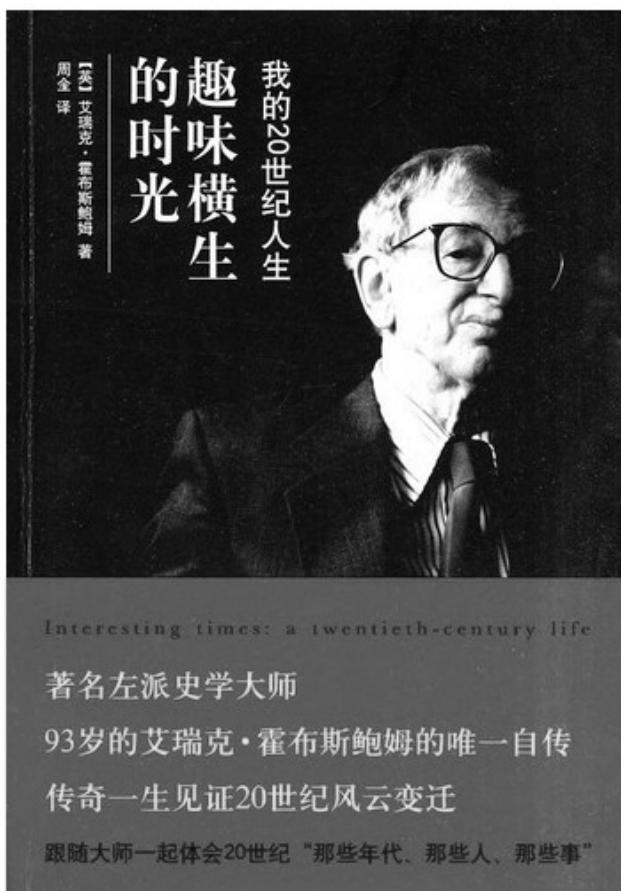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又被学界通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经常被忽视的著作。

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一项政治性解读，其基本问题是重建革命主体，这个问题意识来源于意大利的工人自治运动。

《超越》是奈格里在1978年春天应路易·阿尔都塞的邀请，在法国巴黎高师解读《手稿》的课堂记录。奈格里的这部作品的完成得益于他与阿尔都塞的相遇。奈格里曾回忆说，“我得说，在1977—1978年，我们之间观点的分歧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他（指阿尔都塞）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当时我在巴黎高师讲授《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经常见到他，他也经常出席我的讨论会。特别是，曾经有一度，不光是阿尔都塞还包括他身边的朋友，都严重低估了《手稿》的价值。我并不是说他们公开这样说过，但他们中最后有人怀疑《手稿》可能是和认识论断裂之前的那些文本一起写作的，也就是说，写作于马克思思想中伟大的结构主义阶段开始之前。”正是鉴于他和阿尔都塞学派之间对马克思的这一文本的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奈格里才会致力于对马克思这部伟大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力图在这部作品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洞见。

奈格里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态将工人阶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福特主义阶段相适应的专业工人。二是与福特主义阶段相适应的大众工人。大众工人的战斗性将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结合成对工厂工作的拒绝，并将其权力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机制上。它计划要创造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真正替换。三是与后福特主义的信息生产对应的社会工人。在社会工人这个角色上，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被结合在一起。奈格里认为，社会工人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它与前两个阶段的区分是根本性的，在大工业无产阶级时期，似乎只有带薪工人的劳动是生产的，因而所有其他的劳动看上去都只是再生产的或者是不生产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的生产更多地和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汇合在一起，这便是社会资本的含义。随着劳动转移到工厂之外，要保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作日计算的论断，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或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区分就显得十分困难了。在社会资本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工人整日都处在普遍性的生产之中。奈格里的解读一方面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尤其是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在劳动与资本的辩证法中重构了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另一方面他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重新发现革命主体，用社会工人替代了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也正是奈格里试图“超越马克思”之所在。

《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意）奈格里 著，张梧，孟丹，王巍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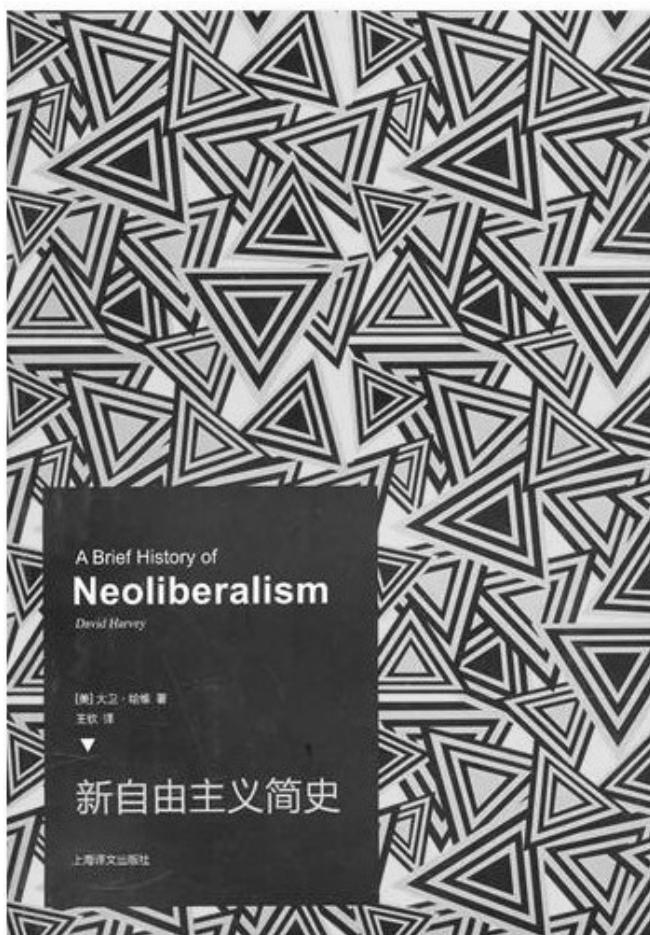
今天做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有心理准备迎接长期的寂寞。而左派历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的自传，告诉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左派，人生可以如此精彩。

身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他的笔触充满热情却不煽情，叙事方式叮叮当当却不试图勾勒一个戏剧化的人生，或者特意营造某种感染力。可是跟随他信手拈来的吉光片羽，才发现他侧面认识了许多影响二十世纪发展的重要人物，不论是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社会行动方面。他也许不是某个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在某种机缘下近身观察，加上身为历史学家对文献的娴熟掌握，帮助他速描事件中人们的处境，以及每个世代、每个地区的变动痕迹，让我们体会“那些年代、那些人、那些事”。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 14 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1946 年加入“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 1952 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

他认为历史的推动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为寇的军人和牧人，所以写作了《原始的叛乱》、《盗匪》等探讨平民叛乱的历史书。他认为学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写就了以一般大众读者为对象、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此外，《民族和民族主义》、《传统的发明》也影响颇大。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 20 世纪人生》，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中信出版社 2010 年 3 月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空间修整”（spatialfix）的过程，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传统概念中，加上“地理”一词，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似乎开始过时的话题，但谁能说得清新自由主义称雄的最近二三十年里，世界人民经受的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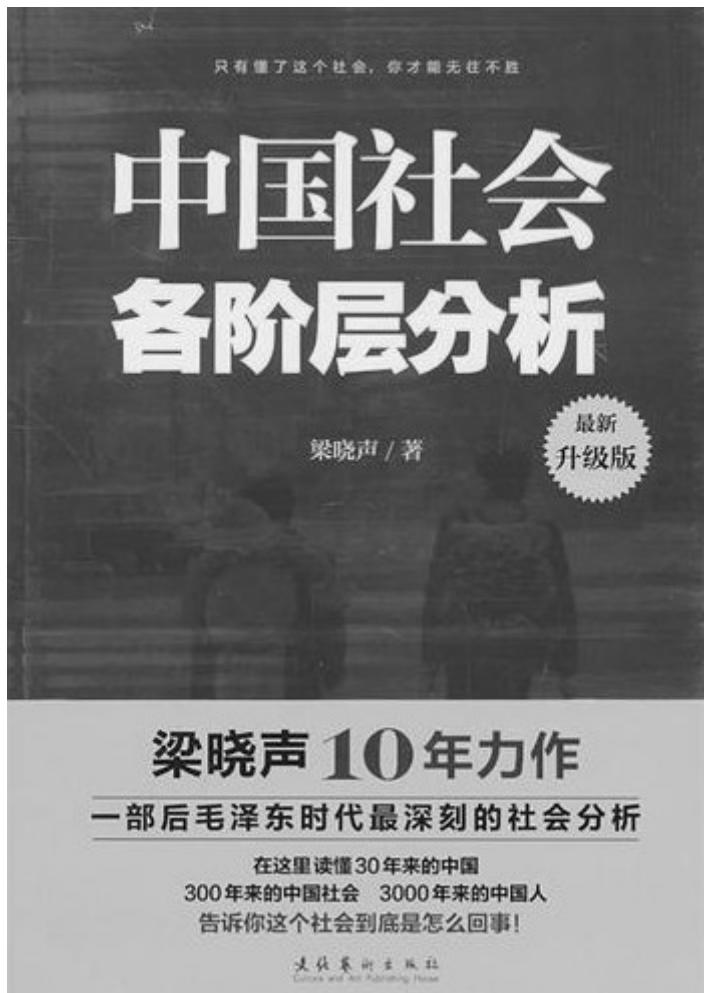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作者指出，在1997金融风暴之前，日本、韩国、西德等国未按照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发展经济，反倒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让人觉得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方案（如果它能算是方案的话）。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更快速的资本流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复合体威逼利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传播——上述各个方面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日本和欧洲被施加压力采取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因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将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

其中第五章“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尤其值得中国读者细细研究。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私有化道路”；作者认为，这一过程既提高了大部

分人民生活质量，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见第五章）通过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国有资产私有化、城市大规模工程项目等等现象后，哈维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重建。”

《新自由主义简史》，大卫·哈维著，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



梁晓声有这个时代特有的庸俗和自负，而且和中国当代大多数作家一样，鄙视理论思维。书中“过来人”的自恋和闭门造车的理论混乱比比皆是。

但是，他自然主义的描写方式，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宝贵的感性材料，而这些感性材料正是陆学艺课题组的无数统计报表有意无意遮蔽了的。

此书十多年前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并引发了理论界讨论当代中国阶级结构的热情。十年之后，梁晓声将中国社会最新的脉动增补入书。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年

边家村扯淡的人 摘编

原文链接：<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938>

后记

少年中国学会网站创办至今差不多三年了。在这不长不短的时间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危机而来的是中华崛起的凯歌式进程，许多国人也包括左派们都感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荣耀。然而，与复兴大业的兴旺发达形成鲜明对比，许多曾经的同志有意无意地逃离了另一条更伟大的征途——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行的无止境的斗争。但是，彻底的革命思想已经培育出一批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坚持下来了，并且暗自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而不仅仅是几个夜晚或者年少轻狂的岁月奉献给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刚刚进入历史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要独立地进行战斗。我们是唱着张广天的歌，看着乌有之乡旗帜网的文章，听着新左老左的讲座一步一步触摸到真理并坚定信念的。谁能料到，几年之后，连张广天都在博客中说道：“说我是新左派，其实很丢人，现在新左派都堕落成民族主义者了”。曾经的同志或者老师与自己渐行渐远，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得不独立地创造历史。

少年中国学会网站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新的产物之一。年轻的革命者们要传播真理，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几年来，同志们在这个新生的阵地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其中不乏饱含革命激情颇具理论深度的作品。爱上网的朋友兴许都看过了，但有些同志由于各种原因，不便于上网。为了方便这些同志阅读，我们特地编印了这本文萃。由于经费紧张，只能印刷得简朴一点，望同志们体谅。

目前，少年中国与各大左派网站相比仍是不起眼的，这就如同马克思主义青年群体在左派反转大军面前暂时显得孤立弱小一样。我们刚刚踏出第一步，就面对左翼阵营里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思潮。如何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那些没有立场问题而只是认识不清的同志团结到我们身边，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坚信，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那些掌握了革命理论，把自己的命运跟无产阶级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我们想感谢伴随网站一路走来的同志们，感谢你们工作和学习之余辛勤地撰稿，翻译。也感谢那些一直默默地支持少年中国评论的读者们，是你们给我们以前进的动力。需要特别地感谢上海的CC同志，他不仅是网站的忠实读者，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还坚持不懈地把网站的文章整理归档。看到这么多有着坚定信仰的同志，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的话：“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这段话献给亲爱的同志们，与大家共勉！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2011-6